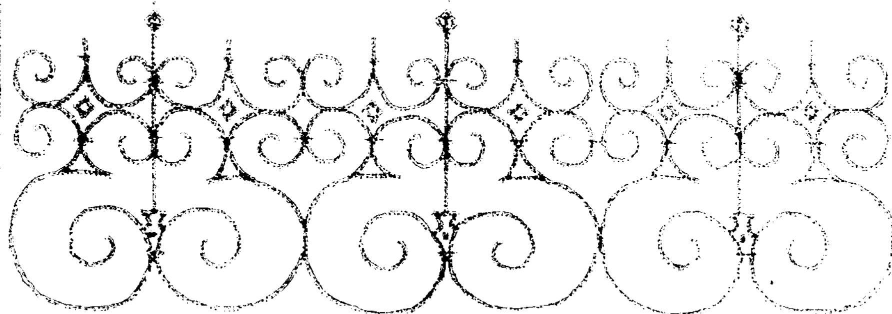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第二卷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第 二 卷

孙伯鍨 金隆德
任吉悌 涂荫森

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第二卷
孙伯鍨　金隆德
任吉悌　涂荫森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125　字数：273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
书号：2088·118　定价：（精装）5.50元
（平装）3.70元

目　录

第一章　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的总结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1
第一节　1848年欧洲革命的特点及其世界历史意义………………2
第二节　对1848年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11
第三节　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革命学说……………………………………………25
第二章　《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39
第一节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观点和方法……………………………………………41
第二节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及其历史地位的剖析……………………………………………45
第三节　《资本论》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研究……………………………………………58
第四节　《资本论》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阐述……………………………………………80
第五节　《资本论》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论证……………………………………………93
第三章　《资本论》中的科学方法论………………………………104
第一节　《资本论》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继承与改造………105
第二节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形而上学方法的批判………113

第三节　矛盾分析方法……118
第四节　质量和数量辩证结合的分析方法……126
第五节　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131
第六节　逻辑分析的开端……140
第七节　科学抽象的作用……145
第八节　逻辑进程与历史发展的一致性……151
第九节　分析和综合的结合……158
第十节　归纳和演绎的结合……164
第四章　恩格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研究战争和军事科学……180
第一节　恩格斯对战争和军事科学的研究……181
第二节　战争和军队的本质、起源及其发展规律……187
第三节　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及其发展规律……198
第四节　军事中的战略、战术和各种因素的辩证关系……205
第五章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过程中对国家学说的进一步发展……222
第一节　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225
第二节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229
第三节　用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234
第六章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确立……244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科学发展成就的研究和总结……245
第二节　自然科学和辩证法……252

第三节　物质及其存在形式 …………………………………264
第四节　从自然界向社会的过渡 …………………………275
第五节　自然界的辩证法 ……………………………………280
第六节　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逻辑方法 ……………………292
第七章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302
第一节　批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 …………………303
第二节　批判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理论…………314
第八章　恩格斯在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中系统阐述和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观点…………336
第一节　恩格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336
第二节　批判杜林的"共同社会"的空想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342
第三节　揭露杜林思想体系的核心仍是十八世纪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355
第四节　批判杜林的形而上学真理观，论述认识过程的辩证法……………………………………………………362
第五节　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暴力论，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374
第九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384
第一节　恩格斯创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揭示人类社会初期的真实历史…………………………384
第二节　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 ……………………………………390

第三节　社会、家庭和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相互关系 …………400
第四节　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 ……………………………………410
第五节　国家的起源和本质 ………………………………………416
第十章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后四十年来斗争成果的科学总结……………………………………424
第一节　全面系统地剖析了德国古典哲学…………………427
第二节　第一次科学地提出和阐明了哲学基本问题……………442
第三节　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概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458
第十一章　十九世纪90年代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475
第一节　保·巴尔特和保·恩斯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及恩格斯对他们的批判……………………………476
第二节　经济基础及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490
第三节　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502

第一章　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的总结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问世后，就开始进入了一个在实践中运用、检验并获得发展的新时期。

《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几个星期，就迎来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战斗考验。这次革命，从意大利开始，在法国具有了全欧性质，紧接着法国二月革命（2月24日）胜利之后，3月13日和18日，奥地利和普鲁士也相继爆发了起义，革命风暴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使这次革命很快发展到它的顶点。随着六月起义的失败，革命就急速地沿着下坡滑去。反革命向革命的进攻最初也开始于意大利，在六月事变中镇压了巴黎的革命起义，10月和11月，维也纳和柏林都相继落入反革命手中。事变的整个进程又落在它的起点的后面去了：在法国，以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而宣告结束；在德国，则以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维护宪法运动的彻底失败（1849年7月）而告终。但是，1848年革命毕竟是有着全世界历史意义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中突出的中心点。为了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他们根据《共产党宣言》所确立的观点，深入研究这次革命、特别是由六月起义所开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和经济政治条

件，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有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前者着重总结了法国革命的经验，后者则主要是针对德国的事变而写的。这些著作是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当时事变的历史从而作出科学结论的卓越典范。正如列宁说的："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象在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①

第一节 1848年欧洲革命的特点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自1848年初开始，意大利、法国、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和波兰等国，相继爆发了革命，英国、爱尔兰等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是世界近代史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在这次革命中，各个国家都有自己所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法国，主要是铲除封建残余，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德国，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英国，是要争取普选权，改革选举制度；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波兰等，则是反对民族压迫，要求实现民族独立。但是，总的说来，这是一次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

法国，是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早在十八世纪末叶，法国经历了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不久，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拿破仑取得了政权，废除共和，宣布

①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4页。

帝制。随后，波旁王朝利用拿破仑对外战争的失败得以复辟。1830年7月又发生革命，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取代了波旁王朝的查理第十。

奥尔良王朝是金融贵族的专政。它对内压迫，对外屈从于反动的“神圣同盟”，早已激起了普遍的不满情绪。1845—1846年的农业歉收和1847年的经济危机，使深受其害的劳动群众对奥尔良王朝统治的不满情绪空前高涨。在1848年1月12日意大利的巴勒摩人民起义的激发下，2月23日法国工人举行总罢工，24日发展为声势浩大的工人武装起义，推翻了奥尔良王朝，获得了胜利。但是，当工人还在街垒中浴血奋战的时候，共和派资产阶级却趁机窃取了革命果实。在工人逼迫下，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并通过了和无产阶级利益直接有关的一些法令，设立了专门研究工人问题的常设委员会，给共和国打上了“社会”的烙印。但是，资产阶级对此是不甘心的，它通过临时政府解除了无产阶级武装，组织了反动的别动营，挑拨工农关系，在4月23日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中，以压倒的优势取胜。

制宪国民议会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专政，它镇压了5月15日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6月21日又强令驱逐国家工场的工人，迫使无产阶级于6月22日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4万名起义工人，经过4天激战，终于被政府军镇压下去。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第一次伟大搏斗，是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的战斗。六月起义失败后，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又在资产阶级内部的不同集团之间进行下去。起初，共和党同由各种保皇势力组成的秩序党之间展开斗争，结果，在1848年12月10日总统选举中，得到广大农民和秩序党等支持的路易·波拿巴（1808—1873）当选为总统。1849年5月13日立法国民议会选举中，秩序党战胜了共和

党，保皇派资产阶级专政便取代了共和派资产阶级专政。6月，秩序党又镇压了社会民主派的反抗。此后，代表行政权力的路易·波拿巴同代表议会势力的秩序党之间的斗争就表面化了。路易·波拿巴在自己的势力巩固壮大之后，便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了政变，次年12月2日废除共和，恢复帝制，终于以法兰西第二帝国代替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而使这次法国革命宣告结束。

在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等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都先后发生了革命。十九世纪40年代末，德国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各邦之间的矛盾，都已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资本主义的发展，迫切要求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1846—1847年德国的农业歉收和工业危机，使上述各种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在法国二月革命的鼓舞下，1848年2月末3月初，德国的革命风暴首先在邻近法国的巴登、瓦登堡、巴伐利亚等地爆发。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工人、市民、大学生联合起义，很快推翻了梅特涅的反动政府。同时，普鲁士首都柏林人民经过流血斗争，迫使国王于3月18日宣布立宪和召集联邦议会，将军队撤出柏林，人民获得了胜利。但是，统治权却落入了大资产阶级的手中。为了解决德国的统一问题，5月18日在法兰克福召开了全德国民议会。然而，议会一成立，就为背叛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所掌握。随着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德国反动势力也转入进攻。8月23日，奥地利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勾结一起，镇压了维也纳工人的示威。10月6日，拒绝开赴匈牙利的士兵在维也纳举行了起义，一度把政权夺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占优势的市议会手里，但由于起义没有坚强的领导，结果仍遭失败。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的帝国宪法，规定德国是一个统一的君主立宪国家，遭到各邦政府拒绝。5月初，南德各小邦发生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在这一斗

争中，小资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农民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走在斗争的最前列。但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法兰克福议会在6月18日被解散，6月底，各地起义先后被镇压下去。至此，德国这次革命也就宣告终结。

在1848年革命时期，欧洲许多长期分别受着俄、普、奥等帝国统治的国家，也掀起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意大利，1848年1月12日巴勒摩人民首先发动起义，推翻了当地的反动政权，3月，米兰、威尼斯和伦巴第等地的人民以武装起义赶走了奥地利军队，1849年2月成立了罗马共和国。但是，在法国、奥地利、西班牙等反革命联军的袭击下，8月间罗马共和国遭到覆灭。在匈牙利，1848年3月15日布达佩斯人民起义的胜利，迫使奥地利政府承认了匈牙利的独立内阁，在多次击退奥军的进攻后，1849年4月成立了匈牙利共和国，8月俄奥联军则战胜了匈牙利共和国。在1848年革命影响下，罗马尼亚的摩尔多瓦、蒙特尼亚、特兰西瓦尼亚三个公国也相继爆发了革命运动，有力地打击了沙俄、奥地利等外国统治者；1848年3月17日，捷克首都布拉格工人实行罢工，6月12日举行起义；同年3月，波兰的克拉科夫、利沃夫和波兹南人民也举行了示威，提出了实行政治自治和民族平等的要求。这些起义，都先后被俄、普联军所镇压。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这些民族独立运动虽然失败，却表现了被压迫民族的巨大革命力量，沉重地打击了俄、普、奥等国的反动统治者。

1848年革命是欧洲历史上的转折点，是资产阶级革命旧时代的终结和无产阶级革命新纪元的开端。在1848年革命中，无产阶级为彻底实现民主任务而奋斗，而资产阶级则力图把民主改革事业缩小到最低限度。在革命的进程中，一方面，转向反动的资产

阶级已经成为反人民、反革命的力量；另一方面，正在崛起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阻挠反革命势力的联合进攻。这种情况构成了这次革命的特点，并使它最后走向失败。在革命由于工人的浴血奋战初次获得胜利之后，资产阶级即普遍地慑于“红色怪影”而纷纷同反动势力结成联盟，使革命夺得的政权依次落入越来越右的政党手中。这在法国表现得特别典型，同它1789年的革命相比，适成鲜明的对照。在1789年革命中，立宪派的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的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革命是沿着上升的路线进行的。而1848年革命的情形刚刚相反，它是沿着下降的路线进行的。先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背叛了无产阶级，接着资产阶级共和派抛弃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后来属于保皇势力的秩序党又抛开了资产阶级共和派，最后路易·波拿巴战胜了秩序党。马克思说：“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①甚至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德国，资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也不能起领导作用，三月革命的硝烟未散，它就转到了和封建势力相勾结的反革命的立场上，出卖了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必要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和农民。事变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所作的分析。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消失，无产阶级开始跃居历史的领导地位。1848年革命中的法国工人阶级，已经获得了较之1830年要多得多的政治独立性。工人们开始用巷战推翻了路易·菲力浦政府，接着就迫使资产阶级宣布成立共和国，并且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尽管工人们的要求本

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5页。

身还很不明确，但已经使资产阶级感到是一种切实的威胁。当资产阶级公开叛变革命并要用武力取消工人阶级的一切胜利果实时，工人们就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六月起义作为回答。六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揭开了无产阶级革命新纪元的序幕。六月的失败较之二月的胜利有着更加伟大的意义。二月革命的悲喜剧式的胜利给予工人阶级的仅仅是模糊的幻想和空洞的诺言，它不过是以统治阶级中的另一批人代替了统治阶级中的这一批人。而六月革命则是反对整个统治阶级的，包括统治阶级中最激进的部分。在六月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观念——自由、平等、博爱的残余，是无产阶级在二月革命前所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二月胜利后的陶醉不能使他们摆脱，只有六月失败后的屠杀才能使他们摆脱。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它不仅不借助于任何历史传统、理想和幻想来作为自己的精神摇篮，而且要以同一切旧观念彻底决裂为其先决条件。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诞生而战斗过的斗士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内容，为了获得创造新社会制度所必需的英雄行为和自我牺牲的热情，曾经在罗马共和国的传统中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无产阶级革命却必须要在另一种条件下进行。马克思说："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①

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6页。

但是，无产阶级要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乘着二月革命胜利的余威，工人们的要求似乎得到了形式上的满足。工人们要求成立专门的劳动部，资产阶级就在卢森堡宫为他们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常设委员会，其任务是探究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办法，使他们有事可做。实际上，这是一个虚设机构，它既没有经费预算，也没有行政权力，只有用自己的额骨去撞碎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工人们要求“组织劳动”，资产阶级就为他们成立了“国家工厂”，收容了十万失业工人，驱使他们从事繁重而效率极低的土工劳动，只发给他们微不足道的工资，这完全是一种“露天的英国习艺所”①。其实，雇佣劳动本身已经是按资产阶级方式“组织劳动”，资产阶级社会的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就是资产阶级的劳动部，在它们旁边成立的无产阶级劳动部，只能是一个虚弱无能的部，只能是一个仅有善良愿望的部，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工人们陶醉于虚幻的胜利，相信能在与资产阶级并存的情况下解放自己，但是一到资产阶级稍微站稳了脚跟，国民议会就立即同工人们的社会幻想实行了决裂，否决了设立专门劳动部的提案，并且宣布：“现在的问题只是要劳动回复到原有的状态。”资产阶级还命令用强力把一切单身工人逐出国家工厂，或是编入军队。愤怒的工人再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用大规模的起义作为回答。就这样，蒙在共和国头上的面纱被撕破了，无产阶级在血泊中从二月胜利的醉意中清醒过来了。

继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起义失败之后，1849年6月民主

①习艺所是英国根据1834年通过的济贫法所规定的“救济”贫民的方法，即将贫民安置在“习艺所”中，强迫他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劳动。它同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人们称之为“穷人的巴士底狱”。

派小资产阶级也遭到了失败。小资产阶级在帮助资产阶级击败了起义的工人之后，丝毫没有使得自己的财产和地位获得更多的安全和保障。既然他们断然地推开了站在自己身后的强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他们就只得以债务人的身份单独地面对着资产阶级的无情宰割。他们的名义上的财产和虚幻权利顷刻间都化为乌有，其中有一大部分人已完全破产，其余的人则许可在完全受资本奴役的条件下继续经营自己的业务。于是他们惊愕地认识到，他们把工人击溃之后，就使自己毫无抵抗地陷入资产者的掌握之中了。他们提出“拯救财产！”但是，他们所居住的房屋、做生意的店铺、出卖的商品都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的虚幻的财产只是作为别人的资本才是真实的财产。正是要反对他们自己，才可以拯救这种财产。他们提出“恢复信用！”但是，恢复了的信用表明自己是一个威然站立在债务人面前的冷酷无情、满怀复仇心情的凶神。他们的失败必定换来了对自身利益的更为清醒的意识。所以，随着事变的进程，由于一系列的失败，不仅无产阶级革命化了，而且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也日益革命化了。“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忽然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为保证现代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绝对必需的形势、关系和条件。”① 这就是说，1848年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毕竟在不同程度上打击和动摇了封建制度或其残余势力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促进了欧洲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事业的发展，同时它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和准备了基础，为各国无产阶级走向国际联合展示了光辉的前景。正是从上述意义上，马克思作出了简

---

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6页。

短而明确的结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①

1848年欧洲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不仅如此，还在于无产阶级通过这次革命实践，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丢掉了幻想，更透彻地了解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

1848年革命的结局，说明了无产阶级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事情。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这次革命的新的经验重新考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和进程，认为经济危机是革命发动的强大杠杆，184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由此得出结论说："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②

这次革命集中地揭示出无产阶级革命从其性质、特点和进程来看，它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在于它的异常的彻底性、长期性和曲折性。资产阶级革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它总是倏忽即逝，很快就达到它的顶点，而无产阶级革命则要整个地摧毁一切剥削制度，从根本上改造现存社会，就必然要求有最大的彻底性：不满足于既得的成就，经常批评自己，不怕暴露自己的错误并勇于改正错误，而且常常是在曲折和反复中继续前进，直到最后的胜利。马克思分析说："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象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

①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14页。

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象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象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①

总之，从无产阶级方面来看，1848年革命使无产阶级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认识到自己应该如何正确地进行革命斗争，因而它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

第二节　对1848年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1848年革命期间的著作时，明确指出这是马克思初次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定时期历史的尝试。同时，恩格斯也指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

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6—607页。

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①

实际上，恩格斯这一时期的著作，也是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定时期历史的尝试。在谈到1848年革命的发生这一问题时，恩格斯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②同样，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也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在谈到革命失败的原因时，人们通常总是把它归咎于某几个领袖人物的“出卖”，恩格斯则认为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加荒谬的了，事实上，二月革命后法国临时政府中总共不过十一个成员，这些人怎能在三个月之内毁坏一个有三千六百万人口的民族？问题正在于这三千六百万原先在一定程度上暗中摸索的人怎么突然就能自己决定走什么道路，后来他们又怎么迷了路而让他们从前的领袖暂时回到了领导地位。在恩格斯看来，1848年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③

①恩格斯：《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91页。

②③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0—501、501页。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要弄清法国二月革命必然爆发的原因，就必须了解七月王朝的阶级实质和在它统治下的法国社会内部的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以及产生这些阶级矛盾的社会经济根源。

1830—1848年统治法国的，是以国王路易·菲力浦为代表所组成的七月王朝。七月王朝只是代表资产阶级中一个集团的利益，即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与他们相勾结的资本主义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七月王朝是这一小撮金融贵族盘踞着王位，他们在议会中强订法律，控制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织的社会权力机关，并利用报刊来操纵社会舆论。七月王朝所执行的政策也只是为一小撮金融贵族服务的，例如，它规定很高的选举资格，全国三千六百万居民中只有二十四万人有选举权；它把生产和经营畅销商品的专利权完全分给金融贵族；它逐年增加税收，把重担压在劳动人民身上；它残酷地镇压一切人民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这一切表明：七月王朝是金融贵族专政，是金融贵族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

金融贵族的统治，不论就其巧取豪夺的剥削方式来说，或就其下流淫荡的享乐情形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极易引起社会各阶层人民的一致愤慨。工业资产阶级看到了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小资产阶级充满了道义的愤慨，人民被金融贵族的不法和腐败的行为深深地激怒起来了。加之，由于两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事件的发生，加速了普遍不满的爆发，使不平的怨言终于发展为起义。第一个事件是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歉收，导致1847年的物价腾贵，在法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各国都引起了流血冲突；第二个事件是1847年秋爆发的英国工商业总危机，犹如一种经济瘟疫迅速传播到整个欧洲大

陆，法国的工商业首当其害，使金融贵族的专制统治变得更加不堪忍受，工业资产阶级和被弄得倾家荡产的小资产阶级被迫采取了革命行动，而无产阶级则照例充当了街垒战中的前卫战士。

推翻金融贵族的专制统治的共同目标把代表着不同阶级利益的各个党派暂时地联合在一起，而写在他们旗帜上的共同口号则是“法兰西共和国”。人们都天真地相信，一旦宣告成立了共和国，人民中的各个阶级就能和平地分享这次革命的果实。但实际上，法国历史上真正有着现代意义的阶级斗争只是从二月共和国宣告成立的那一天才开始的。随着二月共和国的建立，打碎了资本隐藏于其后的王座，因而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公开地显露出来了。原来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反对金融贵族的斗争中所建立起来的联合阵线也解体了。正如恩格斯所说：“不同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当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动起武来。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构中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阶级对抗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①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得不独立地走上斗争的前台正面交锋了。二月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异常迅速而彻底地扫清了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统治的场地，使无产阶级开始上升到成为现代社会中革命利益汇集中心的历史地位。

无产阶级强迫临时政府，并通过临时政府强迫全法国实行共和制度，它就立刻以一个独立政党的姿态走上了前台，但同时它却招致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来和它作斗争。从二月革命的胜利

①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0页。

中真正得到加强的是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地位。由于成立了共和国，一切有产阶级都同金融贵族一样获得了参加政权的机会，而无产阶级所获得的只是为了自身的解放而进行斗争的基地，而并不是这种解放本身。无产阶级既然确信自己用流血斗争挣得了共和制度，它就必然要提出自己的强烈要求，因而它和资产阶级的直接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说："革命是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人民根据革命提出自己的强烈要求。革命是人民转在资产阶级名下的一张期票。资产阶级由于革命而取得了政权。在它取得政权的那一天，这张期票的支付期限就满了。资产阶级必然要拒付这张期票。"①

因此，无产阶级不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不能继续把革命推向前进，它必需独立战胜因二月革命的胜利而异常地强大起来的这个敌人。然而，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断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所制约的。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工业无产阶级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地位，这种存在地位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工业无产阶级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又是它用以达到革命解放的手段；也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蒂，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虽然法国工业当时是整个欧洲大陆上最发达的工业，但是二月革命的性质本身说明了，工业资产阶级在此以前还远远没有占居统治地位，法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还远

①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0页。

不能和英国相匹敌，甚至对于国内市场它也得依靠略经改头换面的保护关税制度才能掌握得住。所以，在革命发生时，无产阶级虽然在巴黎拥有实际的力量和影响，足以能够推动它超出自己所有的手段范围去继续前进，但在外省各地，它却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这样，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二月革命时还不能成为革命的全国性内容，当时，甚至小资产阶级反对次要资本剥削方式的斗争，如农民反对高利贷和抵押制的斗争，小店主和手工业者反对大商人、工厂主和银行家的斗争，都还隐蔽在反对金融贵族的普遍起义的外壳下面。而在革命进程还没有把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发动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以前，在革命进程还没有迫使它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向它靠拢以前，法国无产阶级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

马克思说："当一个身为社会革命利益汇集中心的阶级起来斗争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在自己的地位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它消灭敌人，采取适合斗争需要的办法，而它自己行动的后果就推动它继续前进。它并不从理论上研究本身的任务。而法国工人阶级不是处于这样的地位，它还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①不但如此，法国工人阶级若不能把在法国开始的无产阶级革命扩展到整个欧洲特别是英国，要完成这次革命的任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法国的生产关系是受法国的对外贸易所制约的，是受法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及这个市场的规律所制约的，法国无产阶级若不挑起一场对于统治世界市场的英国产生强烈影响的欧洲革命战争，便不能打破这种生产关系。这一切，就

①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2页。

决定了法国的二月革命必然失败。

1848年6月法国无产阶级起义的迅速爆发和失败，同样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远远没有成熟到足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程度。虽然1847年的经济危机导致了这次革命的爆发，但是1848年中期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达到了全盛的工业繁荣，却使各国的反动势力迅速得到了振奋的力量。“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①

当时法国的革命还受到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制约。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缔造者，因此，不论革命发生在什么地方，它对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实际影响，都要视其对英国影响的强烈程度而定。马克思说：“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末危机的原因仍然始终出于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晴雨计，它可以测知，这种革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真正使资产阶级制度的生存条件成为问题，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这种制度的政治设施。”②

在1848年革命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也得到了充分表现，因而要弄清法国六月起义失败的原因，还必须认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特性。

①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8页。

马克思从农民的经济生活条件出发，对这一阶级的特性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占法国国民大多数的农民，既是一个阶级，又不是一个阶级。他们仅仅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而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一个个马铃薯所堆集成的那样。他们的生活条件虽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一方面，他们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因而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之间只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党派或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又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而，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①随着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在议会制共和国的条件下，也一定要发生农民革命化的过程。但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法国农民，不懂得如何运用已经得到的权利来拯救自己，却普遍存在着由历史传统所造成的一种迷信观念：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给他们，从而重新创造了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行政权力——波拿巴王朝来支配整个社会。

至于小资产阶级，则始终充满着幻想并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他们始而相信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幻想，为了保卫“财产”和“秩序”，在六月事变中追随资产阶级镇压巴黎工

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

人。但一到起义工人被镇压下去、资产阶级张灯结彩庆祝胜利的时候，小资产阶级迎来的不过是破产和拍卖，是资产阶级和旧时贵族们的冷落和凌辱。他们悔恨之余，又转而求助于无产阶级，由此便产生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政治联合，即所谓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现存社会中的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一致。社会民主派的政治主张的实质就在于：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法国大工业生产发展的相对不足，使小资产阶级能够在一个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发挥其政治影响，因而使整个革命进程染上更加富有戏剧性的色彩。

在一切阶级中，小资产阶级似乎是最缺少个性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真诚地认为，那些保证其自身获得解放的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整个现代社会得到拯救并使阶级斗争最终消除的一般条件。所以，不应该狭隘地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目的只是力图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也不应该认为，所有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者。实际上，按照这些代表人物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① 由此可见，对于每一阶级的政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2页。

治和著作方面的代表，决不能根据他们本身的言辞和幻想来判断他们的实际人品和行动，而应该根据他们所代表的实际利益来理解他们的主张和原则。在分析各种历史事件中，最重要的是要把各个党派和政治组织的幻想的动机和真实的动机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在现代社会的阶级斗争中，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不是什么思想和政治的原则，而是一定阶级的物质利益。

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失败以后，历史就迅速地开起倒车来了，但革命仍然是富有成果的，它使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除了旧日的幻想，同时也使反革命营垒中的各个政党被迫脱去了言辞的伪装。“革命很迅速地把所有的旧反对党相继推上国家高峰，好象就是为了使它们不只在行动上，而且在言论上都不得不放弃或否认自己旧日的辞句，使它们终究被人民当做一团讨厌的废物全部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①

在1848年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中，工人阶级都起了关键的作用。当实现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的工人阶级遭到失败的时候，它的朋友和敌人也先后遭到了失败。1848年革命整个进程表明：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业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时，“任何一次革命起义，不论它的目的仿佛距离阶级斗争多么远，在革命的工人阶级没有获得胜利以前，都是不免要失败的”。②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当时还远远没有成熟到足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程度，所以六月巴黎的无产阶级起义必然不可能获得胜利；既然无产阶级不可能获得胜利，那末

①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2页。

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1页。

1848年革命的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综上所述，1848年革命检验和证实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各个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斗争，都受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的。正是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才爆发了法国的二月革命、德国的三月革命以及巴黎的六月起义，又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还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内发展，所以1848年法、德等国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又必然失败。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1848年革命做出了科学的总结，同时也驳倒了历史唯心主义的种种观点。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革命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结果，因而无论何时何地，革命都不能单凭意志制造出来。马克思以维利希—沙佩尔集团①的冒险主义的政治策略为例，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决不能单靠意志去发动和实现。他说：“少数派用教条主义观点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主义观点。少数派不是把现实关系、而仅仅把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而你们（指维利希、沙佩尔等——引者注）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我

①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是1850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分裂出去的一个冒险主义的宗派小集团。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资本主义经济重新繁荣的形势，提出改变革命策略，由准备起义转变为长期积蓄革命力量，以待时机。“同盟”内，以维利希、沙佩尔为首的少数派，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出发，主张马上夺取政权，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正确主张。他们拒绝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和挽救，1850年9月终於从“同盟”分裂出去。

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非常粗劣地向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级偏见阿谀逢迎，当然这样做是比较受欢迎的。正象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词变成圣物一样，你们则用无产阶级这个词来玩这套把戏。你们象民主派一样，用关于革命的空话代替革命的发展”。①

唯意志论者和唯心主义者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有着必须遵循的规律，而泛神论者则对历史规律抱另一种错误见解。例如，卡莱尔就从泛神论的观点出发，论证历史的过程不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所决定，而是由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所决定。人民群众永远只能充当完全处在他们身外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不自觉的工具。一切都以能否正确地认识这一规律为转移。而谁能认识和揭示这种规律呢？当然只有靠天才的直觉。按照卡莱尔的观点，宇宙有它独具的特点，它始终把自己的秘密只显示给少数的贵人和贤人。这样一来，社会就理所当然地应该由贵人和贤人来统治。“根据这种观点，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各异，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即认识了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它行动的人（贤人与贵人）和误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驰的人（愚人与贱人）的矛盾。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②所以，泛神论者所谓的历史规律，不过是神秘的天意，它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

在剖析1848年欧洲革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

①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7页。

还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探讨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分析了历史人物的活动同阶级之间的关系。

在1848年法国革命期间，路易·波拿巴这个历史人物的活动就是一个典型。尽管他才能平庸，在二十多年的冒险生涯中屡遭失败，可是在1848年12月的选举中却能获得绝大多数选票而当上了总统，1851年12月又成功地发动了政变，次年12月还复辟了帝制。应该怎样解释这一现象呢？当时，有各种看法。维克多·雨果写了一本小册子《小拿破仑》，认为路易·波拿巴是一个渺小的毫不足道的人，浸透了一切卑鄙的帝王欲念，强奸法兰西民族的意志，蹂躏法兰西国家的主权，在两天之内，他就驱散了议会，夺取了政权。雨果的这种主观主义的理解，不仅没有揭露路易·波拿巴的真面目，实际上反而抬高了他。同时，蒲鲁东也写了《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一书来反对路易·波拿巴。蒲鲁东是从客观主义的观点来考察波拿巴政变的。蒲鲁东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把国家政权说成是罪恶的、反人民的东西，认为路易·波拿巴政变是国家政权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与阶级斗争的内容和结局无关。这种分析，实质上成了对政变的主人公所作的历史辩护。

马克思反对以上两种观点，他力图“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① 路易·波拿巴被选为法国总统之谜，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寻找解答。前面已经详细说明了农民由于其分散、隔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条件，不能形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阶级，他们总幻想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来代表他们。在波拿巴·拿破仑当

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5页。

政时，曾将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用“法典”的形式固定下来，提供了使农民富裕的条件。虽然这很快地被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但是，却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觉和迷信，以为那个冒充“伯父的侄儿”的路易·波拿巴上台，也会象他的伯父波拿巴·拿破仑一样使他们重新获得失去的小块土地。路易·波拿巴正是得到农民的支持，才爬上总统宝座的。同时，路易·波拿巴政变也是资产阶级的政策所准备的，它是资产阶级反动政策的继续。政变者的个人品质是跟这一政策完全协调的。他是一个冒险家和流氓，用阴谋手段逐步掌握了军队，击败了秩序党，实现了政变。但是，波拿巴的政权是不稳固的，它必然陷入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他要扮演法国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又要疯狂地剥夺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收买流氓无产者。他的政治统治是不稳定的，这又会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混乱状态，所以社会危机依然存在着。马克思断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①这一预言，不久就被历史事件证实了。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只有密切地联系社会历史条件，联系社会阶级斗争发展的进程，才能正确地分析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3页。

第三节 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革命学说

一、根据六月革命的主要经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学说

在六月革命中，巴黎工人虽然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向敌人投降。工人虽然被击溃了，但是真正被打败的是他们的敌人。六月革命推进了革命发展进程，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道路。

巴黎无产阶级六月革命的失败，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出了自己的原形，表明它是以巩固资本统治和劳动奴役为其公认的任务的国家。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阶级实质，他说："这次失败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① 自从1789年以来，法国历次的资产阶级革命都保持了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但是，六月革命却第一次侵害了这个秩序，这就是它在全法国以至全欧洲的资产阶级眼中成为十恶不赦的罪行的原因。资产阶级逼迫巴黎无产阶级举行六月起义，就是要把工人们初次表露的超出资产阶级秩序范围的社会主义的模糊意向

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1页。

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因此，唯有六月革命的失败才使无产阶级认识了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加以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①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唯一道路，就是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马克思从六月革命的失败中引出的极为重要的结论，也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科学概念。虽然《共产党宣言》中已有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但是只有在总结了六月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才形成"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科学概念。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写道："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②在这里，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专政看做是他所作出的主要贡献。马克思写这封信的时候，也正是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接近完稿的时候。1852年3月25日，马克思把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原稿寄给了约瑟夫·魏德

---

①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7页。

②《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页。

迈，让他在美国出版。由此可以断定，马克思在上述信中所发挥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主要是以1848年革命的经验为依据的。

（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纲领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

从六月革命的经验中引出的第二个结论是：无产阶级经济改造的要求必须是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使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些形式的运动，即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局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①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宗派，在革命的工人中造成了极端的思想混乱。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极力散布其所谓"组织劳动"的主张。他要求使国家成为"穷人的银行"，它用信贷来组织社会工厂，这种工厂依靠竞争来消灭资本主义企业。二月革命胜利以后，巴黎工人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提出的"组织劳动"、"成立专门劳动部"的要求，正是路易·勃朗的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

马克思批判了这种异常模糊而混乱的提法，认为它们根本没有触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本质。马克思说："组织劳动！但是雇佣劳动就是现存的资产阶级的组织劳动。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就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社会。专门的劳动部！但是，难道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不是资产阶级的劳

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1页。

动部吗？"①巴黎工人提出组织劳动的要求，认为这就是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确保"劳动权"，免除失业和饥饿的威胁。马克思指出："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说是一种胡说，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但是劳动权实际上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②对于马克思在这里概括的无产阶级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恩格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恩格斯说："使这部著作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这样，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和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说马克思后来把这个公式也推广到交换手段的占有上，那末这种由《共产党宣言》中自然地引伸出来的推广，不过是从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结论罢了。"③

（三）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保证。

从六月革命中引出的第三个结论是：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与农民、小资产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在六月革命中无产阶级是孤立无援的。当时，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军队、别动队、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

①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1、426页。

③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3—594页。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失败是必然的。马克思指出："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工人们只能用可怕的六月失败做代价来换得这个胜利。"①无产阶级必须把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争取过来，使之成为自己的同盟军，那样，"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②

六月革命的失败毕竟出现了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结成同盟的可能性。当六月起义的街垒被击毁，工人被击溃，而小店主们在胜利的陶醉中奔回到自己店里去的时候，他们发觉到，它把工人击溃之后，就使自己毫无抵抗地陷入它的债务人的掌握之中了。小资产者从六月胜利中得到的只是破产和拍卖，而农民从六月胜利中得到的却是45生丁的附加税。原来反对六月工人起义所维护的共和国，不是他们自己的共和国，而仅仅是资产阶级实行其专制统治的共和国。六月起义后，在法国农民中存在的普遍失望情绪，在1848年12月10日的总统选举中表现出来了，他们选举了路易·波拿巴这个王位僭望者为共和国总统。既然资产阶级以一个收税人的姿态向农民表明了自己的存在，农民就以一个皇帝的姿态向共和国表明了自己的存在。这就是说，"小农的

①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3页。

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9页注。

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①农民选举波拿巴只是表明了他们的反抗，而不是表明了他们的觉悟。对于从1789年以来新形成的法国农民来说，拿破仑是唯一代表他们的利益与幻想的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②

但是农民们心目中的"拿破仑观念"只不过是不发达的、青春少年的小块土地所抱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来说，这些观念是荒谬的。事实上，自从拿破仑时代以来，法国的农业在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现在已经变成他们受奴役和贫穷的根源了，它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自己随便怎样去挣工资糊口的一种手段。

很明显，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家。一个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一个个的农民，资产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据马克思统计，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农民身上榨取的利息，就等于英国全部公债每年利息的总和。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的日益加剧的解体，就愈加促进农民的革命化，使农民日益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

①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694页。

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袖。马克思说："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①只要农民一旦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红色共和国才是他们获得解放的唯一道路，而战斗的无产阶级才是他们利益的真正代表者，那末，在工人、农民和小资产者的联合冲击下，资产阶级的国家建筑物就一定要倒塌下来。

（四）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

在1848年，六月巴黎无产阶级起义失败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次考察了农民、小资产者和社会中等阶层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发展与变化，考察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发展与变化，结果发现：一方面，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实际统治权，到1950年春已经集中到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另一方面，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者，则已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期待过一个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联合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中等阶层的革命发动，并且设想领导这次革命的政党，将是一个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无产阶级革命恐怖主义的各种政治主张的联合战线。马克思说："愤恨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实现这种改造的工具，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党即红色共和国党的一般特征。这个'无政府党'——如它的敌人所称呼的——正和秩序党一样，是各种不同利益的联合。"②

①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477页。

根据相同的观察，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新的革命高潮不仅将会在法国发生，而且也会在德国发生。并且预料这个高潮将首先会使德国的小资产阶级获得政权。这个预见虽然未能实现，但是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他们为这个未来的革命制定了策略。这个策略就是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必须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告诫无产阶级要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以便把未来的这场革命进行到底。他认为，这种空想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段落，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细小的手法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一切必然表现。这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画图，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以与其他各个阶段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① 这里把“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作为革命社会主义的特点，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所要达到的四个相关联的社会目标，充分体现了无产

①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9—480页。

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

在1850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会为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和舒服。因此，一旦他们的要求得到实现，他们就会赶快结束革命。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①

马克思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谈到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谈到废除私有财产的革命时，就说过：只有暴力革命，"宣布革命是不停顿的，才能做到这一点"。②在上述"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说明必须把民主革命及时地转向社会主义革命。

为了保证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政党在同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时候，必须保持和巩固自己的独立组织，实行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武装工人，组织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武装，是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必要条件。并且，工人们"无论如何都不应把武器和弹药交出去；对于任何一种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的时候都应该予

---

①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5页。

②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431页。

以武装回击。”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制定的这些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策略，后来在新的条件下，都为列宁和毛泽东所进一步发展了。

二、根据1848年革命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作出了重大发展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的是，他们根据对法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深入地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作出了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从而发展了他们关于国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1848年的法国革命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的，一方面，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却是已经不能管理法国了。因此，这次革命是沿着下降路线进行的。二月胜利后成立的临时政府似乎代表各阶级的共同利益，但不久随着5月4日立宪国民议会的召开，政权落到共和派资产阶级手中，镇压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共和派资产阶级的统治立足未稳，同年12月10日波拿巴就当选为总统，由立宪国民议会所体现的共和派资产阶级专政不久便宣告灭亡，政权开始落到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秩序党的手中。秩序党依靠立法国民议会实行大资产阶级专政，但不久就面临和波拿巴所代表的政府争夺权力的斗争。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用行政权力消灭了议会权力，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最后覆灭。

事变的整个进程说明了什么呢？行政权力不断得到加强直到

①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8页。

最后成为吞噬一切的力量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以法国的历史为例研究了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整个发展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它的本质和特征，并且得出结论说：自从拿破仑一世以来，一切变革都没有动摇还在君主专制时期就已形成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而是使它不断地得到加强，以便更适合于镇压被剥削阶级。“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①

在法国，资产阶级国家的庞大军事官僚机构形成于君主专制时代，最初是作为封建领主的地方特权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把土地所有者和城市领主的封建特权集中到自己手中，从而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这种中央集权的官僚军事机构，在法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曾被一种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区自治制所代替。这时，国家各级政权是由人民自己选出的可以在全国法律范围内自由行动的各省、区、乡镇的管理机构组成的。在1799年雾月18日拿破仑发动政变以后，就立刻把这种自治制取消而代之以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一开始它就成为反动势力的工具。

自从拿破仑一世以后，法国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有增无已地发展起来。它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它密如蛛网一般地缠住法国社会的全身，成为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虫。这个庞大的行政权力，管制、控制和监视着整个社会下层，由于它的高度的集权制而无处不在和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地压制和镇压

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2页。

被剥削阶级的一切反抗活动。一方面，它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因为资产阶级总是通过庞大的国家机体安插自己多余的人口，以官吏的高额薪金和优厚的政府补贴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因此，资产阶级的每一次变革都不仅不去破坏这个行政权力，反而不断地加强它。在1848年革命的进程中，先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用武力镇压了无产阶级的起义，然后是保皇派大资产阶级用高压手段镇压了小资产阶级的反抗，因而就一步一步地加强了行政权力并使之集中化。最后，到路易·波拿巴利用这个行政权力驱散象征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的立法国民议会时，资产阶级连做出任何切实反抗的表示都成为不可能的了。“斗争的结局，好象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①

但是，正如一切事物都要向反面转化一样，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不断加强和集中化，按照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一定要走到它的尽头。当着资产阶级的统治完全建立在枪托之上、并以赤裸裸的暴力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当着这个行政权力日益脱离社会、不断孤立并且膨胀到成为社会机体上的不堪重负的寄生赘瘤的时候，它就将成为革命的唯一对象，这时革命就将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和摧毁这个权力。当基佐认为12月2日的政变“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的时候，他的话是有着片面的真理的。马克思说：“如果说议会制共和国的倾覆包含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萌芽，那末这一事实的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力的胜利”。②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1848年的革命是彻底的，它在按步就班地

①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1、690页。

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进行准备。马克思说："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预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它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权力。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站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①

马克思的这些非常精彩的论述，把无产阶级革命在国家方面的任务规定得十分具体了。他阐明了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国家机器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历次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和面临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时它是如何演进的，从而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是要原封不动地夺取和保存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是要首先集中一切破坏力量摧毁它。

马克思在1871年写给库格曼的信中说过："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②

后来，列宁在谈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些论述时说："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精彩的论述里比在《共

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1页。

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页。

产党宣言》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那里，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还只有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在这里，问题已经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①

从本章的论述可以看出，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刚刚问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了革命实践的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这不仅表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方面，而且表现在作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和革命的学说方面，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①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4页。

第二章 《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

马克思研究经济学，始于1843年。1844年，他写作了《经济学哲学手稿》。1845年，马克思曾同达姆斯塔德的出版商列斯凯签订合同，拟写大部头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后因出版商慑于反动的书报检查而毁约作罢）。1848—1849年革命后，马克思又继续埋头研究经济学，从1850年夏天到1853年8月，共写了二十四本经济学笔记。此后，马克思又写了三部篇幅宏大的手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以及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创作《资本论》，1866年完成了全部手稿，并于1867年9月14日出版了第一卷。由于多种原因，《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直到马克思逝世后，才经恩格斯整理，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原定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内容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早在1866年以前写成的，由于恩格斯逝世，不得不由考茨基整理，单独付印，定名为《剩余价值学说史》。①

①1859年，马克思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分册，其中共分两章：1．商品，2．货币或单纯流通。《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原来计划写的一部巨著，但在出版第一分册后，由于结构上的缘故改变了计划，决定以《资本论》为全书标题，并重新整理了已经准备好的手稿。《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出版后，1872年出版了法译本，这是马克思下功夫修改过的，甚为珍贵。1873年，马克思又对第一卷作了某些修改后，出了第二版。1883年，恩格斯根据《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编辑出版了第三版。1890年，恩格斯又编辑出版了第四版，就是现行的版本。现在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马克思原来当做第二卷的两个分册，原来的第三卷现在成了《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单独著作，也有三大卷。

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社会所代替的特殊的经济运动规律，给无产阶级提供革命的理论武器，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历时整整四十年。《资本论》是马克思经历了千辛万苦、耗尽了毕生的心血所创作的一部最重要的科学著作，它集中了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最卓越的成就。

《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而且是他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和发展，是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资本论》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完成，也标志着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范畴和规律的最后制定。由于在《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是作为严格科学的方法论被应用于一门经验科学的研究的，因而它的范畴和规律的表述要求有最大的精确性。照列宁的说法："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①因此，《资本论》是我们学习和领会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最有权威的著作。

在1859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马克思写了一篇著名的序言。这篇序言以经典的形式概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根据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这里所概述的观点既是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研究的成果，也是指导这一研究的方法。通过对这篇序言的研究，我们就能获得贯串全部《资本论》的理论线索。

①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第一节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①在这里，马克思全面地科学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等等，这样就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序言”中的这个思想就是马克思用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思想。这个思想的实质，就是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而《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根据这一基本思想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应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时说道：“马克思究竟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①然而，马克思“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胳有血有肉。”②

《资本论》的任务不是要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用包括全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在内的丰富实践来证明和检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自从十九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和制定了新的历史理论以来，《资本论》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几乎全部历史的研究而产生的唯一著作，由此就确立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突出地位。对于当时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历史唯物主义”被当成了不研究历史的借口，他们把它当做一个套语或

①②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页。

标签，认为无需作进一步的研究，只要把这个标签贴到任何一种事物上去，以为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可是事情恰恰相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①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的历史运动，虽然也证明了新的历史观点的正确性，但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被推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因此不可能进行纯科学的探讨。而为了把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地向前推进，"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

在历史科学领域内也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新的理论的发现和对它的证明和验证并不是同一件事，后者往往需要付出更大得多的精力、时间、智慧和劳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是思想史上的划时代的革命，它一反传统的历史观，不再把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归结为人们的变动着的思想，而是把社会变化、政治变化和思想变化的最后动因归结为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于他们的社会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它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一切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以及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

①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7页。

②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32页。

式、以最彻底的否定。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①

但是，新的历史观点的发现还只是为唯物主义地说明全部人类历史、为真正的历史科学的创立开辟了正确的道路，要把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研究都置于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若是象从前所做的那样，把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一般过程归结为它们的共同的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这还是较为容易的。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说，这还只是提供了一种正确的解释方式，而不是科学的证明。科学的证明应当是把次序倒转过来，从各该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引出全部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一般社会生活的内容和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②《资本论》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不是仅仅通过分析来揭示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而是从最简单的经济关系出发，一步一

---

①恩格斯：《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91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0页。

步地引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全部生活内容，直到它的最抽象的思想形式。可见，在《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般地作为一种观点和公式，一种借以通晓历史事变的解释方式，而是作为经过十分仔细地检查和验证的科学方法被成功地应用于一门科学。

人们常常以为有了正确的历史观就能保证对历史事件作出科学的解释。然而事实决非如此。如果把多种多样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简单的经济原因，或者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套语，企图通过强制的抽象对复杂的事件作出简单的解释，那都是不科学的。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要求人们详细地占有一切有关材料，从作为事件的最终原因的简单事实中，一步一步地通过各种中介环节的分析引出事变的最后结果。《资本论》的研究进程就是如此。但它不是对一个孤立事件的研究，而是对人类历史上的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一个最复杂的社会生产组织的研究。正如列宁所说的："他（马克思——引者注）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极详尽的分析。"①

第二节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及其历史地位的剖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是全部先行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果，是历史上一切古老的社会形态灭亡的产物。确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及其独特的历史地位

①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是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看做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因而它把这种生产的由历史形成的社会关系方面的特征当作物的属性，完全忽视了商品、价值、货币、资本等等这些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在斯密和李嘉图看来，原始的猎人和渔夫就已经是单个的和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了，他们的生产物天然地具有价值规定性。这种纯属虚构的假定，绝非来自真实的历史，而是根据普遍流行于十八世纪的非历史的世界观。根据这种世界观，原始人的思考和行动从来都是同十八世纪的人们一模一样的。事实上，“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①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力求获得历史知识，他们的使命只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它们由于较封建社会的范畴和规律更符合人性和自然，因而也更能促进财富的生产。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个人而不是社会，在他们看来，社会不过是一个抽象，只是表示由个人构成的集合体，在个人的规定性之外没有社会的规定性。可是，事实恰恰相反，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个人却是由社会“构成”的。社会不是别的，它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个别的个人正是由这些联系和关系决定的。个人只有通过社会并在社会中才获得自己的规定性。他成为公民或奴隶、资本家或工人，这是社会的规定，是人和人的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6页。

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①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正确地把生产劳动当作社会生活的基础，但是他们抽掉了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抽掉了资本主义生产在其中进行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正象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当做一般的个人来考察一样，他们也把资本主义生产当做一般的人类生产来考察。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说，劳动作为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但是这种抽象形态的劳动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人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创造着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且他们正是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在生产的资本主义形态中，人们在劳动过程中不仅创造使用价值（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价值(社会关系)，不仅如此，使用价值的生产还只是实现价值生产和价值增殖的一种手段。所以，劳动生产物的价值形态不是它们的自然形态，而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就是由此取得历史特征的。

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基本的特征是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的彻底分离。这种分离状态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产形态灭亡的产物。”①

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的历史前提是简单商品生产，而简单商品生产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相互独立的生产者手中这一事实为前提，后者又是封建的、宗法式的自然经济解体的结果。所以归根到底，“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②小农经济与独立的手工业经济，在后期曾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封建关系的瓦解过程中它们又是资本主义经济赖以发生的土壤。虽然这种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者经济似乎为一切经济时代所共有，但只有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不仅生产资料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而且劳动者本身变成了自由的私有者的时候，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才能展开其全部力量和获得典型的形态。由于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的发展很快就遇到自己的极限。一旦当“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③它的消灭就意味着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从而使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分离出来。所以，资本主义生产不仅以简单商品生产为前提，而且是简单商品生产的直接对立物。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却把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生产混同起来了。它不懂得“其中一种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是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④

①②③④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783、830、833页。

资产阶级学者不了解历史是在对立中运动的，在各种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关系中，他们只看到同一而看不到差别，把资本、竞争、分工等这些现代经济范畴看成是一切经济时代所固有的。从历史上说，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出现是早期社会的现象。但早期社会的商业资本不仅在本质上不同于现代资本，而且当中并无历史的联系。虽然商业的存在及其一定程度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但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并不足以促成由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旧时代的商业资本之所以不同于现代资本，是因为它的存在只需要有简单商品和货币流通作为条件，并且这种商业资本是独立于生产而存在和发展的，所以它能以不同的规模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对于独立的商业资本来说，它是以不等价的交换和各种欺诈手段为其利得的源泉。"贱买为了贵卖，是商业的法则"。而且在旧时代的和新时代（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的商业民族内，商业资本的发展，也是与暴力的劫掠，海盗行为，奴隶贩卖，殖民地的征服等等，直接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在一切历史时期内，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总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成反比例的。

马克思说："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然经济和中世纪城市工业的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相对立。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虽然后一条途径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过渡作用，……但就它本身来说，它并没有引起旧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如说保存了这种生产方式，把它当作自己的前提予以维持。"①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不是旧时代的商业资本的简单继续，而是它的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3—374页。

彻底否定，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并且是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来发生作用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商人资本从它原来的独立存在，下降为一般投资的一个特殊要素，而利润的平均化，又把它的利润率化为一般的平均水平。它只是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①可见，只有认识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历史特殊性，才能区别两种商业资本的不同性质。

同商人资本同时出现的高利贷资本，也属于古旧的资本形态。这种旧时的高利贷资本在任何生产方式内都起着破坏和瓦解作用。它一方面促使富有的土地所有者破产，另一方面又残酷地榨取小生产者的血汗并迫使他们破产。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一起促成了货币资本的形成和集中，它们和土地所有权相独立在旧的生产方式内部造成了大笔的货币财产。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和时候，高利贷才表现为形成新生产方式的一种手段；这一方面是由于封建主和小生产遭到毁灭，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条件集中为资本。"②只有在这种条件下，高利贷资本才对产业资本的种种条件的形成，成为一个有力的支点。所以，"不论商业资本或高利贷资本，其本身都还不能构成产生工业资本（即资本主义生产）的足够的条件"。③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科学地考察了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研究了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主要规律。他指出："虽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

---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6、675页。

③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3页。

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生产资料在事实上或法律上为耕者自己所有的旧生产方式中发展起来的，是从农业和手工业经营发展起来的。从这时起，生产资料才逐渐走向集中，并逐渐转化为资本，而同转化为雇佣劳动者的直接生产者相对立。这个过程最初曾沿着两条途径进行：一条途径是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小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生产者，如行会老板，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有一些工资劳动者，转化为商人或小资本家，然后再由工资劳动剥削的逐渐扩大和相应的积累，转化为成熟的资本家。另一条途径是先由商人把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然后再直接转变为产业资本家。不过这个过程起初是进行得极为缓慢的，它需要有一个经济外的因素来发生催化作用，这就是所谓原始积累时期对小生产者的剥夺和对殖民地的掠夺。

所谓原始积累，不外就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它的结果，就是独立农民经济的消灭，土地被合併于资本，农民则完全脱离了生产资料，沦为城市的无业游民。在国外，“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4页。

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①可见，资本最初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与肮脏的东西。它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在人类的编年史中的。

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条件是：一方面要有相当数量的生产资料集中在资本家手中，另一方面要造成除了自己的人身条件之外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资本只有在那样的地方才能产生，在那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②创造资本的过程就是使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分离的过程。它一方面把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集中和积累起来，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又把直接生产者转化为工资劳动者。“因此，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他的劳动因而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另一方面，正是从这时起，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③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毕竟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最深刻的革命。它破坏了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的原有的统一，也破坏了一切旧的生产方式对于生产的种种限制，生产第一次在社会的规模上进行，劳动也直接具有了社会劳动的性质，协作和分工在企业内部迅速地发展起来，生产品成倍地增长，被远销国外，争得一个又一个市场，不断打破地域和民族的界限，技术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生产力神奇般地从地下迸发出来。这一切都是新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但就最初的形态来说，资本主义生产同旧时行会老板的手工作坊之间不过只表现为量的差异。“较

①②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9、193、193页注（41）。

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①但从内容来看，这种量的差异却包含着最深刻的质的区别。在行会师傅的作坊里，人们关心的是今天的帮工明天可以成为师傅。但是，当生产资料变为社会生产资料并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行会的规律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工人只是受雇于资本家的劳动者，一切都听命于资本家，只有资本家的意志才是统治着整个生产过程的唯一意志。而资本家本身则听命于市场，为竞争所驱使。

这种新的生产形式导致的重要结果就是工场内部的协作。起初这种协作是在没有分工的情形下进行的。即使这样，它也引起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随着这种简单协作工场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制造业。这种工场内部的分工把生产者之间的协作形式提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一直到产业革命以前，它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所以，马克思称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②虽然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内部的分工必须以社会内部的分工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但它本质上却不同于社会内部的分工。作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只是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存在的条件，因而是许多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形式。而工场内部的分工，则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8、397—398页。

的特有的形式，它以集中较大量的生产资料和多数的劳动者于同一个资本家的工场内为必要前提。这种全然由资本所创造的新的生产形式，在极大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一方面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另一方面又有力地推动着技术改造的进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性质产生的一个规律。"①

在十八世纪最后的三十年中，欧洲最先进的国家开始了产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从手工制造业阶段发展到机器与大工业的新时期。与此相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也日益充分地暴露和发展起来。

自从人类出现以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总是处在一定的共同体内。在不同的生产阶段上，构成人们的共同体的基础和纽带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相应于这种变化，社会共同体也改变着自己的性质。最初形成的共同体是以血缘为基础和纽带的，原始群、氏族和部落是人类早期共同体经历的几个阶段。稍后出现的共同体是以地域的联系为基础的。虽然在这种共同体内财产关系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但把人们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仍旧是自然形成的因素（土地）。只是由于人们一般地不能脱离土地，他们才必须生活在以土地为纽带的共同体内。所以，财产的一切原始形式，必然表现为把各种制约着生产的自然因素看做自己所有这样一种关系，这些原始的财产形式既是各种原始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又以自然形成的一定共同体作为自己的前提。在这些原始的共同体内，虽然保持着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的统一，但这是以自然形成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8页。

的生产条件仍然统制着人们的生产这一情况为前提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由劳动所创造的物质条件越来越成为生产的主要手段，以自然因素为纽带的共同体的存在就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了。人们摆脱自然条件的统制而走向独立的过程，也正是他们摆脱原始的共同体而使之解体的过程。所以人的“孤立化”，只是历史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原始的自然状态。商品生产和交换就是促成这种“孤立化”的主要手段。于是历史过渡到了这样的阶段：脱离了原始的共同体的“孤立化”的个人，现在必须依靠自己所创造的手段和条件重新把自己置于更普遍的社会关系和联系之下。这些新的条件仍然把单个的人们锁在社会的共同体内，成为这个共同体的链条上的一环，不过它们已不再出现在自然形态上，而是作为纯粹经济的因素出现在“价值形态”上。

马克思说：“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原有的统一｛我们不谈奴隶关系，因为当时劳动者自身属于客观的劳动条件｝有两种主要形式：亚洲村社（原始共产主义）和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小家庭农业（与此相结合的是家庭工业）。这两种形式都是幼稚的形式，都同样不适合于把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不适合于提高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因此，劳动和所有权（后者应理解为对于生产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破裂和对立就成为必要的了。这种破裂的最极端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同时会得到最有力的发展）就是资本的形式。原有的统一的恢复，只有在资本创造的物质基础上，并且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经历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①人们作为生产者所

①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65—466页。

组成的共同体，和以这种共同体为基础的财产形式，归根到底归结为他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生产者之间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是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力，使人们第一次冲破了由自然和历史造成的狭隘共同体的界限，发展了个人之间的普遍的、全面的社会关系。在这种新的、世界性的、全面的个人关系没有最后建立起来并置于人们的自觉控制之下以前，这种关系的发展必然表现为和个人相异化的、物的关系的发展。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相脱离，个人间相互关系的物化，构成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它以潜在的，并且是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同时它还创造和建立着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①

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除了同周围的自然和狭隘人群的关系之外，还没有创造出自己全面的丰富的关系，因而也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赞美和留恋这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真正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把自己的社会关系当作彼此的共同关系来创造并且自觉地加以调节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个人之间的全面的关系制约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个人关系的全面性又以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程度为前提。因此，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力，在普遍产生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0页。

遍性和全面性。①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一切异化现象，一切社会关系方面的颠倒和混乱，是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过渡点上所产生的暂时的现象，而在资本内部发展起来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的社会性质，必定能够脱离它们的这种资本主义形式，脱离它们的各因素的异化、对立和矛盾的形式，脱离它们的颠倒和混乱，从而走向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在现存的关系之外发现更多的东西，因而不能设想这种脱离是可能的。而马克思主义者所坚信和坚持的却正是这一点。

事实上，在所有真正称得上经济学家的人们中间，只有马克思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伟大历史作用作过最充分的评价。马克思写道："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109页。

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但是，"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①

第三节 《资本论》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研究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和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作了严格科学的考察和应用，第一次给予了精确的、全面的定义和说明。马克思结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及其运动规律的考察，特别详尽地探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辩证发展的内容。

在《资本论》之前，马克思就明确肯定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并指出了生产力的历史性和继承性。他指出："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394页。

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认为，在任何社会形态中，生产力始终都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一定时间的有用劳动创造出较多或较少的产品，这和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②所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一般是指劳动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能够缩短生产某种物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

马克思分析了生产力发展所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劳动还没有发展为社会劳动，因此生产力也没有获得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性质。在那样的条件下，并不存在事实上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普遍化，劳动才发展为社会的劳动，因而社会劳动的生产力也才能得到最有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生产力是一个必须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加以确定的量，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第一要关心的事情。“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③因此，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迫使资本家们把提高劳动生产力作为最重要的竞争手段。

---

①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478页。

②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53页。

马克思还对劳动生产力作了一般性的分析。他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①其中起首要作用的是劳动资料的性质，而尤其是工具的性质。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在其萌芽状态上已为某些动物所具有，但它却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②生产力既是人类劳动的生产力，因而显然决定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劳动力的发展程度和劳动资料的发展程度。但每一历史时代的劳动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又决定于劳动资料的性质。在决定生产力的诸因素中，劳动资料特别是劳动工具的性质具有最重要的作用，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首先表现为资本的技术构成的发展，旧的机器、工具、器具等等不断地为效率更高的、从功效来说更便宜的机器、工具和器具等等所代替。

马克思在分析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时，探讨了机械性的劳动资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204页。

料的发展。在《哲学的贫困》中，他就概括过这种机械性的劳动资料的发展，即："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复合的工具；由一个发动机即人手开动复合工具，由自然力开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①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中，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在机器生产时代的生产力的发展。他指出，工场手工业时代工具的发展为机器的产生准备了物质前提，而工具由工人手中转向机器，则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因为在机器的三个组成部分（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或工作机）中，前两个部分的作用，仅仅是把运动传给工具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因此，尽管蒸汽机在十七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发明，但是一直到十八世纪80年代初，它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地，正是由于创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所以，马克思说："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工人，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或同种的工具一起作业，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②

在对机器发展的辩证法的探讨中，马克思指出了机器如何向同类机器的协作过渡，然后又向各类机器的专业协作过渡。工具机也经历过这样的变化，即经过通用工作、专业化工作阶段又在单个工具机变为复合机的条件下转到通用工作。

马克思对机器发展的分析，反映了当时的重要的技术进步，

①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8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3页。

同时也展示了机器向自动化体系发展的趋势。他说："结合工作机所完成的整个过程越是连续不断，即原料从整个过程的最初阶段转到最后阶段的中断越少，从而，原料越是不靠人的手而靠机构本身从一个生产阶段传送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结合工作机就越完善。"① 又说："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②

马克思对自动化的原则表述，把握住了技术的未来发展。现代化的生产，就是建立在计算机、控制与信息系统等科学基础上的高度自动化的生产体系，这充分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科学预言。

在研究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中，马克思还注意到了科学变为直接生产力的问题。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固定资本底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③ 在《资本论》中，他又指出："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④

当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并不是为了减轻人的劳动而创造的，它是为了增加利润而创造的。因此，马克思在研究机械性的劳动资料——机器的发展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剩余价值生产是社会制度的基础，

①②④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8、418、417页。

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8页。

那么在这个制度下的技术进步则同获得追加利润的目的相联系。还应该看到，资本家不只是为了获取超额利润而力求完善技术与机器，而且，技术与机器对资本家来说，又是他们进攻工人的一种武器。

机器生产的发展，可以增加一个工作日的产品，同时可以在互相联系的生产行为中缩短劳动时间，它造成了生产的积聚和生产资料的节约，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仅是劳动者这一社会的基本生产力的浪费，同时也有物质生产资料的浪费：“总之，资本主义生产尽管非常吝啬，但对人身材料却非常浪费，正如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产品通过商业进行分配的方法和它的竞争方式，它对物质资料也非常浪费一样；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使社会失去的东西，就是另一方面使单个资本家获得的东西。”②

总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再生产与技术进步，同时也是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度的再生产。正是由于机器生产的发展，使小生产者进一步遭到破坏，生产资料从工人那里彻底异化出来，成为无产阶级的异己力量。机器使企业主有可能施展新的加重剥削的方法，使劳动紧张程度达到最大限度。由于技术进步而增长起来的规模越来越大地不断再生产的失业大军，不仅为资本主义剥削建立了大量后备军，而且在许多场合使资本家有可能向工人阶级展开全面的进攻。然而，这样同时也就成了加深资本主义基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2页。

本矛盾的因素。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进步的同时，技术发展越来越不平衡，生产力的破坏过程日益加深。这也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过时了。

在任何社会形态中，人本身都是社会生产的基础。但是人本身的状况，他作为人类劳动力的状况，又是由客观的社会生产条件所决定的。人们的工艺技能、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教育状况以及社会结合，都是由预先存在的客观经济条件所制约的。只有不断改变一切足以对人发生影响的客观经济条件，使沉睡在人的身体中的潜力不断地开发出来，才能使人在生产中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大的发挥。随着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生产者的文化与教育状况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人不再作为单纯的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因为自然力已经代替了人力，自觉应用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技能也代替了劳动的熟练程度和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马克思说："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证明，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①

在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各种因素中，包括着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也就是对生产过程的科学管理。在一切有多数劳动者和较大

①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0页。

量生产资料集中在同一生产场所的时候，劳动者的协作形式和生产资料的合理使用，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起着重大的作用。初期资本主义生产较之行会工业所显示的巨大生产力，主要来自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即劳动者之间的协作方面。“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①这种集体力量的形成，往往是由于社会接触而引起的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提高了每个人的工作效率。马克思说：“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②为了把这种由协作而产生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发挥出来，一切规模较大的共同劳动都需要统一的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作为总体来看的生产过程所产生的一般职能。

所以，对生产过程的科学管理，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的存在不是由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所引起，而是由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进程所决定。现代生产不仅要求把自然科学应用于生产过程，而且要求把有关的社会科学应用于生产过程。

由于自然科学越来越应用于生产，各种自然条件对于劳动生产力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缩小了。随着自然科学的农艺学的发展，土地的肥力也在变化，因为人们能对土地的要素加以利用的各种技术手段在不断地提供出来。“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366页。

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①

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社会生产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劳动资料和生产过程的协作形式总在不断地变更，不断革命化，分工引起了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引起了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生产引起了更大规模的生产。马克思说：“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②

然而，在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生产力何以获得如此迅速的发展？这种发展何以必然要遇到资本本身所具有的限制，因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改造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为了弄清这些问题，必须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马克思也就生产关系的一般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说明。

马克思认为，所谓社会，首先是指社会的经济结构，而所谓经济结构，则是指人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以，生产关系就是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的经济形态或经济结构，构成为所谓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即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历史地改变着的，所以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指出：“社会生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7、288—289页。

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因为，这种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①

生产关系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由生产过程自行产生出来的。当某种新的生产关系一经产生并获得社会的普遍性的时候，它就作为社会生产的前提和条件被固定下来，并在生产过程中作为结果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一直到新的生产力出现使它走向解体为止。“因此，生产过程借以运动的一切生产关系既是它的条件，同样也是它的产物。我们越是在这一过程的实际外部表现上来考察这一过程，它的形态就越是在条件的形式上固定下来，以致这些条件似乎是不取决于它但对它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而过程参加者们本身的关系对他们来说表现为物的条件、物的力量、物的规定性，尤其是在资本主义过程中，任何要素，甚至最简单的要素，例如商品，都已经是一种颠倒，并已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的属性，表现为人与这些物的社会属性的关系。”②

自从交换使劳动生产物转化为商品以后，价值就作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产生出来。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代表人们在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5页。

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64页。

其生产活动中的关系。价值通过交换而实现，但是交换的不是作为具有自然属性的物，而是社会劳动的生产物，这就是说，交换的是物化在产品中的社会劳动，它和物自身的性质是绝对无关的。所谓价值只是表示：私人的具体劳动的生产物必须通过交换转化为社会的抽象劳动的凝结物才能取得在生产上有用的形态。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价值不仅是生产的目的，而且是生产活动借以进行的前提和条件。价值一旦作为生产过程的条件而固定下来，它就失去了人的关系的外观而获得物的关系的假象，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获得了和人相独立的性质，价值变成了似乎是物本身的属性，人们的社会关系转化为与人相异的物的关系统治着人们的生产活动。货币和资本对人的支配和统治，不过是物化劳动对于活劳动的支配和统治，并且归根到底是人们所创造的生产关系对于人本身的支配和统治。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在价值关系背后看到人们自身的关系，更不能在人的关系背后看到生产力的作用。在他们看来，价值、货币、资本不是一些社会关系，而是物的社会属性。因为他们不是把资本等等看作历史上暂时的、过渡的、相对的生产形式，而是看作永恒的、自然的、绝对的生产形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猜不透商品价值这个谜，因而也根本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是一些拜物教徒。马克思在批判庸俗经济学家赛米尔·贝利时说道："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劳动的特征是：劳动的社会性质以歪曲的形式'表现'为物的'属性'；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产品，使用价值，商品）互相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位拜物教徒把这个假象看成为真实的东西，并且事实上相信物的交换价值是由它们作为物的属性决定的，完全是物的自然属性。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自然科学家发现，

鼻烟和油画由于什么自然属性而彼此按照一定比例成为‘等价物’。……这位自作聪明的人，把价值变为某种绝对的东西，变为‘物的属性’，而不是把它仅仅看成某种相对的东西，看成物和社会劳动的关系，看成物和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劳动的关系，在这种社会劳动中，物不是作为独立的东西，而只是作为社会生产的表现被规定的。”①

生产关系的物化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特有的特征，而生产关系的客观性及其对生产过程的支配作用，则是一切时代的生产关系所共有的。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生产的前提和条件是一个先行历史过程的结果，对于生产过程的参加者它是一种不得不面对着的预先的存在。在生产过程中，由于人们是在一定的固定关系中进行生产，因而他们在再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不断再生产着自己的社会关系，他们不仅重复扮演着这个社会关系中的一定的角色，而且把新的一代人也当做这一关系的承担者再生产出来。只有当新的生产力出现以后，原有的生产关系才或快或慢地走向解体，让位于新的生产关系。这一切不以生产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正象地球绕日运行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一样。揭穿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拜物教，正象破除对于偶象的迷信一样，是为了恢复客观经济规律的本来面目并加强对它的研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对资本关系的拜物教，把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拜物教，专门把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改造，人类能够把生产关系当做自己的共同关系自觉地

①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9—140页。

加以控制和调节，但这只有根据它本身的规律才做到这一点。一切在历史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生产关系，都有自己的历史合理性，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正象它们必然在历史上出现一样，它们也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失。全部问题在于揭示并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①这就是说，生产关系的实质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借以结合起来进行生产的方式和方法。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保持着原始的统一，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只需通过一种简单和狭窄的关系来实现。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拥用自己生产资料的独立劳动者，则必须借助于市场通过复杂的交换才能使自己的再生产过程得以继续下去。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作为资本和劳动结合的方式除包括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的全部社会关系外，还包括在这个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一切经济关系。资本和劳动的结合，剩余价值的生产，是通过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组织才能得到实现的。这些社会关系和组织总合起来，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或所有制形式，都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而是由一系列互相关联的生产关系所构成的复杂的整体，这些关系象组成一根链条的各个环节一样，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社会的生产过程就是依次通过这各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页。

个环节而得到实现的。关于生产关系的科学，也就是关于社会生产的全部现实过程的科学，是一门要求有高度严整性的系统科学。《资本论》就是第一部这样的科学著作。把生产关系简单化，或用简单的定义来代替对现实生产过程的系统研究，都是和马克思的思想相违背的。

在任何社会经济形态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都是一切生产关系的基础，其他各种关系都是这一关系的进一步的发展和规定。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包括着生产者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因此，不仅产品的交换，而且产品的分配也都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它本身就包含在生产关系的体系之内。交换过程是生产过程的延续和必要补充，而分配则既是生产过程的终点，又是它的起点。它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而且同样反过来影响生产和交换。马克思说："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仿佛离开生产很远，对生产是独立的。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①因此，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在一处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另一处表现为分配的规定。如果劳动不是被规定为雇佣劳动，它参与产品分配的方式，也不表现为工资。地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9页。

租的前提，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大地产，而不是通常的土地。可见，“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①

古典经济学家忽视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却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这是因为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当做永恒的、绝对的形式，而只把分配形式看成历史地变化着的。他们本能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要素得以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似乎不是生产先于分配和决定分配，而是分配先于生产和决定生产。事实上，即使说生产必须要从生产要素的一定分配出发，但这种分配也是由生产本身内部产生出来的。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于生产资料的状况，这些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改变自己的性质，从而既改变着生产方式，也改变着分配分式。例如：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就既改变了生产工具的分配，也改变了产品的分配。现代大土地所有制本身，不是从地租中产生的，而是从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商业中产生出来的，它是现代工业在农业上应用的结果。

马克思反对把分配看成仅仅是对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因为这种分配只是生产的消极的结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生产。例如，尽管利润和工资的比例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发生变化，但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却不受任何影响。在马克思看来，分配首先是劳动条件的分配。“这种分配完全不同于人们把分配关系和

---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8页。

生产关系对立起来，赋予它以一种历史性质时所理解的分配关系。人们用这种分配关系来表示对产品中归个人消费的部分的各种索取权。相反，前面所说的分配关系，却是在生产关系本身范围内，落到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的、生产关系的一定当事人身上的那些特殊社会职能的基础。这种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会性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①例如，资本本身就是以这种分配为前提：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条件，这些条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独占着资本和土地的所有权。于是劳动不得不从属于资本，并在资本的调节下进行生产，从而对劳动过程的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落在资本家的身上，并获得特殊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家对生产过程的管理不仅是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而且是由他作为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当事人的社会地位所产生的。马克思说：“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象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②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科学地论证了生产关系怎样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每一步都是生产和交换发展的结果。商品、货币和资本代表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94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9页。

着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从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时起，商品生产才有了充分的发展，才成为普遍的、典型的生产形式。新的生产关系一经产生出来，就成为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的原则。商品生产一经出现，价值规律就成为支配生产的原则，竞争迫使生产者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做首要的事情来抓。从简单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时起，价值生产也同时转化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推动原则，在为缩短工作日而进行的斗争迫使资本家不能再用延长工作日的方法来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后，资本家就不得不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

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①从这个观点出发，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三个阶段，其中每个阶段都标志着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和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一定阶段。在最初的两个世纪内，资本主义生产是直线式地向前发展的，它从劳动的社会化的最简单的形式——简单协作，经过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制造业，发展到它的最高级的形式——机器大工业。相应于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技术进程，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形式也在不断改变。起初劳动是在形式上受资本奴役，现在则变成了在实际上受资本的支配，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品了。

剩余价值包含着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实质，它是理解整个资本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7页。

主义生产关系的钥匙。马克思根据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把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区别开来，揭露出劳动过程作为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的生产和价值增殖过程作为资本主义形式的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是作为生产力的代表者，作为用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来使自然界服从于自己的需要的创造者而出现的，但是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价值增殖过程，却把人变成资本的一部分，变成为价值增殖的目的所驱使的没有意志的工具。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在这种无法摆脱的矛盾中发展的。

由资本积累而引起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加快进行，银行资本的作用发生了新的变化，它成了资本集中的一个大得惊人的社会力量。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增强了资本周转和流通过程的意义，在流通过程中产生了信用制度，改造了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把它们从陈旧的形式转变为工业资本的派生形式。由于资本早已渗透到农业中去，土地的经营和地租的来源也已经包括在资本关系之内。由于不断产生了资本的新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愈来愈发展，愈来愈复杂了。现在资本对劳动的关系已经不单单表现为产业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的关系，而是表现为各类资本家以及大土地所有者和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在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基础上竖立着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股份公司”，公司里的每一个股东不管他们的经管项目、有机构成和周转速度如何，都按照等量资本带来等量利润的规律取得大小不等的红利。雇佣劳动和资本、资本的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剥削收入：工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都表示着一种生产关系，所有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就是从全体上来看的资本

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工业技术的不断改造，使资本有机构成日益提高，因而产生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开始触到了它的界限。这一点，甚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已十分敏锐地感觉到了。马克思说："象李嘉图那样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绝对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家，在这里也感觉到，这种生产方式为它自己造成了一种限制，因此，他们不是把这种限制归咎于生产，而是把它归咎于自然（在地租学说中就是这样）。但是在他们对利润率的下降所感到的恐惧中，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感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是由它的特定的内容和目的所决定的，无论它经历怎样的变化，它唯一地追求的都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或榨取剩余劳动。资本家所关心的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增加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社会进步的源泉是劳动时间的节约和供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的增加。个人的充分发展作为最大的动力将反过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所以，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观点看来，劳动时间的节约可以被看作是主要"资本"的生产。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却不是以赢得社会的绝对剩余时间为目的，而是以榨取工人的剩余时间为目的。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是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0页。

工人的剩余时间。社会所赢得的绝对的剩余时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无关。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在它增加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时间，而不是减少物质生产的一般劳动时间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生产才是重要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对立中运动的。”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与工人相独立、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因此，机器的出现和进步，并不是工人的独立和自由的增加，而是对他们的奴役形式愈来愈发展成为不可抗拒的体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陷入了越来越深刻的矛盾。它的历史使命是无所顾虑地按照几何级数推动人类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而它的生产关系却为这种发展设置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它被迫在矛盾中运动，在畸形中发展，透过表面的繁荣，显露出腐朽与衰颓的可怕景象。

马克思在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这种奇特现象时写道：“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十九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他接着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93—294页。

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包含的另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是由竞争所带来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必然引起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律通过竞争而变为外部的强制法则，个别资本家面临这种法则就象面临自然规律的盲目作用一样。人们自身的关系转化为物的关系和人们相对立，进一步通过竞争而实现，偶然性支配着人们的命运。无怪乎达尔文对动植物生活的描述酷似马尔萨斯的所谓人口理论。恩格斯说："在我第一次读达尔文的著作时，我也曾经由于他对动植物生活的描述同马尔萨斯的理论异常相似而感到惊奇。……我认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来说，最可耻的是它还没有超出动物界的经济形式。”②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这种生产方式只

①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79页。

②恩格斯：《致弗·阿·朗格（1865年3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9页。

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来看，这个阶段同一切过去的形式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这个阶段决不是最后结果，而是相反，在它固有的对抗形式中，包含着它灭亡的必然性。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被证明为历史的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它看做是生产的绝对的自然规律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研究，开辟了通向新社会的远景，开辟了通过对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而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远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构成向这个新社会形态的过渡。这一切，也是那样地不可抗拒，就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的否定是不可抗拒的一样。马克思说："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①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1页。

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削者就要被剥夺了。

第四节 《资本论》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阐述

马克思认为，所谓经济基础就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根据这个观点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法律以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和历史特征的。马克思指出：“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① 可见，马克思在经济基础的概念中包括了人对人的社会关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6页。

系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他并不象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把生产力排除在经济基础的概念之外。当做经济基础来看的生产关系总和与生产方式的概念具有相同的内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方式的革命化对改变人们的思想方式所具有的决定作用时也说过："因此，瑞士的工业如果还是几乎完全保持着蒸汽机发明以前全欧洲普遍采用的那种形式，那末可以想见，在从事生产的居民的头脑中，除了适应这种水平的思想以外，就不会有其他任何思想。如果蒸汽机还没有使瑞士的生产和交通方式革命化，它能够引起瑞士人的传统的思想方式的改变吗？"①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特别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全部政治思想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问题，其中对法权关系作了尤为深入的研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法权关系的阐明是科学地理解法权问题的钥匙。

马克思说："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

①恩格斯：《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4页。

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①

法权关系的领域是意志关系的领域，但是，这种意志关系并不决定于独立自主的个人。法律并不象资产阶级思想家所理解的那样，是自由意志的表现。权利虽然是由当事人的意志来表现，但人本身生活在社会中，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因此，“社会”本身才是所有权、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的法律以及由所有权必然产生的政治隶属关系的最后根源。

在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习惯和传统在法律的形成过程中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们最后作为法律被固定下来，仍然是因为它们同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相一致。马克思指出，在社会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所借以建立的基础仍然是自然形成的不发达状态的时候，习惯和传统必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总是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并且要把习惯和传统对现状造成的各种限制，用法律固定下来。类似的法律形成过程，仍然是在下述基础上进行的：“撇开其他一切情况不说，只要现状的基础即作为现状的基础的关系的不断再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有规则的和有秩序的形式，这种情况就会自然产生；并且，这种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要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会的固定性和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个必不可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1—892页。

少的要素。这种规则和秩序，正好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对地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单纯任意性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停滞状态中，一种生产方式所以能取得这个形式，只是由于它本身的反复的再生产。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个时期，那末，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①可见，法律关系的产生归根到底是要由生产方式获得一定的社会固定性来加以说明的，法律就是对这种社会固定性的公开认可。

在历史上，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等等。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权利的平等和公平，不过是商品生产关系的抽象表达，而且随着简单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谓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平等权利也立即转化为不平等的权利。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相互承认对方的私有权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和法律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劳动生产物必须在平等的交换中才能够成为商品。所以在交换过程中，两个商品的所有者必须愿意互相交换他们的商品，为此，必须彼此承认对方对商品的所有权。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马克思说：“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4页。

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①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同在任何其它社会中一样，法律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政治外壳，创造法律权利的不是某种思想原则，而是现实的占有方式。除非生产关系发展到必须改变它的外壳的程度，这种权利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所以，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它们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否则，就是非正义的。②但是，一旦生产关系发展到必须改变它的法律外壳的程度，这种权利和一切以它为依据的所谓正当利益的源泉，就会消失。例如，从一个更高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就象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

资产阶级法权最初是建立在简单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的，它的正义性似乎在于：权利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依据的。但是随着简单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相同的法律形式下，它的内容却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而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利不仅不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而是对这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2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9页。

个原则的彻底否定。平等的权利现在仍然表现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上。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作为享有意志自由的立约双方，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买卖一样，在权利上是完全平等的。但是这种初看起来完全平等的交换关系，仅是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是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并且只能使它神秘化的形式。

马克思说："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假定，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①经济运动完全不顾立法者由以出发的原则，而把法律形式远远抛在自己的后面。所以，同一所有权形式，在产品归生产者所有，生产者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因而只能靠自己的劳动致富的商品生产者社会，是适用的；在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资本家手中，因而使他们可以靠无偿占有别人劳动而致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适用的。法权形式总是只能相对地表现它的经济内容，所以它只能从不断变化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确切的说明，而不能反过来用法权关系解释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每一个单独考察的交换行为仍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0页。

然遵循等价原则，但占有方式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这丝毫不触犯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所有权。

有关土地所有权的变化也属于类似的情形。同样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在封建制度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不同的内容，它所发生的变化反映了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单从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形式来看，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作为一种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但这同一种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却有着完全不同于在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经济价值。因为这种权利的利用，显然不决定于土地所有者的意志，而取决于客观的经济条件。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权和封建土地所有权其实是不相同的，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在使农业从属于资本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使农业由陈旧落后的经济领域转化为自觉地应用科学和农艺学的先进生产部门，另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权从封建的统治和隶属关系下解放出来，把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的所有权和所有者完全分离，使土地对其所有者来说只代表一定量的"货币税"。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所有权就取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而不象在封建制度下，它总是带有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杂物。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到处都是从人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人们的一切政治和法律观念的。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教育和帮助工人阶级，使他们不是带着有色的法学眼镜，而是如实地观察事物，以便彻底认清自己的生活状况。正如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对法权（它始终只是某一特定社会的经济条件的反映）的考察是完全

次要的；相反地，对特定时代的一定制度、占有方式、社会阶级产生的历史正当性的探讨占着首要地位。”①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研究了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各种意识形式的历史特征，进而具体阐明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首先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②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交换为基础的，而劳动产品一旦取得了商品的形式，它就成了一个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由此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切颠倒与混乱，在世俗事物和人们的日常关系中重新笼罩起神秘的光圈。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变幻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变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把个别生产者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变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变化，商品就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即社会的物。各种商品之间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的和化学的性质绝无关系的，它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在人们面前却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正如在宗教世界里，人的

①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7页。

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6页。

头脑的产物表现为具有生命和意志并支配着人们的命运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货币，这种从商品中发展出来的一般等价物，获得了主宰一切的权力，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偶象。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着一种粗野的物质拜物教。无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还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中，作为资本的物化劳动不是表现为活劳动的基础和手段，而是同它相对立并支配着它的力量。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不仅看不见人和物的区别，甚至连物和生物之间的区别也不见了。在他们那里，“物作为劳动过程的物的因素所产生的作用，被认为是由这些物在资本中造成的，就象这些物在自己的人格化中，在和劳动对立的自己的独立性中所具有的作用一样。假如它们不再以这种异化的形式（资本——引者注）和劳动相对立，它们〔在政治经济学家们看来〕就不再能够产生这种作用。”①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的世界支配着有生命的人的世界，物化的死劳动统治着现实的活劳动。正象在受宗教束缚的思维过程中，思维的产品不仅要求支配思维本身，而且实现了这种支配一样。

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和由此引起的拜物教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宗教意识。正因为如此，获得某种改良形式的基督教就成为商品世界中最合适的宗教形式。基督教作为一种崇拜抽象人的宗教，主张人们的行为和命运都是根据神圣的意志在事先决定。在商品世界里，每一个商品所有者的个人命运也是由某种在他之外的力量所主宰和支配的。他的个人遭遇完全取决于下

①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26页。

述情形：他的商品能不能卖出并且以何种价格卖出，给他带来盈利还是亏损。这就是说，他完全落在他所不能控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支配之下，淹没在无法挣脱的竞争的旋涡之中，只有偶然的机会才能使他得救和获得幸福。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宗教存在的根源仍然是那样的事实：人们的苦难或幸运不取决于个人的才干和努力，而决定于他所不能控制并强加于他的盲目力量的作用。

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即当作价值来对待，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一般的社会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① 和资产阶级的宗教观念不同，古代宗教存在的基础是人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狭隘性。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虽然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因个人尚未成熟，而以人们之间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隶属关系为基础，他们的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因而他们在物质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和自然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现实关系的狭隘性，反映在观念上，就是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马克思说：“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6页。

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①

在马克思看来，宗教和神话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富有浪漫色彩的幻想的产物，而宗教则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②随着生产力和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所具有的神话色彩逐渐消失了，但是宗教观念却并不因此而有任何削弱。

象在宗教领域中一样，在道德领域中资产阶级也竭力提倡对抽象人的崇拜。他们一方面把人的自由意志即所谓天赋权利捧到天上，另一方面却又把无产者同机械、代劳家畜、商品并列。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也只是把无产者当作机械或代劳家畜，即当作商品来购买和使用的。但是，在资产者看来，这和他们所提倡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是丝毫矛盾也没有的。因为他们正是在劳动力的买卖中看到了天赋人权的真正的乐园。马克思说：“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6—97页。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①

资产阶级除了根据他们的特殊的私人利益、他们的利己心行事以外，不知道有任何足以约束他们行为的公共道德。他们在行动中总是斤斤计较于具体的细小的利益，而在口头上却专爱卖弄抽象的空话。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从整个阶级来说，资本显然有它自己的、如同根据国家利益而制定的最高法律那样的道德，至于普通的道德，那仅仅适用于穷人而已。”②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几乎是昨天才诞生的，但是，它已经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源泉。

它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不理会人类的将要退化和不免终于要灭种的前途，就象不理会地球可能和太阳相撞一样。“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③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还研究了艺术生产

①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299、300页。

②马克思：《政治动态。——欧洲缺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44页。

的特殊性问题，指出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性。他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胳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① 马克思以希腊古典艺术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他指出，一定的艺术形式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独特的产物，所以某些艺术形式当它们再度当作艺术生产的对象时，就再也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希腊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是和希腊社会的不发达状况相适应的。希腊社会所处的发展阶级是产生神话的阶段，而希腊神话则是产生希腊艺术的土壤。马克思说："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② 因此，在排斥一切神话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的社会里，要再度创造出希腊的艺术形式，这就无异于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

然而，希腊艺术既然和产生它的社会发展形式一样属于历史的过去，但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马克思解释说，正如儿童的天真会使成年人感到愉快一样，人类的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也会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不朽的魅力。因此，希腊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是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的。希腊艺术的历史意义，不是要人们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上重新创造出它的古典形式，而是在一个更高

①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113、113页。

的历史阶梯上，象希腊艺术那样，努力再现自己时代的真实。

第五节 《资本论》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论证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关于阶级、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并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出了科学的预测。

为了全面论证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五十二章中，提出了要对社会阶级这一基本概念进行研究。他说："首先要解答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事情形成阶级？这个问题自然会由另外一个问题的解答而得到解答：什么事情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①马克思在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后，由于手稿中断了，所以，我们未能看到马克思的直接的答案。然而，这个答案，则包含在他的一系列其他著作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绝不是收入和收入源泉的同一性形成社会阶级。他认为，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是据以区别阶级的标志的基础。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据此准确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结构成分："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②马克思在这里讲到的土地所有者，并不是指的封建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01、1000页。

地主，而是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因而这里讲的地租则是从对雇佣农业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剥削中得来的。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①这就是说，资本所有权和大量土地所有权的同一性就形成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阶级，而对生产资料一无所有和只占有自己劳动力的同一性则形成无产阶级。这也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②可见，社会阶级是由于一定集团的人们在生产关系体系中所处的一定的地位，同这一体系中别的集团的地位相对立或不同而形成的。因此，社会阶级乃是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它只是同一定的生产发展的历史阶段相联系的。

后来，列宁发展了马克思这一思想，给社会阶级下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即："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

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5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9页。

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①

马克思依据他对社会阶级这一科学概念的把握，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指出并非所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社会集团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他说：“这里我们遇到的是这样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特点，在这个社会中一定的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但是还不是这个社会的一切生产关系都从属于它。”②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是商品生产者，是其生产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生产者。这些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不仅再生产了自己的劳动能力，而且创造了剩余价值，并且，他们的地位容许他们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或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则以税收等形式从他们那里拿走了）。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其本质来说，是以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为基础的，因而导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分离。马克思说：“在现在这个社会中，分离表现为正常的关系。……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资本家本身不过是资本的职能，工人本身不过是劳动能力的职能。”③

因此，与资本相联系的资本家，通过地租也与资本相联系的大土地所有者，以及与劳动相联系的雇佣工人，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立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则“分裂为两重身份。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是资本家；作为劳动者，他是他

①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②③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9、441页。

自己的雇佣工人。”①

马克思还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阶级结构的总的发展趋势，即范围越来越广的居民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们或者与资本相联系，或者与劳动相联系。马克思指出：“这是一条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职能分配在不同的人身上，而且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或农民，不是逐渐变成剥削别人劳动的小资本家，就是丧失自己的生产资料……，变成雇佣工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的发展趋势。”②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总趋势，是符合马克思在这里所阐述的这条发展规律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有了新的发展。本书第一卷讲过，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有全面的阐述。《共产党宣言》在肯定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其中，考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发展中所经历的各个不同阶段，考察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发展情况，分析了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发展，从个别的工人对个别资产者的斗争发展为阶级冲突，从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组成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并且，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统治。《共产党宣言》指出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

①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0、441页。

历史使命，同时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它所阐明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在1848——1850年欧洲革命实践中，经受了考验，并有了发展。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得到了深刻而严密的考察和论证。

《资本论》不仅为无产阶级提供了科学的经济学说，它还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论证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直接分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经济方面的对立和无产阶级所处的地位，总结了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斗争历史，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这就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科学的理论基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所建立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说明，资本主义再生产既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分析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不仅不会改变工人阶级所处的阶级地位，反而会遭受更加深重的剥削。

马克思还探索了在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的条件下，资本积累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资本家由于对剩余价值的贪欲和激烈的竞争，竭力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用较少的活劳动推动更多的机器和原料，这样，就必然引起对劳动需求的减少，出现相对的人口过剩。

在考察剩余价值的生产时，马克思说明了工人处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受剥削的情况；在考察资本积累过程时，马克思则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外的工人——产业后备军的状况。马克思在分析了资本积累过程之后指出："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积累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工人阶级的绝对数

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人数也就越多。发展资本的膨胀力的同一些原因，也会产生出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因此，产业后备军必然会同财富的增长一起增大。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劳动折磨成正比。最后，雇佣工人阶级中的这个贫苦阶层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①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这一系列规律的分析，归根到底说明了一个真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工人阶级就无法摆脱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而且，他们创造的财富越多，自己所受的剥削和奴役也会更加沉重。无产阶级要求得自身的解放，要彻底摆脱资本的奴役和剥削，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恩格斯在一篇《资本论》的书评中特别指出：“这里社会革命的要求是足够清楚地提出来了。”这里所讲的社会革命，“指的是根本消灭资本。”②

必须指出，马克思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出发，来对待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阶级社会的剥削和奴役等历史现象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但他同时证明，这种历史的正当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继

①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87—688页。

②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杜塞尔多夫日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43页。

续保存下去，已经日益愈来愈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愈来愈激烈的冲突中。”①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过程，资本积累的过程，也是资本的集中过程。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是资本家用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剥夺直接生产者的过程；而资本集中的过程，则是少数资本家用残酷无情的鲸併手段剥夺多数资本家的过程。随着庞大的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在资本寡头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也就愈益尖锐起来。特别是作为这一基本矛盾的表现之一，各个资本家都在竞争的压力下竭力扩大生产规模，而整个社会生产则处于无政府状态下，因而必然出现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使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这清楚地表明：“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的庇护之下成长、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劳动的社会化和劳动的物质资料的集中已经达到了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再容纳它们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者自身就要被剥夺了。”②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所作的深入分析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由于自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造成了自身的否定。如果说，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作为独立的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这是第一个否定的话，那末，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又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马克思说：“这种

①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7—558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26页。

否定不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共同占有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指出了这种转变的必然性，也分析了这种转变的条件，这就是：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发展，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社会创造了物质前提；另一方面，它还训练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②

由上可见，正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灭亡，乃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因此，列宁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③“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④《资本论》问世后，马克思就把自己关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奠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作了

①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26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③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9页。

④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6页。

原则性的论述。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考察时，作过很好的说明。他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问题，去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①马克思究竟在什么事实的基础上来考察未来的共产主义的发展的呢?"这个事实就是，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中有着它的根源的，它是从资本主义中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给予诞生的那种社会力量行动的结局。"②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作了哪些原则性的论述呢？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它将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透彻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严重地阻碍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因此，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的社会形态的共产主义，必将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协作和共同占有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③到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者与生产条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重新恢复统一，这也就彻底铲除了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的根源。

其次，社会生产力将以从未有过的高速度蓬勃发展。这是由

①②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3页。这里的引文是重译的。

③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43页。

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同社会化生产的发展相适应的，这时，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和分配劳动，而且，生产的发展也将直接同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结合起来。马克思说："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些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① 这样，就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领域。

再次，劳动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劳动摆脱了被奴役的状态，不再是一种强制进行的沉重负担。在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们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② 这时，劳动者也不再是终生都受社会分工限制的"局部工人"。劳动者将成为"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③ 由于劳动的普遍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将大大缩短工作日，社会成员都将有更多的"非生产劳动时间和余暇"，这就为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创造了条件。

此外，马克思还设想过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指出，在这个联合体内，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它的分配方式是："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9、926—927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5页。

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①这里假定的关于生活资料的分配原则，实质上就是马克思后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明确提出的“按劳分配”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还提出这个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生产机体和商品的分配方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②这里实际上已说明了共产主义社会是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这也可以说是后来关于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的渊源。

由上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③今天，社会主义已经在许多国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这些原则性的论述，一部分已经变成了现实，被实践所证实，而且，它们将会继续为实践所证实。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5—96、95页。

③恩格斯：《致爱德华·皮斯（1886年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19—420页。

第三章 《资本论》中的科学方法论

《资本论》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制定是马克思把新的唯物主义观点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而作出的伟大成果，它的意义不亚于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基本观点的制定。

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这在马克思以前是没有正确解决过的。在马克思以前实际存在着两种方法，一种是传统的、庸俗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方法，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采用的那种缺乏联系、自相矛盾和简单的现象复制的方法；另一种则是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后一种方法无疑有着巨大的优越性，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观，证明历史是永恒地发展着的，它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必然的规律，而研究和揭示历史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则是辩证法的任务。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由于它具有完全抽象的和思辨的性质，在其现成的形式上是完全不适用的。为了使黑格尔的辩证法变成能够对经验材料进行逻辑加工的科学方法，必须对它进行唯物主义的改造。因此，我们的阐述要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说起。

第一节 《资本论》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继承与改造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上，不仅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与完善是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密切联系着的，而且作为科学的方法论的唯物辩证法的制定也是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程分不开的。因此，《资本论》的出版，不仅宣布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作的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始告完成，而且标志着他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改造也获得了最大的成就。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只有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才有可能完成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同时，也只有通对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研究，马克思也才有可能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彻底而系统地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

在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研究中，马克思收集和积累了无比丰富的材料，在对这些堆积如山的经验材料进行逻辑加工，以便根据系统科学的要求把它们变成严整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他发展并重新估价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巨大科学意义。在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不只一次地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尤其是黑格尔的《逻辑学》。1858年1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

一般人都能够理解。”①1868年他在给狄慈根的信中又重申了这个意愿：“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②马克思虽然没有留下辩证法的著作，但是他把辩证法应用于《资本论》，《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逻辑学》。正如列宁指出的：“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③

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诚然不是一件小事情，无论是黑格尔的学生或是他的敌人，“都没有能够在这个方法的巍然大厦上打开缺口；它被遗忘，是因为黑格尔学派不知道可以用它干些什么。”④只有马克思才是唯一能够担当这件工作的人，他出色地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⑤这个经过改造了的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成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基础。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

①《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②《马克思致约瑟夫·狄慈根（1868年5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35页。

③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357页。

④⑤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122页。

（1873年）中，马克思概述了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过程。他说："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①列宁也认为："黑格尔逻辑学的总结和概要、最高成就和实质，就是辩证的方法，——这是绝妙的。"②他在分别研究了《资本论》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之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③

那末，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所阐述的辩证方法的总的特征是什么呢？我们知道，黑格尔的《逻辑学》所要达到的唯一目标，乃是要把握"具体概念"（即"不同规定之统一"的概念）；而对"具体概念"由抽象到具体、即由简单到复杂的矛盾发展过程的描述，就是黑格尔《逻辑学》的整个内容。因此，黑

---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页。

②③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3、191页。

格尔《逻辑学》中的辩证方法的总的特征有两点：一是把概念的推移转化看成是由于自身内在的矛盾所引起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二是把概念的推移转化看成是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前者是矛盾分析的方法，后者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黑格尔的矛盾分析方法，贯穿在他的《逻辑学》的全部内容中。《逻辑学》讲的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第一阶段——逻辑阶段。整个逻辑阶段，又分为三个发展段落，即"存在"——"本质"——"概念"，因而他的《逻辑学》也相应地分为三个部分："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黑格尔在这三个部分中，都运用了对立统一的规律，即运用了矛盾分析的方法。

从《逻辑学》中，我们可以看出，黑格尔所描述的"绝对精神"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环节，它们自身都包含着矛盾，概念间的转化和推演，都是由于概念的自我矛盾运动的结果。例如，作为逻辑学起点的"存在"（Sein也译作"有"）这一概念，它之所以转化到"无"这一概念，不是由于在"有"之外存在着一个跟"有"没有内在联系的外力来推动这一转化的，而是由于"有"是一个纯粹抽象的、毫无规定性的概念，它自身就已包含着与它相反的"无"的因素的原故。在黑格尔看来，矛盾在他的逻辑学的三个部分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在"存在"的阶段中，各概念间的联系只是潜伏的，其间的矛盾也是潜伏着的；在"本质"的阶段中，各概念间的联系是显明的，其间的矛盾也是显明的；在"概念"的阶段中，原先互相矛盾着的概念达到了同一，每个概念自身即是对方，对方又即是自身。可见，从"存在"——"本质"——"概念"的整个发展过程，就是对立面矛盾同一的过程。这也表明了，矛盾是推动黑格尔逻辑学全部概念演变的唯一动力和源泉。

当然，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的运动、发展，表现为由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转化、过渡到另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联系，都不是从客观事物所固有的本质和联系中抽引出来的，而是先于客观事物存在的、自我发展着的精神。因而，黑格尔颠倒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他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

马克思正是批判和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吸取了其中关于矛盾推动概念变化、发展和矛盾由潜在到明显展开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特别注意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内在矛盾，弄清楚这种内在矛盾如何由萌芽状态一步一步发展到明显的、尖锐的状态。《资本论》正是从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的胚芽的商品这一“细胞”出发，通过一步一步深入而详细的分析，揭示出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的各部分间复杂关系的自始至终的矛盾发展全过程。

关于《逻辑学》中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黑格尔有很明确的说明。他说：“认识是从内容到内容向前转动的。首先，这种前进是这样规定自身的，即：它从单纯的规定性开始，而后继的总是愈加丰富和愈加具体。因为结果包含它的开端，而开端的过程以新的规定性丰富了结果。普遍的东西构成基础；因此不应当把进程看作是从一个他物到一个他物的流动。绝对方法中的概念在它的他有中保持自身；普遍的东西在它的特殊化中、在判断和实在中、保持自身；普遍的东西在以后规定的每一阶段，都提高了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它的辩证的前进而丧失了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和自己一起，使自身更丰富、更密实。”① 列宁认为，黑格尔的这一段话，对

①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49页。

于什么是辩证法这个问题，非常不坏地做了某种总结。①

具体一点来说，被黑格尔称作绝对方法的辩证法怎样推动纯粹理性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纯粹理性的简单范畴怎样由于不断的辩证运动而发展为整个体系？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做了阐述。在那里，马克思问道：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纯理性的运动。纯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是纯理性自我安置（设定），自我对置（异化），自我结合（综合），就是它把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说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这种通过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而实现的否定的否定运动，形成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的思想发展过程。正象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理性一旦把自己作为正题安置下来，这个作为正题的思想就会自相对置，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对立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即“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这样，“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这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思想，即它们的合题。然后这个新思想又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两个思想又融合为新的合题。随着这种辩证运动的进展，思想（简单范畴）就变成了思想群。并且同简单的范畴一样，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它也分出另一个与自己矛盾的思想群为自己的反题，然后从这两个思想群中产生出新的思想群作为它们的合题。这样，纯理性的辩证运动就从简单范畴进展到“群”，从“群”进展到“系列”，从“系列”进展到“整个体

①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0页。

系”。可见，这种前进的运动每向前一步，作为逻辑开端的简单范畴都获得更进一步的规定，从而使自己的内容愈来愈丰富和愈来愈具体，直到整个体系的形成。由此也可以看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概括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和一般特征。

黑格尔从他的绝对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把辩证法了解为纯粹理性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认识的运动，了解为抽象的逻辑形式的运动或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由于它具有这种极端神秘的唯心主义性质，从1843年起就受到马克思的坚决批判。虽说马克思自始就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容，但在40年代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全部意义还没有达到充分的理解，所以在批判其唯心主义和神秘性质的时候，往往作了过多的否定。50年代以后，马克思似乎重新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巨大认识作用，在他的各种经济学著作中，辩证法逐渐取得了严整的科学形态，变成了伟大的认识工具。虽然它在形态上仿佛又回到黑格尔，但本质上却完全不同，它不再是抽象形式的运动，而是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在马克思看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是人的认识用来反映客观具体事物的方法，而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资本论》中对于由抽象到具体发展的每一过程、每一阶段的概念的分析，都是以铁的事实和历史实践为根据的，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这里，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实即用实践来进行检验。”①而对黑格尔来说，由抽象到具体的矛盾发展过程是“纯

①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7页。

思想”、“纯概念”的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过程，具体实在却变成了纯粹理性的抽象运动所创造的结果。在他那里思维和实在的关系是头足倒置的。

所以，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

接着，马克思在指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被神秘化了、应该如何从其神秘外壳中发现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之后，特别比较了黑格尔的神秘形式的辩证法与被他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批判改造后获得合理形式的辩证法的根本区别。他说：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因之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而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则引起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②

恩格斯在1891年致施米特的信中也说：“即使把马克思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同黑格尔的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作一比较，您也会看到一种绝妙的对照：一方面是具体的发展，正如现实中所发

---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页。

生的那样；而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结构，在其中非常天才的思想以及有些地方是极其重要的转化，如质和量的互相转化，被说成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的表面上的自我发展。”①

第二节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形而上学方法的批判

恩格斯说：“自从黑格尔逝世之后，把一门科学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来说明的尝试，几乎未曾有过。”“陈腐的旧科学由于在实证知识方面较强而保持着它的地盘；……旧的形而上学及其固定不变的范畴似乎在科学中又重新开始了它的统治。”②在马克思以前，政治经济学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也正是这种形而上学方法。要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在其内在联系中阐述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规律，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是完全无济于事的。因此，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必须从它们的方法开始。

在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古典经济学家们是作出过一定贡献的。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联系，而不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但是由于他们所用的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因而终于未能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出科学的说明。古典经济学家们虽然在不同程度上达到了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理过程的基础和出发

①《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1年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4页。

②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9页。

点，即商品价值决定于生产它的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但是他们却不能从这个基础出发，一步一步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机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一直上升到这个社会的现象的表面。他们缺乏历史的观点，不懂得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当做自然历史的过程来研究，而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财富形式当做一成不变的既成事实来对待。他们只限于把各种不同的经济事实当作彼此并列的现象，以便从中寻找它们的共性，完全不懂得这些不同的经济关系以及反映它们的各个经济范畴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一种关系和范畴从另一种关系和范畴中产生出来，同时又成为站在它之上的别种关系和范畴的基础。

各种经济关系和范畴之间的这种相互转化、互为中介的联系，仅仅用分析和还原的方法是不能加以说明的，只有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方法才能加以说明。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力求通过分析，把各种固定的和彼此异化的财富形式还原为它们的内在的统一性，并从它们身上剥去那种使它们漠不相关地相互并存的形式；它想了解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不同的内在联系。因此，它把地租还原为超额利润，这样，地租就不再作为特殊的、独立的形式而存在，它就和它的虚假的源泉即土地分离开来。它同样剥去了利息的独立形式，证明它是利润的一部分。于是，它把非劳动者借以从商品价值中获取份额的一切收入形式，一切独立的形式或名义都还原为利润这一种形式。"然而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混淆了利润和剩余价值，往往试图不揭示中介环节就直接进行这种还原以证明不同财富形式的源泉的同一性，因而不得不陷入矛盾。马克思认为，这种情况是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的必然结果，因为"它感兴趣的不是从起源来说明各种不

同的形式，而是通过分析来把它们还原为它们的统一性，因为它是从把它们作为已知的前提出发的。”①

可见，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形而上学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它不是力图说明各种经济关系的起源，而是把它们当做已知的前提，因而它把各种经济范畴也看做固定不变的，并且往往在一开始就把所有一切范畴一下子都罗列出来，企图通过强制的抽象还原为它们的内在统一性。在他们不得不陷入矛盾的时候，不是抛弃他们的理论的出发点(劳动价值论)，就是求助于繁琐论证和诡辩言辞，企图证明矛盾并不存在。

亚当·斯密先后曾提出过三种不同的价值理论。起初，他对价值以及对作为价值的组成部分的利润和工资发表过正确的观点，后来却走上了相反的道路，把所谓工资价格、利润价格、地租价格假定为某种既定的东西，试图把它们规定为独立的量，从它们的总和中得出商品的价格。这后一种观点的庸俗性质是十分明显的。斯密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说明，他起初是从事物的内部联系考察事物，企图用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来说明利润、工资和地租这些更具体得多的经济关系，但由于他的形而上学方法，使他不能发现从价值规律到利润规律、工资规律、地租规律的依次转化的各种中介环节，因而迫使他把研究的方向倒转过来，从事物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颠倒了的形式去考察事物。虽然这两种观点不仅缺乏联系，而且互相矛盾，但在斯密看来似乎是同样合理的，他竟天真地没有察觉它们之间的矛盾。由于斯密局限于从流通领域内考察剩余价值的起源，他感到物化劳动和活

①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56页。

劳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使价值规律出现了缺口，并且从结果看来，作为出发点的价值规律似乎已经失效了。于是他得到结论，认为从土地所有权和资本产生以后，适用于简单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价值不再决定于生产它们的劳动时间，而是由利润、工资和地租等几种收入所构成。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之所以不能解决这个确实存在着的矛盾，是因为他不懂得从商品价值的简单规定一步一步地上升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现象的辩证思维方法，因而丢掉了一系列的中介环节。

李嘉图虽然较之斯密更为一贯地坚持价值规律，但他总想证明各种不同的经济关系和范畴同价值理论并不矛盾，他力求通过强制的和形式的抽象说明利润、地租、利息等等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和价值理论的一致性，而不是从价值规律这个基础出发，去阐明这些经济范畴，以及它们同价值理论的表面上的矛盾。他所运用的方法不是“上升”法。他的体系的矛盾和缺点都是由此而来的。这种情况首先决定了李嘉图著作的非常奇特的、必然谬误的结构。例如，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中，不仅假定了商品的存在，而且假定了工资、资本、利润甚至一般利润率以及由流通过程产生出的资本的各种形式，所有这些经济关系和范畴都被他当做不变的事实和已知的前提。他把所有发展了的资产阶级关系以及和它们相适应的范畴，一起提到自己的面前，然后一一把它们和价值规律对质，清查它们同这个规律符合到什么程度。他虽然牢牢抓住了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有机联系的基础和出发点，但由于他所用的不是上升法而是逆序法，因而和斯密一样，不得不跳过各种中介环节来强行贯彻各种经济范畴的内部统一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

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所有一切范畴都预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的一致性。"①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的错误是：它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暂时的历史形式，而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不仅导致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形而上学方法，而且也使他们不能对资本主义关系作深入的分析。例如，李嘉图就仅仅局限于对交换价值的量的分析，而忽视了对交换价值的质的研究，对于剩余价值也只限于做量的分析，而完全不研究它的起源。这样他就不能透过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研究发现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不了解价值必然要表现为货币，货币必要发展为资本，不了解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发展，反映了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的质的变化。马克思写道："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象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

---

①《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8—369页。

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①

所以，古典经济学的一切基本错误和缺点，不仅有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根源，而且有其阶级的根源。虽然古典经济学已经接触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本质的东西——价值和剩余价值，但是却不能科学地把它表达出来。只要它仍然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至于庸俗经济学的方法就更是粗俗的经验主义和鄙陋的形而上学。庸俗经济学原来是从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因素，即作为资产阶级日常意识的单纯现象的简单复写，即它的庸俗因素中发展起来的。前面说到，这种庸俗因素在斯密学说中明显地存在着。庸俗经济学完全停留在现象的表面，以“学理主义的形式”来复制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意识，即“在其动机和观念上都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在表现的意识。”它“愈是肤浅地抓住现象的表面，仅仅用一定的方式把这种现象的表面复制出来，它就愈觉得自己‘合乎自然’，而与任何抽象的空想无关。”②

第三节 矛盾分析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一种辩证方法，就是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内在矛盾，揭示其概念、范畴由于这种内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8页注（32）。

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39页。

在矛盾而不断推移、转化、发展的过程。这种方法，就是矛盾分析法。

矛盾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始终，《资本论》自始至终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因此，列宁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为我们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中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①

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它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矛盾的胚芽"，《资本论》就是从分析商品的内部矛盾开始的。如何运用矛盾分析法来分析商品呢？首先就是把商品这个统一物分解为互相对立、互相矛盾的两个部分，然后对这两个矛盾着的部分进行分别的考察。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是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方面来考察的，每次考察一面。可是，作为商品，它直接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同时，它只有在同其他商品的关系中才是商品。"②这就是说，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分析的任务，就是先对统一物进行分解，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然后回到矛盾的总体上进行综合，达到对统一物的全面的、深入的认识。

---

①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9页。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0页。

在分析商品的矛盾中，从商品的使用价值这一方面来考察，可以看到每一个商品都具有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属性，它是社会需要的对象，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它包含在社会联系中，但不反映任何生产关系；再从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一方面来考察，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它所反映的内容乃是人类的抽象劳动即商品的价值，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对商品的这两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后，再从矛盾的总体上来进行考察，就可以看到，在商品中，使用价值和价值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中，这两个方面是矛盾的、对立的，商品的使用价值表现着人与物的关系，商品的价值则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使用价值乃是为一切社会所共有，而价值则表示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使用价值表现各种商品间的质的差异，价值则表现商品间的质的同一；同时，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商品的价值又是相互联系的、统一的，在商品交换的关系中，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的承担物，那种离开价值的单纯的使用价值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同样，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也是紧密相联系的，交换价值首先就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总之，在商品生产的范围内，不可能有没有使用价值的价值，也不能有没有价值的使用价值，两者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通过以上对商品的这种分析，我们就可以把握住商品的内在矛盾即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实质了。

马克思运用矛盾分析法来分析商品，不仅阐明了商品自身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而且渐次揭示出产生商品的这一内在矛盾的根源。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是由于使用价值是具体劳动创造的，交换价值是抽象劳动创造的，因而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就是产生使用价值与交

换价值的矛盾的根源。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是由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中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产生的。这样，从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的矛盾分析中，就揭示出潜藏于商品中的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这就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

商品中所潜藏着的矛盾，按照自身的规律，必然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说："商品隐藏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这种对立进一步发展，就表现为、实现为商品的二重化即分为商品和货币。商品的这种二重化作为过程出现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卖和买是一个过程的不同因素，但是这一过程的每一行为同时都包含着它的对立面。"①随着商品交换过程的扩大与加深，货币出现了，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内部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成为商品与货币的对立，"在这种外部对立中，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同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对立着。"②商品交换的双方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然而这种差别的统一又按相反的方向表现在两极中的每一极上，由此表现出它们的相互关系。在商品——货币、货币——商品的交换过程中，商品实际上是使用价值，它的价值存在只是观念地表现在价格上，价格使商品同对立着的金发生关系，把金当做自己的实际的价值形态；反之，金这物质只是充当价值化身，充当货币，因此，金实际上是交换价值。这样，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就表现为等价性形态和相对价值形态的对立，商品的这种对立形式就是它们的交换过程的实际的矛盾运动形式。

①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1—92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3页。

原来是商品与商品交换的过程，现在分裂为“商品——货币”和“货币——商品”两个过程，也就是“卖”和“买”的过程。卖和买既是相分离的又是相统一的。这两个过程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们两者之间的对立就是商品与货币的对立的表现。这种对立表现在：一方面，商品所有者可能遇到商品卖不出去，即商品不能转化成货币的情况；另一方面，握有货币的人可以等待时机而不立刻购买商品，即不立刻把货币转化为商品。当“卖”和“买”这两个过程的独立性或矛盾发展，也就是“卖”和“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相分离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危机。此外，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既相分离又相统一，生产各部门的既相分离又相统一，生产和消费的既相分离又相统一，也都是一样的。马克思的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也是从矛盾双方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上来阐述的：“正是在危机中，它们的统一、不同因素的统一才显示出来。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的因素所具有的彼此的独立性被强制地消灭了。因此，危机表现出各个彼此独立的因素的统一。没有表面上彼此无关的各个因素的这种内在统一，也就没有危机。”①

在分析商品经济关系中，只看到对立而看不到统一，或者只看到统一而看不到对立，都是一种片面的观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萨伊和詹姆斯·穆勒等人，抹杀交换过程中的矛盾，否认“卖”和“买”的相对独立性，说什么买卖必然平衡，否认普遍的生产过剩，说什么供求完全一致。这样，他们就完全否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危机的任何可能性和必然性。马克思

①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1页。

批判了这种形而上学观点，指出它是“只看见统一而看不见分离”，用空话来解决实际没有解决的矛盾。

在简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所潜藏着的经济危机，当然还只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①

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简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货币还只是一种交换媒介，而不是资本，那时的流通公式是“商品——货币——商品”，是为买而卖。然而，当货币由流通手段发展成为购买劳动力、剥削别人的劳动的手段时，货币就成了资本，这时才发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的公式是“货币——商品——货币”，即为卖而买。资本家在这一过程结束时所得到的货币，大于他开始时所拥有的货币，这一部分增殖的货币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资本家所雇佣的劳动力所创造出来的为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出劳动力价值的价值。正是由于剩余价值是工人在生产范围内创造的，所以，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发生。”② 这就是说，货币必须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商品，而劳动力商品又必须在使用中才能创造新的价值。可见，如果没有市场上劳动力的买卖，没有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就不可能有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先前的简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商品和货币的矛盾，就这样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展成了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发展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过程，就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3、188页。

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础之上的，所以，马克思说：“资本本身就是矛盾。”①

在揭示出剩余价值，说明了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以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继续对剩余价值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指出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有两种形式，一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二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是靠延长工人工作的时间而产生的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则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相对地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在前一种情况下，资本家有权利尽可能地延长工人工作日的时间，而工人则有权利为缩短工作日的时间而斗争。

马克思说：“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②而从绝对剩余价值到相对剩余价值的发展，则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更加深刻，更加尖锐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运动，并没有至此为止。资本家从工人那里剥削来的剩余价值，一部分用于自己个人的消费，一部分则把它转化为资本，用来扩大生产规模。前面一种情况是简单再生产，后面一种情况则是扩大再生产。由于后者增加了资本，因而又叫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源泉，是在先前的生产过程中从工人

①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2页。

那里剥削来的剩余价值；现在经过资本积累，资本家又以这部分剩余价值为资本，再从工人那里剥削新的剩余价值，这样继续下去，结果就产生了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则是贫困的积累，表现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性质。

马克思继续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来分析资本的积累，揭示出了资本积累的两种形式：一是“资本积聚”，二是“资本集中”。“资本积聚”是靠积累本企业获得的剩余价值以增加资本总额。“资本集中”则是通过合股或大资本吞併小资本的方式，使多数资本结合为一个更大的资本。这两种情况都更增加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

资本家对财富的无限贪欲，驱使它拚命地积聚或集中资本，这就刺激着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越发展，资本中用于发展技术、采用新机器和新设备等生产资料方面的“不变资本”的比重就越增加，相对的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的比重就越减少，而剩余价值是可变资本创造的，这样，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量和利润量虽然增长，但是利润率却随之下降。资本家为了改变利润率下降的状况，就进一步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这又造成利润率继续下降。这样，资本积累的矛盾也就越陷越深。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条件下，虽然生产力发展了，产品增加了，但是由于资本家无止境的剥削，工人的消费和购买力都日渐低微，这样，“生产越是发展，它就越是与消费关系所借以建立的狭隘基础陷于矛盾。”于是，生产过剩的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原来潜藏在简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危机的可能性，这时就完全变成现实性了，包含在商品细胞中的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的萌芽，至此也充分地展开了。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

产生出来。不仅如此，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①马克思说：“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这种经济，一方面，这个矛盾的越来越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另一方面，这个矛盾的比较抽象的形式会再现并包含在它的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这一点，也必然被说明。”②因此，只有用矛盾分析的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研究这些矛盾的解决和再现的全部运动，才能把握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才能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

第四节　质量和数量辩证结合的分析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引者注）经济运动规律”。③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除运用矛盾的辩证分析方法外，还必须用质量和数量相结合的辩证分析方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但是，事物的量只能是具有一定质的规定中的量，不了解事物的质，就不能正确地把握它的量，而任何质又总是要表现为一定的量，没有数量

①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页。

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2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页。

也就没有质量。因此，从人们认识事物的顺序上看，认识总是从对质的认识开始，然后再认识它的量和度。《资本论》的分析，也是按照质、量、度的顺序进行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质量分析方法，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时，首先就注意到区分物的自然的质和社会的质。在讲到用铁来充当糖的重量尺度，用上衣来代表麻布的价值的例子时，马克思指出："在塔糖的重量表现中，铁代表两个物体共有的自然属性，即它们的重，而在麻布的价值表现中，上衣代表这两种物的超自然属性，即它们的价值，某种纯粹社会的东西。"①这很明确地指出了物的自然的质和社会的质的不同。自然的质和社会的质，是两种不同的性质的属性，它们受到不同关系的制约，各自有其独自的发展路线。马克思在谈到商品时就说过："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把物的自然的质和社会的质混为一谈，特别是不理解社会的质，不理解社会的质是怎样在一定历史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科学地说明复杂的经济现象。

马克思特别注意分析物的社会的质，他还对社会的质的不同类型作了具体的分析。就以商品为例：商品就它的使用价值来说，不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还是从它作为人类劳动的产品才具有这些属性这个角度来考察，它

---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2、89页。

们都反映了某些社会需要和社会标准，但它们都具有一定的实物形式，都是物化于单个的具体的物中，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改变了，自然的物质变成了人们可以使用的物，然而，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可以感觉的物。这是商品的一类社会的质。

当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人们便看到："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① 商品所包含有抽象的人类劳动，则是商品的社会的、系统方面的质②，这是另一类社会的质，与前一类社会的质不同，它不具有实物的形式，不物化于单个的物中，而仅仅表现为社会整体的质。

马克思曾形象地说过："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使人们感到兴趣。作为物，我们没有使用价值。作为物，我们具有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自己作为商品物进行的交易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彼此只是作为交换价值发生关系。"③ 从这里可以看出，商品有三个方面的质，即自然的质（物）、第一类社会的质（使用价值）、第二类社会的质（价值）。三者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其中社会的、系统方面的质，在

①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100页。

②所谓"系统的质"，是指对象在某种系统中所具有的质。例如，人有重量，这种质是处于地球的引力的系统中产生的，超出这种引力系统，人就失重了，这就是一种系统的质。又如，机器的无形损耗，这是由于某台机器处于全部开动着的机器的系统中，只要同样结构的机器能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或者出现了更好的机器同原来的机器相竞争，原有机器的交换价值就会受到损失。机器的这种无形损耗也是一种系统的质。

资本主义制度下决定着商品的社会生产，决定着商品的社会运动和发展的性质和方向。

《资本论》除了注重对经济现象进行质量分析外，也注意到对它进行数量分析。

马克思在分析交换价值的数量方面的关系时，指出："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① 测定商品的价值量，是以在现有的社会的标准的生产条件下，生产商品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而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是随着许多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要弄清交换价值的数量差别，还必须详细分析决定价值量的数量结构的那些社会条件，这就是个别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关系，科学发展水平及其在工艺上运用的程度，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有效性，自然条件的有利和不利等等，只有全面地把握了这一系列因素，数量分析才能准确地阐明价值形成及其运动的规律。

马克思运用数量分析方法，还对劳动强化这种经济现象进行了科学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自从剩余价值的生产不能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以来，资本就竭力用加快发展机器体系，增加劳动的强度，迫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的办法，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这时，外延量转化为内涵量，就是说，计量劳动时间的，除了它的"外延量"以外，还有它的密度，即内涵量。马克思研究劳动时间的密度的计量问题，揭示出了这样一条规律，即"劳动力的活动能力同它的活动时间成反比。"②

---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450页。

此外，《资本论》对一系列经济现象进行了数量的分析，诸如把各种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的比例，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的估定，劳动力的价格量和剩余价值量的互相关联的变化，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的增长的各种相互关系，等等，在这些数量分析中，马克思都十分注意到把研究的数量方面和质量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事物的发展总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单纯的量变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了，这个转化的一定点也就是"度"。因此，分析事物的转化过程，必须把握这种转化的"一定点"即度。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转化为资本时，认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①

马克思分析了富裕的手工业者转化为资本家的过程。他认为，富裕的手工业者起先自己还得参加一部分劳动，后来，剥削到的剩余价值多了，营业的规模扩大了，才能完全摆脱劳动，专门担任管理和监督工人的职务。据此，马克思指出："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在这里，也象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②

---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1、342—343页。

第五节 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在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马克思同黑格尔一样把他的研究方法叫做“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在科学研究领域内的系统地应用和具体化，是把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融为一体的科学方法论，它有着普遍的意义。

依照马克思的说法，所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①

科学认识的对象都是具体的整体。这种具体的整体在未曾认识以前只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在经过分析、加以规定之后，它变成越来越简单的概念。理性的思维就是从最简单的概念开始的，所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有一个先行的认识路程作为它的前提。从表象中的具体（感性具体）出发，经过分析，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最简单的规定，这是认识过程的前一段路程。传统的认识方法到此就为止了。其实这只是走过了认识过程的一半，并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半。认识的行程必须从这里再回过头来，经过综合，从最简单的抽象重又上升到具体的整体。但是现在所达到的具体整体，已不再是浑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整个认识过程好象是一个封闭的圆圈，它由两条相反的认识道路组成。第一条道路主要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格克思恩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

沿着分析的路线进行，在这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第二条道路主要沿着综合的路线进行，在这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必须指出，这里所讲的分析的路线与综合的路线是就其主要方面说的，其实，分析与综合决不是彼此孤立进行的，而是相互结合的，分析是通过综合在思维的每一个运动中完成的，整体的各个部分之经过分析而分离出来，正是遵循着有客观依据的连贯性，即其综合性的统一性，分析的每一个动作即直接是综合道路上的一步，是弄清整体诸部分之间的联系的道路上的一步。黑格尔说过："哲学的方法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这倒并不是说对这两个有限认识方法的仅仅平列并用，或单纯交换使用，而是说哲学方法扬弃了并包含了这两个方法。因此在哲学方法的每一运动里所采取的态度，同时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① 列宁认为黑格尔的这段话讲得"好极了！"②

科学发展的实际进程就是遵循着这个规律进行的。政治经济学在它产生的时期走的是第一条道路。例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等等这些浑沌的表象开始，作为结果，他们总是通过分析得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规定，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而当这些简单要素被抽象出来和确定下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就多少沿着相反的道路进行，它开始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等具体整体。这样，各种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就开始出现了。显然，这条上升的认识道路是有很大的自

---

①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4页。

②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7页。

发性的，不过它预示了一种科学上的正确方法。如果把经过分析获得最简单的规定作为必要前提包括其中，那末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方法就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①和黑格尔不同，马克思是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当做思维用来掌握具体、使现实中的具体在思维中复制和再现出来的方法，所以整个过程都是在思维行程中进行的，丝毫无损于现实具体的客观独立性。而黑格尔则陷入唯心主义的幻觉，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误认为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因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②必须这样来理解黑格尔的精神才算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

---

①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38—39页。

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①

列宁在说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用的方法时指出：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但他并不以单纯地阐述经济关系为限，而是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因此，“这一著作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向读者表明出来，将它的生活习惯，将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具体社会表现，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将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都和盘托出。”②列宁在这里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也正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决不限于把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归结为经济原因，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要阐明生产力、经济关系怎样通过各种中介环节决定着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整个过程。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在于透过社会生活的表面揭示它的本质和真正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要表明本质如何转化为现象，原因如何转化为结果。马克思说：“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

①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

②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①

马克思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和庸俗经验主义的归结法对立起来，指出后者是一种非科学的方法。他说：“这种归结法是把包含着发展的差别抛掉，使一切都归结为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单从这点来说，它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科学的；何况它是时而抛掉这一方面，时而抛掉那一方面，以便时而从这一方面，时而从那一方面来制造同一性。”② 由抽象到具体的上升法，把事物看做生动的、发展的，它要求在事物的变化和过程中把握事物，要求从同一进展到差别，依次地展现事物发展的一切阶段和环节，从最简单的元素形态直到最丰富、最复杂的有机整体。归结法则把事物看做僵死的堆积，用虚假的和形式的抽象制造事物的同一性。它不是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揭示事物的联系，揭示一切事物互为中介、相互转化的有规律的联系。它所能认识的事物之间的唯一的联系，就是抛弃了一切现实差别的抽象共同性，然后就用这种抽象共同性（僵死概念）来解释一切。庸俗经验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误认为这就是科学的方法，其实它和科学还相距甚远。所以，马克思说：“黑格尔从来没有把归纳大量‘事例’为一个普遍原则的做法称为辩证法。”③

既然每一门科学都是以思想和概念的形式来把握自己的对象，所以，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换句话说，就是按照一定的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0页注（89）。

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3页。

③《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12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9页。

逻辑顺序来展开它的概念和范畴的体系。科学的任务不是要把这些概念和范畴缺乏联系地任意排列起来，而是要按照事物固有的内在联系和必然的发展规律，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从原因到结果，从单纯的本质到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一步一步地展现出概念和范畴的发展层次和依次转化的一切中介环节。

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这一具体事物的认识，是从“商品”这个抽象的规定性开始的，即把商品当做脱离了它同货币、资本的联系的东西来单独考察的，通过考察，发现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在说明“商品”概念后，就进到“货币”概念。“货币”包括“商品”在内，但“货币”这个概念包含着“商品”和其他规定的联系，它是比“商品”的内容更为复杂、更为具体的概念。在论述“货币”后，又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资本”的概念。货币因资本家用来购买劳动力、从而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增值，这才使货币转化成为资本，“资本”这个概念包含着“货币”同劳动力变为商品以及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等等现象的联系，因而，“资本”的内容比“货币”的内容更为丰富、复杂，它是一个比“货币”更为具体的概念。然后，资本的使命并不以简单地剥削剩余价值为终结，它还要将已经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用作追加资本，以剥削新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的积累”。这样，“资本的积累”又是一个比“资本”或“剩余价值”的内容更为复杂丰富，更为具体的概念。这是《资本论》第一卷所展示的经济范畴由抽象到具体的内容。“资本的积累”，就其实际过程而言，它经历着资本流通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便是《资本论》第二卷所展示的内容。《资本论》第三卷，又把第一卷所展示的资本的生产过程和第二卷所展示的资本的流通过程统一起来，它所要

揭示和说明的，是“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①《资本论》第三卷中所提出的各种经济概念，如“价格”、“利润”、“利息”、“地租”等等，便都是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统一的产物，都是一些极为具体的概念，它们都反映出了资本主义这一客观具体事物中各种极端复杂的矛盾关系。

可见，在《资本论》中，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各个经济范畴，不是任意排列的，而是安排得象台阶一样，一种范畴立于另一种范畴之上，同时又成为另一种更高的范畴的基础，较高一级的范畴只有依靠低一级的范畴才能得到说明。由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只有先分析商品然后才能说明货币，只有分析了货币才能说明资本，然后从资本进展到剩余价值，从剩余价值进展到工资和利润等等。较具体的范畴总是出现在较简单的范畴之后，整部《资本论》的结构就是一个庞大的被严格规定了的经济范畴体系，各个范畴之间的逻辑顺序不容许有任何颠倒和错乱，抽去其中的任何中介环节，后面的范畴就是不可理解的。这种范畴之间的逻辑顺序看起来象是先验的，其实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及其内部结构的客观逻辑所必然要求的。

科学认识的方法就在于自觉地和这种客观的逻辑相适应。马克思说：“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页。

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斯密和李嘉图，虽然力求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联系和生理过程，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但是当他们一旦获得了作为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的价值理论之后，却不懂得怎样从这个基础出发，按照资本本身发生、发展的法则一步一步地理解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杂机体。

亚当·斯密开始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他从简单商品交换及其固有的价值规律转到物化劳动同活动之间的交换，转到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交换。但他只是走了开头的几步就发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不能理解较少量的物化劳动如何能同较多的活劳动相交换。这样就迫使他采取相反的方法，即庸俗经验主义的方法，抛开了他最初的正确前提，转而用纯属现象形态的几种“收入”来说明商品价格的起源。所以在斯密那里是两种方法安然并存的：“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②

---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24页。

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81—182页。

李嘉图把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变原则，完全忽视价值的各种转化形态和形式差别，他唯一感兴趣的是证明利润、利息和地租等这些浮现在社会表面的财富形式和价值理论的一致性，因此，他求助于还原法，企图把价值的发展了的最复杂的形式一下子就还原为它的最简单的规定。这样，他不得不丢掉了从价值规律到利润、利息和地租规律之间的所有中介环节，而且把剩余价值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直接等同起来。于是他就碰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既然剩余价值是产品价值中被资本家扣除的由工人的无酬劳动所创造是那部分价值，那末，为什么不问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比例如何，只要垫支的总资本数额相同就总是会带来相同数量的利润？这个矛盾使李嘉图学派碰得头破血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如果想不经过任何中介过程就直接根据价值规律去理解这一现象，就是说，根据某一个别行业的个别资本所生产的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来解释这一资本所取得的利润，那末，这就是一个比用代数方法或许能求出的化圆为方问题更困难得多的问题。这简直就是企图把无说成有。"① "在这里，一般规律同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是想用寻找中介环节的办法来解决，而是想用把具体的东西直接列入抽象的东西，使具体的东西直接适应抽象的东西的办法来解决。"②

在《资本论》中，由于马克思应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一切经济范畴都被安置在适当的位置上和正确的联系中，由于一切范畴都通过它们的推移、转化和揭示其中介环

①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0、91页。

节而得到论证和阐明，所以，即使是最复杂、最困难的经济问题，也都得到了简洁而明确的说明。例如，从商品到货币的转化这个两千多年来未曾解决的困难问题，马克思却通过从简单价值形态导出扩大的价值形态，再从扩大的价值形态导出一般价值形态的逻辑发展，加以最科学的说明。在这里，逻辑的证明是通过范畴的推移、转化而实现的。并且，既然货币的起源已经得到说明，它的最深刻的本质也就被揭示出来了。对于货币是这样，对于资本及一切其他事物也都是这样。所以，恩格斯说："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①

第六节 逻辑分析的开端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要求认识从最简单的规定开始。因而，在一切科学认识中，确定研究的起点乃是非常重要的。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曾明确谈到过逻辑学的开端问题。黑格尔认为，逻辑学是对绝对精神的全面的论证。就绝对精神本身来说，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普遍联系的整体，是无所谓开端的。然而，要论证它，就得有一个开端。当然，逻辑学不能从绝对精神开始，因为对绝对精神的全面描述是到逻辑学结束时才能做到的。为了一步步地论证绝对精神，只能从绝对精神的最贫乏、最空洞、最抽象的表现即纯存在开始，而作为逻辑学的终点的绝

①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页。

对精神，则正是纯存在之最丰富、最圆满、最具体的发展。

可见，作为开端和起点的东西必须是一门科学的最基本的前提和出发点，整个科学以及所运用的全部概念和范畴都应当从这个基本前提中发展和引导出来。任何具体的概念和范畴都不能在科学开始之前预先作为已知的东西假定出来，而只应当从作为基本前提的最简单的规定中发展、转化而来，并由此获得逻辑的证明，否则就是把科学以外的东西，把先入之见强加于科学。所以，黑格尔关于逻辑的开端的学说，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就是说，科学认识的发展必须顺应对象本身的自己运动、自己发展的历史进程，以便从不知进展到知，从不甚深刻、不甚全面的知识进展到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知识，而不把任何东西作为已知物预先假定出来。例如，在分析商品之前不假定货币为已知的，在分析货币之前不假定资本为已知的等等。实际上，科学认识的任务正在于研究货币、资本等等这些复杂的经济范畴究竟是从什么地方产生出来的。

列宁曾引述黑格尔的话说："必须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存在、无、生成（das Werden）（不要其他东西），引伸出范畴（不是任意地或机械地搬取）（不是'叙述'，不是'断言'，而是**证明**）——因为在这里，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这个萌芽中》。"①恩格斯还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②所以，作为开端的东西必须是所研究的对象的萌芽，它或者是对象所由发展起来的历史的起点，或者是它的复杂机体由以构成的细胞，或者同时是这两

①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2页。

②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

者。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是根据这个思想把商品作为自己的研究的开端的。列宁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为我们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中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① 列宁认为，一般辩证法的阐述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本论》中的辩证法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

《资本论》所以把商品作为研究的起点，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决定的。因为商品交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资本主义就是从商品交换中发展起来的，所以，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必须从商品的价值规定出发，而且是从在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而不能从别的什么出发，例如，不能从劳动出发，因为劳动是一切社会赖以存在的前提，而不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从劳动出发直接过渡到资本，就象从不同的人种过渡到工人和银行家，从自然物直接过渡到蒸汽机一样，是不可能的。在一切社会状态中，劳动生产物都是使用对象，只有在一个历史地规定了的发展时期，才把生产一个有用物而支出的劳动，表现为它的对象的属性，即表现为劳动生产物的价值，把它转化为商品。所以"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

①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9页。

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① 商品生产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又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因此把商品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就能一下子抓住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胚芽，把握住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线索。

恩格斯说：“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②

这种把最抽象的规定或最简单的关系作为逻辑分析的开端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把它运用于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而且把它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的一切局部过程的分析，如在分析价值形态的发展时，从简单价值形态开始；分析商品流通时，从简单商品流通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时，从简单协作开始；研究再生产时，从简单再生产开始，等等。这些，都是从最简单的关系开始的。

确定科学研究的起点或逻辑分析的开端，首先，取决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抽取它的最基本、最简单的“细胞”和“元素”形态。不同质的事物，其“细胞”和“元素”是不相同的。其次，是取决于科学研究的任务，如物理学与化学，微生物学与昆虫学，研究的起点也不可能是相同的。最后，随着科学本身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各门科学的所谓元素形态也必定会发生变化。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8页注（32）。

②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123页。

正确地确定科学研究的起点本身就是科学上的重大发现。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发现劳动价值论，化学发现原子，生物学发现细胞，都标志着这些科学发展史上的新起点，标志着科学开始向着体系化的方向发展。只有发现了研究对象的元素形态，真正的科学才开始建立起来。所以，近代化学之父不是拉瓦锡，而是道尔顿；细胞的发现则奠定了近代生物科学的坚实的基础。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内也是如此。马克思写道："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象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①

和黑格尔不同，马克思作为"开端"的东西不是抽象的思想，不是空无内容的范畴，而是客观的事实，包含在商品价值形态中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具体的私人劳动和一般的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不是纯粹的范畴，而是非常现实的经济关系。它之所以被视为抽象，不是由于它是头脑的产物，而是因为它的简单性和单纯性。这种简单的和单纯的关系并不是浮在现象表面的东西，而是隐蔽在现象深处的事物的本质，因而它只能在抽象的形态上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页。

被把握。所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不是“从无通过无到无”的方法，而是从顽强的事实出发达到科学的丰富性和完满性的方法。

马克思就说过：“对我来说，对象既不是‘价值’，也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商品。”①“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所以没有任何必要把它‘分割开来’。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并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现的形式上加以分析。在这里我发现，一方面，商品按其自然形式是使用物，或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这个观点来看，它本身就是‘交换价值’。……因而，我不是把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把它们当做‘价值’这个抽象分裂成的两个对立物，而是把劳动产品具体社会形式分为这两者”。②这是马克思对于“开端”问题所作的最重要的唯物主义的阐明。

第七节 科学抽象的作用

要确定逻辑分析的开端，必须借助科学的抽象。在历史科学领域内，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只能依靠抽象力。科学的抽象不是远离事物，而是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列宁说：“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

①②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0、412页。

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①

只有深入对象的本质，在最纯粹的形态上抽取出对象的元素形态，科学才能真正地立于自己的坚实基础之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缺陷，就在于他们在正确抽象方面做得不够。他们把交换价值和价值混为一谈，忽视了对价值实体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双重性的分析，因而就不能从劳动的二重性中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原始的关系和最基本的矛盾。他们同样不能在抽象的纯粹形态上把握剩余价值，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由此导出古典经济学的一切基本错误。马克思说：“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②由于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混为一谈，也就推翻了由他们发现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起源的规律。

李嘉图虽然看出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价值和价格之间存在着差别，但是，他却不能解释这种差别，因为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不能摆脱由竞争决定的一般利润率对商品价格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和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时间无关的。他缺乏抽象力的表现在于：当他只需要阐明劳动决定“价值”的地方，却同时把一般利润率也作为前提扯上了。所以，马克思说：“如果说人们责备李嘉图过于抽象，那末相反的责备倒是公正的，这就是：他缺乏

①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1页。

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页。

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①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那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抽象：一种是科学的但还不够纯粹的抽象，如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抽象；另一种则是强制的和错误的抽象，这种抽象表现为把由竞争造成的表面现象牵强地直接还原为一般规律，跳过它们之间的一切中介环节，这就是说，不加证明地使具体的东西和一般的东西、现象和本质直接相符。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李嘉图有意识地把竞争形式，把竞争造成的表面现象抽象化，以便考察规律本身。应该指责李嘉图的是，一方面，他的抽象还不够深刻，不够完全，因而当他，比如说，考察商品价值时，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各种具体关系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他把表现形式理解为普遍规律的直接的、真正的证实或表现；他根本没有揭示这种形式的发展。就第一点来说，他的抽象是极不完全的，就第二点来说，他的抽象是形式的，本身是虚假的。”②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对价值进行抽象分析时，根据要把一切与当前分析对象无关的关系抽出去的原则，先把与分析对象无关的使用价值抽象出去，集中对交换价值进行研究，这样，各种商品之间的共同的属性，就只剩下一点，即它们都是劳动生产物。又由于把使用价值抽象去了，也就是把劳动的具体形态抽象掉了，这样，一切商品都被还原为同一的人类劳动，也就是说，凝结和物化在商品中的人类的一般劳动，就是一切商品的共同的、本质的属性，而这就是商品的价值。交换价值则是价值的表

①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11、112页。

现形式。同时，马克思还把商品的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区别开来，以使价值独立于价值表现的形式，在它最纯粹的形态上加以研究。由于他考察了隐蔽在交换价值背后的价值实体，他就进一步发现和论证了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二重性。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一点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的枢纽点"。古典经济学家由于缺乏抽象力，他们只是在交换价值的形态上研究了商品价值，因此只限于对价值数量的分析，而忽视它的质的规定，忽视了对价值实体的分析，看不到交换价值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下，"个人劳动只有通过自身的异化（alienation）才表现为抽象一般的、社会的劳动。"①

同样，马克思还借助"抽象力"，对资本主义社会里货币在周转中增值这个普通事实进行了分析，找到了资本的增值是在生产领域中发生的，这个增值不是别的，是雇佣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这样，便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的一切收入的总源泉，揭示出形成利润、利息、地租等等的共同的、本质的东西。为了在纯粹形态上把握剩余价值，马克思不仅批判和改造了古典经济学的工资理论，而且确定了资本自身内部的区别，确定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马克思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从理解剩余价值的一般形态，到理解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地租等特殊形态，其中经过的一系列中介环节。所以，恩格斯说："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在他的前人看到是无燃素气体的地方，他却发

①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5页。

现是氧气。①

科学的抽象显然不是象庸俗经济学所做的那样靠经验归纳的方法制造现象的同一性，由此而产生的抽象概念是取消了对象的特殊规定和抹去现实差别的僵死的共同性。例如，如果抽掉资本的特定形式，而只强调它的内容，即积累的物化劳动，那末作为这种物化劳动，资本就是一切劳动的必要要素。这样，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所以，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的那些特殊规定，就能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因为这种抽象不是把资本理解为“关系”，而是理解为僵硬的“物”。例如，他们把商品、货币、资本以及工资、利润、利息等等经济范畴，都不看做只是反映资本主义关系的范畴，不看做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看成了永恒的自然的经济现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常就是这样偷偷摸摸地把资本主义关系当做社会一般的自然规律替换进来，由此制造一般社会、一般进步等等的神话。庸俗经济学家根据商品有交换价值这个一般的事实，把交换价值看成是商品的物的属性。这种固陋浅薄的表象方法导致了把假象当做真实的东西。

科学的抽象不是从现象的表面析取一般的东西，而是要通过深入分析概括出事物自身中的本质的一般。黑格尔说：“一般乃是一个贫乏的规定，每个人都知道一般，但却不知道作为本质的一般。”②作为科学的抽象，还必须是反映历史发展中在质上互相区别的那些特殊的经济关系，而构成历史发展的东西，正是不

①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页。

②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73页（译文略有改动，参照列宁《哲学笔记》第297页）。

同于这种一般和共同之点的特殊的东西。因此，揭示对象自身中的"本质的一般"，不仅不取消对象的特殊规定性，而且还要以这种特殊规定性为前提。如《资本论》中的研究对象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是一个在历史上被规定了的特殊的社会形态，科学抽象的任务正是要揭示出表现这个社会的历史独特性的本质的东西。所以，《资本论》中的那些抽象范畴，都是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并且也只有对于这个特殊的社会形态来说才是正确的。

马克思认为，科学的抽象不仅取决于抽象力，不单单是头脑的产物，而且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如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一方面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历史发展，只有在十分发达的劳动分工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把任何种类的劳动同等看待；另一方面，它又取决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人们习以为常地从一个劳动部门转到另一个劳动部门，他们究竟从事那种劳动，这对他们来说是纯属偶然的，因而也是无差别的。虽然在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发现了互相交换的商品存在着"等同性"，指出："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但是，他却没有进一步从这里作出价值的抽象。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基础的，在那时要发现人类劳动的等同性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说："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

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只是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①

第八节 逻辑进程与历史发展的一致性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以辩证的历史观为基础的。黑格尔的思维方式就以这种历史观作为基础。恩格斯指出："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②

黑格尔把思想史和逻辑学的一致看做他的逻辑体系的最大特色。他在《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和《逻辑学》中，表述过他的关于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思想。他说："我认为：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面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的逻辑概念了。反之，如果掌握了逻辑的进程，我们亦可从它里面的各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③又说："在哲学历史上所表述的思维进程的过程，也同样是在哲学本身里所表述的思维进程的过程，不过在哲学本身里，它是摆脱了那历史的外在性或偶然性，而纯粹从思维的本质去发挥思维进展的逻辑过程罢了。"④黑格尔根据唯心主义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4—75页。

②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页。

③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4页。

④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5页。

的观点，认为这是历史对逻辑的符合，他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思有同一”、“主客同一”的基础上的，他是在纯思辨的领域中来谈论逻辑与历史一致的，认为历史的东西是逻辑的应用。实际上，逻辑却必须符合于历史，逻辑的东西只是被移植到人类头脑中并经过改造了的历史的东西。历史不是逻辑的应用，而是逻辑的原型。

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思想中的合理的东西，但又对它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他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揭示其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特点时，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现实和历史、尤其是以英国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现实和历史作为基础，批判地吸取了以往的经济学说史的优秀成果为基础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①

马克思把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和方法，运用于整个《资本论》，这在它的范畴顺序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从《资本论》一至三卷的四大范畴（商品、货币、资本、土地所有制）的顺序看：第一卷的第一篇研究的是商品和货币；从第一卷第二篇（“由货币到资本转化”）起，一直到第三卷的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与企业利润、生息资本”）止，都是研究资本的；第三卷第六篇（“剩余价值转化为地租”）是研究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这种商品——货币——资本——土地所有制的逻辑顺序，也正是它们在历史上的先后顺序。在历史上，商品先于货币，货币先于资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4页。

本，资本先于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再从《资本论》一至三卷分卷来看。第一卷的逻辑顺序是商品与货币——资本与剩余价值——资本积累一般趋势，这个逻辑顺序是同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与走向灭亡的趋势的历史顺序相一致。第二卷的逻辑顺序是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这个逻辑顺序反映了产业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过程中，在货币资本的循环、生产资本的循环和商品资本的循环之间，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之间，分别存在着的历史的先后顺序性。第三卷的逻辑顺序是利润一般——平均利润——商业资本——生息资本——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这个顺序也是同历史发展相一致的。

然而历史并不直接等于逻辑，思维的逻辑进程也不能仅限于对历史的复述。历史必须经过思维的加工方能在其逻辑必然性上被表现出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以现实的历史发展为依据，却又不完全是追随历史的行程。“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①例如，产业革命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其时间、速度、深度都因各自的具体条件不同而呈现出很大差异，英国产业革命从1765年始至1830年结束，美国、法国则在十九世纪初才开始，它们利用英国的技术，分别在十九世纪50年代、60年代完成了产业革命，德国在十九世纪30年代才开始产业革命，日本到十九世纪60年代才进行产业革命，它们的深度也是不同的。历史科学当然要从这些差异中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逻辑就不能跟随这些历史事件的反

①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

复、曲折来安排自己的范畴体系，相反，它要舍弃这些偶然性因素，要在抽象的、前后一贯的理论形式中来考察历史。不过逻辑的研究方式也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仅仅是抽掉了历史的形式和在历史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①

不过，从简单范畴到具体范畴的发展是否一定都反映了现实历史的发展？这要看情况而定。如果作为元素形态的简单规定在具体整体出现之前就有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那末"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②如在资本存在之前很久，商品和货币就已经在历史上存在着，所以从商品和货币到资本的发展和现实的历史进程相一致。在另外的情况下，简单的东西的存在是以较复杂的具体整体为前提的，因而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进程只是思维的综合，而不是历史的发展。在前一种情况下，思维进程反映了简单范畴和较具体范畴之间的继起性的联系，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反映了同一结构内部各方面之间的并存性的联系。所以，范畴的逻辑顺序并不到处都是历史过程的反映，在《资本论》的逻辑结构中，存在着这两种联系。但是，由于《资本论》的主要任务是把资本

---

①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5页。

主义生产方式当做自然历史的过程来研究，所以，它的逻辑结构的主要特色也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对概述资本主义历史的那些概念所作的分析。如关于价值形态的一章，逻辑的分析和历史的分析是完全融为一体的。

虽然，一般说来，逻辑上最初的东西也应该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但这一点又是有条件的。因为任何逻辑分析都是以特定的具体总体为对象，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这个对象都是既与的，所以在研究范畴的发展及其逻辑顺序的时候，必须以它们在这个特定对象中所处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为依据，而不能仅仅以它们在历史上出现的先后次序为依据。例如，在历史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先于资本主义的，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把它放在开始论述资本之前来阐述，而是放在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秘密和它的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后，来考察资本的形成史时才讲到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这就不是以历史发展的先后次序、而是以逻辑发展的次序来安排的，又如，在历史上土地所有权产生在资本之前，但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中，资本却是土地所有权的前提。初看起来从土地所有权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它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而农业又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但是，仔细分析起来，这是再错误不过的了。虽然在历史上资本较土地所有权为晚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却是支配一切和影响一切的生产关系。不说明土地所有权可以说明资本，不说明资本却不能说明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资本是资产阶级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权之前来说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

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的次序或者同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① 可见，逻辑的东西通过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的顺序，以概念的形式，再现所研究的具体历史整体之发生过程的真正历史次序。逻辑思维把所研究的整体的并存要素解开，排列成时间上的序列，即与所研究之具体性的历史形成、产生、繁荣和自我毁灭的真正顺序、而不是虚假顺序相吻合的时间序列。

所以，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必须在所研究的特定对象的整体结构上统一起来，范畴的体系和序列必须是这个整体结构的正确的反映。在这个体系中，历史的发展表现为起决定作用的核心范畴的逻辑的形成与展开。如在《资本论》中，历史的发展就表现为“资本”范畴的形成与展开。逻辑既不是历史的简单的复制，也不是某种先验的结构，所以，不能在研究之前就提供出来，它只是研究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历史上特殊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只有在它获得了充分发展和经过多方面的长期研究之后，方能在整体上作为系统理论被逻辑地复制出来。

马克思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

---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0页。

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①而且，历史上较早的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关系，常常要在这些社会形态覆灭之后才能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客观的理解，因为低级形态中的组织和关系只有在高级形态中才能发展到完备的程度或显示其充分的意义。“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的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②另一方面，也只有批判地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对它以前的早期社会：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获得客观的而不是片面的理解。因为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如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初起时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就是同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相似的。

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做自然历史的过程来研究，考察的范围就必须大大超出资产阶级经济本身。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的阐明，必须要以对先前的生产方式的历史研究作为补充。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页。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虽然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无需描述各个先行的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对这些历史上已经存在过的生产关系加以正确的考察和推断，就能得到象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数据一样的原始的方程式，这些方程式不仅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过的历史，而且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未来的先兆、变易和运动，以及它的行将被扬弃之点。“一方面，如果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① 所以，逻辑的研究方式也必然同时是历史的研究方式。

第九节 分析和综合的结合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方法，要求把分析的方法和综合的方法辩证地结合起来。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然而分析又是综合的前提，因为若不通过分析达到简单的规定，综合便无由进行。当然，分析也必须以某个确定的综合的统一物作为基础。恩格斯说过：“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时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② 认识总是从表象的具体开始，经过分析，达到越来越简单的规定；然后又从那里回过头来，经

①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8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6页。

过综合，在思维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但这是就认识运动的全体来说的。其实认识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分析和综合的结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过程既贯串着不断的综合，又贯串着不断的分析，分析和综合互为前提，组成认识运动的两个密切联系着的侧面。

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就是把统一物分解为它的矛盾着的各个方面，而综合则是在对矛盾各方面的认识之后，在它们的相互联结上和总体上把握事物。形而上学者和经验论者把分析的方法表面化和绝对化，一方面仅仅根据现象的表面的外部标志在差别的多样性中寻求同一性，赋予现象的各个方面以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另一方面，又把这些普遍性的形式变成彼此孤立的和僵死不变的。所以，洛克和经验论者都主张分析的观点，并且认为认识的作用也仅限于此。古典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也都片面地主张分析的观点，所不同的是，古典经济学深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揭示了这个社会的最隐蔽的基础。而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析取非本质的甚至是假象的东西，从而制造经济关系的统一性。

黑格尔说："分析的认识是全部推论的第一个前提，——概念对客体直接的关系；同一因此是这样的规定，即分析的认识认识它作为自己的规定，而且认识只是去把握有。综合的认识从事于有什么之概念理解Begreifen，即是说以规定的统一性去把握规定的多样性。因此，它是推论的第二个前提，差异的东西本身在推论中有了关系，为此之故，它的目标就是一般必然性。"①分析的认识是达到抽象和同一，综合的认识则是达到多样性的统

①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95页。

一。前者只是为事物和现象的分类提供统一的尺度和标准，所以只能“抓住现有的东西”，后者则是根据现象自身的内在联系在思维中再现具体的事物，所以它是力求“理解现有的东西”。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通过分析发现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统一源泉，从而抓住了商品之为商品的本质特征，但他们却不能理解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以及它为什么和怎样形成价值。李嘉图虽然也懂得货币是商品，但他并不真正理解货币的本质，因为“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①

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分析当做唯一的认识方法，因而不得不陷入种种矛盾。它力图通过分析，把各种固定的彼此异化的财富形式还原为它们的内在统一性，由此证明利润、利息、地租等一切非劳动者的不同的收入形式都是由同一的源泉（剩余价值亦即工人的剩余劳动）所构成。然而，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提供了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收入形式的原则，但却始终未能成功地证明这一点，因为他们单靠分析的方法无法揭示从一般本质转化为多种多样的现象形态的中介环节。马克思指出：古典经济学家所以陷入矛盾，这是它的方法的必然结果，批判和理解必须从这一方法开始。古典经济学不是从非劳动收入的同一源泉来说明它的各种不同的形式，而是通过分析来把它们还原为它们的统一性。这样，他们就把尚待证明的东西当做已知的前提和出发点。虽然分析是说明利润、地租等等的起源和理解它们实际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中介环节）的必要前提，但是仅仅用分析的方法却不能证明从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0页。

剩余价值到利润、利息和地租的转化与发展。所以"分析的认识只是全部推理的第一个前提"，分析之后必须继之以综合，"综合的认识是推理的第二个前提"，是认识运动的继续和完成。在综合中，差别的东西是相互关联的。

不仅综合以分析为前提，分析也以综合为前提。例如，我们从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关系中，把商品关系拿出来进行独立考察时，是把它当做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来考察的，因而是以资本主义经济这个统一体为其前提和出发点的。我们研究商品，如果脱离了这个前提和出发点来进行孤立的分析，那它就什么也不是。不仅如此，而且，每一个继起的分析都以综合为前提，任何综合都是进一步分析的起点。所以，不仅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没有综合也不会有进一步的分析。分析和综合互为前提，从认识简单的事物开始，一步一步地上升到认识最复杂的事物。黑格尔说："哲学的方法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这倒并不是说对这两个有限认识方法的仅仅平列并用，或单纯交换使用，而是说哲学方法扬弃了并包含了这两个方法。因此在哲学方法的每一运动里所采取的态度，同时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①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每一步上都同时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

马克思对商品的认识是从分析开始的，他不仅分析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分析了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借助于这一分析，他不仅对价值本身作了最纯粹的考察，而且暴露了隐蔽在商品体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的矛盾：私人的具体劳动和社会的一般劳动之间的矛盾。然后，他又回到价值表现的形态即交换价值上作综合的考察，说明

①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4页。

使用价值和价值在价值表现中的关系。在作了这个综合之后，他又分析价值表现的二极：相对价值形态与等价形态，最后在货币形态上统一起来。然而货币的产生并没有消除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而是由隐蔽在商品内部的矛盾转化为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外在的矛盾，因此，分析就转到商品流通中的两极即卖和买的矛盾中去。对商品流通所作的分析和综合的结论是：必然会有一定数量的货币从流通过程中溢出，作为贮藏货币积累起来，而这就是资本形成的前提。

恩格斯在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阐明从商品到货币的发展时写道："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因为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际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研究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加以说明，等等。"①

可见，认识运动的每一步都是由分析开始，通过分析揭露出事物内部的矛盾，并且分别对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作单独的考察。

①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123页。

在这之后，认识便由分析过渡到综合，过渡到考察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矛盾的性质及其获得解决的方式。而随着旧的矛盾的解决，新的矛盾又建立起来了，于是又开始了新的分析。所以，矛盾的不断发生和不断解决的过程，反映在认识运动中，就是分析和综合的依次递进，直到全部认识过程终结为止。全部《资本论》的结构就是由分析和综合的循环交替所形成的大大小小的圆圈所构成的整体，其中分析和综合都以被扬弃的形式互相包含着。如第一卷是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是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是综合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但是每一卷的内容又都是由反复递进的分析和综合的认识步骤所组成的。马克思在规定第三卷的任务时写道："至于这个第三卷的内容，它不能是对于这个统一的（生产和流通的统一——引者注）一般的考察。相反的，这一卷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对这些具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和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们在本卷中将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① 这里的任务是要阐明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因何和如何转化为利润和利润率以及进一步转化为利息和地租这些呈现在社会表面的现象形态。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未能解决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因此问题不在于把单独表现在生产过程中和流通过程中的资本形式简单地统一（综合）起来，而是要通过一系列分析和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30页。

综合相结合的推理形式，一步一步地阐明从剩余价值到利润和地租等不同收入形式的推移转化。为了阐明这种转化，马克思研究了利润和利润率、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经营收入和货币利息等一系列中介环节。

总之，认识从最简单的规定开始，经过连续不断的分析和综合而螺旋上升，直到最复杂的具体整体，整个路线酷似一个封闭的圆圈，并且是圆圈的圆圈。每个圆圈的末端都通过中介环节而同这个圆圈的开端连结在一起。这就是黑格尔的同时也是马克思的认识方法。

第十节 归纳和演绎的结合

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了两种分析：演绎的和归纳的、逻辑的和历史的。这些不同的分析方法自然都是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

归纳和演绎，作为认识的逻辑方法它们必须相互依托，相互补充，而不应把它们彼此孤立起来，强调一种方法而排斥另一种方法。恩格斯在批评"归纳万能论"时说过："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依赖着的。人们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设法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人们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①黑格尔在其哲学著作中极少应用归纳推理，这自然是和他的绝对唯心主义的唯理论立场有关，但他认为归纳推理本质上是一种"尚成疑问"的推理，这个论断无疑还是正确的。马克思用赞同的态度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页。

谈到，黑格尔从没有把归纳大量事例作为一个普遍原则的做法称为辩证法。恩格斯也同样多次谈到归纳法的局限性，指出以归纳法为基础的分类方法到处都出现问题。

在政治经济学中，归纳法是庸俗经验论所惯用的方法，他们反对抽象，而强调经验的归纳，认为理论上的真理是同现实情况相矛盾的抽象，而从社会表面归纳出来的经验事实倒是完全合乎自然的。所以，他们到处应用归结法，以便把包含着发展的差别抛掉，把不同质的经济关系勉强地归为一类。如把资本归结为生产工具，归结为一切劳动的永恒的必然要素，或者把货币、资本、利润和利息等等都还原为交换价值的简单规定，而抹煞它们之间质的特殊性和历史的差别，把不同质的事物硬结在僵死贫乏的抽象概念之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种最新经济学是从日常经验中借用一个事实，即交换价值不仅存在于这种简单的规定性（简单商品交换——引者注）上，而且也存在于本质上不同的资本的规定性上这个事实，然后再把资本归结为交换价值的简单概念，同样，把也表示资本本身的一定关系的利息，从其规定性中分离出来，使它成为与交换价值相同的东西；这种最新经济学把具有特殊规定性的全部关系抽掉，退回到商品同商品相交换的不发达关系。只要我把具体事物不同于它的抽象概念的一切方面抽掉，那么具体事物当然就成了抽象概念，丝毫没有不同于抽象概念的地方。这样，一切经济范畴就总只是同一关系的各种不同的名称，从而这种无法理解现实差别的彻底无能就被认为是纯粹的常识本身。"①

①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2页。

归纳法的特点即是把包含着差别的个别和特殊的东西置于某种普遍性的形式之下，由此作出事物的定义和概念，作为分类的基础。然而任何事物都是多种多样的关系和规定的总和，因而它们的定义和概念也可能有许多。正如黑格尔指出的：被下定义的对象愈丰富，它可被考察的方面愈多，那么根据这些方面所下的定义就会有愈大的区别。所以问题不应当局限于下定义，而是应当证明和推论。黑格尔说："绝对理念是普遍，但普遍并不单纯是与特殊内容相对立的抽象形式，而是绝对的形式，一切的规定和它所设定的全部充实的内容都要回复到这个绝对形式中。"①对于具体和特殊的东西的认识，不能仅仅用经验归纳的方法析取它们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人为地制造同一性，而应当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以便在普遍性的形式下把握事物的全部丰富内容。归纳法只强调把经验的具体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却不懂得只有以抽象为其逻辑开端的演绎证明，才是真正认识事物、理解事物的开始。

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方法中，由经验归纳的事实仍然是出发点，但逻辑的说明并不以这个事实为限。它还要从这个事实出发，把事物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把它所具有的最复杂的形态和全部充实的内容，依照它推移转化的一切层次和中介环节，一步一步地演绎和证明出来。这好象是按照先验的结构进行的，但每一步又都是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每一个商品都以元素的形态代表着资产者的财富。这显然是一个由经验归纳的事实。但是，这个简单的事实，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极普遍的、抽象一般的规

①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2—423页。

定，辩证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这个抽象一般的规定上，它必须再从抽象回到具体，从一般回到特殊中去。这就是说，归纳必须要由演绎来补充。然而演绎不能在纯粹的思维中进行，它的前提和结论都必须和历史的事实相符，而且每一步都要用经验事实来验证。这就表明演绎要以归纳为前提。

亚当·斯密最初想根据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推论出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交换也是按照这同一原则进行的。然而他感到这与事实不符，便轻率地作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结论。马克思重新研究了劳动商品这个新的事实，从而归纳出新的原则，指出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相交换的过程中，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资本家正是在把劳动力当做使用价值来消费的过程中，才使他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得到增殖。所以，不是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原则遭到破坏，而是它作为一般原则在新的特殊的条件下发生了变形。可见，对新的事实的归纳分析，成了进一步演绎推理的出发点。同样，如果不归纳和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竞争这个事实，要从剩余价值规律推论出平均利润规律是同样不可能的。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过程，通过从简单到复杂的不断的推移转化，形成一系列的认识阶段和中介环节，其中归纳和演绎交织并用。如果说归纳为演绎提供经验事实的支点，那末演绎则揭示和说明这些事实之间的必然的联系，说明本质必然表现为它的现象形态，简单的、低级形态的东西必然发展为复杂的和高级形态的东西。归纳法虽然为现象的分类提供基础，但是，却不能说明事物之间的转化和发展，正如单纯用归纳法来证明进化论是不可能的一样，单纯用归纳法来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必须和演绎法相结合，这样由归纳法所提供的

概念和范畴才不是僵死的、固定的，而是生动的、流动的、可变的。因此，只有归纳法和演绎法相结合，才能变成强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这种结合的范例。

第十一节 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的统一

列宁说："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①

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诚然是一个东西，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它们也完全统一起来了。然而，这并不是说，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按其本来意义说应当是一回事。这只是告诉我们，当它们应用于同一门科学的时候，三者必须完全结合起来。

真正说来，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只是思想史的概括，他是从思想（概念）的辩证法猜到了事物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地从客观的辩证法中引导出主观的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除了概念自身的辩证法之外，不存在任何其它的辩证法。而概念的辩证法无非是思维、理性发展的规律，因而也即是逻辑学。不过黑格尔这个看起来极端唯心主义的观点却包含着极有价值的合理的内容。所以，列宁指出：唯物主义应当从黑格尔那里吸取这个有价值的思想，即在同一门科学中把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完全结合起

①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7页。

来。

然而，在进行这种结合的时候，应当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以客观的辩证法作为这种结合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及其内部结构作为他的方法论的基础。这样，他就把黑格尔的上述思想按照唯物主义的路线加以改造和推进了。

在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统一，集中体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方法。在这个认识方法中，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融为一体。它是辩证法，因为它在思维进程中再现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和事物内在的有机联系。它是逻辑学，因为它按照概念和范畴自身的本性及其固有的规律来运用概念和范畴，由此建立起严整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它也是认识论，因为沿着从抽象到具体的道路，使人们一步一步地深入事物的本质并最终达到对事物的最充分最完全的认识。

和辩证法相统一的逻辑不是形式逻辑，而是辩证逻辑。辩证逻辑虽也是关于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但它不是把思维形式（概念、范畴等等）看做是和活生生的内容相脱离的，因而是僵死的、固定的和不变的。在辩证逻辑看来，思维形式是具有实在的、活生生的内容的形式，它们和内容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因而同内容一样也是生动的、流动的、可变的。辩证逻辑不是专注于概念和范畴的外在形式，而是深入研究它们的内在本性，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由此及彼的推移转化。所以列宁说："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

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①

可见，辩证逻辑不是别的，它只是客观辩证法的主观的应用。按照辩证法来进行思维就是逻辑学（辩证逻辑），而把辩证法应用于科学的结果就是概念的逻辑体系，所以辩证逻辑无非是教导人们按照事物自身的辩证本性来正确地运用概念和范畴。黑格尔认为，真正的“辩证法则是对于对象的内在的考察；这是就对象本身来考察，没有前提、观念、应有性，不依照外在的关系、规律、根据。我们使自己完全钻进事实里面，即就对象本身而加以考察，即依它自己所具有的那些特性去了解它。在这样的考察里，于是对象自身便显示出其自身〔的矛盾〕：即自身便包含有正相反的规定，因而自己扬弃自己”。②这就是说，在对对象作辩证的考察中，必须这样来运用概念和范畴，以便使它们不是从自身以外的任何前提、关系或规律引出它们的发展，而是从自身的本性即内在矛盾和规律中引出这种发展。这也就是说，应当从最简单的概念出发，沿着从抽象到具体的道路，引出反映事物的全部复杂内容的逻辑体系。《资本论》的逻辑就是这样：开始是最简单的、普遍的、常见的、直接的“存在”——个别的商品，把它当做社会关系来分析，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叙述了这些矛盾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和运动。

在《资本论》中，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和逻辑相独立地被阐明，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在概念和

①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9—90页。

②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80页（译文略有改动，参照列宁《哲学笔记》第279—280页）。

范畴的逻辑体系中得到展现。贯串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通过对商品的分析而被揭露的。商品内部的矛盾，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胚芽。这个矛盾的发展，两极化及其解决是商品向货币转化的内在源泉，决定了从商品概念向货币概念的逻辑推演。在价值形态的分析中，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被概括在一个严整的逻辑结构中：最初是简单的、个别的价值形态、其次是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态，最后是一般的价值形态。辩证法在这里被表达为逻辑的推理：单一性通过特殊性而与一般性相联系。从商品到货币的转化，在历史上，确实经过了从物物交换的个别价值形态到商品与货币交换的一般价值形态的发展，而在逻辑上却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过程。这里的实质是辩证的转化，是对立面的同一。正如列宁指出的："从一定观点看来，在一定条件之下，普遍是个别，个别是普遍。不仅是（1）一切概念和判断的联系、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是（2）一个东西向另一个东西的转化，并且不仅是转化，而且是（3）对立面的同一——这就是黑格尔的主要的东西。"①

从商品到货币的转化，是商品价值表现的两极化的必然结果，是商品内部的矛盾的解决。但是，随着这个旧矛盾的解决，又有新的关系建立起来，而新的关系则包含着新矛盾。这种新矛盾以其抽象的形式包含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由于买和卖这两个对立过程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它们的任何分离和独立都孕育着危机的可能性。这个矛盾的发展，在逻辑上也表现为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过程。

马克思说："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这种经济，一方面，这个

---

①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8页。

矛盾的越来越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另一方面，这个矛盾的比较抽象的形式会再现并包含在它的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这一点，也必然被说明。总之，可以说：危机的第一种形式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买和卖的分离。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里货币在两个不同的、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形式都还是十分抽象的，虽然第二种形式比第一种形式具体些。因此，在考察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它同资本的流通是一致的）时，首先要指出，上述两种形式在这里是简单地再现，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里第一次获得了内容，获得了它们可以表现出来的基础。”①在这里，客观矛盾的发展也获得了它的正确的逻辑表现形式。

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也是在流通过程中开始的。“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②商品流通的最初形态是商品——货币——商品，由商品到货币，再由货币到商品，两个对立过程的统一，意味着商品生产者为买而卖。但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包含在流通过程中的矛盾也发展起来了，并且导致两个对立过程(卖和买)的分离和独立，以及旧的流通形态的解体和新的流通形态的产生，实现了向对立物的转化。在新的流通形态（货币——商品——货币）中，不再是为买而卖，而是为卖而买。在这个形态中，货币既是出发点，又是目的，因此，它不再充当流通手段，而转化为资本了。马克思说：“在运动中通过后一种流通的货币转化为

①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2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7页。

资本，成为资本，而且按它的使命来说，已经是资本。”①从货币到资本的历史发展，在《资本论》中最初就是由分析这两个对立的流通形态的差别特征和推演转化来概述的。看起来，只是同一些概念的逻辑次序的颠倒，却概括地反映了非常复杂的经济历史内容。马克思说：“首先我们应该说明G—W—G和W—G—W这两种循环的形式上的区别。这样，隐藏在这种形式上的区别后面的内容上的区别同时也就暴露出来。”②

但是，货币作为资本，必须在循环中增殖自身，就是说，它必须获得一个加量，即剩余价值。所以，资本流通的公式是这样的：G—W—G。可是这个公式同商品交换依以进行的等价原则是矛盾的。这就是资本总公式的矛盾。为了揭示这个矛盾，就必须不仅要在流通过程之中，而且要在流通过程之外探求剩余价值的起源。因此，问题必然发生在作为资本流通之媒介的那种商品的特殊性上，而且不能发生在它的交换价值上，只能发生在它的使用价值上。这样就发现了作为特殊商品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乃是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活的源泉。“因此，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③

斯密和李嘉图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逻辑，他们一味要在流通中，依照简单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解释资本和劳动相交换，结果碰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这个困难终于使他们的学说走向解体和破产。辩证逻辑不仅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和变化中来考察事物，而且要求从事物的转化、对立面的统一中来把握事物。

①②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8、169、188页。

资本和雇佣劳动作为两个对立着的方面，是同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从在商品中昏睡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发展到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结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史。往后的发展就是资本作为一种“有机体”向总体的发展。这象任何一个有机体一样，一旦当它的具有新质的胚芽在历史过程中形成之后，它就开始向总体方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作为历史上的新的生产关系，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①鉴于这种情况，《资本论》的往后的逻辑，一方面是顺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按照把资本主义社会当做一个有机总体来研究时所必然出现的解剖学上的要求。必须从这两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

马克思在制定他的价值和货币理论，以及研究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时，也同时运用了质量关系的辩证法。马克思责备李嘉图只研究交换价值的量的规定性，而忽视它的质的规定性。李嘉图只停留在两种商品依一定量就可以相等（交换）的比例关系上，却不懂得，不同物的大小在还原为同一单位以前，不能有量的比较。由于李嘉图不能深入到对隐藏在交换价值背后的价值实体的研究，所以他始终不能理解包含在商品中劳动的二重性，以及这

①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5—236页。

一矛盾的深刻社会意义。他不了解交换价值的本质，因而也不了解从商品到货币的发展的必然性，不了解货币的本质，自然也不能了解从货币向资本的必然的转化。作为出发点和根据点的事实被忽视了，一切逻辑推论的线索也因而被割断了。

和李嘉图不同，马克思自始就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交换价值的质的规定上，进而发现隐藏在交换价值背后的是生产者之间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即私人的具体劳动和社会的一般劳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说："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代表人们在其生产活动中的关系。价值确实包含交换，但是这种交换是人们之间物的交换；这种交换同物本身是绝对无关的。"①只有研究了交换价值的质的基础之后，才能正确地了解它的量的规定。由于人们互相交换的不是物，而是劳动，因此交换价值的量也不是物的量，而是社会的量，是等一的社会劳动的量。个人劳动必须取得社会劳动的等一性，即被看做"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劳动时间，才能互相交换，这个规律绝对地制约着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的发展。

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价值表现的形式也一同发展起来。货币和资本就是在更加发展了的交换关系中产生的价值表现的新形式。正如列宁所说："商品的交换表示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各个生产者之间的联系。货币表明这一联系更加密切，已经把各个生产者的全部经济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结成一个整体了。资本表明这一联系的继续发展：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②

由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则表现为一个从量到质的发展过程。区

---

①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9页。

②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4页。

别中世纪手工作坊的主人和近代工业资本家的主要标准，是人们在生产上垫支的货币额。因为，并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①由此可见，“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②

这就表明，单纯量的变化达到了一定点的时候，就转化为质的差别。在《资本论》中，由商品到货币、由货币到资本的历史发展，也同样表现为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逻辑推移，它既反映了历史发展中的联系和渐进性，也反映了渐进过程的中断、突变和飞跃。

在《资本论》的逻辑中，最初由黑格尔所表述的否定的否定规律也一再重复地表现了出来。在价值形态的发展中，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否定的否定的过程：最初，商品价值是偶然地表现在简单的、个别的别种商品的自然形态上；在发展的过程中，它被扩大的、总和的价值形态所否定，这时商品价值被表现在一个不断增加着的商品系列的自然形态上；最后出现的是一般价值形态，这是否定的否定。现在，商品的价值表现是简单的，因为它是表现在唯一的货币商品上；它又是统一的，因为它是表现在同一的商品上。这就仿佛是向简单的、个别的价值形态的复归，然而它却处在一个更加发展了的、高级的阶段上。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也是一个否定的否定过程，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发展到作为资本的货币，经过了一个双重否定。马克思说：“进入流通并同时从流通返回到自身的货币，是货币借以扬弃自身的最后形式。这同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1、342页。

时就是资本的最初的概念和最初的表现形式。货币作为只是消溶在流通中的东西否定了自己；但它也作为与流通相独立的东西否定了自己。这种否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它肯定的规定中，包含着资本的最初一些要素。货币是资本表现为资本的最初形式。”①资本一经产生出来，最初作为出发点的商品交换的原则就被否定了，平等的交换变成了不平等的交换。而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充分发展，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也必然被否定，这就是否定的否定。马克思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②

所以在《资本论》中，辩证法也就是逻辑学，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逻辑学，而是根据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加以改造、制作过的逻辑学，是辩证逻辑。“辩证的逻辑和旧的仅仅形式的逻辑相反，它不象后者那样满足于把思维的运动的各种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相反地，辩证的逻辑使这些形式一个从另一个地推导出来，不把这些形式互相平列在一起，而使它们一个隶属于另一个，它使高级形式从低级形式中发展出来。”③辩证逻辑要求这样来安排概念和

①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2页。

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范畴的序列与体系：它们不是根据某种外在的和固定的思维形式和规则同时地、互相平行地罗列和排列起来，而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法则和事物内部的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由此及彼地推论出来。其中每一步推论都是一个逻辑证明，由全部推论所组成的系列就是一个得到充分证明的完备的逻辑体系，缺乏任何中间环节，证明都是不充分的。因此，辩证逻辑的证明和形式逻辑是不同的，它不是由形式规则的正确来保证结论的正确，而是由全部先行的演绎推论来证明结论的正确性。辩证逻辑的证明，实质上是起源学上的证明，它用事物自身的起源和历史、'自身运动'和发展来证明事物的存在并揭示它的本质。例如，要说明货币的存在和本质，必须研究货币的起源和历史，一步一步地推出商品是如何转化为货币的。要说明资本的存在和本质，就要研究资本从商品细胞中开始分裂和发展起来的全部历史。所以，辩证逻辑是客观辩证法在理性认识中的反映和应用，这种应用以逻辑的形式相对地固定和系统地表达出来，就是辩证逻辑。

辩证逻辑在概念和范畴的运动中，把握事物自身的运动。事物自身在矛盾中运动，通过量的扩大而达到质的转变，并且从一个过程的全体看表现为螺旋形的上升。辩证逻辑则通过揭示概念和范畴本性中的矛盾和由此及彼的推移转化，通过揭示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差别特征和借以发生联系的中介环节，把事物发展的辩证过程，一步一步地从逻辑上复制出来。骤然看来，好象是一种纯粹逻辑的抽象演绎，但却是以现实发展中的大量材料作为根据的。整部《资本论》的逻辑结构，就是这样被安排成同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和内部结构相一致的、由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的严整的范畴体系。

辩证逻辑的概念和范畴体系，既是一个严密的推论和证明的

体系，因而也表现为一个思维和理解的过程。它从事物简单的规定出发，开始只是最抽象最肤浅的认识（一般存在），然后一步一步地深入事物的本质，获得愈来愈具体、愈来愈丰富的认识。而思维一旦上升到逻辑的最高点，它同时也就达到了认识和理解的最高点。逻辑的进行和认识的发展是完全一致的。它们走着同一条道路，遵循着相同的规律，即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逻辑学和认识论是完全一致的。正如列宁所说："逻辑学是关于认识的学说，是认识的理论。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这些概念和规律等等（思维、科学＝'逻辑观念'）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着永恒运动着的和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性。"①《资本论》不仅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完备的逻辑学，也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认识论。

①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4页。

第四章　恩格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研究战争和军事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后，它的创始人除运用这一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现实的革命运动外，还十分注重运用它来研究和从根本上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运用它来研究和创立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1848年至1850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革命的发展暂时处于低潮。从这一时期开始，马克思便集中精力从事于经济理论的研究，而认为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将具有重大意义的恩格斯则集中精力从事于战争和军事科学的研究。

1848年至1850年的欧洲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给欧洲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欧洲和亚洲、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高涨起来，爆发了一系列的战争。恩格斯非常关注这些战争的发展，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恩格斯写了大量的战争评论和军事科学论文。在这些著作中，恩格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阐明了战争的起源和本质，总结了历次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了军事科学史，从而揭示出了战争发展的规律，说明了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以及战争中诸因素的相互关系。这样，不仅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基础，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提供了科学的军事理论，而且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

第一节　恩格斯对战争和军事科学的研究

为了研究军事科学，恩格斯亲自参加过革命战争的实践，广泛地搜集了有关各类战争的消息、电讯和资料，阅读了当代著名的军事文献和著作，系统地钻研了军事学术史。

在开始研究军事科学之前，恩格斯早在普鲁士军队服役期间就接受过军事教育。为着取得军事经验，他又积极参加了1849年的德国人民维护帝国宪法①运动所举行的爱北斐特起义和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在爱北斐特，恩格斯接受安全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的委托，组织工兵连，改建了许多街垒，拟订了新街垒的布置计划，并指挥安装大炮。他还建议军事委员会聘请米尔巴赫担任卫戍总司令、武装工人、向资产阶级强行征税以充武装部队的军饷。在爱北斐特期间，恩格斯受到武装工人和志愿部队的充分信任。由于资产阶级害怕这样一位著名的共产主义者的影响，恩格斯才被迫离去。接着，恩格斯抵达巴登-普法尔茨，在奥古斯特·维利希（1810—1878）所领导的志愿部队里担任副官，参与制定作战计划，并先后参加了拉施塔特会战等四次战役，“所有在火线上看见过他的人，很久以后都还在谈论他那种镇静和漠视任何危险的精神。”②通过参加爱北斐特起义和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战斗，恩格斯也获得了宝贵的军事教益。

---

①帝国宪法是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经过几个月的辩论后通过的德国的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由于它为在整个德国实现更强大的全国性中央集权并为实施资产阶级的立宪制度铺平了道路，因而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②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95页。

1850年11月中旬，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重新回到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11月底开始系统地研究军事问题。1851年4月，恩格斯写了《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一文，第一次对十八世纪末期以来欧洲各国的军事发展作了唯物主义的分析，对这些国家在十九世纪中叶军事经济的潜力作了阐述，还对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中的军事艺术发展道路，发表了许多深刻的意见。

在欧洲反动势力日益猖獗和警察迫害加强的情况下，恩格斯协助马克思竭力保护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核心，从思想上锻炼和教育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的同时，鉴于军事知识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将来的革命战争的重大意义，恩格斯继续研究军事学术的历史和理论。1852年至1853年3月，恩格斯研究军事学术史，阅读了克劳塞维茨（1780—1831）、若米尼（1779—1869）、维利森（1790—1879）、霍夫施泰特尔（1818—1874）、金策耳、戈尔盖（1818—1916）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军事著作，同时特别注意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各次战争，尤其是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战争，以及革命军队在反对沙皇俄国的战争中所采取的策略，并打算写一部关于这些战争的历史。1852年8月，恩格斯在他所写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的第十七篇中，根据各次战争和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科学共产主义关于武装起义的重要原理。

十九世纪50至70年代，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先后爆发了战争，其中主要的有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1857—1859年的殖民地战争和印度起义，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866年的普奥战争，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等。对于这些战争，恩格斯都十分关注，先后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

表了许多精辟的评论文章。

1853年9月，俄国和土耳其准备开战，恩格斯就此写了《俄军在土耳其》的文章，分析了多瑙河上的兵力对比，并由此开始，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关于克里木战争的一系列军事评论文章。1854年5月，恩格斯撰文评述了过时的英国军事制度。9月，恩格斯就英法联军开始进攻塞瓦斯托波尔写文章评述联军的军事行动，随后根据马克思的要求继续定期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关于塞瓦斯托波尔战役进程的军事评论，其中概述了筑城学的发展，指出了要塞和野战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1857年1月，恩格斯就纽沙特尔问题所引起的普鲁士同瑞士的冲突，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关于山地战的文章。4月间，恩格斯在评论文章中，论述了英国侵略者继广州挑衅之后出兵中国的可能性，说明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起因和过程。

恩格斯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军事评论中，评论了克里木战争结束后俄国军队实行的改革，论述了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主要中心德里城被英军攻占和勒克瑙城被围攻、强攻和解救以及英国温德姆将军在印度的战败，分析了法国军事力量以及德国能对付法国的军事力量，分析了奥地利为一方、法国和意大利各国为另一方的交战双方的战略阵地，评论了意大利军事行动的进程和蒙特贝洛会战、马振塔大会战、索尔费里诺会战，阐述了1859年11月开始的西班牙侵略摩洛哥的战争进程，评议了英国的志愿兵部队，论述了加里波第的运动。此外，恩格斯还给《志愿兵杂志》、《新闻报》撰文，评述了美国的战争进程。在他给马克思的信中，分析了美国各主要战场上的形势，并详细地描述了北美的科林斯会战和弗吉尼亚战役。他还给《曼彻斯特卫报》撰写战争短评，评论了奥地利同普鲁士爆发的战争。1870年7月一

场争夺大陆霸权的普法战争爆发，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给《派尔－麦尔新闻》先后写了五十九篇关于普法战争的文章，总标题为《战争短评》，详细地研究了战争的进程。

从1857年至1859年，马克思被《美国新百科全书》聘为正式撰稿人，为了使马克思腾出时间研究经济学问题，恩格斯承担了这一工作的主要部分。恩格斯撰写的条目包括了军事的各个领域。其中有对于军队的形式、组织和装备、补充和训练、指挥管理等问题，战略和战术、地面部队各兵种和海军的组织和战术，筑城工事的构造以及其他包括部队的物质保障和供应，部队的宿营等许多问题，恩格斯都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对其发展历史作了科学的概括和阐述。

在这些条目中，恩格斯非常重视对军事技术发展的研究，他论述了各种武器（如弹射器、刺刀、明火枪、马枪、卡伦枪、爆炸弹、霰弹等）、各种进攻和防御的战斗手段（如Battery、炮艇、棱堡、掩障、防弹工事等）和辅助的技术手段（如军用桥等）等军事技术发展的历史，揭示了最重要的技术发现（如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使用和改进、炮兵学和军事工程学的进步、蒸汽机在海军中使用等），对武装力量和军事学术的发展的巨大影响。在这些条目中，恩格斯还以很大篇幅评价了卓越的统帅、军事改革家、工程师和发明家的活动。在关于战局、会战和攻击一类的条目中，恩格斯分析了如阿尔马、阿斯佩恩、比达索阿、博罗迪诺等会战，阐述了许多宝贵的战略、战术的原理。还有些条目是谈到已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对象的东方各国的，如阿富汗、缅甸等，恩格斯在这些条目中揭露了殖民统治的野蛮方法和殖民奴役的后果，对受殖民压迫和奴役的人民表现出了深切的同情。

恩格斯在研究战争和军事科学中，特别注意到要掌握大量的切实可靠的军事资料，和详细了解战争进展的实际情况，他说："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了解实际的、确实存在的东西，而不是一些无人承认的天才们的体系或臆造物。"①为了研究当时的各类战争的情况，他用各种方法收集作战双方的作战地图、作战计划，以及兵力、给养、装备等各方面的资料，他认为："在写战史方面，如果没有关于兵力、给养和装备等情况的各种材料，就想加以论述，那是最容易出笑话的。"②同时，他还特别关心每日每时电讯报导的战争动态，只有当他感到已经掌握了真实的详细的充分的材料以后，他才开始动笔描述战争，作出判断。

恩格斯为了使自己在军事评论中做到能够发表一定的理论见解，他还下功夫系统地钻研军事著作，掌握那些作为了解和正确评价军事历史事实所必需的细节知识，竭力使自己成为军事研究领域中的内行，他钻研过基本战术、筑城原理、包括从沃邦到当时的独立堡垒的各种体系、以及对野战工事和其他有关军事工程问题（如各种类型的桥梁等等），研究过一般的军事科学史和由于武器及其使用方法的发展和改进而引起的变化的历史，还有当时每个军事部门的概况以及军队的的组织、给养、装备、医疗等各方面的情况。

尽管战争的发展千变万化，难以捉摸，但是恩格斯由于以唯物辩证法作指导，又具有丰富的军事知识，掌握了大量的真实的资料，因而他的分析能经得起战争实践的检验，他的许多预见都

---

①《恩格斯致约·魏德迈（1851年6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7页。

②《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4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9页。

得到证实。例如，1870年7月末，普法战争的双方开始调集兵力的时候，恩格斯在8月1、2日所写的短评中，就根据自己掌握到的信息，推断出普军总参谋长毛奇的作战计划和双方军队初次交锋的大致地区，8月6日的短评还预断第一次决战当天或次日就要开始。就在这一短评见报的当天，也正是在他指出的地点即洛林的福尔巴赫（或施皮歇恩）附近和亚尔萨斯的维尔特附近，普法两军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会战。在8月26日的短评中，恩格斯预告“麦克马洪的军队可能被迫在梅济埃尔和沙尔蒙-纪韦之间法国那片向比利时领土突出的狭窄地带投降。”①后来，9月2日，麦克马洪的军队在比利时附近的色当终于战败，被迫投降。在这次普法战争的最后阶段，法国布尔巴基将军受命进军法国东部，截断围攻巴黎的普军同本国的交通线，但是由于兵力不足，会战失利，只得退却。恩格斯在1871年1月26日的短评中指出，如果布尔巴基退却得缓慢的话，将会被驱入与瑞士毗连的汝拉的一隅而不得不在国界的这一边或那一边放下武器，结果1871年2月1日，布尔巴基军团终于被迫进入瑞士而放下武器。对恩格斯这种准确的判断，连马克思都赞叹不已地说：这“有几乎是数学般准确的把握。”人们将会怀疑这些战争短评的作者“是普鲁士的大军事作家。”②列宁也把恩格斯称为伟大的军事专家。

①恩格斯：《战争短评（十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75页。

②《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2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2页。

第二节　战争和军队的本质、起源及其发展规律

在恩格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研究战争和军事科学中，他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指导，通过对大量的事实的研究，揭示出了战争和军队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

关于战争的本质，资产阶级的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提出了著名的观点，即："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①他还提出了"战争既然是一种暴力行为，……取决于敌对的利害关系的大小和久暂。"②这些观点，给恩格斯以很大的启发。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战争和其他一切社会历史现象一样，都可以"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③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吸取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和政治间的密切联系的这一重要思想的合理成分，并对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克劳塞维茨说，"只能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④恩格斯则把政治看成是阶级的政治，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而且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⑤因而，恩格斯把阶级社会的

①②〔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3、26页。

③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

④〔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97页。

⑤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7页。

战争看作是一定阶级和国家的政治产物和继续。这样，便对战争的本质有了更为科学的解释。

恩格斯通过对大量的事实的研究，论证了战争这一社会现象的本质。比如1524年至1525年爆发的大规模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分析了在其宗教口号下所包含的阶级矛盾，他说："十六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稍后时期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①

资产阶级的反封建的战争，"它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和小农的社会和政治的解放。资产阶级出钱，农民当兵；两个阶级解除封建的与行会的枷锁，是产生现今的庞大的军队所必需的条件；而与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相联系的财富和文化的水平，同样是保证现代军队有必要数量的武器、弹药、粮食等，培养必要数量的有素养的军官，以及士兵本身智力发展所必需的条件。"②革命战争也是这样，也应该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去寻找它爆发的原因。恩格斯说："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③在谈到1848年革命的发生和失败的原因时，恩格斯认为这"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④

---

①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0页。

②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57—558页。

③④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00—501、557—558页。

不仅如此，恩格斯还认为，敌我双方在战场上的每一重大作战行动，每次会战的成功与失败都与参战国军队各自政府推行的政治密切相关。例如，在普法战争中，法军夏龙军团在色当惨败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870年8月18日，德军通过圣普利瓦一战切断了法军莱茵军团的一切退路，并将其合围于麦茨之后，法军在战场上就只有麦克马洪元帅率领的十一、二万人可以自由行动了。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马洪主张退向巴黎，诱敌深入，凭借巴黎的要塞工事进行防御，等待时机破敌。然而，法国政府害怕继续退却会引起革命，于是强令麦克马洪的军团开向麦茨，企图解救被围的莱茵军团，甚至在麦克马洪军前进受阻再次提出撤向巴黎时，也不批准，结果便酿成了尔后拿破仑第三和麦克马洪亲率八万多名官兵于色当向德军投降的特大悲剧。恩格斯在分析这一战例时指出，法军面对敌人优势兵力的追击和堵截，不退向中心——巴黎，反而脱离中心，北上援救麦茨，这不是战略家的计划，而是政治和军事冒险家的计划；法军之所以采取这种“绝望的行为”，“只能解释为出自政治上的需要。”①

战争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不仅在于战争是一定阶级和国家的政治产物和继续，而且还表现在战争对社会的政治制度以至对社会的经济基础有一定的反作用。恩格斯在对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以及查理大帝统治下的法兰克时代的研究中，看到在连年不断且破坏巨大的战争条件下，由于王朝推行不合理的军事制度，曾促进了大封建土地占有制度的形成和大量自由人沦为农奴的过程。法兰克时代的大土地占有者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恩格斯指出，王

①恩格斯：《战争短评（十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75—76页。

权通过侵略战争而在移居的日耳曼人中间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和实际的权力，它把旧日的民田变成王室领地，把罗马的国有土地也并入自己的领地。在分割帝国引起的多次内战期间，又由于大量没收所谓造反者的土地，王室领地不断地增加。这样，便形成了大土地占有者阶级。在当时，自由人又是如何沦为农奴的呢？按照查理大帝时代的军事制度，普通的自由人一年一年地愈来愈无力负起兵役的重担了，因为服兵役不只是个人服役，而且要自备装备和头半年里的伙食。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自由人的负担重到不堪忍受的地步。为了逃避这种负担，大群的小自由人宁愿将他们剩余的田产，甚至他们自身及其后代，都转让给豪绅显贵，尤其是转让给教会。其结果，“普通的自由人日渐消灭了。他们日益跟土地分离，早已驱使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沦为新兴大地主的臣仆，由于害怕兵役造成直接的破产，另一部分人甚至被迫当了农奴。”①

这样一来，全部法兰克人便“分裂为大土地占有主、臣仆和农奴，——这就是查理为取得他的新罗马帝国所付出的代价。随着普通的自由人的消灭，旧的军事制度瓦解了，随着两者的消灭，王权也崩溃了。”②

由此，恩格斯明确地指出，政治手段和战争这种暴力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反作用的，但它“只是在促进和加速一个必然的经济过程。”而在另一种条件下，政治手段和战争这种暴力它又会“阻挠经济的发展”。③

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不仅揭示出战争与政治

①②③恩格斯：《法兰克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62、563、542页。

的密切关系，从而把握住战争的本质，而且还科学地阐明战争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

历史上许多剥削阶级的军事理论家、社会学家和思想家，由于受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局限，总是企图证明战争这种暴力冲突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不可避免的现象，是人类所固有的本能的表现。其实并不是这样。战争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的最终的决定的力量是物质生产。恩格斯以这一基本观点为指导，说明了私有财产、奴隶制的出现都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而暴力、包括军事方面的暴力，则是出现了私有财产的结果。恩格斯指出："要强迫人们去从事任何形式的奴隶的劳役，那就必须设想这一强迫者掌握了劳动资料，他只有借助这些劳动资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而在实行奴隶制的情况下，除此以外，还要掌握用来维持奴隶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样，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拥有一定的超过中等水平的财产。"①而"在私有财产形成的任何地方，这都是由于改变了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流——因而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产生的。"②显然，在掠夺者能够占有他人的财物以前，私有财产的制度必须已经存在了，因此，进行掠夺、抢劫和使用暴力的意图，都是在私有财产产生以后才出现的。

对于战争这一为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武装冲突的社会现象发生的经过，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阐

①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6、177页。

述得更加清楚。原始公社的氏族制度，正如恩格斯所描绘的：“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啊！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做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他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①这就是说，在原始公社制度中，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没有军队，也没有战争。

当时，在各个氏族或部落之间有时也因争夺较好的牧场、猎场和渔场而发生纠纷，这一般都由各个氏族或部落按历来的习俗相互调整解决，有时也因此发生武装冲突，但这是一种偶然的极端的行为，就其社会内容来说，这与阶级社会中所特有的那种解决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的最高的斗争形式的战争并无共同之处。因为这种个别氏族和部落之间偶尔发生的武装冲突并不是由社会关系的性质本身产生的，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当时还没有专为进行战争而建立的军事组织，冲突时所使用的并不是特殊的武器，而是平常进行劳动的工具，其结果也从来不是某一些氏族或部落奴役另一些氏族或部落。例如，易洛魁部落在1651年前后征服伊利部落和印第安部落时，他们建议这两个部落作为完全平等的成员加入他们的联盟，只是在被征服者拒绝了这个建议之后，才被驱逐出自己所居住的地区。

所谓“血族复仇”这种极端行为，也只是由于在氏族制度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93页。

下，个人依靠氏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凡伤害个人的，便是伤害了整个氏族，如果一个氏族成员被外族人杀害了，那末被害者的全氏族必须实行“血族复仇”。在发生了这种不幸的情况下，起初是试行调解，行凶者的氏族议事会开会，大抵用道歉与赠送厚礼的方式，向被害者的氏族议事会提议和平了结事件，如果提议被接受，事情就算解决了，否则，受害的氏族就指定一个或几个复仇者去寻出行凶者，把他杀死，这样做，行凶者的氏族也没有诉怨的权利，事情也就算了结了。可见，“血族复仇”只是氏族成员中的一种权利与义务，也决不是那种含有政治目的战争行为。

战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是在生产力发展到足以创造出剩余产品时才产生的。在野蛮时期的高级阶段，人们从渔猎进化到驯养和繁殖牲畜，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而且也不相同，因而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为着饲养家畜，便发展了牧草栽培和谷物种植，而谷物也很快成了人类的食物。在这一阶段，包括织布机和矿石冶炼、金属加工在内的手工业也有了发展。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等一切部门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也增加了氏族和个体家庭中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需要吸收新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在氏族冲突中得到的俘虏不再是杀掉而是变成为奴隶了。这就是说，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的这种历史条件下，必然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随着社会第二次大分工，即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生产的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提高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本质的组成部分，奴隶们不再是简单的助手了，他们被成批地赶到田野和工场去劳动。这时，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

这时，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恩格斯说："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存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可耻的活动，那末这种情况是决不会发生的。"①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最初形态的武装冲突就变成了历史的陈迹，代之而起的则是阶级社会的战争。从这个历史阶段开始的战争已经失去了与生产过程的直接联系的性质而转变为阶级政治的继续。

在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暴力论时，恩格斯指出："不是暴力支配经济情况，而是相反地暴力被迫为经济情况服务。"②"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③战争既然是在私有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页。

②③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6、187页。

制的条件下，解决不同阶级、民族、国家和政治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的一种手段，因而，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

恩格斯还根据当时的发展趋势，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战争必然发展到军国主义，而这种军国主义本身也包含着自己毁灭的萌芽，因为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它们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军费方面花费更多的金钱，从而愈来愈加速财政的崩溃；另一方面，不得不愈来愈严格地采用普遍义务兵役制，结果使全体人民学会使用武器，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机反对剥削者和统治者而实现自己的意志。一旦人民群众有机会表达自己意志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军队将转变为人民的军队，机器将拒绝效劳。按照这样内在的辩证的运动规律，“军国主义将同任何其他历史现象一样，由于它自己的发展而趋于灭亡”。① 恩格斯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后指出：战争决不是人类社会自始至终存在的现象，它将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灭而退出历史舞台。

关于军队的本质、起源和发展规律，恩格斯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分析。

恩格斯认为，军队和战争一样，是在阶级社会和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在原始社会，没有战争，也没有象军队这样专门的军事组织。那时的武装力量，是一种全体成年居民为夺得和保护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而集合在一起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它既不是氏族公社内部的压迫手段，也不是奴役其他部落的工具。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加剧，原始公社

---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89页。

制度及其武装组织开始瓦解，而氏族军事首领扈从队的力量一天天增强起来。在军事首领和氏族贵族奴隶主的权力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扈从队成了他们的社会支柱和工具。这种扈从队是一种独立自主地进行战争的私人团体，它就是一种军队的雏形。

只有到社会分裂为敌对阶级以后，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可能靠人民自己成立的武装组织来维护，必然会出现由国家建立和供养的一支专门的武装力量来维护，这才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的军队。① 在古代东方各国进入奴隶社会时，军队是由统治阶级的代表，由各扈从队组成的。后来，在希腊和罗马，军队则由符合兵役条件的公民和一部分雇佣兵组成。等到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后，罗马军队开始逐渐由来自贫苦阶级的志愿兵组成，从而形成职业兵的军队，并代替了从前由全体公民组成的民军。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以后，军队的主要构成是封建主，农民只被吸收来参加民兵或充当封建的仆役。过了很长一段时期，欧洲有些国家的封建主才开始允许农奴到军队服役。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国家的封建军队的基本骨干则是雇佣兵。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逐渐获得了自治，并建立起自己强大的武装力量。这种新的军队开始由大批的雇佣兵编成，而雇佣兵获得了谁出钱就为谁服务的自由，这样便产生了一种类似常备军的军队。在封建社会，由于生产水平和武器发展都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各国军队的数量都不大。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剥削阶级有了强迫大批劳动人民当兵的可能，于是便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兵役制度。

---

①恩格斯：《军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页。

恩格斯认为，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阶段相联系的财富和文化水平，同样是保证现代军队有必要数量的武器、弹药、粮食等，培养必要数量的有素养的军官，以及士兵本身智力发展所必需的条件。正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出了资产阶级军队的一系列的特征：一是运动性，即军队的人员、马匹和大炮等这些进攻工具的运动性。部队的辎重轻便，便于迅速行动；粮秣靠在当地征发，一个地方吃尽时就转移到别的地方；部队的调动依靠铁路等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兵士在巡逻、粮秣征发、前哨勤务等活动中善于独立行动，更灵活的散兵战具有重大意义，这些都是以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其基础的。二是众多性，即在一个国家内武装力量和人口总数的比例比资产阶级解放以前的任何一个社会都多。在当时的欧洲，通过募兵制、后备兵制、民军制、征兵制等各种方法补充军队被召入伍的往往达到全国人口的7%，参战的大约占全国人口的5%，这样，每个国家的兵力一般都是几十万、上百万之多。

恩格斯还指出，资产阶级军队的这种运动性和众多性是紧密相联的，运动性不仅是军队众多性的必要的补充，而且甚至常常可以代替后者。具有以上两大特征的资产阶级军队，当然在作战体系和作战方法上，在战略指挥和战术指挥上，都必然会同封建社会的军队不同，具有自己的特点，形成自己的军事科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现代的作战方法是以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为前提的，它是这个解放的军事上的表现。"①

对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在军事上所表现出的特征，恩格斯

①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1页。

也作了科学的预见性的分析。他说："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这是很明显的。"①无产阶级的新的作战方法，是以无产阶级真正解放、一切阶级差别全部消灭和一切生产资料全部社会化为前提的。正如无产阶级革命在工业上不是消灭蒸汽机，而是增加它的数量一样，在军事上，它的任务也不在于减少军队的众多性及其运动性，恰恰相反，在于把两者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新的生产力的增长，铁路和电报等现代化的运输、通讯工具的发展，给有才干的将军提供了在战争中能采取完全新的策略的机会。生产力的逐渐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的逐渐增多，同样也提供了征集更庞大的军队的可能性，那时一个国家所能动员的兵力将不只是全国人口的5％，而可能是12％到16％，即成年男性人口的一半到三分之二。这样庞大的军队，又将以更大的运动性为前提，而且这种运动性要比现代军队的运动性高得多。按其众多性和战略的运动性来说，这些军队将具有空前惊人的力量。"革命将以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来与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作战。"②

第三节　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及其发展规律

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除分析阶级社会中一般的战争及其发展的规律外，还特别注意概括和分析无产阶级和人民群

①②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2、565页。

众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战争的规律，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指出了争取解放的道路。

对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战争、人民大众的反封建的革命战争以及无产阶级的解放战争，恩格斯都是十分关注的。他认为这些战争都是由于社会不同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所引起的。在欧洲，如意大利、波兰等国争取独立的斗争，是由于以沙俄为首的封建同盟对欧洲人民压迫的结果。当时，有些人对意大利人为对付奥地利等压迫者所使用的匕首或暗杀流露出道义上的愤懑。恩格斯说，自1820年奥地利依靠暴力镇压等手段统治意大利，并对有民族意识的意大利人进行杖笞，然而，这些人"似乎完全忘记了这一切都是对奥地利杖笞的回答。"①当时，英国报纸指责中国人民使用所谓可怕的残暴的手段对付英国侵略者，恩格斯认为这是由英帝国主义侵华这种古老的海盗式掠夺所造成的。同样，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解放战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战争，这是由封建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引起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乃是回击反革命势力的必要形式，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因素。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暴力论时，对革命暴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革命的暴力，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②它往往能使一个民族在短短几年内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

---

①恩格斯：《波河和莱茵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78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0页。

恩格斯认为，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战争往往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而资产阶级的解放战争又往往是无产阶级解放战争的序幕。恩格斯在谈到欧洲1854年所爆发的各国独立战争时说："1854年的主要军事行动不过是载入1855年编年史的民族大战的小小序幕而已。只有当俄国主要的西方军团和奥地利军队彼此对抗或者互相携手出现在舞台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同拿破仑的历次大战相似的真正的大规模战争。并且还有可能，这些战争只是其他更激烈的、更有决定意义的战争的序幕，即欧洲人民群众反对那些目前胜利的和自以为巩固的欧洲专制暴君们的战争的序幕。"①

恩格斯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寄予无限的希望，认为只有这种革命战争才能粉碎一切旧的战争，并创造万物而永葆其青春的活力。他在《欧洲战争》一文中，分析到英、法、俄、普、奥等五大强国时，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在欧洲还有一个第六强国，它在一定的时刻将宣布它对全部五个所谓'大'强国的统治并使它们个个战慄。这个强国就是革命。它已经长久地沉默和退却，但是现在商业危机和饥馑又把它召上战场。从曼彻斯特到罗马，从巴黎到华沙和佩斯——到处都感到有它，到处它都在抬头，从假寐中醒来。它复苏的象征是多种多样的；这些象征在各地无产阶级的骚动和不安中都可以看到。"接着，恩格斯还预示：只要有一个信号，这个"欧洲最大的第六强国"就会披戴灿烂的盔甲、手持宝剑昂然地走出来，好象密纳发女神从奥林帕斯神的头脑中出现一样。而这个信号将由快要到来的欧洲战争发生，那

①恩格斯：《俄国的兵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70—571页。

时，对于列强均势的一切预计都要因新因素的出现而被推翻，“这个新的因素将以其创造万物、永葆青春的活力粉碎旧的欧洲强国及其将军们的一切计划”。①

恩格斯还从军事学的角度，对人民群众的武装起义及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战略、战术等，进行过具体的研究。他说：“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末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接着，恩格斯依据1848年革命中群众起义的经验，论述了起义所应遵守的规则，这就是：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来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后果。起义是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居优势；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起义者要按照一位著名的、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

---

①恩格斯：《欧洲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行动。①

此外，恩格斯指出，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还有，在革命中，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在决定性的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也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次胜利的革命不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1848年革命中没有这样做，结果失败了。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小民族如何才能制胜大民族呢？对此，恩格斯明确回答说："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② 应当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方式扰乱敌人，截断敌人的交通线，夺取或毁掉敌人的粮秣辎重，避免正规的攻击，并在遇有敌人大量正规部队时退入森林或沼泽地。民族起义的力量往往比侵略军弱小，所以它的力量不在于进行决定性的会战，而在于进行游击战争和切断敌人的交通线等。侵略者一般来说比较强大，在采用大规模的围攻和正规战时有巨大的优势，而一旦转入游击战中，这些优势就可能会大量丧失。

民族起义应该采用游击战，而游击战是绝对需要山地的。然而，游击战和山地战都需要采取进攻的战术。恩格斯在著名的论文《山地战的今昔》中，举出战例说，提罗耳起义、西班牙反对拿破仑的游击战、巴斯克的卡洛斯派暴动，虽然都采用了游击战、山地战，但是都没有获得成功。可是，高加索人反对俄军

---

①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5—586页。

②恩格斯：《皮蒙特军队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1页。

时，他们采用的游击战术却十分机动灵活，经常离开山区向平原出击，突然袭击俄军的警备部队的前哨，奔袭俄军第一线部队的深远后方，并不时在俄军运动道路上进行伏击。在这种游击战、山地战中，高加索所以能取得一定的胜利，这是“由于他们在保卫自己的疆土时主要采用了进攻战术。”①在强调游击战的作用的同时，恩格斯还注意到必须有正规军的支援。他说：“在我们今天，要胜利地进行任何起义或非正规的军事行动以对抗强大的正规军，就必须有正规军的支援。”②

恩格斯在研究意大利、中国和印度等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提出和发挥了人民战争的思想，认为这是反对外国奴役者的广泛全民运动所特有的战争形式。在谈到意大利军队反抗奥军的战争时，恩格斯首次提出要把“军队的普通战争”变为“**人民的**战争”。③在谈到中英鸦片战争中中国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斗争时，恩格斯反驳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报纸对中国人民的污蔑，指出这是“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④，并认为中国人民在这种人民战争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狂热态度，表明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由此可以“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⑤在谈到印度的随着大规模民族起义部队的分散而必然到来的游击战，将使英国侵略者更加难以应付并将夺去更

①恩格斯：《山地战的今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6页。

②恩格斯：《神圣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9页。

③恩格斯：《皮蒙特军队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3页。

④⑤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2、234页。

多的生命时，他指出，在东方人眼里，英国人再也不是什么高贵的种族了，“从这信念到公开的敌对行为，对于东方民族说来只有一步之隔：星星之火可成熊熊之焰。”①

在研究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问题中，恩格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特别注意到并赞扬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和英勇战斗的精神。他在总结维也纳、柏林、波兰、捷克、巴黎等地人民群众的武装起义的经验时说：“在这一切场合，起义者真正的战斗的力量，是首先拿起武器与军队作战的城市工人。”②恩格斯在谈到巴黎工人1848年六月起义时说：工人们那样迅速地掌握了军事行动的计划，那样有计划地互相支援，那样巧妙地利用极为复杂的地形条件，真是令人吃惊。在分析其原因时，恩格斯说：“这是因为工人在国家工厂的时候就被很好地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编成连队，因此只要把他们的企业组织运用到军事行动中来，就能立即形成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要不是这样，上述情况就完全不可理解了。”③在六月起义中，巴黎工人作战是多么英勇，多么齐心，多么有纪律，多么有军事素养，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因此，历史将给他们以特殊的地位，把他们看作是无产阶级第一次决战的牺牲者。恩格斯还满怀激情的指出：“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兵士。”④

①恩格斯：《攻占勒克瑙的详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00页。

②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7—588页。

③恩格斯：《六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0页。

④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9页。

第四节　军事中的战略、战术和各种因素的辩证关系

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与周围的各种事物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是随着交战双方军事行动的展开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把握军事中的战略、战术和各种因素相互间的辩证关系，就是十分重要的。

战略、战术及作战方法，是涉及整个战争的全局或某一战役的全局的对作战双方的诸种相互联系的因素如何作总体的全面的处置的根本问题。因而，恩格斯在对军事问题的研究中，特别注意到战略、战术和作战方法的重要性。他认为，作为一个军事统帅，就"要善于正确地估计政治形势，擅长战略、战术"。①战略目的是否达到，这是衡量战争成败的主要标准。"如果这个目的没有达到，那就是说不管他们如何重创敌人，他们也是遭到了真正的失败。"②有时，虽夺取了对方的局部地区，然而从战略上看只要未触及其心脏和躯干，仍然是不能制胜对方的。恩格斯举例说：俄国可以丧失克里木、高加索、芬兰、圣彼得堡和别的边区，但是只要不触及它那个以莫斯科为心脏、以设防的波兰为右臂的躯干，它是丝毫用不着让步的。但是，如果战略上举措失当，作战方法上落后，虽有优势，也是会失败的。恩格斯讲到，在因克尔芒会战中，俄军一方三万人，联军一方只一万四千人，

①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73页。

②恩格斯：《辉煌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44页。

而且，俄军士兵打得好，军官指挥能力也高明，然而战略上举措失当，作战方法不好，结果还是失败了。

在对当时各类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中，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概括出了集中兵力、迅速运动、分进合击、迂回包抄、积极防御、友军配合及利用有利地形的山地战等作战原则。

集中兵力，在作战双方的力量较量中，它不仅可以做到以多胜寡，而且可以在以寡敌众的情况下造成局部的优势，各个击破敌人。因而，集中兵力是现代战争中克敌制胜的一条重要的战略原则。"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①恩格斯在总结1849年意大利皮蒙特王室军队的失败的教训时说：在诺瓦拉会战以后，马乔列湖附近驻扎了三、四万皮蒙特军队，如果在大约两天之内把这支军队集中起来，就可以把它迅速调到驻有不到一万二千名奥军的伦巴第，这支军队就能够占领米兰、布里西亚和克雷莫纳，组织普遍起义，各个击破从威尼斯省开来的各奥地利军，从而完全摧毁拉德茨基的整个作战基地。那样，形势就可能改观。

有人说，集中兵力的众兵战术是卡诺（1753—1823）发明的。对此，恩格斯表示怀疑，并指出在卡诺所作的1793—1794年的作战计划中，他不但没有集中，反而分散使用了法国军队，而他对付敌人侧翼所采用的作战方法，使敌人反而能够集中自己的力量。有时，英勇奋战纵然可以取得一时的胜利，然而，只要是违背了集中兵力的战略原则，这也是错误的。恩格斯说：1853年底至1854年初，土耳其抵抗俄军入侵时，战士虽英勇奋战且取得胜利，但分散兵力，犯了错误。在把守道路时，一般说来，如果每

①马克思：《印度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26页。

条道路上各派一军，那便是分散兵力，结果必然招致失败，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侧方阵地可以和正面阵地同样可靠地，甚至是更可靠地防守道路，这是一条现代作战原则。”①在兵力较弱的情况下，一方面要集中兵力，另一方面要争取友军的支援，如果不能象英军在滑铁卢会战时那样坚信友军会在决定关头对攻击之敌的侧翼进行突击，而决定在这里会战，那就会是不可容许的错误。

还有，“分进合击”，则是集中兵力的一种特殊方法。当几支军队联合进攻同一个目标时，往往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即从与目的地等距离的各个地点同时出动，以便同时到达目的地并同时由各方面威胁它。1851年欧洲联军进攻法国巴黎，就是采用的这种“分进合击”的战术。

集中兵力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战斗中的主动权，从而战胜敌人。而夺取主动权，乃是恩格斯在战略、战术研究中所关心的中心问题。这是因为一支在战斗中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的军队，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只有化被动为主动，才能避免失败而获得胜利。为了夺得战争中的主动权，除了集中兵力以外，采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越来越为军事战略家们所重视。恩格斯从战略、战术的发展角度，说明了运动战是现代战争中所常用的一种作战形式。他认为，和敌人拚消耗的阵地战，从军事战略观点来看，在现代的条件下是错误的；应该实行运动战，“军队在运动中要比在停驻时有四倍的价值”。②运动战贵在机动灵活、行动迅速。

①恩格斯：《军事事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19页。

②恩格斯：《德里的攻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53页。

在战争中，当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作战的一个基本规则，也就是说，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精力进行战争，粉碎敌人并迫使敌人同意你的条件。行动的迅速还可以弥补军队人员的不足，因为这样可以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集中兵力以前就进行袭击。拿破仑在耶拿会战中，正是由于出敌不意，兵力强大，行动迅速，所以大获全胜。

在运动战中，还要经常采用迂回包抄的战术歼灭敌人。有些防御阵地，从正面进攻往往等于完全丧失理智，而这种从后方迂回敌人的可能性则能够绰绰有余地抵销这种防御阵地的力量。防御者要防守敌方可能借以对阵地进行迂回运动的所有道路，就会分散兵力，以致必败无疑。可见，正面进攻和迂回包抄，都应该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恰当地运用，而不能作机械地理解和运用。

在山地战中，过去认为瑞士的山地是不可战胜的，后来法军采用运动性的纵队和散兵线、迂回包抄等战术，攻破了它的山地战。拿破仑提出的进行山地战的准则是“山羊能通过的地方，人就能通过；人能通过的地方，一个营就能通过；一个营能通过的地方，全军就能通过。”恩格斯在《山地战的今昔》中，从战略和战术的角度，详细地论述了在山地战中，进攻对防御占有巨大的优势，“事实上，在一切场合，甚至在山地居民的暂时获胜的起义中，胜利的取得都是进攻行动的结果。”①

在处理进攻和防御这对矛盾中，不仅进攻中需要争取主动权，而且在防御中也同样需要争取主动权。因此，恩格斯再三强

①恩格斯：《山地战的今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6页。

调消极防御一定是被动的、必定会失败的，只有积极防御，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才能夺取胜利。恩格斯特地引述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话说："消极的防御，即使有良好的武器，也必败无疑。"① 恩格斯还举出意大利皮蒙特王室军队在防御奥军的进攻中，消极地死守里沃利高原，分散了兵力，结果失败了；而高加索人采取积极防御，经常离开山区到平原作战，结果取得了胜利。

在防御中是需要修筑必要的工事的。可是有些野战工事被说成是不可攻破的。恩格斯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曾有多少被认为是攻不破的野战工事，结果经过几次霰弹的齐射后，就在第一次强攻时被夺取了！谁不知道，过去最有名的野战工事——托列斯-维德拉斯防线之所以坚固，并不是因为它可供消极抵抗，而是因为它有威灵顿的十万人防守，可是进攻它的马森纳却只有三万人！恩格斯还指出，各个孤立的野战工事，例如山口的野战工事，往往是很有效的，但是在现时的条件下，还不曾有过依靠野战工事的消极抵抗在决战中击溃有才能的统帅所指挥的优势敌军的战例。在1853年的俄土战争中，有人认为土耳其军队可以凭借工事抵抗住俄军，恩格斯则认为："如果这些工事果真是起土军要它们起的作用，那我们就不能不认为，这些工事对土军本身的威胁要比对俄军更大。"② 因为这些工事很容易在俄军的进攻下丢失，丢失阵地会对土军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影响，丢失的工事还会被俄军利用来对付土军。

---

①恩格斯：《步枪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2页。

②恩格斯：《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4页。

那末，这是不是说防御就毫无用处了呢？当然不是。这只是说，防御不应当只是消极的，而应当是积极的，即应当从机动中吸取力量，并且只要一有机会，防御者就应当采取进攻行动。在这种场合中，单纯的消极防御所仅仅依靠的那些坚固的防御阵地，就变成了可能诱敌深入的许多陷阱，而这时防御的主力却可以迂回敌后，致敌于死地。恩格斯曾援引塞瓦斯托波尔的战例说明："巨大的营垒，如果为进行大规模的积极防御的一支大军所防守，将具有多么巨大的威力。"① 又说："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② 如何才能做到这种积极的防御呢？恩格斯认为，要做到不是消极地死守阵地，不去计较某一地区及其要塞的得失，不让自己的人员和武器遭到损失，寻找其它出路，出敌不意地将自己的军队调往新的攻击目标，机动灵活地出击。要做到这种积极的防御，就需要有机敏灵活、经验丰富和指挥熟练的将领，需要有训练有素和行动敏捷的部队，而首先需要有指挥熟练且又极其可靠的旅长、营长以至连长，因为在这些场合，一切全靠各独立部队行动的迅速和机警。

在防御时要争取积极主动地出击，而击溃敌军后，勇猛地追击穷寇也是一条重要的军事原则。恩格斯说："战果通常是在追击敌人时得到的。追击愈猛，胜利愈大。俘虏、火炮、辎重、军旗等，与其说是在会战过程中获得的，不如说是在会战后的追击中获得的。另一方面，胜利的彻底程度取决于追击的勇猛程度。"③ 1859年，联军和奥军进行马振塔会战时，由法军等组成

①②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91、296页。

③恩格斯：《奥军向明乔河的退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39页。

的联军一开始就集中了全部战斗部队，而奥军则兵力极为分散，行动十分迟缓，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因而联军不仅可以一举击溃奥军，而且可以把退路已断的奥军整旅整团地抓去当俘虏。然而，会战结束后，法军却没有半点追击的企图，而是吩咐军队进行休整，结果竟让奥军从容不迫、秩序井然地退走了。恩格斯认为这是法军的一个明显的失误。

在研究战争中诸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时，恩格斯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全面地阐明了人和武器、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辩证关系。

恩格斯认为，武器是战争中的一个基本的要素，它在战争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他曾以比喻的方式说到，《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在幻想岛上由于手持利剑，奴役了星期五。若设想星期五有朝一日将手握实弹的手枪出现，那时，全部“暴力”关系就颠倒过来了，星期五发号施令，而鲁滨逊则不得不做苦工。可见，手枪战胜利剑，“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一般所说的武器的生产者，战胜较不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①

接着，恩格斯指出，新的武器的发明，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变革。在十四世纪初，中国人发明的火药，经阿拉伯人传入西欧，结果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81页。

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结果，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随着市民等级的发展，步兵和炮兵愈来愈成为决定性的兵种；在炮兵的压力下，军事行业不得不增加新的纯粹工业的部门——工程部门。

火器被采用后，经过了三百多年，即十八世纪初，才出现了适合装备全体步兵的装有刺刀的燧发枪。由于这时的步兵是由经过严格训练的，但是完全不可靠的诸侯雇佣兵组成的，而这些兵士能够应用新武器的唯一战斗形式就是线式战术，即全体步兵排成三线，形成一个非常狭长而中空的四边形，这种战术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达到了最完善的地步。然而，这种队列作战方法缺乏应变能力，动转不灵，不久也被淘汰了。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由于起义者是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不会临阵脱逃，又能很好地使用线膛枪射击，因而他们就以行动敏捷的散兵群在隐蔽的森林中袭击英国人，这样便发明了散兵战。在法国革命中，这种作战方法又有新的发展。由于法国是以全民武装来和反法同盟的训练有素的雇佣军相对抗，他们便发明了以纵队的形式同敌人作战。这种队形行军速度较快，能够在任何地形上以任何适宜的方法去部署军队。这种纵队形式之所以被采用，除法国革命的兵士成份发生了变化外，还由于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的野炮架，使野炮能以所要求的速度转移，还有1777年法军采用了按照猎枪仿造的弯曲的枪托，使射手能向某一个人瞄准而不会屡击不中。如果没有这些武器装备上的进步，是不能进行散兵战的。

普鲁士采用后备军制度，在1830年到1860年短期使用前装线膛枪后，又改用后装线膛枪来装备全体步兵，这样，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便取得了胜利。英国军队全部装备着经过普里契特改进的米涅式步枪，这种步枪射击准确，装弹快，因而在1851年的因克

尔芒会战中大显威力，使英军获得了胜利。在后装线膛枪的火力下，纵队作战形式也不得不被淘汰了，兵士们本能地找到了至今仍然有效的唯一的战斗形式即以稠密的散兵群进行战斗。由上可见，“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①

恩格斯从军事学术上说明了新武器的重要：在生产上不发明新式工具就不能使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同样，“在军事学术上也不能利用旧的手段去达到新的结果。只有创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新的、更伟大的结果。每个在战史上因采用新的办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的将领，不是新的物质器材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新器材的第一人。”②

在说到武器时，恩格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武器先进，还要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先进，武器才能发挥作用。他举例说，英国军队的武器在当时是第一流的，但英国实行买卖军官官衔证书，所有高级军职几乎完全由贵族把持。英军的领导不是集中在一个部门，而是分散由四个各自为政、互相妨碍的部门管辖。一个是军务大臣，他不过是一个“出纳员”和“记帐员”而已。英军总司令部有一个总司令，只管步兵和骑兵；有一个军械总长，管理军队的兵器；还有一个殖民大臣，负责派遣军队到海外各属地并调度这些军队的装具供应，同时还有军需部；最后，为了统管驻殖民地的部队，还得委派一个该地驻军总司令。这四个

---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87页。

②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5页。

部门相互牵制，行动很难统一，这样就大大地影响了军队的作战力，影响了新式武器威力的发挥。

要赢得战斗的胜利，先进的武器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同时，掌握武器的兵士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而且是一个更重要的条件。恩格斯明确指出："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①其道理是极为明显的，就是因为"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②这就是说，任何战斗力都是人和武器的结合，如果说任何武器都离不开兵士的使用，那么，任何兵士都是必需由一定的武器装具来武装起来。恩格斯强调人和武器在战斗中的重要作用，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那种否定人的作用的唯武器论，以及否定武器作用的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错误观念。

恩格斯还十分重视精神力量在战斗中的突出作用。他在阅读法国资产阶级军事著作家毕若（1784—1849）的著作《略论作战的几个问题》中"步兵战斗中的体力因素和精神因素"一章时，对毕若强调精神力量的作用的观点特别重视。针对相信巧妙的战术胜过相信旺盛的士气的传统观念，毕若认为，战斗有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而精神方面最为重要，因此，应该特别注意有助于提高兵士的勇气和削弱敌军勇气的一切；要树立士气，发扬兵士的爱国精神，使他们爱光荣，有集体荣誉感。要做到这些，首先要求指挥员能够取得兵士们的信任。为了取得信任，指挥员应履行自己对兵士的一切义务，同他们交朋友，常常跟兵士们谈战

①恩格斯：《步枪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2页。

②恩格斯：《德国战争短评一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1页。

争，谈作战方法，使他们相信自己的指挥员有办法很好地领导他们；在火线上，指挥员应给自己的兵士们做出高度勇敢和十分沉着的榜样。对士气的最严厉的考验是退却，这就是说，不仅进攻中兵士们要有昂扬的斗志，而且在退却时士气不应沮丧，仍应英勇顽强。恩格斯也明确说过："能掌握主动权，就证明军队或者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或者在指挥艺术上具有优势，而且在一切失利和退却的情况下，除了决战失败以外，这也可以维持士气。正是这种主动权，既把威灵顿那支被数十万法军包围在西班牙的小小的军队团结起来，又使它在历时5年的战争中成为一切事件的中心。你可能被迫退却，你可能被击败，但是只要你能够左右敌人的行动，而不是听任敌人摆布，你就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占有优势。而更重要的是，你的每个兵士和整个军队都将感到自己比对方高出一筹。"① "勇敢和必胜的信念常使战斗得以胜利结束。"②

由于人以及人的精神因素在战斗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恩格斯对战斗员和指挥员的素质及其相互关系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他研究了当时法、英、俄、土、奥、普、意、丹麦、西班牙等国的军队的兵士以及过去战争的经验后，指出："勇敢善战这种军事素质，在世界各民族中基本上是相同的；其次，各民族兵士的区别与其说在于他们的长处，不如说在于他们的特点；最后，就是在目前军事公开的情况下，只有多动脑筋，在军事领域和国家资源的利用方面不断地改进和发明创造，以及发展本民族

①恩格斯：《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89—290页。

②恩格斯：《欧洲军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78页。

特有的军事素质，才能在一个时期内使一个国家的军队在竞争者中间跃居首位。”①

恩格斯十分注意军队中士兵的素质。他在分析欧洲军队的素质时指出，除一般的勇敢善战外，各国军队的兵士还有各自的特点，比如法国士兵攻击敏捷、主动积极，英国士兵抵抗顽强，俄国士兵沉着坚定而驯服，土耳其士兵最能吃苦耐劳，而普鲁士士兵则素质更好。士兵的这些素质，都与各个国家多方面的情况有关的。例如，普鲁士的士兵素质好，这是因为普鲁士是既有辽阔的平原又有大片山地的国家，能为任何兵种提供充足的兵员，而且大部分人的体质既适合担任轻步兵，又适合担任基干步兵，这是任何其他民族所难以相比的。普鲁士盛产马匹，并能提供大量的从小就习惯乘骑的骑兵；德意志人稳健沉着的性格使他们特别适合在炮兵中服务；还有，他们是世界上好战的民族之一，他们在战争中寻求快乐，当自家门前无仗可打时，就出外找仗打，这些德意志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为优秀的兵士。

在考察士兵的素质中，恩格斯很重视士兵们的文化知识素养。他说：“在今天，任何军队没有军事知识就无法作战，就无法守住任何城市。”②他还举出俄国军队为例说明，虽然俄军兵士具有一切优良的战斗素质，但由于其文化知识素养差，结果往往被文化知识水平高的军队所击败，可见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对文化不够发达的邻国在军事上具有明显的优越条件。

此外，严格的纪律，持久的积极性，也是兵士所必需具备的

①恩格斯：《欧洲军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7页。

②恩格斯：《德里的攻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52页。

素质。例如，土耳其兵士素来勇敢，最能吃苦耐劳，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听从指挥，然而，现代军队所要求的严格的纪律、持久的积极性和经常集中的注意力，这与懒惰的、主张消极宿命论的土耳其人是极不相容的，这是土耳其军队最大的弱点，就这一点也足以使土耳其军队不适于进行任何一种进攻战。

兵士的这些素质是怎么来的呢？恩格斯指出，这些主要是靠训练和管理而形成的。例如，瑞士人和一切山民相同，如果受到严格的训练，就是很好的兵士，作战都是很出色的。英国军队甚至不惜使用九尾皮鞭来训练兵士，他们认为，勇敢的精神，高度的纪律性和不可战胜的气概这些素质，只有背上带有伤疤至少挨过五十鞭的兵士才会具备。当然，恩格斯不赞成用这种惩罚的办法来训练士兵。他说，这在它的维护者看来是维护纪律性的最好手段，而实际上它却破坏纪律，涣散士气，并挫伤兵士的荣誉感。对兵士的管理也很重要。法国实行代役制，兵士通常是从所谓“社会的危险阶层”中招募来的，这些人很难控制，但只要善于管理，他们就会成为优秀的兵士。反之，军队即使素质好，如果放松管理，象英军在印度那样任其抢劫，那末军队就永远变样了，那时将军的任何命令和威信都无法使它恢复原状。

训练和管理十分重要，但是，在恩格斯看来，学院式的教育训练则必须废止。恩格斯指出俄国那种学院式的教育是一种“温室教育”，具有明显的害处和缺点。在当时的俄国，兵士的儿子大多数从小就由官费教养，以后从中选拔出军士。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脱离人民的特殊集团，他们逍遥自在，一无所长；在政府豢养下生活，这是他们的全部希望。他们是一群仰人鼻息、奸诈狡猾、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的人，受过一点点肤浅的教育使他们更加令人厌恶，虚荣心重，唯利是图，把自己的灵魂和躯体出卖给

国家，同时只要对自己有好处，又时刻想零星地出卖国家。由军校培养军官更是耗费很多的金钱。国家非常慷慨地供给他们学费，使他们能够受完教育，并在职务上迅速提拔他们，然而，军校的知识很浅薄、刻板，军校的学生，也主要是为了应付考试，在专业知识方面，他们远不及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军校的青年，在战场上往往被击败。

恩格斯还依据事物相互联系的原理，深入研究了影响军队素质的许多因素。首先，它与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状况密切相关。英军组织腐朽透顶，这与英国到处盛行着大量惊人的舞弊行为是相联系的。普鲁士由于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制度，它的军队先进的编制原则和先进的训练原则没能彻底实行。俄军技术落后，编制方法、训练方法陈旧，“阅兵式教练”和盗窃公款等风行，这些都是沙皇俄国经济落后、封建农奴制关系的统治、反动的政治制度的结果。不仅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对军队有影响，民政制度对军队素质也有影响。恩格斯说过，西班牙这个曾以步兵闻名世界达一百余年的民族，要重新建立一支可以引以自豪的军队，并不是不可能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需要改变军事制度，而且需要在更大的程度上改变民政方面的整个制度。

同时，恩格斯认为军队不同素质的士兵是否能科学地组合，也会影响到它的战斗力。例如，在每一个国家里，由于人员的身长、体力和气质的不同以及马匹的特长不同，应该科学地分别编成重步兵和轻步兵，重骑兵和轻骑兵，如果把具有本质上相反的战斗素质的人员合并在一个部队里，因而使这些素质中和，便会削弱整个部队的战斗力。

军队战斗力的强弱，除了要提高战斗员的素质外，更重要的是指挥员的素质。恩格斯认为，作为一个指挥员，要善于正确地

估计政治局势，擅长战略、战术，熟知各种兵器的使用法，同时还要具有充分的精力、机敏和决心。现代的战争对指挥员的要求更高了。当时法国为了对付欧洲的联军，帕希（1746—1823）、布朔特（1754—1840）、甚至卡诺已经是不够了，而应当有相当于拿破仑这样的人。有时，在作战双方力量对比强弱不等的情况下，如果力量较弱的一方能有一位经验丰富、能干的统帅指挥，也有可能改变兵力的对比。有时情况则恰恰相反，如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索尔费里诺会战中，奥军虽然非常勇敢，兵力又多于法军一倍，但由于奥军将领弗里兰茨-约瑟夫指挥无能，结果失败了。恩格斯还特别指出："当一个国家由一些愚蠢的年轻人来领导时，一切必然都取决于他们的神经状态。深思熟虑的计划，被当作儿戏，听凭主观想象和一时的兴会任意处置。"①

恩格斯在研究战争中诸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时，还用唯物辩证的观点研究了时间、地形、气候等要素。

时间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讲过："如果说在贸易上时间是金钱，那末在战争中时间就是胜利。放过有利的时机，不利用机会调派优势兵力去对付敌人，这就是犯了战争中可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如果不是在防御时而是在进攻时，即在侵入敌人的领土时犯这种错误，那末它就会造成加倍的危险，因为防御时疏忽所造成的后果还可以纠正，而在进攻时这样的疏忽便会招致全军复没。"②他还说明了：行动的迅速可以弥补军队的不足；相反，延误时间就会给敌人造成优势。

①恩格斯：《奥军向明乔河的退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4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罗素的辞职。一克里木事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06页。

地势对于军队作战也是很重要的。恩格斯指出，瑞士多山地，这对于进行山地战、游击战提供了很好的地理条件。又如意大利波河流域的曼都亚，处于湖泊之间，有着纵横交错的河网，这种地势易守难攻，所以谚语说："曼都亚在谁手，意大利归谁有。"有的军队在不同的地形条件下，所显示出的战斗力不一样，如摩尔人在丛林和山谷中十分厉害，而在平原作战则不行。

气候对战争有时也有很大的影响。最典型的事例是1854—1855年的克里木战争。战争开始后不久，恩格斯预言说："克里木草原的致命的气候也将成为联军危险的敌人。"①果然不出所料，当战争进入严冬季节，阴雨连绵，天气越来越寒冷，暴雨把整个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变为一片泽国，泥水深过膝盖，英军对此毫无准备，士兵们睡在沼泽地上，长期的潮湿和寒冷引起痉挛、腹泻和其他疾病，医务人员又少，每天成百人地死亡。这种，英军完全瓦解，不击而败。

正因为时间、地形、气候等因素对军队的战斗力的发挥都有影响，所以恩格斯在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军事条目"野营"中，十分赞许："罗马的野营根据季节、军队驻留的时间、军团的数目以及地形条件和其他等情况而变动。"②

恩格斯对战争中的诸因素及其辩证关系的分析，当然不止上述这些。然而，仅就这些也可以看到，恩格斯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相当丰富的。

总之，恩格斯大量的军事著作表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①恩格斯：《对俄国要塞的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11页。

②恩格斯：《野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78—279页。

观点作指导来深入研究军事问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为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武装斗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同时也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

第五章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过程中对国家学说的进一步发展

自从1848年革命进一步打击了封建制度以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涨时期。从40年代末期开始，工业革命步伐大大加快，席捲了整个欧洲大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俄国都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则变成了第一流的工业国。随着资本主义基础的扩展，在西欧一些先进的国家里，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壮大，阶级关系也愈来愈简单化和明朗化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都开始走上了社会发展的前台，两者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1848年革命失败后，暂时处于低潮的欧洲工人运动，在1857年新的经济危机爆发后，又逐渐高涨起来。此后，各国工人之间的联系加强了，1864年在伦敦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并且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从1848年开始的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除波兰外，欧洲所有各个大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内部统一都成了现实。1863年1月爆发的波兰人民反对沙俄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得到了欧洲各国工人的支持。这样，无产阶级的发展就可以不再受到民族纷争的困扰了。“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而在他们旁边则已有1848年革命的继承者威严地站立起来，这就

是以国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①

法国在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时期，资本主义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机器在工业中的应用增加了五倍多，蒸汽机从五千三百多台增加到二万八千台；到1866年，工人的数目已近三百万人，在一百八十多万居民的巴黎，有一半以上是工人和工人家属。在第一国际的影响下，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已经发展到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在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一部分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起来反对政府，要求恢复共和国；身受波拿巴三世的战争和税收政策压榨的农民群众，也参加了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行列。各种革命力量在60年代末汇合成了一股冲击第二帝国的洪流。

崇尚民族沙文主义的路易·波拿巴，从50年代就开始不断地进行侵略战争，千方百计地为法国兼併领土。但在1866年以后，由于德国在普鲁士的兼併政策下，通过一个自上而下的运动实现了统一，使波拿巴在对外政策上碰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尽管如此，波拿巴为了摆脱日益严重的国内危机，于1870年7月19日迫不及待地对普鲁士宣战，发动了侵略普鲁士的战争。普法战争的结果，法国大败，9月2日，普军在色当俘虏了波拿巴连同他的近十万法军。接着，大举入侵巴黎。这时，民族矛盾立即使本来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激化了。9月4日，巴黎工人、市民和国民自卫军起来推翻了第二帝国，直接宣布共和国。然而，资产阶级政客窃取了人民革命的果实，自封为“国防政府”，实际上推行卖国政策，与侵略者勾结起来，镇压巴黎无产阶级，妄图解除国

①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9页。

民自卫军的武装。在这种情况下，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不得不奋起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这样，便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

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着重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从政治思想上研究和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为此，马克思中断了从1844年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于1850年底重新恢复了他对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他的理论活动主要是在经济学方面。1859年，马克思发表了代表其批判研究成果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又发表了《资本论》第1卷。恩格斯则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不得不重新回到曼彻斯特营业所去从事他所十分痛恶的商务，直到1870年。到普法战争前夕，无产阶级的两位伟大导师，又把全部视线移到了当前事变的历史上来了。他们领导着整个"国际"，以极其振奋和喜悦的心情，殷切关注和全力支持巴黎无产阶级的英勇创举。

马克思不仅派人以国际联络员的身份前往巴黎指导和参加巴黎公社的斗争，同时还向世界上有国际所属支部的地方发出了数百封信，宣传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伟大意义，号召各国无产阶级起来声援和支持巴黎无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做了大量的工作，发动法国南部的群众运动来挽救巴黎公社。他们多次在国际总委员会上发言，阐明公社斗争的伟大意义。公社失败后仅两天，马克思就在国际总委员会上发表了由他起草的国际关于公社革命的宣言即《法兰西内战》。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歌颂巴黎工人的英雄主义、历史主动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特别认真地总结了这次革命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基本原理。

第一节　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

还在公社成立以前，即1870年12月13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就指出："不管战争怎样结束，它已经教会法国无产阶级掌握武器，而这就是未来的最好的保证"。①在公社失败以后，即1871年9月25日，马克思在伦敦庆祝国际成立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十分肯定地说到这个问题。马克思首先谈到，在过去发生的一切运动中，最伟大的运动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接着，他指出："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②这样，马克思就第一次十分明确、具体地把掌握枪杆子、武装夺取政权当做无产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

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于如何夺取政权还提得比较抽象。那里只是说："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③"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

---

①《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0年12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页。

②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7页。

主。”①其中，提到暴力革命问题的有二处，即“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②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起草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依据当时的革命经验，提出：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反对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专门图谋私利的资产阶级的政党，“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应把武器和弹药交出去；对于任何一种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的时候都应该予以武装回击。”④而在1870年和1871年间，则明确地提出了教会无产阶级掌握武器和建立无产阶级的军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决条件的思想。

马克思的这个思想的发展，是以1848年、1871年这两次革命的经验为依据的。恩格斯后来在1891年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导言中，特别提到了这个历史经验。恩格斯指出，由于法国从1789年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使巴黎爆发的每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无产阶级的性质，就是说，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总是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所有这些要求，归根到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尽管这一要求还很不明确，但它对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包含有一种威胁，特别是提出这种要求的工人们往往还拥有武装，“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4、35、5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8页。

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①这种情形，第一次发生于1848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政府、要求改革选举以获得统治权时，最初不得不求助于人民的支持，工人们在危机发生时用巷战赢得了革命的胜利，越出了资产阶级要求改革选举的有限目的，宣布成立“社会”共和国来表明自己的模糊意向。由于工人们已经拥有武装，所以资产阶级开始不得不作出让步。但是，在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感到他们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工人武装。他们以种种挑衅性的措施迫使工人举行1848年六月起义，使工人们遭受到了失败。然后就以屠杀、监禁和流放来对待手无寸铁的工人。这样，资产阶级就第一次向工人们表明了，当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来反对它的时候，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对付无产阶级。

1848年发生过的事情在1871年又重复出现了。在波拿巴失败投降、巴黎被围之后，工人们又再度武装起来，组成了一支以工人为主体的、近两百个营三十万人的国民自卫军，建立了一个由国民自卫军官兵组成的政治组织——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共和国重新宣告成立，而由资产者组成的政府和武装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不久就又暴露出来了。1871年1月巴黎投降之后，巴黎无产阶级还继续保持了自己的武装，这使资产阶级政府的首脑们感到十分惶恐不安。他们确信，只要巴黎工人还握有武器，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时刻处于危险的境地。于是梯也尔之流的第一件事就是企图解除工人的武装。这件事发生在3月18日，而法兰西

①恩格斯：《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6页。

的内战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巴黎的工人阶级不仅依靠手中的武器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而且有力地抗击了国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达两个月之久，使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积累了两个多月的宝贵经验。可见，公社所建树的伟大历史功绩，首要条件乃是因为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武装。然而，公社的失败也在于它没有充分地利用这个有力的武器，“它们愚蠢地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梯也尔力图用暴力解除巴黎武装并不是开始内战似的”[①]；它多次错过机会，不去向凡尔赛进军，不去捣毁这个反革命巢穴；起义胜利以后，公社表现出极大的“仁慈”，它没有利用自己的武装对反革命分子造成一种革命的恐怖，特别是对其中武装的反革命分子的抵抗和破坏活动进行镇压。以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说明了：无产阶级掌握武器，建立自己的军队，乃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决条件。

法国两次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明：每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斗争的前台正面相遇的时候，每当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问题总是通过武装斗争而得到解决的，并且每一次都是资产阶级首先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无产阶级若不把自己武装起来，它就不能作为一个有威胁性的政治力量和资产阶级相抗衡，因而就不能为自己争得解放的权利。无产阶级若是把自己武装起来，它和资产阶级的决死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结论只能是这样：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对这一思想作出了更加明确的概括，他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

---

①《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1年4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02页。

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①

第二节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说道：“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②在起义失败之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首先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这条原理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首先加以论证，而在巴黎公社时期得到实践证明的。

从《共产党宣言》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不能立即废除国家，因为国家正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所遇到的唯一现成的政治组织，它必须利用这个有组织的国家政权来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并从根本上改造全部现存社会制度，直到阶级完全

①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06页。

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页。

③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2页。

消灭，整个社会都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时候为止。这是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分歧的主要之点。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显然，如果无产阶级革命从一开始就废除国家，实际上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有效的机构，其结果就一定会归于失败。

但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不能不加改变地运用资产阶级所建立的现成国家机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呢？这个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没有明确地解决，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马克思根据法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不能象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只是简单地夺取现成的国家机器，而是应当破坏它。因为，历史的经验证明：这个机器只是镇压被压迫阶级的工具，是社会机体上的寄生赘瘤，是资产阶级瓜分赃物的场所，奴役无产阶级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所以，无产阶级在胜利后不能利用它来作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应该首先对它加以改造。因此，马克思预言下一次的法国革命必定会打碎这个官僚军事机器。巴黎公社使马克思的预言实现了，马克思的理论得到了革命实践的证实，而在这次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加以总结并发展了这个理论。

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马克思在提出了上述著名论断之后，就系统地总结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从而揭露了它的纯粹压迫性质。

马克思指出，以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为其主要构成部分的法国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从君主专制时代起就开始

萌生出来了。当时它是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而得到发展的。到了第一帝国时期，它达到了完备的形态。后来，政府处于服从议会即资产阶级直接监督的地位，但是，由于它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政府权力就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党派争夺的对象。一方面，它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另一方面，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了变化，从反对封建残余势力的工具愈来愈变成压迫劳动者的机器。“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①

1830年七月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交给了资本家，1848年二月革命资产阶级共和派又从金融集团手里夺得了国家政权，后来它利用这个政权进行了六月屠杀，从而向工人们证明了所谓“社会”共和国不过是用共和国来对他们实行社会奴役。六月屠杀以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统治不得不让位于保皇主义的大资产阶级秩序党的统治，秩序党是三个王朝（波旁、奥尔良和路易·拿破仑）政党的联合。它是一种公开实行阶级恐怖和有意侮辱“贱民”的政体。“由于存在无产阶级起义的威胁，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而无耻地利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②但是，由于统治阶级不断地对无产者实行镇

①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2、373页。

压，使它不得不赋予国家机器愈来愈大的权力以压制劳动群众的反抗，同时也就剥夺了议会机关防范和监督行政机关的一切手段，结果就是波拿巴的帝国取代了秩序党的共和国。可见，“帝国制度是那个由新兴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摆脱封建制度的工具建立起来，尔后又由已经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的国家政权的最淫贱和最后的形式。”①正如一切事物的发展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样。随着第二帝国的覆没产生了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最伟大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②它创造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型国家的雏形。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个思想的特别重要性，可以从下面这件事情上看出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的序言中，特别申明要根据这个思想对《共产党宣言》作唯一的修改。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③此外，1891年，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中，也再次强调说：“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

①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9页。

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①列宁也极端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他指出：“‘摧毁官僚军事国家机器’这几个字，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对国家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简要地表明了。”②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家问题上的思想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47年以前，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都认为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国家就会自行消灭。第二个阶段是《共产党宣言》，在那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还要利用国家政权作为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和改造全部现存社会制度的有力杠杆。第三个阶段就是从1852年以后到巴黎公社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利用现成的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首先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对它加以彻底的改造。但是如何改造它呢？在1871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凭空臆造无产阶级的这个新型政权应当是什么样子，而是认真研究了公社的经验，研究革命本身是如何发现这个新型政权的最初萌芽的。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马克思则进一步总结了这个问题。

①恩格斯：《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4页。

②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第三节　用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

马克思说："……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①如果说，在二月革命期间巴黎工人所提出的"社会共和国"的口号还不过是关于无产阶级新型国家的"模糊意向"，那末，巴黎公社就已经是这种国家的"一定形式"了。这种一定的形式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巴黎公社所建立的国家组织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对此，马克思进行了很详细的分析：

一、废除常备军和官吏，实现国家机关的完全民主化

巴黎原是旧政府的权力的中心，同时，它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活动的中心，巴黎人民手执武器奋起反对了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要恢复和巩固帝国遗传下来的这个旧政府权力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普鲁士军队围困使它摆脱了法国旧政权所拥有的军队，并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同时，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出的城市的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

①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8页。

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一向作为旧政权的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从上至下的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4月21日公社颁布了“最高薪金为每年六千法郎的法令”，这在当时仅相当于法国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这样，作为旧政权的主要标志的常备军、官吏和警察这些物质的权力工具就被废除了，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和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其成员的工作机关。由于一切公职人员都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社会公职就不再是资产者和利禄之徒争夺的对象，也不再是统治阶级的走卒们的私有物。公社所采取的这项措施，“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①公社不再是那种脱离社会、凌驾于社会之上由剥削者少数人垄断的特殊权力，它已把这种权力归还给人民，由社会成员的大多数直接行使这种权力。公社和人民合为一体，并受人民监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所说的国家了，而是从国家向非国家的过渡。公社无疑具有镇压的职能，但由于已经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镇压，而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镇压，因此无需组织特别的暴力工具，即可以由人民自动的武装组织来执行。

列宁说：“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

①恩格斯：《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5页。

选举制和撤换制。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一次大更替，即用一些根本不同的机构来代替另一些机构。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实际例子：实行得象一般所能想象的那样极其完全极其彻底的民主由资产阶级民主变成了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变成了一种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①由于公社打碎了军事官僚机器，所以它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这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

由于公社取消了常备军和官吏两项最大的开支，因而也废除了苛捐重税和巨额国债。马克思说：“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②

二、废除议会制，代之以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③代议机构和选举制是民主制的必要形式。无产阶级民主不是要废除代议制和普选制本身，而是要抛弃它的资产阶级的虚伪形式，赋予它无

①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6页。

②③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7、375页。

产阶级的真正民主的内容。在资产阶级国家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总是在后台决定而由政府各部执行的，议会只不过是为了专门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马克思就已经揭露了资产阶级议会的徒具形式和软弱无力，嘲笑了那些迷信议会势力的党派和个人实际是幻想世界的俘虏。他说："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这种议会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秩序党在它已亲手消灭了议会势力的一切条件并在它反对其他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消灭了这些条件之后，仍然把它的议会胜利看做胜利，并且以为打击了总统的内阁阁员也就是打击了总统本人。"① 因此，公社废除了议会式的虚伪民主而代之以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就是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变资产阶级民主为无产阶级民主。但这决不意味着取消普选制，而是改变普选制的阶级内容。在巴黎公社以前，普选权一直被滥用，它或者被当做以议会方式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做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在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批准议会制的阶级统治，即选择这种统治的工具。而巴黎公社的"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象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

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5页。

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另一方面，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①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有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高位权贵们，这个阶层从群众中吸取有教养的分子，并利用他们去反对居于等级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己。公社的普选制还把从前存在过的国家的神秘性和特殊性消除了。它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从而能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

三、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民族统一政权

公社是如何组织起全国统一的政权机构的呢？根据巴黎公社制定的公社全国组织纲要的规定，公社乃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公社的全国组织纲要对此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象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

①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6页。

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① 这是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关于全国政权组织的一段论述。它的精神是：一方面，必须维护民族统一和体现这种统一的集中制（而不是集权制），即中央政府及其所保留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没有这，统一就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这种集中制又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不排斥广泛的地方自治。

在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十分强调民族的集中统一并坚决反对联邦制，认为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是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开展最有利的国家形式，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而联邦制国家则是把地方自私主义和分散主义固定下来并且丝毫也不能消除官僚政治弊病的国家形式。因此，他们在1848年3月制定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这个具体纲领中，第一条就是：“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② 1850年3月，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重又提出：“也如1793年在法国那样，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③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提法是出

---

①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5—37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

于对历史的误会，因为法国严格的中央集权制不是建立于1793年雅各宾专政时期，而是建立于1799年拿破仑政变以后。在整个大革命时期，法国实行的是一种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区自治制，各地方由人民选出的管理机构可以在全国统一的法律范围内自由行动。这种政权组织形式成为革命最强有力的杠杆。而拿破仑在雾月18日政变以后，立刻就把这种自治制取消，而代之以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它自始就是反动势力的工具。弄清了这个历史真相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抛弃了关于"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的观念，而认为无产阶级的未来国家形式应当是民主集中制的，即地方自治和集中统一相结合。

巴黎公社的经验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个思想的正确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公社是生产者的自治机关，但这种自治不仅不破坏民族的统一，民族统一反而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同时，作为民族统一的体现者的中央政府的集中权力也丝毫不排斥广泛的地方自治，并借助这种自治来消除任何官僚制度和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直到晚年，恩格斯仍然坚持这个思想，他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写道："应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现在的德国呢？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① "需要单一的共和国。但并不是象现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同1798年建立的没有皇帝的帝国没有什么不同。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镇，都有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权，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②

①②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5、276页。

四、公社是可以使劳动者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马克思指出，公社制度若不从经济上解放劳动者，它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且会成为一个骗局。“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①

在巴黎公社存在的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劳动者的经济政策。3月30日，公社取消了从1870年10月至1871年4月的一切房租，规定把已经付出的房金转作以后的预付房金，并且制止拍卖城市当铺里所有的典押物品。4月16日，公社命令登记工厂主停工的工厂，拟定把这些工厂的原有工人联合成一些合作社来开工生产的计划，并拟定把这一切合作社结成一个大联盟的计划。4月20日，公社废止了面包工人的夜工。4月30日，公社下令封闭当铺，因为这些当铺是专供私人用来剥削工人并与工人获取劳动工具和信用借款的权利相抵触的，等等。

公社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虽然还仅仅是初步的，但已经萌生了共产主义的幼芽。例如，公社所提出的把一切合作社结成一个大联盟的计划，就有着共产主义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请问诸

①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8页。

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①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证明共产主义决不是什么凭空想象、不可实现的东西，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本身的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要达到这个更高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经过一系列将把人和环境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但这个更高形式终究是要实现的。“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②

公社的经济法令虽然多数出自蒲鲁东主义者之手，但实际上它们却完全变成了和蒲鲁东主义正相反对的东西。蒲鲁东主义者对联合是切齿痛恨的，而公社的最重要的经济法令则是要组织把一切合作社都联合起来的大联盟。可见，只要一接触到真正的实际运动，空想社会主义的任何社会药方统统都要失灵，并且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恩格斯说：“公社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③

在文化教育方面，公社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改革。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公社诞生的第二天，成立了一个管理和组织教育改革的权力机构——教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是比较熟悉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4月2日，颁布了政教分离法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取消国家用于教会的开支。4月8日，公社又宣布“把一切宗教象征、神像、教义、祷告”从学校革除出去。这些给法国的反动资

①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9页。

③恩格斯：《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6页。

产阶级教育以有力的打击。同时，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当然，公社没有时间来改组国民教学（教育）；但是，公社消除了其中的宗教和教权主义成分，因而在人民的思想解放上开了一个端”。①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所经历的第一次胜利的考验，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光辉的日出。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国家和革命的原理。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无产阶级的斗争只是延期而已。马克思当时就预言：“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②一百多年来世界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马克思这个预言的正确。

---

①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74页。

②《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77页。

第六章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确立

1885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三版序言中说道："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获得了研究时间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个彻底的——象李比希所说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①

系统研究自然科学发展的成就并给予哲学的总结、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探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这一工作主要是由恩格斯进行的。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恩格斯没有最后地完成这项工作，但是，他在这个领域内所作出的巨大业绩和惊人成就，不仅提供了关于整个自然界的统一的辩证图景，而且对某些重大的理论自然科学问题作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阐述。恩格斯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页。

特别强调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运用辩证方法的问题，他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探讨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阐明，其观点和精神都是完全一致的。

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总结主要是在70—80年代进行的，它的成果主要反映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而前者并未脱稿，只是以论文、札记和片断的形式保存下来的。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科学发展成就的研究和总结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关怀和注意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的。马克思在青年时代（1839—1840年初）就曾三次研读过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写了《黑格尔自然哲学概略》；后来，他又写下了《数学手稿》，将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对数学问题的研究。从5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一直不断地谈到自然科学的问题，使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所谓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自然科学发展中的这些新事实占居着整个自然观的中心点，它们使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使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不由自主地倾向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1858年7月14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了他对细胞理论的评价问题。他说："请把已经答应给我的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寄来。目前我正在研究一点生理学，并且想与此结合起来研究一下比较解剖学。在这两门科学中包含着许多从哲学观点来看非常重要的东西，但这全是新近才发现的；我很想知道，所有这些东西老头子是否一点也没有预见到。毫无疑问，如果他现在

要写一本《自然哲学》，那末论据会从四面八方向他飞来。”他指出：“使全部生理学发生革命并且首先使比较生理学成为可能的主要事实，是细胞的发现：在植物方面是由施莱登发现的，在动物方面是由施旺发现的（约在1836年）。”①恩格斯还说：对比较生理学的研究，使对于人类的唯心主义矜夸开始受到最大的蔑视。因为到处都发现了人和其余哺乳动物在机体结构上完全吻合，从基本特征来看，这种一致存在于一切脊椎动物中间，而在较隐蔽的形式上甚至可以延伸到昆虫、甲壳动物和蠕虫等等之中。最后，在低级的纤毛虫身上，人们看到了原始简单的独立生活的细胞，这种细胞无论是同最低等的植物还是同高等动植物的胚芽以至人的卵子和精子，都没有明显的区别。

十九世纪40年代，由迈尔、焦耳、格罗夫、赫尔姆霍兹、柯尔丁等人几乎同时从不同的途径发现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一般结论。在这同一封信中，恩格斯也谈到了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这一伟大发现。他说：“会使老头子黑格尔感到很高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物理学中各种力的相互关系，或这样一种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机械运动，即机械力(譬如经过摩擦)转化为热，热转化为光，光转化为化学亲合力，化学亲合力转化为电（譬如在伏特电堆中），电转化为磁。这些转化也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回地进行。”②

恩格斯没有指名地谈到了英国人焦耳，说他证明了所有这些不同的力都能按照完全确定的量的比例关系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一定量的一种力相当于一定量的另一种力。于是恩格斯反问

①②《恩格斯致马克思（1858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337、337页。

道：这难道不是一个了不起的确实的例证，说明彼此对立的规定怎样地相互转化。恩格斯认为，能量转化定律的发现最终抛弃了旧的形而上学关于潜热以及诸如此类的错误观念，它表明自然界中整个运动的统一，现在已经不再是哲学的论断，而是自然科学的事实了。

1864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也作出了他对能量转化学说的哲学评价，他把格罗夫说成是当时最富有哲学精神的自然科学家。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的起源》一书，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论。他认为，生物界的一切物种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在他看来，生物的种，不是固定不变的。亲代与子孙，个体与个体都有差别，这些差别就是变异。然而，变异是生物的普遍的现象和共有的特性。达尔文认为，动、植物普遍存在着繁殖过剩的现象，因而造成了激烈的生存斗争。那种有利于生存的微小的变异，通过世代的遗传，得到积累和加强，逐渐发生性状分歧，最后形成适应新环境的新的物种，这就是“自然选择”。物种的产生和生物的进化就是通过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长期作用而实现的。这是生物界发展的客观规律。达尔文还认为，人类本身也是生物发展的结果，是从一种古猿进化来的。这样，便揭示出生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自然图景，彻底地抛弃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为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科学根据。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刚出版，他的关于生物进化学说的划时代发现，立即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极大兴趣，他们很快就对这本书进行了研究，并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马克思高兴地写道，尽管这本书还有着很多缺点，但它所包含的自然科学材

料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提供了事实的论证。他说：这本书，“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①差不多同时，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也作了类似的评价。他说，一般说来，达尔文的著作是卓越的。迄今以前，神学在生物学中还没有被摧毁，而现在这一点已经做到了。除此之外，至今还从未有过这样大规模地来证明自然界中的历史发展，何况还获得这样的成就。但是，恩格斯也批评了这本书粗鲁的英国式的方法。

1862年6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批评了达尔文学说的阐述方式以及其它一些缺点。他指出达尔文把马尔萨斯的理论应用于动植物界。他说：绝妙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世界中再度认识到生活在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中的英国社会。对于这一点，恩格斯也有过同样的批判。1865年3月，恩格斯在给朗格的信中说道：“在我第一次读达尔文的著作时，我也曾经由于他对动植物生活的描述同马尔萨斯的理论异常相似而感到惊奇。不过我得出了和您不同的结论，我认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来说，最可耻的是它还没有超出动物界的经济形式。”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就否认生存斗争是有机界发展的主要动力，在60年代他们一直在寻找新的发现，以便获得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但没有成功。后来，恩格斯才根据海克尔的“适应和遗传”的理论，详尽地解释了这一点。恩格斯认为，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和马尔萨斯的学说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生存斗争”这个公式，即使能够存在，也必

①《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12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1页。

②《恩格斯致弗·阿·朗格（1865年3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7页。

须严格限制在由于生物过度繁殖而引起的斗争范围内，这种斗争实际上是在植物和低等动物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发生的。但是，没有过度繁殖，物种也会变异，旧种会绝灭，新的更发达的种会代替它们，例如，当动、植物迁移到新的地域，那里的新的气候、土壤等条件就会引起生物品种的变异。"因此，海克尔的'适应和遗传'，用不着选择和马尔萨斯主义，也能够执行全部进化过程。"①

恩格斯认为，达尔文的理论（自然选择）只注意到过程的形式方面，而忽视了它内在的内容，即引起生物个体发生变异的真正原因。他说："达尔文赋予自己的发现以过大的作用范围，把这一发现看作物种变异的唯一杠杆，忽视了重复出现的个别变异的原因而注意这些变异普遍化的形式，这是一个缺点，是达尔文和大多数真正有所前进的人们所共有的缺点。"②"最近，特别是由于海克尔，自然选择的观念扩大了，物种变异被看做适应和遗传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适应被认为是过程中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被认为是过程中保存物种的方面。"③

达尔文的理论一经发表，就被一批资产阶级学者搬到社会中去，出现了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死死抓住了达尔文学说中的弱点，把生存斗争的概念作为解释社会生活及其发展的基本法则。他们的全套戏法不过是这样的：先是把资产阶级的竞争学说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然后又把它们从自然界重新搬回社会，这样一来，似乎就可以证明这些伪学者的

---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0页。

②③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76、77页。

论断已成为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恩格斯明确指出："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手段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手段和发展手段进行。在这里——在社会地生产发展手段的情况下——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完全不能应用了。……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单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差异极少的阶段，就内容更丰富和更深刻得多了。"①

1870年6月，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也不无讽刺地说到，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思考方法只有对于那些浮夸的、冒充科学的、夸夸其谈的不学无术者和思想懒汉才是值得置信的。

除了上述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然科学中的每一个发现和进步都给予密切的注意和极大的关心。在他们的朋友化学家肖莱马的帮助下，他们能够及时地了解化学领域中的每一个进步。60年代中期，德国实验化学家霍夫曼确立了化学分子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一切物体并不是直接由原子所构成，也不是直接分解为原子，它们是由原子所组成的化学分子所构成。因此，分子和原子一样，是物质结构的无限层次中已经被认识到的不同质的两个阶段。这个发现从理论上动摇了关于原子不可再分割的形而上学观念。然而这一点霍夫曼自己并不知道。他依旧抱着形而上学的观点，相信原子是不可分割的。1867年6月，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对霍夫曼的著作进行了评述。他说："霍夫曼的书已经读过。这种比较新的化学理论，虽然有种种缺点，但是比起以前的原子理论来是一大进步。作为物质的**能独立存在的**最小部分的分子，是一个完全合理的范畴，如黑格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1—292页。

尔所说的，是在分割的无穷系列中的一个‘关节点’，它并不结束这个系列，而是规定质的差别。从前被描写成可分性的极限的原子，现在只不过是一种关系，虽然霍夫曼先生自己时时刻刻都在回到旧观念中去，说什么存在着真正不可分割的原子。总起来看，这部书中所证实的化学的进步的确是极其巨大的，肖莱马说，这种革命还每天都在进行，所以人们每天都可以期待新的变革。”①

50和6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然科学所作的零星研究主要的就是如此。这些研究和评价为他们后来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总结作了一定的准备。这个异常艰巨而又极端重要的全面研究工作，主要是由恩格斯在70和80年代独自进行的。《自然辩证法》就是他在这一时期内的研究总结。

《自然辩证法》一书主要是恩格斯在1873年5月至1883年这一时期内写成的。在这期间，他仔细地阅读了关于自然科学的各个重大问题的大量文献，写成了十篇论文和一百六十九个札记和片断。写作的过程大致可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873年5月至1876年5月；第二个时期是从1878年7月至1883年3月。其中从1876年5月至1878年7月是由于进行《反杜林论》的写作而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但是在《反杜林论》特别是它的“哲学编”中，也集中反映了恩格斯这一时期内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所以《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的有关部分同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经典论著。

①《恩格斯致马克思（1867年6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9页。

第二节　自然科学和辩证法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人们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

在古代，人们看到了自然界的总画面，其自然观在本质上是正确的，然而，由于当时人们还没有条件对自然界的各个局部进行深入地研究，所以他们所看到的整体还是一个笼统的、模糊的整体，不能科学地、具体地说明自然界的发展。在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绝对统治下，自然界的一切都被认为是万能的上帝创造和安排的，自然科学的研究遭到了扼杀。

到了十五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近代自然科学也随之发展起来。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在他的《天体运行论》中提出了太阳中心说，给宗教神学以沉重的打击，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从哥白尼开始的这个时期，自然科学主要是处于搜集材料的阶段，是经验自然科学。当时，发展较快的是天文学和力学以及为它们服务的数学。其他学科正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而且发展得比较迟缓。物理学除光学有所发展外，对热、声、电、磁只有初步的研究；化学刚刚从炼金术中解放出来，还在信奉燃素说；矿物学还没有从地质学中分化出来，古生物学还根本不存在；生物学主要是搜集和初步整理材料，动物学和植物学仅仅作了粗浅的分类。总之，这时自然科学的发展还没有超出力学的范围。与自然科学的这种发展状况相适应，便形成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特点是：认为自然界是绝对不变的。就是说，它认为自然界的一切是从来如此的、永远如此的；万事万物只在空间上彼此并列着，并无时

间上的历史发展；如果说自然界有发展，那也只是物体的机械动作和它们动量的变换，其变更的原因还在于外力的推动。当时，科学家们对各种自然现象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是自然科学深入发展所必要的。然而，这种研究又容易使他们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思维方式，首先被十七世纪的培根引进了哲学，以后，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们又把这种思维方式固定起来，形成了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无论在政治经济学中或是在自然科学中，形而上学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马克思同那些平庸、自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形而上学观点相反，把恢复、拯救、改造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首要的任务。他的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出版，为成功地改造和应用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作出了范例。这对恩格斯的研究无疑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中，被改造了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样是理论的出发点。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就象在政治经济学中一样，必须是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所以这里的问题当然不是要保卫黑格尔的出发点：把精神、思想、观念的东西当作现实世界的本原。自然科学必须是从既有的事实出发，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和运动形式出发，必须坚持从事实中发现事物本身的联系，并尽可能用实验去证明，而不应象黑格尔那样用虚构的联系放到事实中去和任意地构造体系。但是，除开这一切外，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于自然科学如同对于历史科学一样，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恩格斯强调说："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和'今天在德国夸夸其谈的那些令人厌烦的、狂妄而又平庸的模仿者们'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重新提到使人注意的地位，并且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的，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①

在准备和撰写《自然辩证法》的过程中，作为理论上的准备，恩格斯重新研究了黑格尔关于辩证法所写的一切东西，特别是《逻辑学》和《自然哲学》。1874年9月，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他对《逻辑学》的最新研究，他认为自然科学家必须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恩格斯说："虽然大《逻辑》触及事物的辩证本质要深刻得多，自然科学家有限的智力却只能利用它的个别地方。相反，《全书》中的论述似乎是为这些人写的，例证大都取自自然科学领域并极有说服力，此外由于论述比较通俗，因而唯心主义较少。我不能也不想使这些先生免遭研究黑格尔本身的惩罚，所以说这里是真正的宝藏，况且老头子给他们提出了现在也还很伤脑筋的难题。"②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自觉地运用辩证方法，这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连串的重大发现所促成的客观趋势。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到了如此的程度，它再也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如果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自然科学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有其存在的理由，那末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辩证法就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②《恩格斯致马克思（1874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6—127页。

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科学部门到另一个科学部门的过渡，提供正确的说明方法。

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已经发展成为整理材料的科学，即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三大发现。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承认整个自然界的辩证统一性。

第一是由热的机械当量的发现而导致的能量转化的证明。自然界中所有无数起作用的原因，过去一直被看作是一个个彼此独立的不可解释的存在物，即各种所谓自然力，例如机械力，热、光、电、磁等物理力，化学的化合和分解力以及存在于生物体内的生命力，现在已经证明都是同一种能（运动）的不同的存在方式。它们在自然界中经常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并且某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总是相当于另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宇宙间各种自然力的辩证同一性，证明了自然界中一切运动的统一。同各种自然力一样，反映自然界的一切运动形式的范畴的固定性和孤立性也最终被打破了。

第二个发现是有机体的细胞。它是动植物体内的这样一种单位：一切机体，除最低级的以外，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产生出来的。由于这个发现，对一切生命物质的研究，如胚胎学、生理学、比较解剖学，才获得了巩固的基础。有机体产生、成长及其构造的秘密被揭开了，从前不可理解的奇迹，现在表现为一个由细胞的分化和繁殖所形成的有规律的过程。细胞的发现成为理解动植物界的一切现象和过程的内在统一性的坚实基础。剩下的问题是要进一步解释：存在于整个生物界中的千差万别的种，或

者说生物机体的无限差异性，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这个空白刚好由第三个发现填补起来了。由达尔文首先建立并加以系统论述的进化论解释了动植物在机体和形态上的统一性，它说明了生物机体如何从最初的简单形态由于不断的进化而发展出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态，直到人类为止。进化论不仅能够说明现存的动植物的种类和系列，而且也提供了基础来追溯人类精神的史前史，追溯人类精神是如何从简单的低级有机体的刺激感应性沿着进化的道路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一旦弄清了这个人类精神的前史，整个物质世界的辩证统一性就最后地得到了证明。

恩格斯说：有了这三个大发现，自然界的主要过程就得到了说明，就归结到自然的原因了。"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①

恩格斯认为，为了描绘出自然界的统一的图画，还得有两件事情要做。一件事是说明生命怎样从无机界中发生出来的，这就意味着用化学的方法从无机物质中制造出蛋白质来。另一件事是证明人类怎样从动物界中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要科学地说明人类和社会的起源问题。后一个问题几乎是恩格斯自己独自加以解决的，而对生命的起源与本质，他也作了极深湛的理论探索，他对于生命所下的定义和一系列理论阐明，至今仍有极重要的意义。

---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242页。

总之，自然科学的发展把人们又带回到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只有这样一个本质的差别：在希腊人那里是天才的直觉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是严格科学的以经验为依据的研究的结果，因而也就具有确定得多和明白得多的形式。"① 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引起人们在自然观上的多么深刻的变化，以至使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以及黑格尔的观点都显得陈旧不堪。无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自然界都还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而现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证明：自然界中的一切，从地上的物种到天上的星体，都有时间上的历史，都是有生有灭、变化不已的。

在自然界中，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极对立，那些过去被当做是绝对分明的界线和区别，现在都证明是不再存在的了。自然界中的一切对立和区别，虽然构成人们辨别和认识自然事物的基础，但是只有相对的意义。它们那些被设想的固定性和绝对性，只不过是被人们的狭隘的思维方法带进自然界的。"一切差异都会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会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对自然观的这样的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同样不知道什么僵硬的和固定的界线，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对立相互联系；这样辩证法是唯一在最高度地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①

正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为新的辩证法的自然观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基础：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恒的东西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久存在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的。自然界中的事物，不管一切对立和差别，都交织在相互转化的过程中。“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自然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这个过程的认识中。”②

固定的东西甚至在数学中也消失了。数学已经走到了这样的一个领域，在其中它不得不运用变数，而一旦有了变数，运动就进入了数学，于是，辩证法的应用就成为不可抗拒的了。就在微分和积分的运算中，即使很简单的关系，都采取了完全辩证的性质。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已经完全不能容纳自然科学与日俱增地提供的新材料，要精确地审定这些新材料，精确地把整个自然界以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现象当做统一的过程来描述，就必须应用辩证的方法，必须从它们的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普遍联系来加以考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4—85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页。

地发生的。”①

这一切说明了，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和仍然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之间存在着怎样尖锐的矛盾。正当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因而只有辩证法才能帮助自然科学克服理论困难的时候，科学家们却把辩证法和黑格尔学派抛在一边，继续沉溺于旧的形而上学。在他们中间流行着各种庸俗浅薄的折衷主义和机械论思想。海克尔作为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代表仍然坚持机械论和经验主义的立场，赫尔姆霍茨和耐格里则在自然科学中鼓吹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在英国，一批经验论的自然科学家竟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为现代降神术的牺牲品。自然科学家们都相信，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些侮辱哲学最厉害的人反倒作了最坏哲学的最坏和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如英国卓越的动物学家兼植物学家阿尔弗勒德·拉塞尔·华莱士，竟成了迷信奇迹的现代唯灵论的狂热鼓吹者。恩格斯把这种从经验主义者滑向唯灵论的典型现象叫做“两极相通”。这在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中是颇为一贯的现象。“它的始祖，备受称颂的弗兰西斯·培根，早就渴望他的新的经验归纳法被用来首先达到延长人的寿命，某种程度上的返老还童，改变身体的形态和容貌，把一个躯体换成另一个躯体，创造新的人种，获得腾空飞行和引起暴风雨的本领。他抱怨这种研究被人遗弃，他在他的自然历史中开出了制造黄金和完成各种奇迹的正式的方子。同样地，伊萨克·牛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5页。

顿在晚年也埋头于注释约翰启示录。因此，无怪乎近年来以几个决不是最坏的人物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竟似乎变成了从美国输入的招魂术和请神术的不可救药的牺牲品。”①可见，错误的东西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所以，经验主义轻视辩证法便要受到这样的惩罚，即使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不得不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

自然科学家所不应该忘记的是，那些把他的经验概括起来的结论是一些概念，而运用这些概念的艺术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和普通的日常意识一起得来的，而是要求有真实的思维。它必须学会掌握二千五百年来哲学发展所达到的成果，才能够既摆脱哲学唯心主义的影响，又摆脱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熟知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熟知各个不同的时代所出现的关于外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见解，对理论自然科学来说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为理论自然科学本身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准则。”②事实上，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总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

对此，恩格斯强调说：“人们蔑视辩证法事实上是不能不受惩罚的。人们可以对一切理论思维随便怎么样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人们就是两件自然界的事实也不能联系起来，或者对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不能了解。这里，问题只在于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错误地思维的最可靠的途径。”③

---

①②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46、62页。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辩证规律，所以现实发展和思维进程不是相互矛盾而是彼此一致的。这个事实不断加强着我们对理论思维的信念，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性，就在于它只强调思维内容应当起源于感性的经验，而忽视了从形式方面去研究思维本身的规律，因而不能在认识运动中发现辩证思维的规律。黑格尔哲学的功绩就在于：它在许多情况下和在极不相同的领域中，证明了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是类似的，同样的规律对于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适用的。而现代自然科学，则进一步把全部思维内容起源于经验这一命题加以扩展，以致把它的旧的形而上学的限制和公式完全推翻了。“由于现代自然科学承认了获得性的遗传，它便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每一个体都必须亲自去经验，这不再是必要的了；个体的个别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由它的历代祖先的经验的结果来代替。如果在我们中间，例如数学公理对每个八岁的小孩都似乎是自明之理，都无需用经验来证明，那末这只是‘积累起来的遗传’的结果。”①

统治着自然科学的另一种错误思想，是康德哲学的最坏的残余，即所谓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它给理论自然科学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与困扰。不可知论者不是从思维活动的结果和产物与现实世界符合与否来探究人类的认识能力，而是重复着康德的错误，企图从对认识工具的研究去确定思维所能达到的范围，把人类的视力等等的缺陷，当做认识所不能超越的界限，而这正是狭隘的经验主义思维方法所强加于人们的形而上学的界限。事实上，我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页。

们的正确地运用的理论思维，能够以我们的眼睛所获得的知觉为基础，证明蚂蚁看得见而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这就已经证明了人的眼睛的特殊构造并不是人的认识的绝对界限。同不可知论相反，“我们宁可从我们的思维已经探究到和每天还在探究的东西，来看我们的思维能够探究到什么。这从量上和质上来说是已经足够的了。”①

所以，当耐格里断言自然界中会有许多为我们的感官所不能觉察到的运动形式的时候，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诡辩，因为他否认了自然界的一切运动形式无不处于相互转化的过程中。任何运动形式，经过转化都能够成为我们感觉所及的对象。不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能最终地从不可知论所造成的思想困境中解放出来。

恩格斯说：“对缺乏逻辑和辩证法训练的自然科学家来说，互相排挤的假说的数目之多和替换之快，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哈勒和歌德）。这并不是自然科学所特有的，因为人的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而且，在历史科学中（哲学也包括在内）理论也是互相排挤的，可是没有人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例如，形式逻辑是没有意思的东西。——这种观点的最后形式——‘自在之物’。认为我们不能认识自在之物的这种论断……，第一，是离开科学而走到幻想里面去了。第二，它没有给我们的科学知识增添一个字，因为如果我们对事物不能加以研究，那末它们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了。第三，它是纯粹的空话，而且永远不会被应用。”②

旧的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已经不再适应科学发展

①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117页。

的现状了，虽然它在历史上有其存在的理由，因为必须先研究事物，然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然后才能考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形而上学总是把事物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而不是从它的发生和消灭、运动和变化中去研究。形而上学是关于事物的科学，而不是关于运动的科学。它把归纳和分类看做科学的最主要原则，把生物和非生物、动物和植物、这个种属和那个种属一概当做既成的事实来研究。形而上学把抽象意义下的同一律当做观察事物的基本原则：每一个事物永远和它自身同一，一切都是恒久不变的，太阳系、星体、有机体的物种都是如此。

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每天都有新的材料来驳斥这种观点。自然科学从细节上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包含着差别和变化，一个事物既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什么东西。抽象的无差别的同一性，只是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内和很短的时间里才有它适用的范围。对于综合的自然科学来说，无论在任何一个部门、抽象的同一性都是根本不够的，因为在这里同一和差别都不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是同一个东西的两极，它们只有在相互联结中，只有当差异性包含在同一性中，才具有真实性。所以，当自然科学已经从十八世纪的狭隘框子中冲破出来，当它研究的范围和视野已经发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从研究事物过渡到研究过程，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

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不是某种从外部强加于自然界的东西，它是由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所揭示出来的自然界的真实性质的反映。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

加任何外来的成分，因此，它在希腊人那里从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东西。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要求简单地回到希腊人的时代，因为两千多来年，虽然本质上是由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所统治，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哲学本身，都获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对于两千多年来的全部思想内容，不是简单地加以抛弃，而是要批判它的暂时的由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造成的错误的形式，以便从中吸取一切有价值的成果。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应懂得：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只有辩证法才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

第三节　物质及其存在形式

物质及其存在形式的问题，是确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物质到底是什么？它是怎样存在着？这个问题希腊哲学的创立者们曾企图在感性直观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但是，要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自然科学和哲学长期发展的成果。这一方面要有对各种自然力的本质的真正认识，以便把各种神和上帝从一切地方撵出去；另一方面依赖于对人脑的产物和活动方式作出系统的科学说明，以便从根本上阐明物质同精神的关系。恩格斯说：“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①

然而，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对于物质问题所进行的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8页。

考察和研究，主要是针对着当时流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恩格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物质这一概念作了如下的说明："作为物质的物质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把各种有形体地存在着的事物概括在物质这一概念下的时候，我们是把事物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和特定的、存在着的物质不同的作为物质的物质，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如果自然科学企图寻找统一的作为物质的物质，企图把质的差异归结为同一的最小粒子的结合上的纯粹量的差异，那末这样做就等于不要求看到樱桃、梨、苹果，而要求看到作为水果的水果，不要求看到猫、狗、羊等等，而要求看到作为哺乳动物的哺乳动物，要求看到作为气体的气体、作为金属的金属、作为石头的石头、作为化合物的化合物、作为运动的运动。"①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者借口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物质和运动。当然，对于抽象的物质和运动我们不可能看到或体验到，只有各种不同的、现实地存在着实物和运动才能够看到和体验到。物质概括各种实物的总和，这个概念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我们用物质这个概念把许多不同的、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依照其共同属性把握住。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恩格斯反对旧原子理论把原子看做不可再分割的最小物质粒子和构成整个宇宙大厦的最小砖块的形而上学观点。恩格斯指出，"物质在质上绝对同一的理论"是一种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但是人们不可能从经验上去驳斥它，正如不能从经验上去证明它一样。他根据化学分子理论的确立不仅论证了原子的可分割性，而且论证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根据当时物理学中的流行的观点，恩格斯把物质分割的无穷系列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156页。

中的更小粒子假定为以太粒子或以太原子。他说："原子决不能被看作简单的东西或一般来说已知的最小的实物粒子。撇开愈来愈倾向于原子是复合的这一观点的化学本身不谈，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断言：作为光辐射和热辐射的媒介的宇宙以太，同样地是由分立的粒子所组成，但是这些粒子是如此地小，以致它们对化学的原子和物理的分子的关系就象化学的原子和物理的分子对力学的物体的关系一样，也就是象d^2x对dx的关系一样。这样，在这里，在现在流行的关于物质构造的观念中，我们也有了二次微分；每个人只要高兴，都完全有理由设想自然界中一定还存在着和d^3x，d^4x等等相似的东西。"①

恩格斯从质量关系的辩证观点出发，认为物质是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构成物质分割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非连续的部分是各种不同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决定一般物质的各种不同质的存在形式。根据这个观点，必须辩证地看待物质的可分性问题。就是说，物质既是无限可分的和连续的，也不是无限可分的和连续的。例如，在化学中，可分性是有一定的界限的，超出了这个界限，物体便不再能够起化学作用了。

恩格斯指出，物质永远存在于运动中，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所以，运动和物质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永远不能把物质和运动分割开来考察，运动即是物质本身存在的方式，而不单纯是它的特性。运动能够通过物质的相互作用而发生转移，但是运动的转移就是物质本身的变化和过程。恩格斯对运动下了一个一般的定义："运动，就它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

---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162页。

方式、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起直到思维。”①

恩格斯认为，宇宙间的运动具有无限的丰富性，物质存在的质的无限多样性，正是运动形式的无限多样性的反映，正如不能把物质归结为它的某种最简单的形式一样，也没有任何一种运动可以被认为是最简单的运动。但是，正如在自然物体中存在着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系列一样，在自然界的各种运动之间也存在着这种相应的系列。从简单的位置移动到复杂的思维之间经历了一个从一种运动向另一种运动依次转化的发展过程。

根据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所提供的材料，恩格斯概括了物质运动的几种基本形式。

恩格斯说：“研究运动的本性，当然必须从这种运动的最低级、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并且先学会理解这些最低级的最简单的形式，然后才能对更高级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有所阐明。所以我们看到：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中最先形成的是关于简单的位置变动的理论，即天体的和地上物体的力学，随后是关于分子运动的理论，即物理学，以及紧跟着物理学、几乎和物理学同时而且有些地方还先于物理学发展起来的，是关于原子运动的科学，即化学。只有在这些关于统治着无生命的自然界的运动形式的各知识部门达到了一个高度的发展以后，才能有成效地去着手阐明显示生命过程的各运动进程。在阐明这些运动进程方面前进的步伐，是与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进步成比例。”②

所谓机械运动，即物体的单纯的位置移动，是一种最常见最

①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页。

普遍的运动形式，一切运动都包含着物质的较大或较小部分的位置移动，所以，认识机械运动就成了科学的第一个任务。但是，机械运动并不是构成一切运动的基本形式，仅仅用位置移动显然不能解释自然界的一切质变和飞跃。热是一种分子运动，但是，我们却不能仅仅用分子的某种位置移动来详尽无遗地说明热现象。简单的位置移动，为一切运动形式所固有，某种运动形式愈高级，这种位置移动就愈微小，就愈是处于从属的地位。研究位置移动常常是研究各种运动的开始，但它决不能把有关运动的性质包括无遗。

恩格斯特别批判了想把一切运动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的形而上学观点。他指出："甚至格罗夫也'十分强烈地倾向于去相信物质的其他性状……是运动（机械运动——引者注）的样式或者最终会化为运动的样式"。①这样一来，其他运动形式的特殊性就被抹煞了。从低级的运动形式到高级的运动形式之间存在着无数的质变和飞跃，它们之间显然存在着的联系并不能抹煞它们彼此间质的区别和特殊性。高级运动形式和低级运动形式之间的联系首先在于：低级运动常常以扬弃的形式包含在高级运动中，不过它们是以次要的形式居于从属的地位，因而不能决定高级运动的本质。恩格斯说：每一个高级运动形式总是必然地与某个现实的机械的运动相联系，"正如高级的运动形式同时还产生其他的运动形式一样，正如化学作用不可能没有温度变化和电的变化，有机生命不可能没有机械的、分子的、化学的、热的、电的等等变化一样。但是，这些次要形式的在场并没有把历次的主要形式的本质包括无遗。终有一天我们会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

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学的运动；但是难道因此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①

恩格斯根据辩证法的观点认为生命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他对生命运动下了一个重要的科学定义，说：“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②一切有机体的生命现象都表现在蛋白体从自己周围摄取其所需要的适当的物质，把它们吸收和同化，而把体内其他比较老的部分分解并排泄出来。这种通过吸收和排泄而实现的新陈代谢过程，是蛋白体所固有的自我完成的过程。因此，作为蛋白体的存在方式，生命的特征就表现在：蛋白体在每一瞬间既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这种运动形式和无生命物体内的变化不同，它不是由某种从外面造成的过程所引起的。

恩格斯认为，宇宙间一切现象的统一性就在于各种物质运动形式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形形色色的现象形态都可以归结到运动这个总名称之下，这些形式本身，以其所特有的作用，表明自己是同一运动的不同的形式。他进一步指出：“运动的形式的变换总是一个至少要在两个物体之间发生的过程，这两个物体中的一个失去一定量的一种质的运动（例如热），另一个就获得相当量的那一种质的运动（机械运动、电、化学分解）。因此，量和质在这里是双方地和相互地适应的。直到现在还不能做到在一个单独的孤立的物体内部使运动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③因此，各种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

①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77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88页。

的原因。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才能了解事物的现实的因果关系。整个自然界是由各种相互作用的物体所形成的总体，这些物体之间的错综交织的相互作用就构成永恒不息的宇宙运动。

恩格斯关于运动的质的不灭性的原理具有重大的意义。从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可以直接得出：运动的量是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的。但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运动不灭性的原理不仅有量的方面，而且有质的方面。他说："运动的不可灭性不能仅仅从量上，而且还必须从质上去理解；一种物质，如果它的纯粹机械的位置移动虽然具有在适当条件下转化为热、电、化学作用、生命的可能性，但它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这些条件，那末这样的物质就丧失了运动；一种运动，如果它失去了使自己转变为和它相适应的各种不同的形式的能力，那末即使它还具有潜在力，但是不再具有活动力了，因而它部分地就被消灭了。而这两者都是不可想象的。"①

恩格斯批判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物质在其无限存在的整个时期只有唯一的一次有可能分化自己的运动，展现这个运动的全部丰富内容，在这以前和以后，则永远只局限于单纯的位置移动。

这无异是说，除去单纯的位置移动而外，运动是会死亡的。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继续为创世说保留地盘。恩格斯指出，运动的转移和转化当然只有在各种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能发生。但是，这些条件由于物质的普遍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不断地从物质自身中产生出来。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转化，就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

为一种更新的运动形式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例如，在地球上出现了化学运动形式，就为向生命的过渡创造了条件。形成我们太阳系的炽热原料，也是按自然的途径即通过运动的转化而产生出来的。相互作用和转化是运动着的物体本身所固有的，由此而产生的进一步转化的条件，也必然要被物质本身一再地产生出来。因此，运动形式的转化和转化的条件是同时出现的。

宇宙间的一切运动形式，仅具有相互转化的可能性，而且在各种适当的场合和条件下同时也有现实性。整个物质世界在任何一个瞬间都不会失去任何一种运动形式，运动着的物质连同它的全部丰富内容永远处在具有无限规模的循环之中。恩格斯指出："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还是物质，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不会丧失，因此，物质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上毁灭自己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另外的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①

恩格斯对运动和静止、平衡的辩证关系的阐明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在肯定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之后，又指出了运动和平衡的辩证统一。他说："平衡和运动是分不开的"。运动是平衡中的运动，平衡是运动中的平衡。天体的运动以相对静止的轨道为条件，生命运动以整个机体的持续平衡为条件，如此等等。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运动表现于它的反面，即表现在静止中，并且必须从静止中找到它的量度。例如，从物体的静止质量和它所经过的距离可以确切地计算出它运动的量度。从运动和静止的关系来看，绝对和相对的界限也是相对的，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相对之中有绝对。相对静止和平衡的重要性，正在于它是任何运动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恩格斯说："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本质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本质条件。"①

根据上述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对象作了最深刻的说明。恩格斯说："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离开运动，离开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就谈不到物体。物体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中，在物体的运动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②物质不能脱离运动而存在，物质只是在运动中才获得自己的规定，一定种类的物质只有在运动中才能显示它的特殊的属性，因为它的性质是从它所具有的运动形式得出来的。

因此，自然科学的进步，就表现在人们关于物质运动的形式获得愈来愈丰富的知识。那末，离开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及其相互关系而认识所谓物自身的企图，是空洞的形而上学和徒劳无益的幻想。

从这里可以得出科学分类的客观依据。既然"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彼此相属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科学分类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里。"③

①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149—150页。

②《恩格斯致马克思（1873年5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7页。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随着新的运动形式愈来愈多地被认识，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也愈来愈在细节上得到证明，因而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就出现了。这种整体化的趋势要求对整个自然科学作百科全书式的概括和综合。但是，这种概括和综合不应根据各门自然科学的外表上的顺序排列，而必须依据物质运动形式本身所固有的内在次序加以排列和分类。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转化必须是自我完成的，自然而然的。“正如一个运动形式是从另一个运动形式中发展出来一样，这些形式的反映，即各种不同的科学，也必然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①

物质存在于永恒和绝对的运动中，同时物质的运动又处于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之中。空间和时间同样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恩格斯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②。

空间和时间同物质和运动的概念一样，是人的思维的抽象的产物，它们是从一切现实存在的事物所固有的空间特性和时间特性中抽象出来的。一个事物必须具有空间的特性，它才能成为在空间上可量度的。当我们说一物和另一物有一个距离，这个距离（一定的长度）就表示它们之间的空间关系。但是同一个长度，也可以用来表示其他两物的距离或空间关系。这样一来，空间就成了某种离开一切具体的物体而独立的东西了。然而，事实上一切物体要能够成为在空间上可量度的，决定于它本身具有空间的特性。如果我们说语音A和桌子之间有一个距离，这句话是没有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6—57页。

什么意义的。因为前者显然不具有空间的特性，从而不适于用空间尺度去衡量它。我们说某物存在于空间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某物具有空间的特性，因而它可以用空间的尺度加以衡量。

在这里，“空间”一词可能包含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它指某一事物的具体的空间特性，这种特性是可以凭经验感觉到的；另一方面它又可能指事物的一般空间关系，这是由某种作为第三者的普遍尺度加以衡量的。时间的情形也是一样。因此，在时空问题上，必须善于把事物和事物的概念区别开来，即把现实的空间和现实的时间同空间和时间一般概念区别开来。

经验论者不懂得这个区别，当他们在研究抽象东西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在感性认识的领域内。他们总是陷入幻想，要求感觉和体验到纯粹的空间和时间。正如人们不愿意看现实存在的事物，而要看物质本身、运动本身一样。事实上，无论是真正的空间还是真正的时间，都是一种纯粹的抽象。例如，如果我们要把握十分纯粹的、和一切外来的不相干的东西的混入分离开的时间概念，我们就不得不把所有在时间上同时或相继发生的各种事变当作与此无关的东西放在一旁，设想一种其中不发生任何事情的时间。恩格斯指出：“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没有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存在的空洞的观念、抽象。”①

恩格斯指出：空间和时间都是无限的。但是，无限性是一个矛盾，所以，形而上学者不能接受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概念。然而承认物质世界的有限性必然引起更多的矛盾，而且是荒唐的矛盾。在反驳杜林的过程中，恩格斯对无限性的概念作了辩证的阐明。他说：“杜林先生永远做不到没有矛盾地思考现实的无限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性。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种种矛盾。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这已经是矛盾，可是事情就是这样。物质世界的有限性所引起的矛盾，并不比它的无限性所引起的少，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任何消除这些矛盾的尝试都会引起新的更坏的矛盾。正因为无限性是矛盾，所以它是无限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止境地展开的过程。如果矛盾消灭了，那就是无限性的终结。"①无限不存在于有限之外，而是存在于有限之中，通过有限而存在。有限之为有限，正在于它不能结束过程的系列，而只能构成系列中的一环。所以，从有限到有限的过程，乃是一个无限进展的过程。离开有限的东西而抽象地思维的无限性，如设想宇宙事物的无限多样性必然具有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这种"恶无限性"，只是以被扬弃的形式包含在辩证思维中。无限性的真正本质只有通过揭示其内在的矛盾才能确切地证明和表述出来。

第四节 从自然界向社会的过渡

在《自然辩证法》中，包括了恩格斯的一篇卓越的科学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论文解决了黑格尔曾企图解决但实际未能解决的问题，即自然界向社会的过渡是怎样实现的。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最先天才地提出了人类通过劳动而自我创造和自我生成的思想。马克思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改造了黑格尔的这一思想，逐步形成了实践的观点，作为他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恩格斯继续运用黑格尔和

---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6页。

马克思首先提出的观点，在当时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所提供的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独创地解决了关于人类起源的重大的科学问题。恩格斯的这篇论文和他不久以后写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历史科学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成功地解决历史科学中的重大问题的典范。

根据唯物主义和进化论的观点，恩格斯首先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他说："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就和猿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言语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达的基础就奠定了，从此就形成了人和猿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手的专门化——这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异于其他动物的人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①

人类的发生最初是完全按照自然的规律进行的，当这一过程进行到一定点的时候，在人的动物祖先中就出现了某种具有决定性的新因素，它使人开始突然地从动物界分离出来。正是这一因素构成了全部人类历史的起点和由以发展的基础。一旦确立了这个起点和基础，就获得了理解人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的钥匙。恩格斯的功绩就在于对此作了科学的令人信服的论证。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但是劳动还远不止是如此。它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在某种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8页。

意义上必须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 恩格斯指出，人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不断地和新的动作相适应，而获得愈来愈大的灵巧性，并引起了肌肉、韧带甚至骨骼的特别发展，在遗传的作用下，人的手才逐步达到了愈来愈高度的完善。

和劳动在一起的是语言。人的发达的语言是在劳动中并随着劳动一起发展起来的。劳动从一开始就具有的社会性，使语言的产生成了直接的需要。而随着劳动的发展愈益增强的人对自然界的统治也不断扩大了人的眼界。这二者构成了产生人的语言的最初的动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同时，这种需要也产生了自己的器官：原来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增多，逐渐地沿着一定的方向而得到改造，并且终于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

在劳动和语言的共同作用下，人的能思维的器官——头脑也跟着发展起来了。

对此，恩格斯明确地指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它们是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人脑和猿脑虽然十分相似，但要大得多和完善。和脑的进一步发育相并进，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育起来了。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必然伴随着听觉器官的相应完善化一样，脑的发育也总是伴随着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②

在人的头脑以及为头脑服务的感官的直接作用下，产生了愈来愈清楚的意识，首先是对于个别实际效益的条件的意识，然后是

---

①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5、299页。

对于制约着这些效益的自然规律的意识。在这个基础上，人的头脑所特有的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也愈来愈快地发展起来。这一切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人的意识和思维，他能获得的越来越丰富和深刻的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迅速地增加着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新手段。“如果人的脑不伴随着手、不部分地借助于手相应地发展起来的话，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汽机来的。”①

手、发音器官和脑髓，是人之为人的主要的特征。人的一切动作和行为都是在这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和完成的。由于它们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并实现愈来愈高的目的。劳动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复杂、完善和多样化，由狩猎而后出现了畜牧，跟着畜牧的产生，农业也发展起来了，农业之后又有了纺织、制陶和冶金等等。同手工业一起产生的是商业，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人的活动的分化，整个社会生活的分化，最初是紧随着劳动的分化而进行的，但是愈到后来，它们离开这个基础愈远，就愈感到劳动的手生产较为简易的产品越来越退到了次要的地位。而且，早在原始的家庭中，一些人就已经能够不是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过别人的手来完成自己的头脑所计划的劳动了。于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活动和发展。在法律、政治和宗教产生和发展起来以后，人脑的产物就开始牢牢地统治着人们的全部生活。人们不再能够记起思维连同它的全部器官的起源和发祥地，却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的灵性、而不是实际的需要来解释自己的行为。“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代世界没落的时候起，就统治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着人的头脑。”①

有了人，就开始有了历史。动物虽然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进化的历史。但是人的历史却和动物的历史根本不同，人的全部历史都是自己创造的。人离开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自然界的盲目力量对人的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人们预定的目的就愈相符合，或者说，人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获得自由。这种获得自由的道路始终是在扩大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物质生产劳动在人类没有进入自由王国以前，始终是人类最重要的历史活动。只要人类的最主要的历史活动，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即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生产，还被不可控制的力量即无意识的作用所左右，人就不可能达到完全自由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不仅如此，自由王国，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存在于真正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马克思说：“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2页。

已；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①

了解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联系，就能认识到自由并不在于人们在想象中脱离自然界，而在于人们根据对自然界必然性的认识来实际地支配自然界。因此，它是人本身发展的产物。我们必须记住，既然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因而我们对自然界的统治，决不象征服者对待异民族那样，可以站在它之上和之外来实行这种统治，而必正确地认识和运用自然界的规律。自然规律、历史规律和思维规律，并不是彼此独立和不相关联的东西，它们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并且，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在其最普遍的形式上服从于同一种规律，即唯物辩证法的规律。

第五节　自然界的辩证法

恩格斯说：“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②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

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和形而上学不同，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和现象看作孤立的、静止的、自身绝对同一的，而是看作普遍地相互联系的、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和变化中的。因此，辩证法得出了和形而上学完全不同的规律。形而上学把抽象意义上的同一律当作世界观的基本原则，辩证法则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对立统一规律"。恩格斯认为，若是从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等方面去考察，就不得不承认在一切事物的本质中都必然包含着矛盾。恩格斯说："当我们把事物看做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① 如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恰好就是运动。形而上学者不理解运动的本质，不理解运动和静止的关系，因为矛盾在这里挡着了他们的路。

恩格斯认为，一切自然过程都有两个方面，它们建立在至少是两个互相作用着的事物、力量或趋势的关系上，建立在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上。恩格斯根据黑格尔的论断并概括了自然科学的大量事实，认为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说，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是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虽然它决不能把各种运动的特殊性质包括无遗。一切运动都和某种位置移动相联系，因此它们也都存在于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中，自然界的一切运动只有在吸引和排斥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2页。

或者最后互相抵消、或者完全互相分离的情况下，才会停止。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这两种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恩格斯说："辩证法根据我们直到现在的自然科学实验的结果，证明了：所有的两极对立，总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彼此的相互作用；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含摄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含摄，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这样，无论是排斥和吸引的最终的抵消，或是一种运动形式最终分配在一半物质上而另一种运动形式最终分配在另一半物质上，就都不成为问题了，因而无论是两极互相贯穿（即相互抵消和中和——引者注）或是绝对分离，也都不成问题了。"①

恩格斯强调指出："作用不完全互相补偿的两极决不是极，并且直到现在为止在自然界中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极。"②人们既不能使一条磁石的两极互相中和，也不能使它们绝对地分开。如果把一块磁石切断，原来呈中性的中央便两极化了，而原先的两极对立却依旧不变。所以，凡是有吸引的地方，它都必定被排斥所补充。

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事实上我们愈来愈不得不承认这种必然性：物质的分割有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吸引变为排斥；相反地，被排斥的物质的凝聚也有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上，排斥变为吸引。"③

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已经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就更加包含着矛盾。有机生命及其发展首先就是下述矛盾的表现：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

---

①②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7、131、143页。

"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都既和自己同一，而又和自己相区别，这是由于各种物料的吸收和排泄，由于呼吸，由于细胞的形成和细胞的死亡，由于进行着循环过程，一句话，由于无休止的形成生命的分子变化的总和，而其总的结果则一目了然地出现于各个生命阶段——胚胎生命，少年，性成熟，繁殖过程，老年，死亡。"①生和死是存在于有机体中的一对矛盾，科学的生理学把死亡——生命的否定看作包含在生命之中的重要因素。辩证的生命观就在于：把生命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本身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察。懂得了这一点，关于灵魂不死的任何说法就都站不住脚了。

进化论揭示了，有机生命发展的历史是在连续产生同时又不断自行解决的矛盾斗争中一步一步地前进的。由于海克尔扩大了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的观点，把物种变易看做适应和遗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进一步深刻地揭示了生物进化的规律。它证明了："从简单的细胞开始，怎样由于遗传和适应不断起作用的斗争而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进化到人。"②

恩格斯还指出：作为生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进化和退化是必然互相关联着的，"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化同时又是一个退化，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向的发展的可能性。"③

恩格斯批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机械地割裂开来，以便时而强调它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在达尔文以前，这些资产阶级制度的辩护士们所强调的正

①②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9、83、290页。

是有机界中的和谐的合作，强调植物怎样给动物提供食物和氧，而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肥料和二氧化碳。而在达尔文的学说刚被承认之后，他们便立刻到处只看到斗争。针对这种片面和偏狭的错误思想，恩格斯指出："自然界中无生命的物体的交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交互作用则既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把片面的'斗争'写在旗帜上。但是，想把历史的发展和纷乱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生存斗争'这样一个干瘪而片面的词句中，这是完全幼稚的。"①

前面已经说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刚一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对这本书中所阐明的进化论思想表示由衷的高兴，另一方面对于它的阐述方法又表明了批判和保留的态度。他们共同认为，"生存斗争"的公式是片面而贫乏的，它根本没有涉及到生物进化过程中重复出现的个别变异的原因，而只是强调了这些变异普遍化的形式。因此，这个公式即使只应用在自然领域中也是极其片面的，把它推广到社会中去就更是错误的了。无论在社会中或在自然界中，既不存在单纯和片面的斗争，也不存在单纯和片面的和谐和合作。自然界中一切物体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既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一切自然现象和过程的普遍性形式，是支配整个自然界的最普遍规律。

作为自然过程之抽象反映的数学也是充满矛盾的。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被看作是一回事。一切旧有公式的僵硬性和绝对性都被打破

---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1页。

了，平行线不再被认为在一切条件下都是平行的了，而在眼前相交的两条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认为是平行的。如在解析几何中，曲线的臂可以无限地伸直，却不能完全变成直线。恩格斯说："当直线和曲线的数学差不多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一条新的几乎无穷无尽的道路，由那种把曲线视为直线（微分三角形）并把直线视为曲线（曲率无限小的一次曲线）的数学开拓出来了。"①

在自然界中，到处都表现了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对立的每一方都在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经常改变自己的同一性，直到完全转化为自己的反面。一切自然现象无不在对立中运动，正如电和磁始终是在它们的两极中运动一样。因此，自然科学家绝不可固执一面。正和负、阴和阳、东和西、南极和北极，不仅彼此联系不可分离，而且可以直接看做彼此相等的东西。正电和负电，可以互易其名称，而不影响事物的性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正和负。也能够颠倒过来叫：在电学等等中；北和南也一样。如果人们把这颠倒过来，并且把其余的名称相应地加以改变，那末一切仍然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称西为东，称东为西。太阳从西边出来，行星从东向西旋转等等，这只是名称上的变更而已。此外，地磁的北极所吸引的磁石的真正南极，在物理学中我们就称它为北极，而这完全是无关重要的。"②

由此可见，把矛盾看作背理并企图把它从逻辑思维中驱逐出去的形而上学观点，是彻底违背自然界的辩证本性的。形而上学固守着直不能曲、曲不能直的僵硬观点，思维于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把同一和差别、原因和结果、现象和实质一概视为固定的对立和一成不变的。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坚持一切范畴的流

①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86页。

动性，认为在一切两极对立的范畴中，一极已经作为胚胎存在于另一极之中，一极到了一定点就转化为另一极。整个逻辑都是从前进的各种对立中发展起来的。这种辩证法的逻辑被黑格尔弄成了神秘的东西，因为他把范畴看作先于存在的东西，把现实世界的辩证法看作思维的逻辑过程的反光。事实刚刚相反，头脑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的运动形式的反映。

一切对立的范畴，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都会发现，它们既是彼此对立的，又是不可分离的，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的时候，它们才保持其对立的意义。但只要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大到和世界整体相联系来考察，这两个对立的观念就流动并且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此地是结果的东西，在彼时彼地就变成原因，反过来也是一样。

形而上学所陷入的另一种对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对立。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习惯于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做永远互相排斥的东西。一种现象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而不可能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二者并列于自然界中，科学的任务似乎就在于把两类现象分开。因为只有必然性才被说成是在科学上唯一值得注意的东西，而偶然性则被认为是对科学无足轻重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人们能够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知道的东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人们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不知道的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都是能够不予理睬的。这样一来，一切科学都完结了，因为科学正是要研究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①在自然科学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2页。

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倾向：一种是从法国唯物主义传到自然科学中去的机械决定论的观点，力图用根本否认偶然性的办法来消灭偶然性，按照这种观点，在自然界中一切都是必然的。另一种观点虽然承认偶然性的地位，却把它们置于科学认识的范围之外，归之于不可解释的超自然的原因。

辩证法和以上两种观点相反，提出了全新的命题。它认为："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根据，而且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它也就没有根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① 这好象是奇怪的文字游戏，似乎和自然科学的精确表达格格不入，但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却日益证明它是不可辩驳的真理。进化论的例子就说明这一点。恩格斯指出："达尔文学说必须证明为黑格尔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内在联系的论述在实践上的证明。"② "达尔文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指《物种的起源》——引者注）中，是从最广泛地存在着的偶然性的基础出发的。正是那些在个别的种内部各个个体间的有无限的偶然的差异，正是那种增大到突破种的特性，并且它的近因只在极其稀少的情况下才可能得到证实的，无限的偶然的差异，使达尔文不得不对直到当时生物学中一切规律性的基础，对直到当时一直处于形而上学的僵硬的和不变性中的种的概念提出疑问。……偶然性推翻了人们至今所理解的必然性。必然性的原有观念失效了。把它保留起来，就等于把人类任意作出的自相矛盾并且和现实相矛盾的规定当作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因而就等于否定有生命的自然界中的一切内在必然性，等于一般地宣布偶然性

①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4、289页。

的混沌王国是有生命的自然界的唯一规律。”①

作为两个对立的范畴，形式和内容也是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在自然界中，生物有机体的形态发展是和它的生理机能密切相关和互相制约的。古生物学和地质学证明，对生物遗骸形态的系统研究，可以确切地描述生物进化的历史及其所达到的阶段。正如恩格斯所说："整个有机的自然界是在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或不可分离性的一个不间断的证明。形态学的现象和生理学的现象、形态和功能是彼此交互制约的。形态（细胞）的分化决定物料分化为肌肉、皮肤、骨胳、表皮等等，而物料的分化又决定分化了的形态。”②

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考察了自然界中的质量关系的辩证法。

恩格斯说，在自然界中，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可以这样来表示：质的变化只有通过物质或运动（能量）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自然界中一切质的差别，或是基于不同的化学成分，或是基于运动（能）的不同的量或不同的形式，或是——差不多总是这样——同时基于这两者。所以，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所考察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③

作为一切自然物体的两种不同的规定性，质和量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自然科学中的形而上学和机械观把质上不同的事物看作是从来如此和一成不变的。因此它宣称现实的质的差异是科学所不能认识的，因为科学既不能说明具有不同质的事物的最初的起源，也不能说明它们之间的真实关系。正如在达尔文以前人们不

①②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5、288、76页。

能说明生物学中的所谓“不变的种”一样。按照形而上学的观点，一切质的差异只有在能够归结为量的差异时才能够说明。事实上，在自然界中，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种被认为是不可理解的在质上不同的或绝对不同的领域。一切不同质的物体之间存在着有规律的联系，即使如人和陨石这两种极不相同的物体，但在此二者之间还有一个无限系列的其他自然物和自然过程，使我们有可能把从陨石到人之间的整个空白填补起来，从而使它们之间的质的差别成为可以认识和可以说明的。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把握质和量的辩证关系。一切不同质的事物，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转化而联系起来。

黑格尔首先阐明了度量关系的交错线或关节点，在这一点上，纯粹的量变会立刻引起质的变化。例如，在把水加热或冷却的时候，沸点和冰点就是这种关节点，在这种关节点上，在标准大气压力下，温度的增加或减少会立刻引起进入新的聚集状态的飞跃，因此，在这里量就转变为质。自然界中的每一种事物都有这样的关节点。例如，每种气体都有其临界点，在这一点上一定的压力和冷却能使气体变成液体。物理学中的所谓常数，大部分是这样一些节关点的名称，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引起该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这就是说，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

必须承认自然界中变化和发展的飞跃形式。“不管一切渐进性，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①单单量变的渐进性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千差万别的质的差异。所以对物质的纯粹量的分割有一个极限。到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72页。

了这个极限它就转化为质的差别。物体虽是由分子构成的，但它在本质上却不同于分子；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但分子的性质也不同于原子。在物质分割的无限系列中，存在着同样无限多的质变的关节点，因此，物质的质的差异决不能仅仅归结为它们的单纯量的差异。恩格斯指出，化学虽似乎已经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用原子体积和原子量的关系来说明元素的一系列的化学属性和物理属性，但是没有一个化学家敢断言：某个元素的一切属性都可以用它在洛塔尔·迈耶尔曲线上的位置完全表示出来，单凭这个位置就能说明，例如，碳借以成为有机生命的主要承担者的那些特殊属性，或磷在脑髓中的必要性。象机械论所做的那样，"如果质的一切差异和变化都可以归结为量的差异和变化，归结为机械的位置变化，那末我们就必然要得出这个命题：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同一的最小的粒子所组成，而物质的化学元素的一切质的差异都是由量的差异，即由这些最小的粒子结合成原子时在数目上和在空间排列上的差异所引起的。"①

恩格斯认为，否定的否定规律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他说，否定的否定，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每日每地都在发生的过程。他证明了，否定的否定真实地发生于有机界的两大界中，动、植物个体的生命过程及其物种的进化都表现为一种不断重复和循环的否定的否定过程。而全部地质学则是一个被否定了的否定的系列，是旧岩层不断毁坏和新岩层不断形成的系列。

恩格斯指出，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的一种方法把它消灭掉。真正的、自然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

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否定正是一切发展的推动力，是在既得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达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这是在更高的阶段上达到的。“但是，现在也出现了一种恶劣的、没有结果的否定（指杜林所讲的否定——引者注）。……这种没有结果的否定是纯粹主观的、个人的否定，它不是事物本身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由外部硬加进去的意见。由于从这种否定中不能得出任何结果，所以作这种否定的人就必然与世界不和，必然要放肆地非难现存的和以往的一切，非难整个历史发展。”① 辩证的、客观的否定，必须按照事物本身的性质来进行，它是按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特殊方式而进行的“自我否定”；它构成事物发展的必然环节，而不是破坏和中断这种发展。

所以，“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我不仅应当否定，而且还应当重新扬弃这个否定。因此，我做第一个否定的时候，就必须做得使第二个否定可能发生或者将有可能发生。……因此，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②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然界里，同样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正象在历史上这些规律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事变一样；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③

---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73—674页。

②③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5、13页。

第六节 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逻辑方法

经验的自然科学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就成为十分必要和无可避免的了。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然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已经不中用了，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同时，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

在研究了自然界的辩证性质之后，恩格斯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的方法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是完全不够的，只有辩证的思维才是强大的认识工具。自然界的合理性对于希腊人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但最愚蠢的经验主义还企图从经验上来一点一滴地加以证明。他们为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所局限，不能上升到理性思维的高度，但恰恰是理性思维才是人所独有的。恩格斯认为，黑格尔把思维区分为悟性和理性，这是有一定意义的。整个悟性活动，即普通逻辑所运用的一切认识手段，如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等，就种类来说，是

人和高等动物所共有的，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但以研究人的概念的本性为基础的辩证思维，只对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才是可能的，而它的充分的发展还要晚得多。

所谓辩证的思维，就是人们自觉地反映并加以运用的现实世界的辩证规律。正如恩格斯所说："所谓客观的辩证法是支配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的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种对立，通过它们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化或转化到更高形式，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①

辩证思维否认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抽象的同一性，否认事物及其反映——概念之间的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承认一切概念在本质上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恩格斯说："正是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和不能解决的两极对立，正是那些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类的区别，使现代的理论自然科学带上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相反地，它们那些被设想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则只不过是被我们人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大量积累的自然科学的事实迫使人们达到上述的认识；如果有了对辩证思维规律的领会，进而去了解那些事实的辩证性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种认识。无论如何，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②

在生物学中，建立在旧的归纳法基础上的种、属、纲等等概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17页。

念，由于进化论的发现而变成了流动的和相对的了。所以，定义对于科学来说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为它们永远是不充分的。唯一充分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历史发展，但这已远远不是定义了。恩格斯说："自从我们接受了进化论的那个时刻起，我们关于有机体的生命的一切概念都只是近似地和现实相适应。否则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哪一天有机界的概念和现实绝对符合了，发展的终结也就到来了。鱼这个概念的内涵是在水中生活和用鳃呼吸；如果不突破这个概念，您想怎么能从鱼转到两栖动物呢？而这个概念已经被突破了，我们知道一系列的鱼，它们的鳔已经发展成肺并且可以呼吸空气。如果不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这两个概念中的一个或两个都和现实发生冲突，您想怎么能从卵生的爬行动物转到能生育活生生的幼儿的哺乳动物呢？"①

概念和概念关系反映了现实世界的有规律的发展，因此，它们不是彼此孤立、互相并列的，而是互为中介和相互转化的。概念在思维中的排列和发展，只是事物在现实中的关系及其历史发展的反映而已。自然界也有自己的历史，这种历史依其必然的规律反映在概念的逻辑体系中，不过在抽象的形式上摆脱了现实历史中起纷扰作用的偶然性因素。"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而它在辩证的思维中，就象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概括在必然性中。"②只要现实的历史永远不终止其发展，概念的变化和运动也永远不会停顿下来。概念和现实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把概念变成僵化和孤立的东西，就是把它和现实分离开来。

①《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5年3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518页。

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

概念和范畴是如此，判断也是如此。“辩证的逻辑和旧的仅仅形式的逻辑相反，它不象后者那样满足于把思维的运动的各种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相反地，辩证的逻辑使这些形式一个从另一个地推导出来，不把这些形式互相平列在一起，而使它们一个隶属于另一个，它使高级形式从低级形式中发展出来。”①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把判断分为四类，即实在的判断（这里是肯定地或否定地表明某一单个的事物的某种一般的性质），反省的判断（这里所表明的是关于主语的某种关系规定、某种关联），必然性的判断（这里表明的是主语的实在的规定性），概念的判断（这里表明的是主语对自己的一般本性符合到什么程度）。他对判断所作的分类是和他把逻辑分为三部的思想是一致的。黑格尔说：“我们借以规定各种不同的判断的原则，即逻辑理念的普遍形式（个别、特殊、普遍的思维形式——引者注）本身。依这种看法，我们便可获得，三种主要的判断恰好相当于‘存在’，‘本质’和‘概念’三个阶段。其中第二种主要判断恰好相当于本质的性格，亦即相当于差别的阶段，使得这一阶段自身又得到了重新表述。”②

恩格斯肯定了黑格尔关于判断分类的合理性，指出这种分类反映思维本身的发展过程，即从个别的判断上升到特殊的判断，然后再上升到普遍的判断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人类认识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恩格斯指出，这种分类方法的内在真理性和内在必然性是明明白白的，它不仅以思维规律为根据，而且还以自然规律为根据。他以摩擦生热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在实践上，史前的人已经知道了摩擦生热这个简单的关系，由于同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②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44页。

样的过程无数次地重复，不知经过了若干千年，终于在人的脑子里形成了这样一个判断：摩擦是热的一个源泉。这是一个实在的判断。然后又经过了几千年，到了1842年，迈尔、焦耳和柯尔丁等人才根据对若干类似过程的研究，把这一命题加以扩展，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一切机械运动都能借摩擦转化为热。这是一个全称的反省的判断。此后不久，1845年迈尔就把上述特殊的反省的判断，提高到普遍的必然的判断：在对每一情况来说是特定的条件下，任何一种运动形式都能够而且也必然直接或间接地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这是判断的最高形式。第一个判断记录了单独的事实：摩擦生热。第二个判断展示了一个特殊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在特殊情况下转变为另一个特殊的运动形式(热)。第三个判断是普遍性的判断：任何运动形式都证明自己能够而且必然会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这样，这个自然规律便获得了自己的最后的表达形式，虽然由于新的发现，将会不断地提供更新、更丰富的内容，但在普遍性方面它是不可能再扩大了。

辩证逻辑要求把各种推理形式：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有机地结合起来。“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依赖着的。人们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设法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人们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①经验主义者片面地强调归纳法而贬低演绎法，认为只有归纳法是不会出错误的方法。归纳派把归纳和演绎对立起来，否认演绎也是一种必要的推理形式，不了解归纳一般地不能离开演绎。他们把演绎放在了从属的地位，认为应当先从个别上升到特殊，然后上升到普遍，在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页。

这之后，才容许那应当继续下去的演绎推理。这样就把归纳和演绎变成了推理过程的两极，而不懂得在归纳过程中就已经包含着分析和演绎。恩格斯讥笑归纳万能论者说："用世界上的一切归纳法我们都永远达不到把归纳过程弄清楚的程度。只有对这个过程的分析才能做到这一点。"①

事实上，"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②没有分析和演绎，单靠归纳法永远不能从经验的观察中得出普遍的和必然性的认识。纯粹从个别东西开始的推理形式只是实验性的，它不是以得出某种普遍性的新知识为目的，而是以验证某种已有的知识为目的，把存在于经验中的个别的东西和存在于思维中的普遍的东西相比较。所以黑格尔认为，甚至归纳推理一般说来，也是从A（普遍）—E（个别）—B（特殊）开始的。

由于归纳法把作为分类标志的事物的特征和属性看作孤立的和静止不变的，因而随着进化论的发现和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归纳分类的结果就到处被新的事实所推翻，生物学中的种、属、纲等等的概念由于进化论而日益变成流动的和相对的了，而相对的概念是不能作归纳推理的。与此相联系，所谓纯粹以归纳为基础的演绎推理也同样成为不可靠的了。事实上，由于进化论的成就，有机界的全部分类都脱离了归纳法而回到"演绎法"，即回到根据亲缘关系来分类，从而证明一个种属是如何由于亲缘关系而从另一个种属"演绎"出来的。可见，进化论即发展的学说是反归纳法的。归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121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6页。

纳法确认鱼类是一种专门用鳃呼吸的脊椎动物，然而，出现了一些动物，这些动物具有鱼类的公认特征，但是它们除去鳃，还有很发达的肺。其实经过进一步研究就可以发现：每一条鱼在鳔中都有着潜在的肺。当海克尔断言歌德运用归纳法发现了人也有颚间骨时，恩格斯指出，从通常没有颚间骨的人推出一定有颚间骨，这只能是错误地运用了归纳法。① 恩格斯说："当每天都有新的事实发现，推翻全部旧有的归纳法的分类时，海克尔恰恰在这个时刻狂热地维护归纳法，这又恰好表明了我们的这些自然科学家的思考力的特色。黑格尔曾经说归纳推理本质上是一种或然推理，这个命题多么好地得到了证明！"②

对于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必然规律，归纳推理只是推理的初级形式，认识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对事物及其过程进行解剖和分析。所以，细胞的发现和比较解剖学的创立，为生物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对于化学来说，分析是主要的研究形式。与此相适应，从前占主要地位的归纳推理就过渡到较高的推理形式——类比推理。为了表明热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为机械运动，十万部蒸汽机并不比一部蒸汽机更能证明这一点。但要揭示这一过程的内部秘密，它的内在必然性，则必须通过分析，以便在纯粹的形式上把握住蒸汽机中热转化为机械运动的基本过程，以及热的机械当量。卡诺接近于做到了这一点，但他用的不是归纳法，而是分析和类比。但是恩格斯又指出，分析和综合是必然互相联系的。他认为，在有机体中部分和整体已经是愈来愈

①按照海克尔的意见，歌德先由归纳法得到了这样一个论点："一切哺乳动物都有颚间骨"，然后就由此得出演绎的结论："因此，人也有颚间骨。"后来，这个结论为实验材料所证实。恩格斯认为海克尔所谈到的归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同公认是正确的论点（即"人"这种哺乳动物没有颚间骨）相矛盾。

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

不够的范畴，任何部分都不能离开整个，并且自身即是一整体。种子的萌芽——胚胎和生出来的动物，不能看做是从“整体”中分出来的“部分”。黑格尔就说过：“一个活的有机体的官能和肢体并不能仅视作那个有机体的各部分，……只有在解剖学者手里，这些官能和肢体才是些单纯的机械的部分。但在那种情况下，解剖学者所要处理的也不再是活的身体，而是尸体了。”①同时，“以分析为主要研究形式的化学，如果没有分析的对立的极，即综合，就什么也不是了。”②

恩格斯一反经验主义者(牛顿)的论断，强调假说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他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直到现在对和它同类的事实的说明方式成为不可能的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个，修正另一个，直到最后纯粹地建立起定律。如果人们要等待建立起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那末这就是在此以前要把运用思维的研究停顿下来，而定律也就因此永远不会出现。”③

对假说作出验证的是实践。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并不能充分地证明必然性，如休谟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人类的活动中，在实践和劳动中。人的活动、实践乃是因果观念的基础。机械论的一个重大的缺陷是它忽视了人本身的活动对于思维的影响。恩格斯说：“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作为自然界的自然

①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82页。
②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页注①、117页。

界；而人的智力是比例于人学会改变自然界的状况而发展的。"①

机械论者断言："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这是把有限和无限割裂开来了。恩格斯认为上述命题应该倒转过来："我们在根本上只能认识无限的东西。"②事实上，我们用规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的正是自然界中的普遍性的形式。而普遍性的形式是自我完成的形式，因而是无限性的形式。这就是说，思维通过抽象把许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无限的东西。

然而思维成果的无限性和绝对性，都是通过一个无限的渐近的进步过程而实现的。因为一方面对无限东西的认识需通过纯粹有限的东西来进行，另一方面具有无限认识能力的人的思维是由无限多的有限的人的头脑所组成。因此，在每一特定的情况下，我们的思维成果既是无限的、绝对的，又不是无限的、绝对的。

所以，在辩证逻辑中，真理和谬误也是在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它们的对立只是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才是绝对的。恩格斯说："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做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③

列宁曾经说过："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

①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105页。

③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99页。

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①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确立，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唯物主义辩证法应用于对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研究的丰硕成果，是他们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一部分。

①列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58页。

第七章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

巴黎公社失败后，各国资产阶级对第一国际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法国的工人运动一时转入低潮。然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德国，工人运动却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开始从法国移到了德国。

十九世纪70年代初，巴枯宁及其党徒不仅利用公社失败后“国际”的困难处境，组织宗派团体，召开会议，配合资产阶级的进攻，加剧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而且还公开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德国，由于拉萨尔派机会主义的影响，工人运动陷于分裂状态。1875年，处境困难的拉萨尔派被迫同埃森纳赫派实行合并，然而，他们却把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塞进了新的党纲草案。为了维护工人运动的团结统一，保证它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健康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进行了反对巴枯宁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

第一节　批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

巴枯宁集团是第一国际后期所有宗派集团中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工人运动危害最大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这个派别的头子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出生于俄国维特尔省新托尔若克县的一个贵族家庭，1840年赴德国学习和研究哲学，受到黑格尔、谢林等人的哲学思想和魏特林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848—1849年，巴枯宁曾在奥地利参加革命，革命失败后被当地政府逮捕并被判过死刑，1851年引渡回到俄国。回国后，巴枯宁向沙皇递交了《忏悔书》，乞求赦免，但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61年逃亡欧洲，1864年在伦敦见到马克思，口头上表示愿为国际贡献力量，然而，巴枯宁实际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十九世纪40年代，在他的思想里已有无政府主义观点的萌芽，到6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反映处于无权地位、生活毫无保障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的思想情绪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便形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他系统地宣扬绝对的自由与阶级平等，反对一切政治运动，反对一切国家，反对一切权威。不仅如此，他还于1868年建立了无政府主义的宗派组织——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不久，他名义上解散了同盟，让其成员分散地钻进第一国际。巴枯宁在第一国际中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阴谋夺取总委员会的领导权，在1872年第一次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1876年在伯尔尼逝世。巴枯宁的主要著作有：《德国的反动》（1842年）、

《上帝与国家》（1870—1871年）、《德意志皮鞭帝国和社会革命》（1871年）、《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1873年）等。

为了批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其唯心史观，恩格斯写了《论权威》（1872—1873年）、《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1873年），马克思写了《政治冷淡主义》（1873年）、《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1874—1875年）等著作和信件，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批判，揭露了它的唯心主义实质，同时正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自由与平等、国家与革命、以及权威等问题的观点。

一、批判巴枯宁的"绝对自由"和"普遍平等"的谬论，指出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是消灭阶级

深受英国葛德文（1756—1836）、德国施蒂纳（1806—1856）和法国蒲鲁东（1809—1865）等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巴枯宁，虽然自称为唯物主义者，实际上坚持的是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就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基础上的。他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把人类历史看做是从动物性状态向人性状态过渡的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动物性奴隶状态——神性的奴隶状态——自由状态。第一阶段，是尚未摆脱动物界的原始时期；第二阶段，是受宗教和国家奴役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摆脱了任何权力的人们无组织的自由社会。他认为，人类历史正在向第三阶段前进，因而"革命"的政治纲领应该是立即"爆炸"一切国家，反对一切权威，实现绝对自由和普遍平等等永恒原则。

巴枯宁和蒲鲁东等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竭力鼓吹无条件的绝对自由。1865年，巴枯宁曾经在意大利组织无政府主义的秘密团

体——国际革命协会，他在为这个协会起草的纲领中宣称："自由是一切成年男女无须求得任何人批准而进行活动的绝对权利，他们只听从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理性的决定，他们的行动只能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人的理性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的良心是正义的基础，个人的自由和集体的自由是人类秩序的唯一创建者。"① 巴枯宁还在《巴黎公社和国家概念》(1871年)一文中说明，他所崇拜的自由，是没有其他界限的、不为全体人员的自由所限制的自由，是"在普遍平等之下的自由"，是"战胜权力原则的自由"。巴枯宁的这种要求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实际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幻想，因为不仅在阶级存在和国家尚未消亡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绝对的个人自由，就是当阶级消灭和国家消亡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也不可能有绝对的个人自由。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观，正是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出发点。为了要求这个无限制的绝对自由，他不仅反对资产阶级国家，而且也反对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切权威，认为这些都会妨碍其绝对自由。

巴枯宁还认为，正如个人都应该是绝对自由的一样，每个公社、每个乡镇，也应该是自治的，甚至他还主张在第一国际中的每个支部都应该是自治的，不受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在每个支部中的每个成员也应该是自治的，不受任何纪律约束，不要任何权威原则。这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谬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②

①巴枯宁：《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见《巴枯宁言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73页。

②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页。

巴枯宁认为，要实现这种绝对自由，必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无条件的平等。因而，他又提出“平等是自由的绝对必要条件”。他还进而公开鼓吹所谓“实现各阶级和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①对此，马克思批判说：“各阶级的平等，照字面上理解，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拚命鼓吹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②恩格斯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③

二、批判巴枯宁反对一切国家的谬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揭示国家消亡的经济条件

在国家问题上，巴枯宁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鲜明地表现出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对立。

巴枯宁的国家观，集中地反映在他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他认为，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必须无条件地反对一切国家。他从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对内关系两个方面说明废除国家的必要。从国家的对外关系看，他认为，国家的存在就会破坏整个地球上人们的团结，因为“现代国家，按其实质和目的来说，必然是军事国家，而军事国家也必然会成为侵略的国

①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12页。

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民主同盟中央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3页。

③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17页。

家；如果它自己不侵略，那它就要被侵略”。①从国家的对内关系看，他认为国家就意味着统治和剥削、压迫。他非常赞同蒲鲁东的观点：“国家只有一个使命——在经济上庇护特权阶级对人民劳动的剥削”，“谁谈论国家政权，谁就谈论着统治，但任何统治都是有以服从于这一统治的群众存在为前提的，因此，国家是群众的敌人。”巴枯宁无条件地反对一切国家，“宣布自己是任何政府权力、‘国家’权力的敌人，是一切‘国家’结构的敌人”。②巴枯宁这种无政府主义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根本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它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只有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劳动群众才处于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状态，而在无产阶级占统治的国家里，劳动群众当家作主，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只是对那些反对无产阶级政权的阶级和分子才实行专政，因此，必须区别不同性质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方针。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是地主、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而对待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则是坚决维护它、巩固它，并运用它来创造社会经济条件，达到最后国家消亡。

巴枯宁从反对一切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出发，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然而，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根源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本身，而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他认为，正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使某些人拥有大量的资本；国家又用继承权等法律手段巩固和扩大了私有制，造成社会阶级的不平等。因此，他认为，废除继承权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他设想：在欧洲只需要靠

①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俄文版，第14页。

②参见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88页。

少数“革命者”，通过自发的暴动，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能消灭一切国家。而只有消灭了国家，资本才会随之自行消灭。

这完全是把事情弄颠倒了。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罪恶根源是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要消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首先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马克思在关于继承权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继承权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在法律上的反映，继承法并不是把一个人的劳动果实转移到别人口袋里的这种剥削制度的原因，而是一种结果，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如果生产资料从私有财产转变为公有财产，那时继承权就会自行消亡，因此，“继承权的消亡将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改造的自然结果；但是废除继承权决不可能成为这种社会改造的起点。……承认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只能意味着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那实行攻击现代社会真正应持的阵地。……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①

恩格斯也批驳了巴枯宁的谬论。他说：“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

①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页。

方式的改造。”①

巴枯宁从反对一切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出发，还极力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的国家。他咒骂“革命专政和国家政权……都是反动的”②，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难堪的、最令人屈辱的管理，它尽管具有一切民主的形式，但将是实实在在的专政”③。1871年的巴黎公社，正是法国工人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的尝试，公社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而巴枯宁却颠倒黑白，胡说什么巴黎公社革命是无政府主义的胜利，认为：“它（指巴黎公社——引者注）是对国家的大胆的明确的否定。”“巴黎为了法国、欧洲、全世界的自由和生活而抛弃了自己的桂冠，热情地摈弃了自己的权力！”④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巴枯宁的这些反动观点，从理论上充分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马克思明确指出：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后，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因为“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

①《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0页。

②③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见《巴枯宁言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25、332页。

④巴枯宁：《巴黎公社和国家概念》，《巴枯宁选集》俄文版第4卷，第252页。

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过程。”①马克思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性：“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还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指出国家的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国家是“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将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代替，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将由对人的统治到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直至国家自行消亡。

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观上的对立，也作了全面的论述。列宁指出：“（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在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目的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新的由武装工人组织组成的公社式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应当用什么去代替它以及怎样运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认革命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政权，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利用现代国家准备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则否认这一点。”③

①②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4、639页。

③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9页。

三、批判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的谬论，论证权威乃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反对一切权威，这也是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的反权威主义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那部《上帝与国家》（1870—1871年）著作中。巴枯宁的反权威主义思想，也是以历史唯心主义作为其思想基础的。他认为，“历史正是人的人性的发展对于人的原始的动物性的不断否定。”①“创造出一切构成人身上的人性”的是人“比其他任何动物具备两种更高级的宝贵能力——思想的能力和反叛的欲望。”②而“思想”就是“科学”，“反叛”就是“自由”。根据这种以抽象人性论为出发点的唯心史观，他认为：“一切权威都是虚假的、专横的和极其有害的”③，“任何由官方强加于人的权威和任何权利的影响，都会直接变成压迫和虚伪”④，因此，他叫嚷“我们否认一切立法，一切权威，一切特权的、特许的、官方的和法律的影响”⑤。巴枯宁在反权威主义的旗号下，竭力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权威，反对马克思主义，甚至对马克思进行人身攻击，胡说什么马克思活动的目的是“要建立他在国际中的专政，而通过国际又建立对整个欧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专政。”⑥

为了批判巴枯宁的这些反动观点，恩格斯于1872年10月写了《论权威》一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了权威的作用与实质，驳斥了巴枯宁主义者反权威主义

①②③④⑤巴枯宁：《上帝与国家》，见《巴枯宁言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13、212、222、223、223页。

⑥转引自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03页。

的谬论，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革命的学说。

恩格斯认为，权威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所要求的，它在任何社会里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它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和表现形态。

在进行具体分析时，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生产，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一定的服从，是不可能进行的。无产阶级推翻了资本家的统治以后，权威也不会消失。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成了生产的主人，但是也需要各种规章制度、统一的指挥和纪律，否则生产便无法进行。他说："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①在这里，恩格斯提到了生产活动中的领导和管理问题。每个劳动部门，参加劳动的人的意志，总要服从于一定的管理和领导的权威，这是大工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说："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②

针对巴枯宁主义者反对任何政治权威的谬论，恩格斯还具体论证了在政治生活领域中权威的必要性。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是靠资产阶级专政来维持的，无产阶级要想获得彻底的解放，就必须打倒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威，同时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权威，即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说：反权威主义者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他们"要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

①②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552页。

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① 恩格斯还举出巴黎公社为例说明：“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②

恩格斯在总结他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说：“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③

巴枯宁把一切政治权威看成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看成绝对好的东西。根据他的自治论，每个公社、每个地区，甚至于每个人，都应该是自治的。“在这个社会中（即巴枯宁设想的未来的理想的自治社会——引者注），首先是不存在任何权威，因为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没有一个做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开动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这一点他们当然没有告诉我们。）多数对少数的权威也将终止。每一个人、每一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但是，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

①②③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4页。

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①

必须指出，巴枯宁一方面反对别人的权威，另一方面却又要树立自己的权威，总想要其他人承认自己是国际的领袖。他一方面反对国际总委员会的政治权威，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树立他的宗派阴谋组织“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权威。他一方面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威，另一方面却竭力树立他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权威，把它吹嘘为改造世界的灵丹妙药，妄图以无政府主义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

然而，历史的发展恰恰与巴枯宁主义者的愿望相反。正是由于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荒谬，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忽视工人的日常斗争，以及70年代以后欧洲工人运动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合法斗争广泛开展并取得巨大成就，这些便促使无政府主义思潮日益衰落，无政府主义者结果成了脱离无产阶级斗争的小宗派。

1876年巴枯宁死后，他的一些信徒先后脱离了巴枯宁主义的宗派组织，在一些问题上和在一定时间内支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到70年代后期，巴枯宁主义已经彻底破产。

第二节　批判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理论

十九世纪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还批判了拉萨尔主义。拉萨尔主义是十九世纪60年代初德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右倾机会主

①《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1页。

义。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出生于德国布勒斯劳市的一个犹太绸缎商家庭。他生活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德国工人运动兴起的时期，早年曾在柏林大学学习哲学，成为黑格尔哲学的信徒。1848年他参加了德国的民主运动，并于同年秋认识了马克思。1850年，企图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遭到拒绝。60年代初，他投身德国工人运动，并于1863年担任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拉萨尔自称是"马克思的拥护者"，但他只是剽窃和篡改马克思的学说，在工人运动中推行机会主义路线。他曾同俾斯麦暗中勾结，妄图与普鲁士王朝结盟来反对资产阶级。1864年8月，他为争夺一个贵族的未婚妻进行决斗而死。拉萨尔的著作有：《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弗兰茨·冯·济金根》（1859年）、《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1859年)、《黑格尔逻辑学和罗生克兰茨的逻辑学以及黑格尔体系中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础》（1860年）、《既得权利体系》(1860年)、《工人纲领》（1862年）、《公开答复》（1863年）、《巴师夏-舒尔茨·逢·德里奇先生，经济学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1864年）等。

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理论是相当系统的。他宣扬"劳动是一切产品的唯一源泉"，抹煞自然界对劳动的制约性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要意义；提出"铁的工资规律"，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主张把"全部劳动所得给予工人"，认为只要改变分配方式，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他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通过合法斗争取得普选权，从而使普鲁士王国变成"自由国家"，然后依靠这个国家发放贷款，帮助工人建立和推广生产合作社，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从而使整个社会进入自由、幸福的境界。恩格斯指出拉萨尔的社会主义不过是

"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①，马克思向拉萨尔详细地解释和证明过："认为'普鲁士国家'会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那是荒谬的。"②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观点，是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他从黑格尔的唯心论出发，把国家看成是超阶级的永恒的机构，认为"国家的方针就是积极地发展和不断地完善人类的本质；……就是朝着自由的方向教育和发展人类。"③

十九世纪7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高涨，无产阶级迫切要求统一自己的力量，以便共同对付敌人。1875年5月，以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和特耳克等人为代表的拉萨尔派，由于处境困难，被迫同以李卜克内西等为代表的爱森纳赫派一起在哥达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实行合併。然而，由于李卜克内西等作了不应有的让步，在他负责起草的纲领中充满了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观点。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马克思的1875年4—5月写成的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就是这一斗争的产物。由于当时党的领导人不敢公开马克思的这一著作，直到1891年，才由恩格斯公布问世。

《哥达纲领批判》第一次明确而坚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机会主义的理论与策略的方针和态度，并且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纲领，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

从《共产党宣言》到《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已经

---

①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观察家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56页。

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2页。

③拉萨尔：《公开答复，工人纲领》，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63页。

系统地制定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先后提出并解决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关于武装斗争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问题，以及关于用什么样的新型国家去代替被打碎了的国家机器的问题，等等。但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理论问题，在先前的著作中还没有系统地加以论述，这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得到全面阐明的。

一、剖析分配上“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和“平等的权利”，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

《哥达纲领批判》的第一部分，主要是批判拉萨尔派的这样一个观点：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为了论证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拉萨尔派援引了经济学上的一个似乎是公认的原理，即“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既然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因此工人就应当不折不扣地得到自己劳动的全部收入；既然劳动只能通过社会才能进行，所以劳动所得就应当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拉萨尔派的逻辑就是这样。马克思的批判着重针对这样两点：第一是“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第二是“平等的权利”。

为了弄清拉萨尔派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荒谬性究竟在什么地方，首先必须检查他借以引出这个结论的前提，即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所谓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不过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的拙劣的翻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商品，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财富的数量是由商品的交换价值量来表示的。由于衡量商品的交换价值只根据物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的时间，而不考虑任何

别的因素，于是人们便得出一种看法，认为劳动（即社会必要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竟被宣称为“关于生产财富的科学”。

但是，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拉萨尔在内）根据他们的价值学说，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弄明白：他们这里所说的“劳动”的性质究竟是怎样的？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虽然已经发现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但他们始终未能理解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是两种不同的劳动。只有马克思才第一个发现了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区别。马克思第一个阐明了在商品生产中创造使用价值的是具体劳动，而创造交换价值的则是抽象劳动。这种抽象劳动只是在商品生产的社会内人们相互交换其劳动的一种尺度。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社会内，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必然要以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但是要使各种劳动都能根据同一的尺度进行交换，就必须使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可见，抽象劳动只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物。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商品生产的废除，生产者之间的产品交换也必然会成为多余的，在这种情况下，创造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则不同，具体劳动是一切社会依以存在的基础。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混为一谈，不仅把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而且把创造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也看做是一切社会所必需的，这实际上就是把私有制和交换看做存在于一切社会的永恒现象，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看做永恒的自然法则。因此，他们总是笼统地谈论“劳动”和“社会”，而不具体说

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特殊性质以及资本剥削劳动的本质。

由此可见，当拉萨尔派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时候，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立场上说话的，他们所说的“劳动”和“财富”的含义实质上是指抽象劳动和交换价值，而不是指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因此，当拉萨尔派的首领硬把这个观点塞进德国工人党的纲领中去的时候，就造成了极大的混乱。马克思首先指出了，如果人们不是戴着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眼镜来看问题，那末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而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就不能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劳动只有和自然界一起才能创造使用价值从而成为一切财富的源泉。单纯的社会必要劳动可以创造价值，却不能创造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意义仅仅在于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使资本增殖。所以工人只有在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被允许进入工厂做工，从而获得最起码的生活资料。在相反的情况下，劳动力就变成所谓的“过剩人口”，被剥夺了劳动和生存的权利。劳动作为交换价值的源泉，似乎是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但是正是由于劳动的这个特殊性质，使得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成为受资本剥削的奴隶。马克思指出：“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从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中才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①

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页。

我们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拉萨尔派为了引出“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这个结论所依据的前提，即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个前提，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公式。就是说只有从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经营的角度来理解才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财富才体现为交换价值，并且由交换价值来衡量，从而包含在商品生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才是创造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而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消灭，商品生产被废除，财富就要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即纯粹由使用价值来构成。既然拉萨尔派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这个结论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公式中引伸出来的，因而它本身也就具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

实际上，拉萨尔派所极力鼓吹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不过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商品交换”原则的拙劣的翻版。在商品生产的社会中，生产者把自己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交换，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这种交换总是根据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来进行，如果除去一切偶然的情况，那末每个生产者交换的结果，就总是能够不折不扣地收回自己的劳动所得。因此，这里所说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是指包含在商品中的全部价值。在这个价值中应该包括那些部分呢？第一，包括已被消费掉的原料的价值；第二，包括由于生产工具等等的损耗以及各种辅助材料的消耗而转移到产品上去的价值；第三，包括在加工过程中新增添到产品上去的价值。毫无疑问，如果商品生产者在交换过程中不能全部收回这个价值，他就无法进行再生产，最后必然破产。由此可见，拉萨尔派的所谓“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正好是商品生产的社会中小生产者的经济原则。而拉萨尔派的首领却要把它当做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而且是作为第一个口号写在党的旗帜上。

马克思在驳斥拉萨尔派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这一口号的全部荒谬性的同时，详细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马克思首先指出，根据拉萨尔派也同意的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资料是公共财产，总劳动是由集体调节的。”因此，生产资料显然不能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假定拉萨尔派所说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是指集体劳动的社会总产品，那末在进入分配之前，首先就必须从其中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在作了这些扣除之后，社会总产品中剩下的部分就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但即使消费资料也不能全部都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其中还必须扣除：第一，一般的行政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只有经过这一切扣除之后，最后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个别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因此，“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变成“有折有扣的”了。

不但如此，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把“劳动所得”一语应用到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在商品生产的社会中，所谓“劳动所得”是指个体生产者所创造的那部分交换价值。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是共同占有，生产劳动是集体进行的，产品也不归个人所有，因而生产者之间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既然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已经废除，那末消耗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也就不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或者说，生产某一产品所消耗的劳动量就不再表现为用这一产品所能交换的别种产品的数量。而一旦产品不再用价值来计量，所谓“劳动所得”也就失去任何意义了。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别生产者的劳动是作为社会总劳动的一个构成部分而存在着的。社会总劳动创造出社会总产品，个别生产者根据他参加社会总劳动的数量的多少，在经过上述种种扣除之后，从社会总产品中领取相应的一份生活资料。这部分生活资料只是和他所付出的劳动量成比例，但不是和他所创造的价值成比例，因而也不是他的“劳动所得”。所以，十分明显，如果按照拉萨尔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别生产者“不满足于”他所领得的那一份生活资料，而去向社会要求他的“劳动所得”，这不是极其荒唐的吗？

马克思在揭露了拉萨尔派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荒谬性之后，接着就批判了他的所谓“平等的权利”。

所谓“平等的权利”或“公平的分配”，这些都是法权概念。离开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具体分析，而把抽象的法权概念作为规定社会主义分配的指导原则，反映了拉萨尔派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对此，马克思反驳道：“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吗？”①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②

为了考察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法权关系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生变化，马克思第一次研究了未来社会的发展过程，按照其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即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在经济上还没有得到高度的发展并且刚刚脱离旧社会制度的母体，因此资产阶级的法权关系还会作为残余

①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14页。

而存在，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才能完全脱离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但是，一旦消灭了资产阶级法权，也就同时消灭了任何法权，到那时，所谓“平等的权利”、“公平的分配”等等就都变成过时的废话。所以，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平等”和“权利”是彼此对立的。当还需要根据“权利”来实行“平等”的时候，“平等”也就总是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就不可能是实际的“平等”；而一旦实现了实际的“平等”，也就不会再有任何“权利”了。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进行了十分详尽的分析。

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时，马克思写道：“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可能一下子把资产阶级的法权都消灭掉，在消费资料的分配中资产阶级法权仍然会表现出来，即表现在按劳分配的原则上。马克思指出，按劳分配的原则和商品生产社会中等价交换的原则实质上是“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不过从内容和形式来说，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又有着重大的区别：第一，按劳分配是指生产者个人根据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的多少，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消费资料。这份消费资料只是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而不是相等，这就是说，社会给予生产者的报酬虽然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成比例，但不是完全相等，这和等价交换是不同的。第二，按劳分配虽然体现了等

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页。

量劳动相交换这一原则，但这种交换不是在生产者个人之间自发进行的，因而它既不由价值规律所调节，也不受市场法则的影响，而是以工资的形式由国家统一进行调节，这和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等价交换也是不同的。但是，尽管有这种种区别，按劳分配的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马克思说："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①

在实际上，人们的劳动和工作能力是不相等的，一个劳动者所要抚养的子女的多少也是不相等的。可是不顾这些实际的差别，消费资料的分配却仍然按照劳动这个同一的尺度来进行，因此，"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于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②要消除这种实际的不平等，就必须废除按劳分配这一原则本身。就是说，分配不应当按照任何同一的尺度来实行，而应当按照实际的需要来实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③这样一来，按劳分配就转变为按需分配了。

但这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是不能实现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

①②③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13、14页。

能，按需分配！”①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拉萨尔派的所谓“平等的权利”，实际上只能导致不平等，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带有资产阶级的狭隘内容，因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最终所要废除的。而拉萨尔派的首领出于资产阶级的偏狭眼光，却硬要把这样的口号塞进党的纲领，说明他们是多么荒谬。

为了总结在以上两个问题上所进行的批判，马克思特别指出了拉萨尔派重新鼓吹这类观点的反动性。他说：“我较为详细地一方面谈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谈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这是为了要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思，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空洞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②

二、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废除“铁的工资规律”，而是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哥达纲领批判》的第二部分，主要是批判拉萨尔派对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歪曲。在《批判》的第一部分里，马克思就已经指出了拉萨尔派观点中的一个突出的错误，这就是他把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在拉萨尔派的思想中，不是生产方式的性质决定分配，而是把分配看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就把社会主义了解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例如，在《哥达纲领》中，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者竟把“废除工资

①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4、15页。

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当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对此，马克思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马克思首先指出，把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说成是废除工资制度是不对的，应当说是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因为分配制度是由生产方式的性质决定的。他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①这就是说，一旦消灭了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也就同时被废除。

但是，《纲领》的错误主要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它要在废除工资制度的同时，也连同废除“铁的工资规律”。所谓“铁的工资规律”是拉萨尔的心爱的理论，正是这个理论，暴露了拉萨尔在经济学理论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实质。拉萨尔的这个理论，是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那里抄来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所谓“工资铁律”的论据。根据这一理论，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的速度总是要超过食物增长的速度。而李嘉图则从这一理论中引伸出一条规律，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平均工资必然被限制在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的水平上。如果工资长期高出这个水平，人口就要迅速增长，工人之间的竞争趋于激烈，工资就会重新落到这个水平上

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5页。

来。如果工资长期低于这个水平，人口增长的速度就将缓慢下来，工人之间的竞争就会趋于停息，工资就会回升到这个水平来。

拉萨尔照抄了李嘉图的这条规律，同时也就照抄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拉萨尔说："在现今的条件之下，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之下，决定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这就是在现今的条件之下，支配着工资的铁的无情的规律。""实际日工资不能长期地高出这个平均数，因为，否则由于工人的状况有所改善，工人婚娶和繁殖后代将会增加，工人人口将会增加，从而提供的人手也会增加，这就又一次把工资压到原来水平或低于原来水平。工资也不可能长期地大大低于这个必要的生活水平，因为，那时就会发生人口外流、独身生活、节制生育，以至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数减少，提供的工人人手也因而减少，从而使工资重新回到它原来的水平。"①

马尔萨斯极力把他的人口论说成自然规律。而如果这是正确的，那末，以这种人口论为论据的所谓"工资铁律"，就不仅应当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应当适用于一切社会，不管拉萨尔主义者怎样宣布废除它，也是废除不了的。

事实上，所谓"铁的工资规律"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捏造出来的理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规律也是有弹性的。保证资本增殖的需要，是工资规律的作用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在不致饿死的条件下所能忍受的贫困程度，则是其作用的最低限度。换句话说，工资增加的最高限额是资本家仍然感到有利可图，工资下降的最低限额是工人所能忍受的最大的贫困

①拉萨尔：《公开答复，工人纲领》，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3页。

程度。在这两个限度中间，决定工资高低的不是人口的自然变动，而是工人对资本家所进行的反抗和斗争。否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就是毫无意义的了。

然而，马克思认为，这一切还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问题是拉萨尔及其信徒根本不懂得工资的本质，并企图把他们对工资问题所作的资产阶级解释强加于工人党，在理论上制造混乱，在实践上开历史的倒车。根据拉萨尔的逻辑，废除所谓“铁的工资规律”，无非就是要改变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获得最低限度工资报酬的那种状况，使工资不再被限制在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后代所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水平上。这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的主张。

针对这种机会主义的论调，马克思进行了坚决的驳斥。他指出，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外表当做事物的本质。实际上，“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他们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①

我们已经知道，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就已经为各国工人政党明确制定了无产阶级

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页。

革命的经济纲领，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用来代替过去含义模糊的“劳动权”的提法。马克思说：“劳动权实际上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互间的关系。”①经过二十五年以后，德国工人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仍然企图用拉萨尔的改良主义公式来代替马克思的革命公式，这说明清除拉萨尔主义的斗争对于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是极为迫切而又意义深远的。

三、批判拉萨尔派的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策略路线，坚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路线

《哥达纲领批判》的第三部分，主要是批判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策略路线。简要说来，拉萨尔的全部政治策略就是：第一步，争取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权；第二步，依靠普选权经过合法手段把国家变为自由的人民国家；第三步，在国家帮助下建立生产合作社。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拉萨尔为工人阶级所要求的一切，不过是由国家资助成立生产合作社，这是在1848年以前追随马拉斯特的《国民报》的那一派巴黎工人的纲领的翻版，因此也就是纯粹的共和派针对路易·勃朗的‘劳动组织’而提出的纲领的翻版。正如我们看到的，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非常温和的。”②恩格斯的这段话指明了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十分反动的，它甚至比不上路易·勃朗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恩格斯所说的追随

①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6页。

②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88页。

“国民报”的那一派巴黎工人，就是马克思所提到的《工场》（《L’Atelier》）派的反动工人，这一派工人受毕舍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反对当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他们的纲领也就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纲领。

毕舍是圣西门主义的信徒，他把圣西门学说中关于新宗教的反动部分作为基础建立他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主张利用合作的和平手段实现基督教道德的使命。按照毕舍的思想，工人应当成立生产合作社，以便从雇佣关系中解放出来。第一批成立起来的合作社将把一定数量的纯利润变为集体资本，这是无产阶级的不可让渡的财产。经过合作社的不断发展，就能使各行业的工人全部联合起来。毕舍关于生产合作社的这种主张，就是拉萨尔的社会主义的原型。拉萨尔认为，只要在国家帮助下建立起生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本身就会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他说：他的合作社是“有机的芥种，这个种子不可遏制地要求向前发展并且从本身向外扩展。”

在德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中，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的策略路线早已证明是错误的。1868年恩格斯在《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一文中，就嘲笑了这条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恩格斯说：“‘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权’已经存在了两年。已经进行了两次国会的选举。工人没有能够执掌政权并按照拉萨尔的方案颁布关于‘国家帮助’的命令，而是勉勉强强地把半打左右的代表选进国会。俾斯麦当了联邦首相，而全德工人联合会被解散了。”① 但是，尽管有这些批评，拉萨尔派的首领们还是要把这种策略强加给统一以后的新党，在《纲领》中塞上这样的话：

①恩格斯：《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9页。

"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以便从它们里面产生出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在这里，根本不谈阶级斗争，根本不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幻想靠国家帮助从生产合作社中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拉萨尔的这种机会主义策略的实质，就是用和平长入的幻想代替社会的革命转变。他写道："这里'道路开辟'得确实不错。现存的阶级斗争被换上了拙劣的报刊作家的空话：需要'开辟道路'来'解决'的'社会问题'。'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出来'，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起来'的。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象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①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共产党宣言》以来也曾多次谈到过建立生产合作社的问题，但这只是作为工人阶级争取解放斗争中的补充手段，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建立集体生产条件的努力和尝试，绝不意味着单靠建立生产合作社就可以越出资本主义制度而进入社会主义，因此，这同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

四、批判争取"自由国家"的机会主义纲领，坚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哥达纲领批判》的第四部分，主要是批判拉萨尔派关于争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页。

取“自由国家”的机会主义政治纲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争取“自由国家”是彻头彻尾的拉萨尔主义的纲领。

“自由人民国家”是拉萨尔所向往和追求的国家理想。在拉萨尔看来，国家是超阶级、超历史的东西。他说：“国家的目的是把人的本性导向积极的成长和进步，它教育了人民，使人类发展并获得自由，这是国家根本的天生的职能。”他认为，一旦实现了普选权，国家就变成“自由的人民国家”，“能够导致社会中阶级矛盾的消失”。在《哥达纲领》中，“自由的人民国家”被改写为“自由国家”，但是这实质是完全一样的，而且显得更加荒谬。

马克思首先提出：自由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呢？自由国家实际上就是专制国家。因为只有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而不受任何民主的代议制机构约束的专制国家才能称为自由国家，所以“自由国家”一词，即使从字面上讲也是说不通的。当然，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拉萨尔主义者根本违背了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反映在《纲领》中的拉萨尔主义观点，即“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的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或者不把未来社会当做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①就是说，是唯心主义地理解国家。正因为如此，所以拉萨尔及其门徒才认为国家可以脱离其经济基础而自由行事。

由于把国家看成是一种脱离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的超阶级的精神实体，因而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者就混淆了“国家形式”和“国

---

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页。

家制度”这两种不同的东西，即抹煞了“政体”和“国体”的区别。在他们心目中，只存在“民主制国家”和“专制国家”，即所谓“自由人民国家”和“非自由人民国家”的区别，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一方面保持着“对国家的忠顺信仰”，另一方面又迷信“民主的奇迹”，以为只要在现存国家制度的范围内实现了民主，无产阶级在国家问题上的目的就全部达到了。因此，他们根本不提、也提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马克思指出：不管在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国家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①这就是说，国家制度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消亡，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也一定要发生根本的变化。

建立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不同国家制度，和建立在同一的资产阶级社会之上的不同的国家形式，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此，问题就不应该这样提出：在未来社会中是否应争取一个“自由的人民国家”（民主制国家）；而应该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②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的国家制度”，就是指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需要国

①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页。

家，但这时的国家已不再是原来的国家而是新型的国家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了。马克思认为随着过渡时期的终结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束，国家的非政治职能还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下来，但它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政治国家了。这种新型国家制度同资产阶级国家相比，会有哪些变化呢？在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中有哪些职能会以类似的形式保存下来呢？马克思说，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而不能靠用“人民国家”一词加以解决。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虽没有作出具体说明，但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已经作了某种考察。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一新型“国家”的性质，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①

①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还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为着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需要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这个过渡时期之所以必要，是由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不会很快地消失，只要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而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又还没有发展到建立起巩固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时，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就还没有最后完成，国家的政治职能就不会完全消失。可见，这里提出的思想又比《法兰西内战》一书更加发展了。

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23页。

第八章　恩格斯在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中系统阐述和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观点

1875年5月，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在哥达大会上合併，建立了统一的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以后又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有利于增强正在发展中的德国工人运动的力量。但是，由于这次合併中爱森纳赫派丧失原则的妥协，更加助长了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就在这次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实现统一的前后，杜林主义象瘟疫一样蔓延开来，侵蚀到了党的肌体。为了不使在如此年轻的、刚刚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新的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恩格斯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一起，进行了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恩格斯在其光辉的巨著《反杜林论》中，给予杜林主义以毁灭性的批判，并系统地阐述和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观点。

第一节　恩格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

恩格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杜林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中公开与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派斗争的一个阶段。

杜林（1833—1921）是德国的一个折衷主义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和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1856年，杜林在柏林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从事过法律方面的实际工作；1861年，又以《论时间、空间、因果性兼论微分逻辑》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不久，杜林由于严重的眼疾而双目失明，然而，他于1864年又在柏林大学取得了历史、哲学和国民经济学私人讲师的资格。1866年，他曾向俾斯麦上过《社会条陈》，希求得到帮助，以便获得教授的头衔，但是毫无结果。相反，由于他公开揭露德国大学中的学阀统治，触怒了当事人，1877年7月被解聘。此后，杜林以私人著作家终其生。

在任教期间，杜林就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自然辩证法》（1865年）、《凯里在国民经济学说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865年）、《生命的价值》（1865年）、《资本和劳动》（1865年）、《国民经济学说批判基础》（1866年）和《哲学批判史》（1869年）等。

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注意到杜林，是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的1867年，在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妄图以沉默来抵消其影响的情况下，杜林却第一个著文评论了《资本论》第一卷。可是，到了1871年，杜林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一书，则蓄意歪曲和攻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基本观点。不久，杜林又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873年）和《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875年）。此外，他还出版过物理、化学、天文学等方面的著作。1872年，他的著作《力学一般原则批判史》在哥丁根大学应征获得头奖。因而，杜林便以精通一切科学领域的行家自居。特别恶劣的是，他冒充社会主义理论的“革新家”，拼凑了一套庞杂的“终极的真

理”的体系，吹嘘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等方面实行了“全面的变革”。实际上，他是用实证主义、福格特的庸俗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等哲学混合物，庸俗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妄图取代马克思主义。

由于杜林是在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实行统一后，德国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纷纷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方面的形势下，以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革新家的面貌出现的，而且，杜林还发表过维护巴黎公社活动家的言论，抨击过德国专制制度，从而获得了民主斗士的声誉，博得进步青年的拥戴。当时，党内思想十分混乱，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加强，助长了杜林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不坚定的分子当中的传播。当时，党内的伯恩施坦、莫斯特、弗里茨舍、瓦耳泰希和恩斯等人，都成了最狂热的杜林主义的拥护者，力图将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变成宣扬杜林主义的阵地，把杜林的观点强加于全党。甚至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也一度受到过杜林的影响。1874年6月13日，李卜克内西写信给恩格斯说：“他（指杜林——引者注）虽然有些糊涂，但十分诚实，并且坚决站在我们一边。”①在狱中的倍倍尔，读了伯恩施坦送给他的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后，还以《一个新的“共产党人”》为题，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发表文章推荐过杜林的著作，认为“继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杜林的最新著作属于经济学的领域最近出现的优秀著作之列。”②

①《威·李卜克内西致弗·恩格斯（1874年6月13日）》，见《研究〈反杜林论〉参考史料》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9页。

②倍倍尔：《我的一生》第2卷，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41页。

在党刊上出现倍倍尔这类文字，立即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1874年6—7月间，马克思、恩格斯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布洛斯和赫普纳等人，严肃地指出了杜林主义在党内的危害性。后来，马克思还明确地指出："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耐心帮助下，李卜克内西才逐渐认识到必须批判杜林的理论。1875年2月1日，他写信询问恩格斯是否愿意写文章清算杜林？认为杜林"在我们许多人当中（特别是在柏林）影响很深，必须彻底收拾他。"②然而，杜林分子加紧向党的领导人施加压力，同年10月，杜林主义分子恩斯要求《人民国家报》刊登他的吹捧杜林的一封信，李卜克内西当即将信转给了恩格斯，并再次请恩格斯写文章详细地批判杜林。当时，恩格斯正忙于研究和写作《自然辩证法》，未及撰写批判杜林的专题论文，只是于1876年2月底至3月初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中，顺便表明了一下他对杜林主义所持的立场。这时，杜林主义分子莫斯特得知恩格斯准备批判杜林，便出来加以阻挠。莫斯特还把持了柏林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报纸，更加放肆地宣扬杜林主义。

恩格斯深深地感到，杜林分子公开地着手在建立他们的宗

①《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77年10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7页。

②《威·李卜克内西致弗·恩格斯（1875年2月1日）》，见《研究〈反杜林论参考史料》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30页。

派，损害到党的理论基础，危害党的统一，这就迫使自己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为了制止杜林主义在党内的流传，必须详尽地、彻底地批判杜林的著作，粉碎杜林的谬论，并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诸方面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1876年5月，恩格斯毅然决定中断《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和写作，着手准备反击杜林的进攻。恩格斯于1876年5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打算批判杜林的著作。马克思在5月25日的回信中坚决支持这个想法。5月28日，恩格斯又在给马克思的信中确定了他的著作的总计划。这时，党内的另外一些同志如约·狄慈根、威·白拉克等也都认识到杜林主义的危害性和清算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876年中，恩格斯开始收集材料，9月初便写出了几篇反杜林的文章。1877年1月3日起，恩格斯写的哲学编开始在《前进报》上发表，很快便在读者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列斯纳于1877年1月8日写信给恩格斯说："阅读你的文章，我感到真正从未有过的莫大享受，……越读越有新的感受。"李卜克内西1877年1月12日也写信给马克思说："恩格斯反对杜林的文章真出色。"马克思也说："不仅普通工人……，而且真正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够从恩格斯的正面阐述中汲取许多东西。"①

尽管杜林分子施加压力，使恩格斯的文章发表不很顺畅，但是，1877年1月至5月，《前进报》终于刊登完了第一编。这时，李卜克内西和《前进报》的其他成员也不得不经常同杜林的拥护者们进行斗争。到1877年5月底召开的党的第三次哥达代表大会上，杜林分子又活跃起来，奈塞尔和莫斯特等人提议反对在

①《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977年4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2页。

《前进报》上发表恩格斯的文章，遭到了李卜克内西的断然反对，经过激烈的辩论，终于粉碎了杜林分子阻止《前进报》发表恩格斯著作的阴谋。同年7月，恩格斯还将已发表的哲学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哲学》为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

与此同时，杜林因批评德国大学中的学阀统治被解聘了，激起了社会舆论的抗议，和对杜林的广泛同情，党内的杜林分子更是把杜林吹捧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殉难者，他们不仅在《柏林自由新闻报》上，而且在党的其他机关刊物上大造舆论。《前进报》甚至发表了大学生写的称杜林为“思想家、导师和精神的勇士”的颂诗。对此，恩格斯十分愤慨。在这阵维护杜林的浪潮过后，1878年7月至12月，在《前进报》的学术副刊上，发表了恩格斯的著作第二编的各章。正在紧张地从事《资本论》著述的马克思，始终关注着反对杜林的斗争，他不仅第一个翻阅过恩格斯反杜林的全部文稿，还于1877年3月初为其政治经济学编写了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对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的基本论点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

不久，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杜林随着名声增长，其狂妄自大已发展到发疯的地步，说什么他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谁不相信这一点，谁就是叛徒。”当杜林企图创建“自由大学”，确定自己的个人独裁时，社会民主党内的杜林分子也公开起来反对他了。《前进报》的学术副刊也于1878年5月至7月发表了恩格斯写的第三编——社会主义编。接着，第二编和第三编又以《欧根·杜林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为题，也在莱比锡出了单行本。同时，还将三编合在一起，由恩格斯写了序言，出了第一版，标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

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恩格斯所以采用这个书名，是讽刺地仿照杜林在1865年出版的一部著作的书名：《凯里在国民经济学说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杜林在该书中，吹捧庸俗经济学家凯里，同时又以社会主义的行家和革新家的姿态傲然地向当代挑战。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使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了反对杜林主义的锐利的理论武器，也使党内的杜林分子的绝大部分人改变了观点，结束了杜林在党内的影响。

1880年，恩格斯应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即“引论”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编的第一、二两章）改写成一本较通俗的小册子单独出版，最初题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后来又改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不长的时间里，这本小册子就被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在各国工人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著作。由此一点，也可以了解《反杜林论》一书的巨大理论意义。

第二节 批判杜林的“共同社会”的空想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

无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还是在他们死后，围绕社会主义理论所展开的斗争始终是在空想和科学之间进行的。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同杜林围绕社会主义理论所展开的斗争也是这样。马克思在谈到杜林的空想主义时说过：“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

起来，而且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①

这个斗争不能不涉及到非常广泛的方面，不能不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和现状。而要在如此广阔的领域内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系统的论证和阐明，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的。可是，若不作出这种系统的论证和阐明，则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和空想之间的原则界限就远不能为一般人所了解。长期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教诲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人，直到十九世纪70年代都还一度为拉萨尔和杜林等人的空想主义所迷惑，至于那些越来越多的被历史潮流卷进来的“社会主义者”，就更加不能不热中于各种新颖而高超的胡说。这种人就是在今天也还是屡见不鲜的。所以，恩格斯这部著作的巨大理论意义，不在于它与之论战的那个特殊的对象，而在于它以最大的“详尽程度”在其所涉及到的各个极其不同的领域中正面地发挥了他的理论见解，因而使它们具有了普遍的、科学的和实践的意义。

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须联系到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来加以阐明。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首先在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区别。不管在口头上表现得怎样激进和革命，空想社会主义总是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和启蒙思想的更为彻底的发挥和发展，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把资产阶级的道德和

①《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77年10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8页。

法的观点应用于社会生活的结果。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表现出来的对平等的渴望和对不平等的愤怒，总超不出小资产阶级的道义感所不能越出的范围。杜林这伙空想社会主义者，“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①而科学社会主义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则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仅不同于十八世纪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而且和它根本相反。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来说，对十八世纪世界观、思维方法的任何退让和容忍，都会导致空想主义的复活，都会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科学社会主义同法国唯物主义及其思维方法的不相容，正如以往的社会主义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不相容的一样。

所以，当杜林大吵大嚷，宣称自己是最新的社会主义改革家的时候，他不过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庸俗和拙劣的模仿者。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杜林先生登上舞台，要从他的至高无上的头脑中，从他的孕育着‘最后真理’的理性中，构思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标准’体系，而不根据现有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材料，作为这些材料的必然结果来阐述这个体系，那末，到处去嗅模仿者的杜林先生本人只不过是空想主义者的模仿者，最新的空想主义者。”②在杜林看来，社会主义根本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条件的产物，而是植根于“普遍的公平原则”之上的“社会的自然体系”，是道德和法的最后的终极的真

①《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77年10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7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91页。

理体系。

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和思维方法上的形而上学，使杜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注定要成为空想的，他到处都从其先验的"原则"出发，按照所谓"公理理论"，从而构造他心爱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把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的社会状况一概斥之为暴力、奴役和不正义行为的结果，当问题正是在于如何说明阶级和统治关系的产生，说明剥削、奴役和不正义行为的起源时，杜林总是只用"暴力"一词来作为回答。这就表明了杜林体系的惊人贫乏，在他的社会主义理论中，除了对所谓"平等原则"的空泛的鼓吹和渲染以及对"暴力"所表示的道德义愤之外，不包含任何积极的内容。

自从1845年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把社会主义理论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唯一科学的世界观的基础之上，自从那时以来，社会主义就不再被看做某种应当确立的状况，不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决不能从人们的头脑构造出来，也不是从某种作为"最后真理"的"永恒原则"或"基本模式"出发按照"公理理论"推演出来的"社会的自然体系"，它只能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一定经济状况的产物。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谈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时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

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① 社会主义也是这样，只有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才能寻找到它的产生的必然性。

自从蒸汽机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利用形式。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资本主义的苦头的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基本矛盾的冲突表现在哪里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一基本矛盾冲突，首先表现为在生产上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在阶级关系上的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现代大工业的巨大扩张力，要求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方面扩张，然而，由于劳动者的贫困化，使市场的扩张远远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因而不可避免地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它说明：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不能继续驾驭这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92页。

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这也就是说，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恩格斯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①

可见，社会主义只有在大工业的基础上才能健康地成长起来，因为只有大工业才能创造出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关系所必需的物质手段。在还没有大工业所创造的物质手段可供利用的地方，任何企图建立社会主义的尝试，都不免要沦为空想或在实践中使之庸俗化。因此，恩格斯强调指出，为了不把科学社会主义庸俗化，必须去了解真正的大工业。他说："必须从大工业的历史发展中，从它目前的现实状况中，特别是从那个成为大工业发

---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4—305页。

源地并唯一地使大工业获得标准发展的国家中，去了解真正的大工业；这样就不会想到把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庸俗化，并使之堕落为杜林先生的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①

在这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论点：不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方式，首先是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不能真正地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因为这里所指的“社会”不是别的，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如果生产者个人仍然屈从于旧的分工，仍然是局限于某一生产部门的畸形发展的“经济变种”，那末他们就不能成为全部生产资料事实上的主人。因此很难设想：“社会应该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从而让每一个人依旧做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奴隶，而仅仅有选择哪一种生产资料的权利。”② 现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都仍然深感生产力发展的相对不足之苦，深感在国家的名义下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和依然屈从于旧的分工的生产者个人之间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除了靠极大地发展社会的生产力之外，借助于任何立法和行政的措施都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也作了进一步的概括，这就是：1．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③ 2．社会生产的计划性。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3．随着生产资料之转变为全社会所占有，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阶级对立和阶级区别逐渐消灭。

①②③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2、322、305页。

4．社会一切成员的物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和充实，一切成员在体力和智力上逐步得到全面的发展。5．作为阶级划分的基础的旧式社会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将被消灭。6．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从而国家将自行消亡。7．由于人们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翁，因而也就可能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翁。只有从这个时代起，人们才真正开始充分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在人类发展史上才能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恩格斯指出："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①

杜林从唯心主义历史观出发，认为社会主义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条件发展的必然产物，而只是所谓"普遍的公平原则"的产物。实际上，他的社会主义是反动的普鲁士式的社会主义。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就从生产、分配和社会组织等方面批判了杜林的社会主义。

在生产方面，作为一种显著的特征，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大都把生产和分配割裂开来，拒绝对生产方式作科学的研究，而把整个注意力都放在分配问题上。这样一来，分配就似乎不是由生产所决定，而是由纯粹的意志行为来决定的，从而他们就可以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8页。

把道德和法纯粹主观的标准应用于经济，企图通过改变分配来改变全部社会生活。所以，分配领域始终是空想主义者的"社会炼金术"的注定的场地。在杜林看来，对历史上所出现过的各种不同的分配形式，它们之间的差别和所以变化的原因，都不必作专门的研究，不必联系各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该社会的历史前提去研究，而只要把它们区别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就完了。在他看来，分配形式原则上只有两种：以平等意志为依据的和以压服、暴力为依据的。这样，他"就把全部分配理论从经济学的领域搬到道德和法的领域中，就是说，从确定的物质事实的领域搬到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意见和感觉的领域中。"①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②人们关于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经济科学所提出的无可怀疑的证据，亦即以多少清楚的形式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工人和革命者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些人们头脑中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

在杜林看来，分配与生产是无关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好的，只是分配不好，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如经济危机的原

①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0、163页。

因，不应从资本主义生产中去寻找，而应该从分配中去寻找。杜林认为，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不是生产过剩，而是人民消费不足；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仅仅是个别企业家的仓卒从事和考虑不足。恩格斯指出：群众消费不足是以往社会都具有的旧现象，而经济危机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新现象，用前者解释后者，正表现出杜林的庸俗经济学的全部浅薄见解。同时，群众消费不足是任何人剥削人的社会的一个必然条件，当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条件，可以说是危机的条件之一。但是，它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性质、特征和意义。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能用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生产过剩来解释，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的表现，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

杜林还企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保留旧的分工。他认为，在未来的“经济公社”中，无需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能力”，就一切都解决了。恩格斯指出，杜林的错误在于，他割裂了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内在关系。事实上，在旧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使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社会分工变成奴役生产者的新工具。而社会一旦掌握了生产资料，社会就会消灭生产资料对人的支配，并将彻底地改变旧的生产方式，消灭旧的分工。因此，杜林企图保留旧的分工，就等于让每个人依旧做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奴隶，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消灭旧式分工对于社会解放的重要性；而在这个问题上，杜林的观点也大大落后了，它已经把社会主义庸俗化，堕落为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

杜林还认为，在未来“经济公社”中，城乡分离“按事物的

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其实，杜林不了解，城乡分离是一定阶段的生产的发展所要求的，并对当时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当生产发展到大工业阶段后，城乡对立已经变成为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地步，城乡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乡分离的条件；同时，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才能消灭城乡分离和对立。然而，最根本的，乃是要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此外，杜林在关于未来社会的社会组织的设计中，对于国家、宗教、家庭、教育、婚姻等问题，也都充满着陈腐的资产阶级的观点。

关于未来的国家制度的设计中，杜林一方面采用了卢梭的契约论，认为“个人主权”是未来国家的基础，社会的权力只能从个人的主权中引伸出来；另一方面，他又采用黑格尔的陈腐的国家学说，认为个人必须绝对地服从国家的强制，为此就必须保留军队、警察、宪兵、律师等全部的国家机器。显然，杜林的这种国家设想，乃是为了保留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

关于宗教问题，杜林认为，在未来社会里，可以通过国家权力，采用强制的、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废除宗教。显然，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它表明杜林完全不了解宗教的性质及其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规律。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这种观点时指出：“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就象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41页。

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受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因此，宗教的反映过程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它一起继续存在。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① 杜林主张用强制的行政手段来消灭宗教，恩格斯说：“他（即杜林——引者注）比俾斯麦本人有过之无不及”。② 在这个地方，也表现出杜林的“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的特征。

关于家庭问题，杜林认为，在未来社会中，家庭不可能有所改变，仍然保留资产阶级家庭的全部形式，设想家庭仍然是“继承遗产”的单位，即拥有财产的单位。恩格斯指出，在家庭问题上，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比杜林高明得多，在他们看来，随着人们自由结成社会和私人家务劳动转为公共事业，青年教育的社会化和家庭成员间真正自由的相互关系也就直接产生了。恩格斯还援引《资本论》，指出大工业的发展，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

关于教育问题，杜林对未来社会的教育，作了烦琐的设计，甚至于未来学校的教科书的内容，在他的心目中都大致有了一个梗概。尽管杜林也说什么全面教育，但是，这在他的原封不动地保存旧的分工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恩格斯称它是“空泛的无内容的清谈”，并引述马克思的话指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

①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43页。

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①

关于婚姻问题，杜林明显地表现出了资产阶级的种族主义观点。他认为，“性冲动……正是双方结合的最好保证”。而在两性结合时的不同选择，就产生出善人和恶人：两个优等人结合，就产生善人；两个劣等人结合或一个优等人和一个劣等人结合就产生恶人。因此，杜林主张严禁优等人同劣等人结合，不准劣等人结婚，最后消灭劣等人。显然，这完全是马尔萨斯的反动观点，是种族主义谬论的翻版。后来，杜林也发展成为一个反动的反犹太主义者了。

由以上剖析的杜林的未来社会各方面的内容来看，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无论我们向什么地方看，总是看到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②这种庸俗的、反动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以唯心史观作为它的思想基础的。恩格斯正是抓住了这个核心问题，才能给予杜林以毁灭性的批判。

基于十八世纪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空想社会主义不承认社会科学及其规律的历史的、过渡的性质。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无论是启蒙学者或经济学家，都不把由他们建立的新学说看做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和阐明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社会生活的关系，而是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人们从哪里才能获得这种自然规律呢？它们只有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但是，仔细一看，这个人不是别的人，他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

①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48、343页。

中等市民，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历史地规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工业和商业。

就杜林而论，他的观点不过是对上述十八世纪的观点的更加庸俗的歪曲。他不满足于历史的发展规律，而声称自己的体系是穷究底蕴的科学，到处运用着自然规律和永恒真理。象在道德和法这样的社会关系上，他不是从当时历史地存在着的条件中去探寻它们的历史的规律，而是企图从赤裸裸的两个男人中去发现它们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和永恒的自然规律。这样，他就使自己戏剧性地落到了一个拙劣的模仿者所不可避免的丑角的地位。因为在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那里，通常作为经济关系的基本模式出现的还是两个具有不同经济身份的人，而到了杜林这里，他们就变成了两个赤裸裸的男人，在这两个人身上除了留下“人”这个光秃秃的概念以外，就一无所有了。正由于他们一无所有，所以也就能够拥有一切，随着杜林的意志，他们既可以在历史上扮演主人和奴隶的角色，也可以在未来的社会中作为享有同等权利的经济公社的当事人而出现在舞台上。只要有了这两个傀儡，全部人类历史连同杜林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也就奠定了。杜林的思维方法是这样地富有特征，以致恩格斯不能不给予它以专门的批判和分析。

第三节　揭露杜林思想体系的核心仍是十八世纪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杜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在上一节，我们讲述了恩格斯对杜林的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在这一节里，就需要进一步论述恩格斯对杜林哲学体系本身的分析和批判。

杜林构造他的哲学体系所应用的思维方法是什么呢？它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这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极为关注、并仔细地向读者说明的一个问题。从恩格斯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杜林的方法只是对流行于十八世纪的思维方法的某种歪曲，是法国唯物主义和启蒙思想的思维方法的拙劣的模仿和复制。

恩格斯说："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领教了杜林先生的方法。他的方法就是：把每一类认识对象分解成它们的所谓最简单的要素，把同样简单的所谓不言而喻的公理应用于这些要素，然后再进一步运用这样得出的结论。"① 杜林的思维方法是以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为出发点的，一个是每一类认识对象的"最简单的要素"或所谓存在的"基本形式"，另一个便是所谓"公理"。在杜林看来，这两个要素都具有普遍的、永恒不变的真理性，一切认识对象，无论是自然界的或历史上存在的，只要从它们各自的"简单的基本形式"出发，按照"公理"来解决，正如在数学上运用简单的基本形式和公理理论一样，就能获得真正不变的、终极的真理。简单地说，杜林的方法就是：从原则出发，按公理解决。

杜林认为，哲学应当包括一切知识和意志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各类认识对象之简单的或迄今被想象为简单的成分，由这些终极的成分或原则就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意志。他认为，就哲学研究的对象来说，这些原则或简单的基本形式可以分为三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05页。

类：一类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或一般的世界模式，一类是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最后则是关于人的学说。但是问题在于，思维究竟怎样获得这些原则呢？它所获得的这些原则又具有怎样的性质呢？仔细考察一下就可以知道，只要当思维力求去获得这些原则并把它们当做从其出发的不变基础的时候，它就必然要堕入一种形而上学的先验主义的方法中去。杜林的方法不过是这样玄想的或先验主义方法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按照这一方法，某一对象的特性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来。就是说，人们首先从对象中抽象出关于对象的最一般的概念，然后就倒转过来，用对象的概念去衡量和构造对象。这样，已经不是概念应当和对象相适应，而是对象应当和概念相适应了。

恩格斯揭露和批判了杜林的先验主义原则及其构造哲学体系的先验主义方法。先验主义原则和方法的一般特征是：把从思维得出来的原则，看成为研究外部世界的出发点，看成为外部世界必须遵循的法则。恩格斯指出，杜林的这种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事情完全头足倒置了，而唯物主义的观点则坚持："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① "世界模式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出来的，……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② 而杜林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永恒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恩格斯说，"这完

①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39页。

全象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①

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杜林的先验主义原则的错误还在于，它使思维脱离它唯一真实的基础，即脱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实际上，思维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因而思维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的产物，它必然要与外部世界相适应、相符合、相联系的。杜林所讲的脱离外部世界、且先于外部世界的思维，只能是僵死的、非现实的、神秘的思维。

在杜林那里，所谓存在的基本形式或对象的最简单的要素，不过是他所能达到的终极的抽象，它们执行着概念的职能。可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因为这种最简单的要素，最多只能具有纯粹概念的性质，由此推论出的一切结论也都只能是纯粹的玄想，它们不是从现实本身中推论出现实，而是从纯粹的观念中推论出现实。例如，在历史科学的一切问题上，杜林不是从他周围人们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而是从概念或所谓“社会”的最简单的要素出发。当他把社会分解成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的时候，他发现最简单的社会至少是由两个人组成的，于是这两个人就成了全部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基本模式，他只要按照公理同这两个人打交道，就可以从中推论出一切道德的、法律的及至经济的形式和规律。所以，杜林的新社会制度体系就是根据这种最贫乏的抽象构思出来的，而不是根据现有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现实关系，并且作为这种关系的必然结果合乎规律地推论出来的。

不过在杜林的体系中当然也会包含若干有关现实内容的点滴残余，但这大都是从后门偷运进来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当杜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页。

林“不是从他周围的人们的现实社会关系，而是从概念或所谓‘社会’的最简单的要素构成道德和法的时候，可用于这种构造的材料是什么呢？显然有两种：第一，是在那些被当作基础的抽象中可能存在的现实内容的一点点残余，第二，是我们这位玄想家从他自己的意识中再次带进来的那种内容。”①这样，他就把从大门扔出去的历史现实，又从窗户偷运进来，而当他自以为制定了一种普遍适用于一切时代的道德学说和法律学说的时候，其实不过是把他那个时代的保守潮流或进步潮流制作了一幅歪曲的、头足倒置的映象罢了。

实际上，所谓两个人的基本模式并不是杜林发现的，而是十八世纪乃至整个资产阶级唯物主义所共有的，他们的最初出现于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论著中，然后，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他们大都作为猎人的渔夫扮演着主要的角色，直到十九世纪40年代，他们还作为男人和女人不断地出现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不过，在所有上述的著作家那里，他们主要只是充当说明的例子，只有在杜林的著作中，才第一次把这种举例说明的方法提升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和一切历史形态的尺度。可是，十八世纪和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毕竟是过时的了，而硬要把关于社会和人的严格科学的观念变得简单些，肯定是做不到的。

为了论证先验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杜林还歪曲数学知识的性质，并片面地鼓吹所谓数学方法，他认为数学知识所以具有普遍适用性和确实性，是由于数学所运用的公理化方法。按照这种方法，全部纯数学可以先验地，即不利用外部世界给人们提示的经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05—106页。

验而从头脑中构思出来。恩格斯指出：数学和其他科学一样，也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由纯粹的思维产生出来的；数学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数学上各种数量的明显的相互导出，也并不证明它们的先验的来源，而只是证明客观事物在空间形式和数量方面的合理的相互关系；数学和其它科学一样，是从人们的实践需要中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中产生的，而且，只有当它正确地反映世界的联系时，才能被一般地应用。

杜林不仅认为数学可以先验地从人们的头脑中构思出来，而且认为一切知识领域都应当象数学那样，以简单的基本形式，按照公理来解决。这就是说，只要在历史、道德和法律方面应用数学方法，在这些领域内就能获得象数学那样的不变的、终极的真理。正如恩格斯所说："杜林先生以为，他可以不加入任何经验的成分，从那些'按照纯粹逻辑的观点既不可能也不需要论证'的数学公理导出全部纯数学，然后再把它应用于世界，同样，他以为，他可以先从头脑中制造出存在的基本形式，一切知识的简单成分，哲学的公理，再从它们导出全部哲学或世界模式论，然后以至尊无上的姿态把自己的这一宪法赐给自然界和人类世界。"①

然而，杜林所极度夸张的数学公理究竟是什么呢？恩格斯认为，那不过是从形式逻辑那里借用来的极其贫乏的思想内容的表现，归结起来就是以下两个命题：1．整体大于部分；2．如果两个数量各等于第三个数量，那末它们彼此也相等。即使在数学本身的发展上，这样贫乏的命题也都是无济于事的。要使数学本身真正有所前进，就必须吸取真实的关系，即来自现实事物的关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2页。

系和空间形式。由此可见，任何公理理论的"根本性"和"永恒性"，必然是以它们的极端抽象和内容贫乏为条件的。即使是如此，无论数学公理或逻辑形式，也决不是在一切历史时代中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同时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① 事实上，思维规律的理论决不象庸人的头脑关于"逻辑"一词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形式逻辑本身从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激烈争论的场所，而辩证法直到现在只是被少数的几个思想家所精密地研究过。因此，当杜林把数学从逻辑中借用的极其贫乏的思想作为普遍适用的公理，以便应用于一切历史时代和一切知识对象的时候，他所能得到的结果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对于杜林来说，既然两个人就构成了社会关系领域中的基本模式，因而无论对于任何历史时代，一到有经济、政治等等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这两个人就飞快的出动，并且立刻"按公理"来解决问题。在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中，所谓"公理理论"就是两个人的意志是彼此完全平等的，他们之间一方不能向另一方提出任何肯定的要求。如果一方竟然这样做了，并以暴力来实现自己的要求，那就发生了不正义的情况。在杜林看来，这一情况就是以往的全部历史，即暴力、奴役、剥削和不正义的"基本模式"。依靠了这个基本模式，他就可以省去无数的麻烦的烦恼，不必去绞尽脑汁弄清阶级压迫和政治奴役的起源和原因，而只需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46页。

用“暴力”一词来作为回答。不仅如此，两个人的模式既“适用”于不平等和奴役，也同样“适用”于平等和互助。人类只需要赎出暴力的原罪，平等和正义的千年王国就会和杜林的最新的社会主义福音一起从天而降。

由此可见，杜林的思维方法是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他同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和费尔巴哈一样，虽然在自然观上还能遵循唯物主义的路线，但一旦进入历史领域，他们的思维方法的局限性就立刻显露出来了。他们在世界观上的共同的致命的弱点，是不能找到由“静”到“动”的桥梁。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他们都发现和看到了人，但这是一种静止的、直观自身的人，而不是活动着的、能动地表现自己的生活和创造历史的人。在他们的孤立静止的人和生动地变化着的历史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和桥梁。因此，当他们解释历史的时候就不能不重新陷入唯心主义，把历史发展的动力依旧归结于感情、欲望和意志等等精神因素的作用，用虚构的观念的原因和联系来代替现实的物质的原因和联系。这一切早在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时候就已经分析得十分清楚了，但到了70年代中期，杜林还大叫大嚷地重新兜售这套东西，并贴上最新哲学的标签，这就说明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全面地阐明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方面所实现的根本变革，乃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节　批判杜林的形而上学真理观，论述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阐述，我们已在本书第二卷第六章中详细地讲过了。在这里我们讲的，

则是恩格斯对杜林的形而上学真理观的批判，和对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的论述。

在这本书中，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的是恩格斯对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特别是对真理问题所作的阐述。在这里，他第一次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全面地阐明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

杜林既声称他拥有唯一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方法，因而他所获得的研究结果就是绝对不包含谬误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这样，他就不是一个寻常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而是象教皇一样上升到没有谬误的超凡脱俗的人的地位。

根据以上叙述的杜林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他认为一切认识对象经过分解都可以发展其“恒久的原则”和“单纯的要素”，从这些原则或要素出发，按照他的所谓“公理理论”就能穷尽对象的底蕴，建立起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例如，在道德问题上，他首先企图发现道德的原则，这种原则应该是恒久不变的，它凌驾于历史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在发展的过程中再组成比较完全的道德意识。由于它们的最终基础已被认识，所以，它们就可以同数学的认识和运用一样，具有最普遍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因此，杜林认为：“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① 在这里，暴露了杜林是一个十足的形而上学者。

形而上学者杜林要求他的思维的产物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且不管他的思维方法的正确或错误以及由于单纯的个人因素所造成的知识上的缺陷，这在一般情况下是否可以达到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必须辩证地分析。恩格斯说：“人

①杜林：《哲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36页。

的认识的产物究竟能否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如果能，那末是哪些产物能这样。”① 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既没有笼统地加以肯定，也没有笼统地给以否定。而是认为需要具体分析：“如果能，那末是哪些产物能这样。”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至上的性质，这个问题只能辩证地加以回答。

首先必须明确，这里讲的人的思维，不是指的个人的思维，而是指的人类的思维，即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的思维。我们能够说这些个人中的每一个人的思维具有至上性，只是在于人们的正确思维都具有不依赖于主体的、符合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客观内容，指主观和客观的一致。至于说到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则是根本谈不上的，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因素，总是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因素多得多。

从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来看，作为人类的思维和认识来说，人类通过实践活动能够无限地去认识客观世界，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是无限的，人类的认识能力也是无限的，就这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的思维是至上的，认识是无限的；但是，作为每个人或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类来说，人们的认识能力、人们的思维又不能不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诸如客观事物、现象、过程的发展程度的限制，人们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科学技术条件以及人的生理条件等的限制，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思维又不是至上的，人的认识能力又不是无限的。

由上可见，人类思维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一方面，人的思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93—94页。

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①根据这一分析就可以看出，在人类的认识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上，人们都不能企求在所有知识领域内完全达到最后的、终极真理的认识。如果真的象杜林所宣称的那样，在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各个领域内全部拥有了永恒真理，这就意味着“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从而就实现了已经数出来的无限数这一著名的奇迹。”②

恩格斯认为，不能从确有永恒真理存在着的事实得出人类有朝一日将达到认识全部终极真理的结论。究竟在哪些知识范围内人们有可能达到永恒真理的认识，而在另一些范围内则不能，这要就认识对象的不同性质具体地加以分析。

于是，恩格斯根据传统的划分把整个认识领域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等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一切科学。这些科学的某些成果，也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永恒真理即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然而决不是一切成果都是如此。而随着这些科学本身的发展，一方面它们获得了愈来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开辟了造成谬误的道路。数学上原来被认为具有绝对适用性的一切东西，很多已证明不再是永恒

①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95页。

不变的了。而在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方面，人们就更加不得不长期处在相互抵触的各种假说之中。这就是说，在这些科学中，相对于所获得的认识成果，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必然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罕见了。

第二类科学，是包括研究生物机体的那些科学。在这一领域中，由于存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以致每个已经解决的问题都引起无数的新问题，如细胞的发现，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以前生物学上已经确立了的一切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作全面的修正，而且还不得不把这些真理整堆整堆地永远抛弃掉。而每一个问题的解决常常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而为对各种相互联系作系统的了解，就更加迫使人们不得不在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周围造起茂密的假说之林。“因此，谁想在这里确立确实是真正的不变的真理，那末他就必须满足于一些陈词滥调，如所有的人必定要死，所有的雌性哺乳动物都有乳腺等等；他甚至不能说，高等动物是靠胃和肠而不是靠头脑来进行消化的，因为集中于头脑的神经活动对于消化是必不可少的。”①

至于在第三类科学即历史科学中，永恒真理的情况就更糟了。在生物科学中，尽管研究的对象具有极其复杂的关系和联系，但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人们所能观察到的，并且作为有机生命的过程在极其广阔的范围内正在有规律地重复着。而在历史科学的领域内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事件和过程的重复出现只是极个别的例外。因此，对各种历史形式的认识和研究，总是在这些形式久已在人类历史上和记忆中完全消失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使人们能够例外地认识到某个现存制度下的社会存在形式和政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97页。

治形式的内在联系，那末这种情况至少也是发生在这些形式已开始衰退或频于瓦解的时候，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作的分析就是这样。因此，在历史科学中，人类认识的产物本质上必然是相对的，因为这些认识只限于了解一定的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后果，这些形式只存在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民族之中，而且按其本性来说都是暂时的。"因此，谁要是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末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例如，人一般地说不劳动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现在大都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如此等等。"①

经过以上分析就可以看出，决不能根据在某些认识范围内存在着永恒真理的这一情况，就断然作出下述的结论：在人类历史的领域内也存在着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等等，它们也能够要求同数学知识类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杜林的形而上学的独断主义就正表现在这里。他的错误不在于一般地承认有永恒真理存在，而在于不能作具体的、辩证的分析，到处滥用永恒真理这个有严格规定的字眼。

杜林在真理问题上的错误，仍然根源于十八世纪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十八世纪的思想家看来，人类的理性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永恒的真理和正义包含在思维着的悟性之中，只要思维一旦发现了这种真正的和不变的真理，理性的王国就会在人间实现，而人类就能从充满迷信和谬误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在他们看来，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是愚昧和欺诈的结果，都应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这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98页。

样，历史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发展就被截然地割裂开来了，真理和谬误不是在历史发展和认识运动的过程中相互联结、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辩证的两极，而是绝对对立、互不相容的两个极端。或者是永恒真理，或者是绝对谬误，而决不可能是亦此亦彼。无论是启蒙思想家或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对历史的思维的产物所抱的态度都是如此。但是，这种认识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

恩格斯指出："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做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①恩格斯举出了波义耳定律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根据这一定律，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气体的体积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可是，后来雷尼奥发现，这一定律不适合于某些情况，并且证明波义耳定律只是近似地正确，特别是对于可以因压力而液化的气体，当压力接近于液化开始的那一点时，波义耳定律就失去效力了。这就说明，波义耳定律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才是正确的。即使在这个范围内，物理学家们也不能断定它是绝对地、最终地正确的。同时，在这个范围内，他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未来的研究给予波义耳定律的适用范围以更加严格的限制，或者根本改变这个定律的公式。然而，在物理学家们看来，波义耳定律所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99页。

包含的真理的可变性，并不表明它就不是真正的真理，因而就是谬误。这只表明了，波义耳定律同各门科学中迄今所获得的绝大多数的认识成果一样，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因而是相对的，它只能逐步地趋于完善。因此，一切真正科学的著作，照例都要避免使用象真正的、不变的、终极的真理这种教条的说法，而把所达到的科学认识上的成就视为相对真理。

杜林认为，他通过他的穷根究底的研究，在道德问题上可以进到最终的基础、基本的模式，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使道德的真理具有最后的、终极的性质。这种幻想是一切形而上学的思维者所共有的，然而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这是根本做不到的。无论自然界，也无论人类社会，事实上都不存在什么最终的基础和基本的模式，整个物质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会，是由无限多样的物质运动的形式组织的，在构成宇宙大厦的基础中，不存在被当作基本单元的最小砖块。因此，撇开物质世界的一切现存形式和关系，企图通过一种穷究底蕴的研究去发现它的最终基础和基本模式，这只能是形而上学的幻想。古典物理学企图在旧原子论的基础上建立整个物理世界的机械图景，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企图在人性论的基础上建立社会的自然体系，都证明了是完全行不通的。真理的永恒性或绝对性，不在于它们完成和实现了人类认识的终极目的，也不在于它们是至上的和根本不变的，而在于在这些相对的、可变的、不完善的认识中近似正确地反映了物质世界的某些运动形式，关系或一般规律，因而包含着永恒性或绝对性的因素。这就是说，永恒的或绝对的真理包含在逐步趋于完善的相对真理之中，它是由发展中的无数相对真理所构成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

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①

由此可见，在道德问题上也象在历史科学的其他任何问题上一样，不存在任何绝对的终极性，不存在凌驾于一切时代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

对此，恩格斯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②

恩格斯在这里谈到了“真正人的道德”，这是不是意味着这种道德是从人类的不变本性中或者从人类本性的最终的基础引伸出来的呢？

决不是这样。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真正人的道德”是和未来的真正人的社会相适应的，未来的社会即共产主义所以被称为真正人的社会，是由于它最终脱离了“动物界的经济形式”，在这种社会里，“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③所以，所谓“真正人的道德”正象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一样，是以

---

①②③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94—95、103、307—308页。

往全部历史发展的结果，而决不是从什么超历史的人类本性中引伸出来的。并且，这种道德也决不会是道德观念中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它将随着未来历史的变迁而进一步发展着。

道德观念是如此，法的观念（平等观念）也是如此。恩格斯证明了，现代平等观念的确立并获得其普遍的意义，是由于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结果。就以平等观念在近代的发展而论，平等这一观念，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它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以及在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当今差不多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然而，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的资产阶级所提出的平等要求，就是消灭阶级特权，而伴随着资产阶级并与之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所提出的平等要求，是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去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它的实际内容乃是消灭阶级。

因此，恩格斯说："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已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什么都是，就不是永恒的真理。"①而如果它象马克思所说的，"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那末这也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式的真理性，而是由于十八世纪的思想的普遍传播和仍然合乎潮流。既然平等观念本身包含着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的要求，杜林所讲的什么两个人在道德上、精神上完全平等的人是根本没有的，因此，无产阶级就宁愿用一个更鲜明而确切的口号来代替它，就是说它把平等的要求归结于消灭阶级。

---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17页。

此外，杜林的狂妄无知和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观点，还表现在他对自由和必然问题的看法上。

关于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哲学史上有着各种不同的回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主要有这样几种：一种观点认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可以自由地作出一切决定，不受任何客观条件限制，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另一种观点否认人的意志有自由，认为人的意志和行动都被机械的必然性所制约，不能有自由，这是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地夸大了自由或必然，把自由和必然看成是绝对对立的、固定不变的、不相容的。到了黑格尔那里，第一次把自由看做是对必然的认识。当然，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同样是以他的客观唯心主义为基础的。

杜林对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是怎样看的呢？他的观点是混乱的。他一时把自由说成是所谓合理认识和本能的冲动所构成的合力，即把自由看做是纯属认识范畴的问题，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而在另一个地方，杜林又说："我们把道德上的责任建立在自由之上，但是这种自由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按照先天的和后天的悟性对自觉动机的感受。所有这样的动机，不管如何觉察到行动中的可能的对立，总是以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性起着作用"。①这是对黑格尔观念的庸俗化，它强调自由是以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性的强制为依据，直接否定了杜林自己所提出的前面一个关于自由的定义。

恩格斯指出了杜林关于自由和必然问题上的混乱，揭示了它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同时在批判地改造黑格尔的观

①转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25页。

点的基础上，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的科学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黑格尔看到了自由和必然的联系，这无疑是比前人的认识进了一大步；然而，黑格尔所讲的必然，并不是客观事物的规律，他说："必然性是潜在的概念。"① 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观点的客观唯心主义基础，第一次依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正确地阐明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② 这就是说，自由是以对客观事物的必然规律的正确认识为依据的，同时，还要通过实践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人们在未认识到客观规律的时候，受客观规律支配，是没有自由的；只有认识了客观规律，并利用它来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时人才有一定的自由。

既然自由是在于根据对客观世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的世界，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必然性的认识和利用又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因此，恩格斯又指出，自由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是与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与社会发展史相一致的。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当人们学会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此后，随着文化上的每一个

①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7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25页。

进步，人的自由也就前进一步。而只有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实现了共产主义这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在这种制度下，才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当然，人对客观世界的必然性的认识和支配，总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因而人的自由也是有限度的、相对的，所谓绝对自由，在任何社会里都是不可能的。况且，到现今为止，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而杜林却硬说他的认识、观点具有绝对的意义，这是多么可笑啊！

第五节 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暴力论，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在社会历史领域，杜林认为历史是一种谬误、无知和野蛮、暴力和奴役的历史，因而对到当时为止的历史极为蔑视、厌恶；同时，他又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竭力鼓吹唯心主义的暴力论。

杜林说："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不过是一种作用或特殊情形，因而总是第二等的事实。有些最新的社会主义体系把完全相反的关系的一目了然的假象当做指导原则，他们以为政治从属似乎是从经济状态中产生的。当然，这些第二等的作用本身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在目前是最能使人感到的；但是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应先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①"从这样的原理出发：政

①转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3页。

治状态是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相反的关系只是第二等的反作用。”①这样，杜林就完全颠倒了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重弹了历史唯心主义的老调。恩格斯指出：把显赫的国家的政治行为看做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样一种观念，已经象历史记载本身一样古老了，正因为这样，在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献中关于民族发展的材料就极为稀少，而实际上民族的发展却是在喧嚣的政治舞台的背后悄悄地进行的。

根据杜林的基本模式，手持利剑的鲁滨逊迫使星期五去从事经济的服役，这是迄今存在的所有制产生的真正原因。这种暴力行为、政治行为，这种奴役构成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的出发点和基本事实。对此，恩格斯做了十分详细的批判。他证明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决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而是由于经济的原因。掠夺和暴力虽然可以改变财产的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而且无论如何，财产必须先由劳动生产出来，然后才能掠夺。

恩格斯指出，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决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私有财产制度早在古代的自发形成的公社中就已经出现了萌芽。从公社之间最初进行的交换中，使某几种劳动产品逐渐取得了商品的形式，并且在公社内部也开始出现了愈来愈经常的交换。而公社的产品愈采取商品的形式，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愈是转变为为了交换的目的而进行的生产，公社各个社员间的财产状况就愈加不平等。于是，旧的土地公有制就终于被埋葬，公社本身也逐渐瓦解为小农的乡村。虽然公社制度在东方存在了几千年，并且几千年来的专制制度和东征西讨的游牧民族交相更替

①转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3页。

的统治，都对这些旧的公社无可奈何，而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产品的输入所引起的自发的家庭工业的逐渐破坏，却使它们日益瓦解。所以，在私有制形成的任何地方，都是由于变化了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即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在这里，暴力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事实很清楚，在征服者和掠夺者能够占有他人的财物以前，私有财产的制度必然是早就存在了。

至于资本主义这种现代奴役制度的产生，也丝毫不能用暴力或基于暴力的所有制来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商品生产达到一定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末，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全部过程都为纯经济原因所说明，而毫不需要任何掠夺、暴力、国家或其他的政治干预。"① 如果"政治状态是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那末，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胜利的就不应当是资产阶级，而是拥有政治暴力的封建制度本身。事实上，资产阶级对封建制度的胜利，只是通过"经济情况"的改变而实现的，而政治状态的改变则是或早或迟、或自愿或通过斗争随之发生的。在市民等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整个斗争中，决定性的武器是他们手中的愈来愈强大的经济力量，这种力量，由于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展而不断增长起来。在这整个斗争中，政治暴力始终在贵族方面，只有一个较短的时期是例外，那时王权利用市民等级反对贵族。但到了后来，当资产阶级因其经济力量的增长而变得危险起来的时候，王权就同贵族联合起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8页。

来，但是这时资产阶级已经不是任何政治暴力所能压服的了，随之而发生的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终于把王权和封建贵族的统治一并扫除了。

可见，革命不是按照杜林的原则，使经济情况适应于政治状态，而是相反地把陈腐的政治废物抛开，并造成能够适应于新的“经济情况”的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状态。资产阶级只是在现今才求助于暴力，因为这时它所拥有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它的领导，“经济情况”发展的结果，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同它的意志和愿望背道而驰，以致使整个资产阶级制度面临着这样结局：它或者被推向毁灭，或者实现不可避免的革命。这样，就迫使它象其初的封建贵族一样不得不求助于暴力，以挽救日益瓦解的“经济情况”免于崩溃。资产阶级如今也陷入了杜林所陷入的那条迷途，以为“政治状态是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以为用“本原的东西”、“直接的政治暴力”就能改造那些“第二等的事实”，即改造经济情况及其不可避免的发展，以为“用克虏伯炮和毛瑟枪就能把蒸汽机和由它发动的现代机器的经济效果，把世界贸易以及现代银行和信用的发展的经济效果从世界上消除掉”。① 但是，资产阶级的这种想入非非的幻想照例也是要破灭的。“如果撇开征服的情况不谈，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②

如果杜林坚持说暴力是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原因，那末暴力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暴力可以改变产品的消费，但是不能改变生产方式本身，它不能使徭役劳动转变为雇佣劳动，除非实现这种转

①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80、199页。

变的条件已经具备，并且已是经济本身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且，历史上出现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也不应该用始终一样的暴力来说明，而必须从它们各自的内在必然性中来说明。这就是说，必须用被施加暴力的东西，用那个时代的产品和生产力以及从它们自身中产生的分配来说明。所以，问题正在于如何说明阶级、压迫、政治暴力和国家权力的产生与发展，而不应只是用“暴力”一词来解释。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权力和一切政治暴力都起源于经济条件，起源于各族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①

在人类历史上，这种社会权力和政治暴力最初是经过两条道路产生的：一条道路，是从原始的农业公社的某些公共职能中产生了国家权力的最初萌芽。最初，原始公社中的人们为了维护一定的公共利益，把某些社会职能，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的越权，监督用水以及宗教祭祀等等，委托给某些个人去执行，这些职位后来由习惯而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某种全权，这就出现了国家权力的最初萌芽。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密度的增加，产生了公社之间的联合的趋势，一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并引起新的分工，于是又需要有新的社会机构来保护公社的共同利益，并代表公社利益解决和邻近公社之间的纠纷。这样，随着整个集体的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些机构在对每个单个公社的关系上，就取得越来越独立的地位和权力。与此同时，由于自然形成的原因，某些社会职位也逐渐变成世袭的了。正是这样，社会职能对社会本身的这种独立化就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最初的社会公仆在各种相应的条件下逐渐变成了社会的主人。恩格斯说：无论东方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36页。

和西方各民族的历史可能有着极为不同的特点，“问题在于确定这样的事实：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①

除了上述的阶级形成的过程之外，还有另一条阶级形成的途径，这就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在公社内部引起了分化，某些农业家族内自然形成的分工在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它就有可能从外面吸取少量的劳动力。但是，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生产力已经有了一定发展的条件下，一方面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另一方面维持更多的劳动力和使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于是，奴隶劳动的最初形态就出现了。但是，公社内部还不能提供多余的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而战争却提供了这种劳动力，人们不再把战争的俘虏杀掉或吃掉，而是把他们变为可供服役的奴隶，这样，奴隶制就产生了。可见，奴隶制的出现也不是单纯用暴力所能说明的，它的出现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从那时以来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恩格斯说：“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5页。

正是奴隶制。”①

由此可见，阶级、奴役和政治统治的发生和发展。必然是以一定的经济状况为基础的。到目前为止，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一切历史对立，都能够从社会生产力的相对地不发展的状况中得到说明。

恩格斯说：“当实际劳动的人口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以致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例如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的时候，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②

由此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和经济情况相比，政治暴力在历史上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一切政治权力最初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随着社会成员由于原始公社的瓦解而变为私人生产者，这种权力就以普遍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和社会相独立并且获得不断的加强。在政治权力获得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独立性以后，它的作用可能朝着两个方向发生：或者它按照和经济发展规律相一致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仅不和经济发展相冲突，而且将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或者它违反经济发展的规律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少数的征服事件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在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事件中，由于毁坏了大量生产力，经济发展通常都受到了阻碍。但是，只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这些较野蛮的征服者，都不得不适应被

①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7、198页。

征服国家的较高的"经济情况"，就是说，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

不仅暴力的存在和起源都是以一定的经济情况为前提的，而且暴力本身也必须以经济为基础，要知道暴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在任何情况下，暴力都不单纯是一种意志行为，它要求促使意志行为得到实现的非常现实的前提。恩格斯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①

恩格斯举出武器和作战方法的发展史，清楚地说明了经济情况对暴力的决定作用。火药，从十四世纪初自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也起了变革的作用，然而，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它乃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从中世纪骑士的盔甲和长矛，经过各个中间阶段，直至当时先进的装有刺刀的后装线膛枪、野炮和铁甲军舰的出现，每一步的进展本身，都是为工业生产的发展所决定的。作战队形由中空的四边形到纵队再到以散兵和步兵纵队的配合为基础的新的作战方式，这一系列改变，都是由武器的进步和士兵的来源的不同即经济关系的不同所引起的。从海军舰队的发展看，同样是由工业生产等经济情况决定的，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军舰的建造和它的管理本身都成为现代大工业的一个部门。可见，军队的武器、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都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具体说来，取决于人民的数量与质量以及工业和技术的发展。在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81页。

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

恩格斯还指出，军国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暴力发展的必然现象。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必然性，是为经济发展决定的。军国主义由于它自身的辩证法而必然趋于毁灭，而这个辩证法，则仅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辩证法的一种表现。

总之，暴力都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的，经济情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这恰恰说明了，本原的东西不仅不应该从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且暴力本身还必然扎根于某种本原的东西。"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是占有大工业这一强大的手段。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而正是取决于经济力量，即冶金工业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的号令权和丰富的煤矿。"①这清楚地说明，杜林所说的作为"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的"直接的政治暴力"，反而是完全受经济情况支配的。

杜林戴着基督教道德的眼镜，把暴力看做"原罪"，看做是"绝对的坏事"，似乎暴力玷污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把道德和法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给践踏和歪曲了。但实际上，暴力的应用决不仅仅表现了人类道德的堕落，它有时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那就是在每一次运用了革命暴力之后，都引起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涨。除非是那种"软弱无力的传教士式的思维方式"，任何具有清醒头脑的人都不会忽视暴力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89页。

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①

由上可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以人类社会发展的丰富的事实和科学地说明这些事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彻底揭露和批判了杜林宣扬的暴力论的唯心主义实质，深刻地阐明了经济和政治、暴力的关系，分析了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历史根源，论证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观，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0页。

第九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恩格斯一生中重要的科学著作之一，完成于1884年３—５月，在1891年再版时又作了较大的增补和修订。恩格斯这本书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在美国史前史学家摩尔根的伟大发现的基础上，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原始社会史的系统研究，用严格科学的方法解决了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其向文明时代过渡的问题，从而不仅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重大空白，而且在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第一节　恩格斯创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揭示人类社会初期的真实历史

1883年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毅然肩负起马克思生前所未能完成的几乎全部工作重担。为了整理马克思的遗稿，继续出版《资本论》，他不得不中断已经进行了十年之久的《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和著述。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每一项理论研究工作都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凡是马克思生前从事而未能完成的工

作，他都不惜搁置自己的研究计划而尽力首先加以完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执行马克思的遗言，完成马克思业已开始着手的工作。恩格斯说，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曾打算联系唯物主义历史观来阐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说明这些成果对于证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正确性所具有的全部意义。

1877年，美国史前史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发表了他的划时代的著作：《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他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人类成文历史的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一切文明民族的上古史上的一些极为重要而又一直未能解决的哑谜的钥匙。

摩尔根的著作不是一朝一夕的研究成果。十九世纪40年代初，摩尔根参加了一个以研究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为宗旨的团体——“大易洛魁社”。为了获得和掌握所需要的材料，他前后用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时间，并被易洛魁的塞纳卡部落鹰氏族收养入族。1851年，摩尔根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研究印第安人的重要著作《易洛魁联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科学态度来研究印第安人的著作。此后，他又从易洛魁人的特殊的亲属关系出发，从事世界上各民族亲属制度的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于1871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原始社会史的著作：《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提供了关于当时尚在夏威夷群岛上存在着的普那路亚家庭的材料。摩尔根根据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和夏威夷群岛上土著居民中的家庭关系和亲属称谓制度之间的矛盾，从一系列互相关联的亲属称谓制度中，推出了在原始社会史上相继出现的各种家庭形态，对原始家庭形态的发展作出了科学的说明。同时，从原始

家庭的发展线索中，摩尔根揭示了氏族制度的起源和本质，明确地把氏族和部落区别开来，并证明母权制氏族是先于父权制氏族的最初形式。尤其可取的是，在史前历史的分期上，摩尔根看到了生产发展的决定作用，认为生活资料生产上的进步是人类从蒙昧时代向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过渡的动力，因而也是划分史前各文化阶段的标准。

由于以上情况，摩尔根的著作象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样，一开始就受到马克思的赞同和关注，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这本书，并且很快推荐给恩格斯。1881——1882年，马克思专门研究了摩尔根的著作，作了十分详细的摘录和评注。他打算以摩尔根的发现为基础，写一部关于原始社会史的著作。这一著作可以把他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对人类历史的研究扩展到文明社会以前的整个史前时代，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它是《资本论》的续篇。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立即着手这件工作，其原因也在于此。恩格斯认为："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①

这件事对于巩固地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地位具有无限重要的意义。正如《资本论》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丰富实践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一样，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也在相同的意义上提供了这种证明。然而，摩尔根的阐述方式毕竟还不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满意。这一方面是因为，摩尔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因而未能完全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

理解他的研究成果的理论意义并加以充分的阐述；另一方面，从摩尔根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虽然已发现的关于史前史的大量材料雄辩地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但是，刚刚从动物界脱离出来的人类社会毕竟有着自己特异的现象和规律，对于这些现象和规律必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加以科学的说明，而这样做的结果，又必然会大大地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从40年代中期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探索私有制的起源，就注意对原始社会的研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曾谈到原始的部落所有制，谈到人类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但在那时，人们对原始社会史的研究（考古学和民族学）整个说来还处于初步阶段，史实材料的缺乏，使他们没有可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运用来分析人类早期社会的一些极重要的现象，例如氏族制度。正如恩格斯所说："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① 因此，在《共产党宣言》中还是作出了这样的论断：全部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然而，到了50年代初，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只是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从这以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问题就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并且首先在理论上进行了探讨和说明。1857——1858年，马克思在为写作《资本论》而准备的手稿中，一般地探讨了原始社会的组织问题，他认为由血缘关系所结成的原始共同体是人类历史上最初形成的社会组织，氏族和部落是这种共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4页注②。

同体所经历的几个阶段。稍后出现的共同体就是以地域的联系为基础的，只是到这时，财产关系才在共同体的构成中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不过土地等自然因素仍然是把人们联结在一起的重要纽带。马克思的这个分析已经预示出对原始社会史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此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更加具体地从政治经济学上探讨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问题，认为阶级和统治关系的产生一般地经过了两条途径：第一条途径是，从原始的农业公社的某些职能中产生了国家权力的最初萌芽，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这些社会职能逐渐脱离社会而独立，并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第二条途径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在公社内部引起了阶级分化，于是国家就作为阶级统治的机关而产生出来。

所以毫不奇怪，当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发表，就立刻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欢迎和重视，并且都怀着极大的兴趣投入到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中去。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除了根据摩尔根的著作所提供的材料，还广泛地搜集了当时的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所积累的大量资料。在十九世纪中叶后，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英国历史学家格罗脱（1794—1871）在1846—1856年间编著的《希腊史》中，提供了古希腊人中存在着一些氏族制度和习俗的证据；德国历史学家毛勒（1790—1872）在他的著作《马尔克、田庄、村落、都市制度和公共权力的历史导言》、《日耳曼领主庄园、农民场院和田庄制度的历史》、《日耳曼都市制度的历史》中，详细地说明了古代日耳曼村社土地所有制的情况，考察了日耳曼国家公共权力从马尔克、村落、田庄及都市原始组织中逐渐产生出来的情形；英国

民族学家累瑟姆（1812—1888）在《叙述民族学》（1859年）中，真实地记述了印度马格尔人的族外婚情形，并指出这种婚制在古代曾普遍流行；英国学者麦克伦南（1827—1881）在《原始婚姻》(1865年)中，也提供了许多民族中存在着氏族制度的材料；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1815—1887）在其《母权论》（1861年）中，根据大量古籍作比较研究后指出，在远古社会中曾有过母权统治和按母系计算血统与继承财产的制度。

恩格斯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早就开始了独立的研究，准备写《爱尔兰的历史》，由于发生了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只写出该书的第一章“自然条件”和第二章“古代的爱尔兰”的一部分。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七章论克尔特人的氏族中，就利用了这些研究成果。1881—1882年，恩格斯写了《论日耳曼人的历史》和《法兰克时代》。1882年12月，他又写了《马尔克》一文。此外，恩格斯在1891年增补和修订《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时，还研究了俄国学者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的《原始时代的法》（1886年）、《家庭及私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法国民族学家勒士尔诺的《婚姻和家庭的进化》（1888年），芬兰社会学家威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1891年），德国学者库诺夫的《古秘鲁的农村和马克公社》（1890年）等著作，批判地吸取了这些著作中有价值的材料，特别是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二章“家庭”作了重要的补充，订正了一些不确切的地方。

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直接给工人阶级提供了思想武器。在国家问题的阐述上，恩格斯是把反对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错误理论作为论战的目的的。当时，资产阶级除了加强其国家机器镇压工人

和劳动人民外，还在理论上美化资产阶级国家，宣传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迷信；同时，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者也宣扬国家是超阶级的东西，鼓吹通过资产阶级的“国家帮助”来实行社会主义，因而，国家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关于国家的这些谬论，就必须从理论上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这就得说明国家的起源。要说明国家的起源，就得说明与之相关联的氏族制度产生、发展、解体和私有制的产生，以及家庭的起源和发展。可见，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是为着完成当时的迫切的战斗任务。因此，他认为：“如果只是‘客观地’叙述摩尔根的著作，对它不作批判的探讨，不利用新得出的成果，不同我们的观点和已经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阐述，那就没有意义了。这对我们的工人不会有什么帮助。”①

第二节　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生活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个原理应如何应用于原始社会史的研究，这是恩格斯首先需要解决的理论难题。当人类还刚刚从动物界脱离出来的时候，无论就人对自然界的关系来说，或是就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来说，占支配地位的东西，都还不是人们在自己的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的。虽然一般地说来，只要有生产，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就具有生产关系的性质。但是，只有当人们赖以生活的资料主要地不是依靠自然的供给，而

①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4年4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4页。

是完全由人们自己的劳动所创造和加以调节的时候，生产关系才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占居决定性的地位。因此，说生产关系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这是就业已"成熟"的人类社会而言的，对于人类的幼年和童年时代，对于正在形成中的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却还不是决定的和支配一切的关系，它还被裹在自然形成的血缘关系的胞胎之中。因此，要理解原始社会的结构和组织，揭示人类史前史的发展规律，不能只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出发，而且应从人类幼年时代自然形成的关系出发，亦即从人类本身的生产出发。这就是说，必须研究两种生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恩格斯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①

根据恩格斯的观点，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物质生产关系和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成反比例地发展的。在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血族关系无疑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但是，随着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私有制、交换和人们之间的财产差别也日益发展起来，从这种财产差别中又产生了阶级的对立。所有这些新的社会因素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逐渐挣脱旧的血缘关系的纽带，直到最后完全按新的方式组成社会为止。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①

恩格斯认为，虽然历史唯物主义是支配全部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但是，人类史前历史的内容和成文历史的内容却有着显著的差别。在全部成文历史中，经济关系始终是占支配地位的关系，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而在史前社会中，情形却不是这样，在那里，经济关系的地位和作用只是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增加其比重的。在经济关系尚未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血缘亲属关系无疑起着决定的作用，不然，人们就不能解释氏族制度的起源及其发展。

由摩尔根所发现的夏威夷岛上的土著居民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家庭与姻亲关系的材料证明：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人们决不能只用空话来抹煞这一如此广泛流行的制度的意义，而应该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正确地解释这一点。在蒙昧和野蛮时代，"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②在这种情况下，把血缘亲属关系和由

①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4页。

这种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制度归结为经济关系，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般原理来解释蒙昧和野蛮时代的社会制度，那将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说明的。如果一定要寻找这种制度的经济原因，那末它们的经济基础也只能是否定性的。这就是说，正因为劳动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和财产关系的不发展，所以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经济因素才不起决定作用，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才为血族关系的性质即家庭发展的形式所决定。

诚然，包括摩尔根在内，都肯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人类历史（其中也包括史前历史）发展的动力。他指出："人类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出发，向高级阶段上升，这一重要事实，由顺序相承的各种人类生存技术上可以看得非常明显。人类能不能征服地球，完全取决于他们生存技术之巧拙。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类才能说对食物的生产取得了绝对控制权；……归根到底，假如人类对食物的品种和数量不能绝对掌握，就不可能蕃衍为许多人口稠密的民族。因此，人类进步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的新纪元大概多少都与生活资源的扩大有着相应一致的关系。"①因此，原始家庭形式的每一个进步也都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和推动下所取得的，并且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在原始时代，人本身便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因而人类自身的生产对于生产力的状况具有决定的意义。在蒙昧和野蛮时代，家庭形式所经历的变化起初都是遵循着自然选择的原则进行的。"被共同的婚姻纽带所连结的范围，起初是很广泛的，后来越来越缩小，直到最后只留下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成对配偶为止。"②

①〔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8页。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

家庭形式的发展和变化，一方面是由于自然选择的原则发生作用，即人们终于发现了：凡血亲婚配进一步受到限制的部落，其发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之间的婚姻当做惯例和义务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恩格斯说："这一进步的影响有多么强大，可以由氏族的建立来作证明；氏族就是由这一进步直接引起的，而且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它构成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多数的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并且在希腊和罗马我们还由氏族直接进入了文明时代。"①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个体独立生活的能力也在不断地增强，因而群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也愈来愈减弱。与此同时，分工、私有财产和交换也逐渐发展起来，在旧的血缘关系的胎胞内产生了财产关系的新因素，于是家庭形式的发展又获得了新的动力，直到以财产关系为基础的新家庭形式（个体家庭）完全取代了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旧家庭形式为止。

原始共产主义的经济关系是以生产力的极端低下为前提的，物质生活的极端贫乏使任何真正的财产所有制都不可能产生出来。所谓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财产的公有制也只能在否定性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并且严格说来对史前时代使用法学用语也是不科学的。所有制是历史范畴，它仅仅是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在它尚未产生出来以前或仅仅处于萌芽阶段的时候，自然谈不上它对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影响。所以，在从血缘家庭到对偶家庭的发展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不是经济规律，而是自然规律，是自然选择的原则。"把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带入婚姻关系之中，这种新的做法的影响必然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它有利于创造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4页。

一种在体力和智力两个方面都更为强健的种族。不同种族的结合所带来的利益，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当两个具有强健的体力与智力的、处于开化中的部落，因为野蛮生活中的偶然事件而结合在一起并混为一个民族的时候，新生一代的颅骨和脑髓将扩大到相当于两个部落才能的总和。”①

到了野蛮时代的初级阶段，部落内部的婚姻禁例日益增多，一切亲属之间都被禁止结婚，为数多至数百种。这样，就使任何形式的群婚都成为不可能的了，它终于为对偶家庭所排挤。“在成对配偶制中，群已经减缩到它的最后单位，仅由两个原子组成的分子，即一男和一女。自然选择已经通过日益缩小婚姻关系的范围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这一方面，它再也没有事可做了。因此，如果没有新的、社会的动力发生作用，那末，从成对配偶制中就没有任何根据产生新的家庭形式了。但是，这种动力开始发生作用了。”②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新的、社会的动力”乃是指刚刚发展起来的私有财产制度。只是从这时起，经济关系才对家庭形式从而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发展发生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见，原始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即使它早已产生并确实地存在着，它对原始社会制度的发展也未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过是人类的自然状态的延续，是传统的消极的产物，而不是由人们自身创造的、积极的、社会的因素。

在对偶婚制开始出现的时候，由于它本身还很脆弱，还很不稳定，还“不能使人需要有或者只是愿意有自己的家庭经济，因此它根本没有使早期传下来的共产制家庭经济解体。”③只是伴

①〔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64页。

②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43页。

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而产生了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以后，这种共产主义的家庭经济才最后崩溃，同时，母系氏族就过渡到父系氏族。而从建立了父系氏族的时候起，财产关系的支配作用就日益显露出来了。由此以后，才能谈到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

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作的重大发展，不然人类史前时代的漫长的历史就无从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然而人类起源于动物，从人类刚刚由动物界脱离出来的时候起，到形成由人们自身所创造的社会为止，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的开始阶段，支配人类肉体生产的自然规律必然起着决定的作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人类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也就在多大程度上打上自然的烙印。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的：人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人们相互之间的狭隘关系。真正的人类社会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人类在通过劳动生产自己生活的同时，也创造着自己的社会关系。所以，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不是以自然的产物而是以自己所创造的产物为其生活资料的源泉，则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自然关系的性质。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充分发展，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具有纯经济的性质。在马克思为准备《资本论》的写作而写成的手稿中，他把人类社会关系的发展归结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包括整个史前时代。在这个时期内形成的人类共同体是以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和纽带的，原始群、氏族和部落是这种原始共同体所经历的几个阶段。第二个时期，包括以地产为主要内容的私有制发展时期。这时出现的共同

体是以地域的联系为基础的。虽然在这种共同体内，财产关系已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但是把人们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仍旧主要是自然形成的因素（土地）。这时社会的权力通常表现为土地的属性，而统治者也依然具有自然尊长的威严。第三个时期，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确立而到来的。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和交换的普遍化，由劳动所创造的物质条件越来越成为生产的主要手段，于是以自然因素为纽带的共同体的存在就完全成为不必要的了。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甚至在家庭内部，一切超出经济以外的关系就都荡然无存了。由此可见，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人们克服自然条件的统制而走向独立的过程，也正是他们摆脱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而使之解体的过程。

资产阶级总是只看到“孤立化”的个人，总是把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强调到绝对的地步。他们不了解，所谓“孤立化”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商品生产和交换是促成个人“孤立化”的主要手段。他们尤其不了解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貌似“独立”和“自由”的个人其实是被牢牢地束缚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之中的。人们越是脱离了原始的共同体，就越是陷入由商品生产所开辟的更为普遍的经济关系之中。这种商品经济关系仍然把单个的人们锁在社会的共同体内，成为这个共同体的锁链上的一环。所不同的，只是这种共同体不再出现在自然形态上，而是作为纯经济的关系表现在“价值形态”上。懂得了这个自然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历史辩证法，对于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的理论就不会感到奇怪而不可理解了。相反，如果不科学地阐明这个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就显然是不够完备的。

责备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为二元论的人们，其实是不

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象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曲解的那样是所谓“经济唯物主义”，似乎它只承认经济因素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是唯一地决定历史发展的动力，似乎只有对经济利益的考虑才是决定人们行动的最后动机。如果真是这样，不仅氏族制度以前的整个历史无从解释，而且人类的未来也注定不能摆脱经济利益的困扰，共产主义自然也就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空中楼阁。既然人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无限的，因而不管生产有了怎样高度的发展，人们始终都将生活在一种匮乏的世界中，所以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现代西方的某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就正是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不言而喻，这种理解历史的方式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庸俗唯物主义。只有抱着资产阶级的庸俗观点的人才会认为人类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是永远没有止境的。

事实上，人类既不会永远成为自然界的奴隶，也不会永远成为无止境地追求物质利益的奴隶，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对人自身的改造是同时进行的，要知道人本身也是来自自然界、属于自然界的。人类越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改造和征服了自然界，它本身也就离开自然界即动物界越远。因此，人类愈是脱离自然界而独立，那种源出于动物界的经济形式也就愈是丧失其支配作用。这就是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类的基本生活需要获得充分的、普遍的满足，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关心也必将愈来愈减弱。于是，造就一种新型的全面发展的人类个体的任务就会提到历史发展的日程上来。从这时开始，人类自身的“生产”必将较之单纯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处于更加优先的地位。从全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人类自身的生产既是出发点，又是最终的结果。区别只是，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这种生产只能通过自然

选择的道路来进行，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就将拥有足够的物质手段来创造全面发展的个人。只有在那时，物质资料的生产本身才不再是目的，创造全面发展的个人才是决定人们行动的直接动机。

由此可见，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决不是出于暂时的偶然的考虑，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它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而且在基本观点上也是和马克思完全一致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段话全文抄录在下面。马克思说："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能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

第三节 社会、家庭和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思想家在考察社会问题时总是循着相反的次序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坚持从社会出发，在研究社会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过程中考察家庭形式和个人的发展；而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都因袭了十八世纪以来的传统思想方法，把个人看做是社会的原子，社会仅仅是个人的集合体，就其本身的意义来说不过是一种抽象。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等人所提供的极其丰富的材料，证明了这种观点是绝对错误的。即使说所谓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真的是构成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那末这种家庭的出现也是晚近得多的事情，人类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并不是生活在家庭中，而是仅仅生活在社会中，那时存在的所谓家庭只是就传统和习惯所允许的男女婚配的一定范围而言的，他们（夫妻双方）甚至并不生活在同一个集团内。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氏族制度之下，家庭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组织单位，因为夫与妻必然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氏族整个包括在胞族内，胞族整个包括在部落内；而家庭却是一半包括在丈夫的氏族内，一半包括在妻子的氏族内。……然而我们的全部历史科学直至现在都是从以下一个荒诞的，尤其在十八世纪已成为不可侵犯的假定出发的：未必早于文明时代的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曾是社会和国家赖以逐渐凝结起来的核心。"①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7页。

在人类处于最初的原始状态的时候，曾经盛行着一种毫无限制的性交关系，即同一个群体内部的每一个男子都属于每一个女子，而每一个女子也属于每一个男子，在这个杂乱性交的社会阶段，不存在社会以外的家庭和家庭以外的社会。人类性生活的这个初期阶段的情况，甚至在动物界也不是到处都能发现的。例如，在人类的近亲——猕猴类和四种类人猿中，雌雄的配合也被认为存在着种种不同的差别，它们有时是“一夫一妻制”，有时是“多偶制”。可是，应该受到更多尊重的人类却无疑曾经过着杂乱性交的生活。其中的秘密甚至已由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不自觉地透露出来了。例如勒士尔诺承认：“在哺乳动物中，智力发展的程度和性交关系的形式之间，根本没有严格的关系。”①而埃斯潘纳斯则更加直率地承认：“群是我们在动物中所能看到的最高的社会集团。它看来是由家庭构成的，但是家庭和群一开始就处在对抗之中，它们是以反比例发展的。”②

既然高等动物的群和家庭不是互相补充而是互相排斥的，因而，迫于群居生活的需要，就使任何形式的家庭都不能从一开始就发展起来。埃斯潘纳斯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动物社会中家庭和群互相排斥的情形：“在家庭紧密结合的地方，群只是一种稀有的例外。反之，在自由的性交关系或多偶制盛行的地方，差不多是自然地组成了群”。③如果在动物社会中存在着雄性的嫉妒和由此而产生的某种形式的家庭，但是，并不能由此推断人类早期阶

①沙·勒士尔：《婚姻和家庭之进化》，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页。

②埃斯潘纳斯：《论动物的社会》，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页。

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页。

段的杂乱性交是未曾存在过的。恰恰相反，正由于雄者的嫉妒既联系又限制着动物的家庭，使动物的家庭和群对立起来，使作为共居生活的最高形式的群遭到瓦解或削弱，因而这种情形才决不会在最初的人类社会中发生和发展起来。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动物的家庭和人类的原始社会是两个不相容的东西，脱离动物状态的原始人类，或者根本没有家庭，或者至多只有动物中所没有的那种家庭。一种没有武器的象正在形成中的人这样的动物，以成对配偶为共居生活的最高形式，它们即使能够以不多的数量勉强地延续下来，但是为了获得更强劲有力的发展，却还必须具有另一种因素，这就是由群居生活所产生的力量。恩格斯说："但是，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①如果说，现今类人猿的家庭形式和原始人类的家庭形式有着较大的差别，那末这种差别的存在也正是现今的类人猿之所以不能实现向人类过渡的根本原因。从种种迹象来看，这种类人猿不如说是一种正在走向衰亡的、脱离正轨的旁系。

从杂乱性交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人类最古老的家庭形式是群婚，即整个一群男子与整个一群女子互为所有。这种家庭形式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

群婚的第一个阶段是"血缘家庭"。在这里，婚姻集团是按照辈数来划分的，在同一家庭范围内的每一代人，都既互为兄弟姊妹，也互为夫妇。唯一的婚姻限制是排除了父母和子女等非同辈之间的性交交系。这种家庭是人类在保持群居生活的前提下所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页。

实现的第一个进步。

群婚的第二个阶段是“普那路亚家庭”。这种家庭进一步排除了兄弟姊妹之间的婚姻关系，其初从排除同胞（同母）的兄弟和姊妹之间的性交关系开始，后来逐渐扩大到禁止一切旁系兄弟姊妹之间的结婚，用现代的称谓来说，就是禁止同胞兄弟姊妹的子女、孙子女以及曾孙子女之间结婚。在这种家庭形式下，兄弟姊妹必须分属于不同的婚姻集团。一方面，一列或数列姊妹成为一个公社的核心，她们互称为普那路亚，另一方面，她们的兄弟则组成另一个公社的核心，他们也互称为普那路亚。虽然在每个婚姻集团中，仍然实行着共夫共妻的制度，但是在妻子一方已经排除了丈夫的姊妹，而在丈夫一方也排除了妻子的兄弟。婚姻关系上的这一进步，对于人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意义，它直接导致了氏族制度的建立，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氏族制度都是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造成这一进步的原因，一方面是人类终于发现了自然选择原则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原始共产制家庭经济的规模的限制，使原始家庭的分裂成为必要的了。

随着氏族制度逐渐地成为社会制度的基础，婚姻限制的范围愈来愈大，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显露出来了。由于在氏族内部都严格禁止结婚，而世系又只能从母系方面来确定，因此氏族内部的每一个男性成员都必须无例外地在另一氏族中组成自己的家庭，而他作为氏族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又只能来自他原来的氏族。可见在氏族制度下，家庭形式只具有从属的意义，两性关系的纽带较之按母系确定的血缘亲属关系要脆弱得多。在这个阶段上，无论家庭和个人都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从社会（氏族）中独立出来。

由于氏族制度在禁止血缘亲属结婚方面起了有力的推动作

用，终于在一切亲属之间都普遍禁止结婚，这就使任何形式的群婚都成为不可能的了。于是群婚就被“对偶家庭”所排挤。所谓对偶家庭是一种并不牢固的个体婚制。在这一阶段上，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不过多妻和偶尔的通奸，则仍然是男子的权利，虽然由于经济的原因，很少有实行多妻制的；同时，在同居期间，多半都要求妇女严守贞操，要是有了通奸的事情，便残酷地加以处罚。不过婚姻关系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撕破的，而子女则象以前一样仍然只属于母亲一方。

从血缘家庭到对偶家庭的发展过程是在自然选择原则的作用下进行的。它所遵循的方向是不断缩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在内的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由于次第排斥亲属通婚，从血统较近的亲属直到愈来愈远的旁亲逐渐禁止通婚，因此任何群婚形式终于在实际上都成为不可能的了。由此可以看出，个体婚制的最初形成决不象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个人性爱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然而，对偶家庭的产生毕竟是家庭发展史上的一个新因素，它为从原始家庭向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过渡提供了自然的出发点。从对偶家庭进一步向前发展，已不能通过缩小婚姻范围的途径来实现，因为群已经减缩到它的最后单位，仅由两个原子（一男一女）组成的分子，自然选择原则所要完成的使命实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新的动力才能促使新的家庭形式的产生。而从这时起，这种新的动力也就开始发生作用了。

迄今以前，自然形成的关系一直在原始人类的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缓慢而持续的发展，人们创造出了越来越多的财富，这些新的财富到底归谁所有呢？最初无疑是归氏族所有。但是在女系氏族制度下，由于婚姻家庭关系的复杂情况，

作为财富的创造者的成年男性及其子女虽然生活于同一个家庭内却不属于同一氏族。这一矛盾必然促使财产逐渐转归家庭所有，从而使驯养的家畜和繁殖的畜群转而成为家庭内一家之长的特殊财产。“这些财富，一旦转归各个家庭私有并且迅速增加起来，就给了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有力的打击。”①

根据母权制，男性死者的子女并不属于死者的氏族，而是属于他们的母亲的氏族，因此他们不能继承父亲的财产，其父亲的财产应该转归父亲自己的氏族。所以，当畜群的所有者死去以后，他的畜群应该转归他的兄弟姊妹和他的姊妹的子女所有，他自己的子女是不许继承的。这种由传统保持下来的制度和正在发展着的私有财产关系之间的尖锐矛盾，使母系氏族制度的解体成为不可避免的。同时，由于在两性之间早已存在的分工，使男子在家庭内的地位也越来越变得更重要。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居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②于是母权制就被废除了。

这虽是人类所经历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但它的发生却并不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这并不需要侵害任何一个氏族成员的既得利益。它只需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规定以后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留在本氏族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离开本氏族，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

从这时起，血缘亲属关系就最后失去其支配作用了，而财产

①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1页。

关系则取得了决定一切的地位。自然形成的关系让位于人们自身所创造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在人们生产自己的财富的时候一同生产出来的。人类正是带着这种由自身所创造的关系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一旦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家庭就立刻失去了原始家庭的自然质朴的性质。

随着母权制的被推翻，丈夫在家庭中掌握了权柄，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生育子女的简单工具了。这样确立的男子独裁制的第一个结果，表现在这时发生的家长制家庭这一中间形式上。这一形式的主要特点，是若干数目的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在家长的父权之下组成一个家庭。这就是说，家长制家庭的主要标志，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一是父权。它的最完善的典型形式是罗马家庭。恩格斯说“Familia〔家庭〕这个词，起初并不是表示现代庸人的那种脉脉温情同家庭龃龉相结合的理想；在罗马人那里，它起初甚至不是指夫妻及其子女，而只是指奴隶。Famulus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奴隶，而familia则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①

可见，家庭这一用语乃是罗马人所发明，用以表示一种新的社会机体，这种机体的首长即家长，以父权的身份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对于这一点，马克思说：“现代家族在胚胎时期就不仅包有servitus（奴隶制），而且也含有农奴制，因为它从最初起就和土地的赋役有关。它含有后来在社会和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一切对抗性的缩影。”②由此可见，当经济关系一旦支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53页。

②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8页。

并且渗透到家庭的机体中去以后，社会就立刻分裂为阶级，而家庭内部的奴役制，男子对妇女的统治，也就开始确立起来了。

一般说来，家长制家庭是从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形式。这种过渡家庭形式的遗迹甚至在若干文明民族中还可以找到。不过它们并不都具有罗马家庭那样的压迫性质，而是表现为母权制氏族公社的解体形式。例如，在南斯拉夫人中间它们是被称为Zádruga〔扎德鲁加〕（大意为大家庭）和Bratstvo（胞族社）的家长制家庭公社。在这种家庭中，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他们住在一起，共同耕种自己的田地，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储存，共同占有剩余产品。整个家庭处于一个家长（domaćin）的最高管理之下。家长对外代表公社，有权出让小物品，掌管账目，并对账目和整个家务的正常经营负责。他是经选举产生的，不一定是最年长的尊辈。在家长之外，妇女和她们的工作受主妇（domaćina）领导，主妇通常是家长的妻子。然而，最高权力仍然集中在家庭会议即全体成年男女的会议中，家长向这个会议作报告，会议通过各项最后的决定，对公社成员间的争端进行裁判，以及对比较重大的买卖特别是地产的买卖等做出决定。包括在这种家庭中的非自由人，自然是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

如果说，在群婚制度下，家庭形式的发展是按照自然选择的原则愈来愈缩小两性婚配的范围，那末在新的条件下，即在财产关系在家庭内外都取得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家庭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就表现为它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日益缩小其规模。血缘关系的纽带愈来愈崩裂了，只有最亲近的血统才能抗衡为经济利益所不断加强的离心倾向。于是，家长制家庭公社终于要被一夫一妻的家庭所代替。恩格斯指出，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

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而确定出生自一定的父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①正如对偶制家庭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一样，一夫一妻制家庭也不是以个人性爱为基础的。它和对偶制家庭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②

由此可见，在人类历史上，现代意义的个体家庭是和社会的阶级划分同时出现的。在家庭中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是和社会内部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密切相关的。这二者间的内在有机联系可以从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分配以及私有制的规律中得到说明。私有制是人类自身所创造的第一个经济形式。虽然在私有制出现以前人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阶段，但是这种原始的共产主义制度不是人们自身所创造的经济形式，而是自然长成的、原始家庭形式的亲属制度的自然结果。随着原始家庭和氏族制度的解体，这种共产主义的经济形式也就跟着解体了。随之出现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形式，它取代了血缘亲属关系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发生其决定性的影响，从而既导致了社会内部的阶级划分，也导致了家庭内部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恩格斯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

①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60页。

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财富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来性质。”①

虽然在一切家庭形式中，一夫一妻制家庭是现代性爱能在其中发展的唯一形式，但这并不是说，现代性爱最初是作为夫妻之爱而在这一家庭形式中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在社会分裂为阶级、家庭作为经济单位而存在的情况下，婚姻的締结始终是一种由父母安排的权衡利害的事情。因此，真正的性爱最初不是在家庭中而是在家庭外发生和发展的。它不是家庭的肯定因素，而是家庭的否定因素，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是婚姻本身的目的，而是它的副产品。真正的性爱，人类自由之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只有在家庭不再是经济单位，因而婚姻的目的也不再从属于经济因素的时候，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点，就有待于人类创造出第二种经济形式，即由联合起来的人们自觉地加以调节的共产主义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无产者的家庭才容许个人性爱获得较为自由的发展。所以，无产阶级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是在这个名词的词源学的意义上说的，而不是在这个名词的历史意义上说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虽然一夫一妻制家庭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但当这种原因消失的时候，它却不会随着消失，并且相反，只有那时它才能真正地实现。

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庭经济变为社会的劳动部门。“在这里，一个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页。

在一夫一妻制发展的时候最多只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因素——个人的性爱，开始发生作用了。”① 由此也可以看到，即使单从性爱和家庭的范围来看，人类的自由也是存在于物质资料生产（经济）的彼岸，个人性爱的作用和经济因素的作用是成反比例地发展的。事实上，任何意义上的个人自由都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不是个人的自由意志和行为决定家庭形式和社会关系，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改变的社会关系制约着家庭形式的发展和个人自由的界限。

第四节　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

关于私有制的起源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进行了探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探讨了私有制的起源问题，认为私有制“是外化劳动的结果”。② 随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私有制是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形式的解体过程中……发展起来的。”③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说明：“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④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页。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1页。

④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1页。

关于阶级的产生问题，马克思在1852年给魏德迈的信中就指出过："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①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具体地阐述了阶级和奴役关系形成的两种过程。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则依据丰富的资料，进一步剖析了氏族制度解体的一般经济条件，深入阐明了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科学地说明了人类由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私有制和阶级，是在氏族制度解体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出来的。这种氏族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恩格斯根据易洛魁人氏族的材料指出氏族的基本特征是：氏族共同利用土地，共同进行生产；氏族选举出酋长管理社会生活，在战时选出军事领袖处理军务；氏族的最高的权力机关是氏族的民主议事会，全氏族的男女成员都有平等的表决权，在议事会上，可以选出和撤换酋长和军事领袖；死去的成员的遗产由氏族来继承；氏族成员之间实行互助，当受到外族欺侮时，氏族共同复仇，等等。

恩格斯说："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做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家庭经济都是由若干个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乃是全部落

①《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页。

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庭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他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①

是什么力量促使氏族制度解体的呢？恩格斯着重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等方面来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在恩格斯看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是私有制产生的决定性的因素，社会分工以及交换的发展等，在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中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原始社会的最早的时期，即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以前，在社会上存在的仅仅是自然分工，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做饭、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渔猎用具的所有者，妇女是家庭用具的所有者。家庭经济是共产制的，其中包括几个、往往是许多个家庭。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东西，如房屋、园圃、土地、小船等等，都是共同财产。

从野蛮时期中级阶段开始，社会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氏族制度也开始解体了。这个变化表现在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93页。

离出来，恩格斯称之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①这些游牧部落从野蛮人当中分化出来之后，起初主要劳动部门是驯养牲畜，后来则是繁殖和看管牲畜。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而且也不相同。他们不仅生产出数量更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山羊毛和各种纺织物。这样，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在这以前，交换只是在部落内部发生的偶然的例外的现象。自从游牧部落分离出来后，各个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来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开始是各个部落之间的交换，后来出现了个人之间的交换。

随着畜群的出现，牧草栽培和谷物种植逐渐地占了重要的地位。这时耕地仍然是部落的财产，它最初是交给氏族使用，后来由氏族交给家庭公社使用，最后便交给个人使用，他们对耕地或许有一定的占有权，但是更多的权利是没有的。在这一阶段的工业领域中，也有了较显著的变化，人们学会了熔炼金属，制造金属的劳动工具，用铜和锡熔炼成青铜来制造工具。青铜制品在当时来说是很好的劳动工具和有效的武器，然而，由于它质地不坚固，因而它并没有能取代石器。历史材料表明，只是在后来出现了铁器，石器才被最终取代的。

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等一切生产部门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剩余产品的出现，促进了交换的发展。最初游牧部落交换的东西主要是牲畜，后来发展到把牲畜当作交换的手段和支付的手段，使之获得货币的职能，起着货币的作用。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6页。

剩余产品的出现和交换的发展，开辟了财富不平等的可能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有剩余产品以供给其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而且随着家庭公社中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的增加，把战俘变成奴隶，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所向往的事情了。可见，“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场所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①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现了私有财产，出现了财产的不平等，这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氏族制度已经不再适合需要了，于是氏族制度即走上了崩溃的阶段。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中，明显地表现出了氏族制度的崩溃。

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中，人们学会了制造金属工具，如箭、弓、犁、斧、手工工具等。由于铁犁的出现，使人们能够在大块的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经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纺织业、金属加工业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离的手工业，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农业除了提供谷物、豆科植物和水果以外，也提供植物油和葡萄酒。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便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即：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

社会的进一步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提高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的并且是零散现象的奴隶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7页。

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本质的组成部分，奴隶们不再是简单的助手，而是成为主要的劳动力，被成批地赶到田野和工场去劳动。这时，除了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在具备先进的生产工具条件下的分工，已经不需要象过去那样以共产制的氏族、部落为单位进行共同生产了，而需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原来属于氏族或部落公有的耕地，起初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从而逐渐完成了向完全的私有制的过渡。这时，已明显地分化出不同的阶级，奴隶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制度。

私有制和阶级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原始社会解体之后出现的社会的第三次大分工，是同不从事生产、只是经营生产品交换的商人的出现相联系的。在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留下的剩余物。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游牧民族已有牲畜作为财产，这种财产到具有相当数量时，便有若干剩余提供交换。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农业和手工业之间发生的进一步分工，从而发生了直接为交换的生产品的生产。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在它以前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即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阶级的形成的一切发端，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这时出现的商人，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两者进行剥削。这是一个寄生阶级，它从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上榨取油水，作

为对自己的实际上非常有限的贡献的报酬，它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当的社会影响，正因为如此，它在文明时代便取得了愈来愈荣誉的地位和对生产的愈来愈大的统治权。

这样，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和抵押制的产生，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新的财富贵族，既然从一开始就已经同旧的部落贵族不相符合，就把部落贵族完全排挤到后面去了。随着这种按照财富把自由人分成各个阶级的划分，奴隶的人数特别是在希腊便大大增加起来，奴隶的强制性劳动便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

由上可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中进一步具体地阐明了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社会经济的内在原因和条件，这就彻底揭穿了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宣扬的私有制和阶级是自然的、永久的现象的谬论。

第五节　国家的起源和本质

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上，国家都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原始形式的氏族产生于普那路亚婚姻。从普那路亚家庭中产生的某个确定的女祖先被认为是某一氏族的创立者，她的公认的后代则世世代代包括在这个氏族的成员中。由于在群婚制家庭中父系血统不能确定，所以只能承认母系。又因为兄弟姊妹不得互为夫妇，而只能同其他世系的女性结婚，所以，根据母权制，同这些异族妇女所生的子女，必须列在氏族以外。这样，留在血族团体内部的只有各代女儿的子孙；儿子的子孙则归入其母

亲的氏族。在这种氏族制度下，每一氏族一般都有一个酋长和一个军事首领。酋长必须是从本氏族成员中选出，军事首领虽然可以从氏族以外的人中选出，但他的职位起初却常常是空缺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产生世袭权力的任何可能性。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纯粹道德性的，他没有任何强制的手段。不仅如此，氏族还可以任意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使他们重新成为普通的成员和战士。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氏族议事会，它是氏族的全体成年男女都享有平等表决权的民主集会。可见，在氏族制度下，人们不知道国家为何物。

然而，全盛时期的氏族制度，其前提是生产极不发达，分布在广大地区内的人口极其稀少。因此，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陌生的、对立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人们的眼界不能超出部落的范围，无论对待部落以外的人或对待他们自己，部落总是唯一的标准和界限。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都是无条件地服从它。处于这个阶段的人们，虽然在我们看来是立于纯朴道德的高峰，但是他们毕竟还没有脱离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随着接踵而来的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是一定要被打破的。导致氏族制度解体和国家权力产生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是日益加快的经济发展。这种经济发展有的从内部，有的从外部，终于把氏族制度彻底炸毁。

国家权力的萌芽产生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这时，由于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之上已经产生了部落联盟，这种联盟构成了形成中的小民族。在这种小民族内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着它们的独立性。在氏族和部落内部，由于畜群的增加，农业的扩展，手工业的萌芽，产生了财产

上的差别。由于确立了财产由子女继承的父权制，使财产越来越多地积累于家庭中，而家庭按其本性一开始就是与氏族相抗衡的力量。各个家庭间愈来愈大的财产差别，在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制内部产生了贵族分子（氏族显贵）。由于父权制的作用，不仅财产由子女继承已成为习惯，而且父亲的职位也渐渐可以由儿子们来继承。不过这种继承父亲职位的世袭权利，其初还是通过人民选举而获得的。但不管怎样，氏族内部特殊的显贵家庭的最初萌芽，已经孕育着未来的世袭元首或君主的最初萌芽。

这一过程随着各部落和民族间的战争的不断增多而加速进行。自从人们进入定居生活以来，各个小民族，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为了掠夺战利品，进行着不断的战争，以俘虏充作奴隶也逐渐成为公认的制度。不过奴役本氏族成员的事情这时还没有发生。由于战争的不断进行，使原来经常空缺的军事首领成为常设的职位。这种军事首领在希腊叫做巴赛勒斯，在罗马叫做勒克斯。他们的经常职能就是在战争中充当军事指挥。战争不断加强着他们的地位，愈到后来他们就愈是成为部落和部落联盟的最高代表，除军事权限以外，还逐渐获得了祭祀和审判的权限。

在整个军事民主制时期，军事首领（巴赛勒斯）仍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统治权力。他们的位职必须由人民选举，并由人民所公认的机关（议事会或人民大会）所认可。部落中的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是当然的战士，而人民大会仍然是决定各种重要问题的最高权力机关。因此，那种脱离人民，可以用来和人民对抗的公共权力还不存在。不过部落和氏族内部的世袭显贵和主权的最初萌芽毕竟已经形成，并且它们对于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必定要发生反作用。奴隶制起初虽然仅仅限于战争中的俘虏，但这种制度一经产生就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

最初的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蜕变为专门以掠夺家畜、奴隶和财宝为目的而进行的战争，抢劫变成了正常的营生，古代的氏族制度被滥用来作为掠夺行为的工具。既然对财富的追求已成为普遍的目的，而私有财产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发展起来，于是，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种机关，这种机关能以整个社会的名义表示对私有财产制度的确认，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它必须获得不同于旧的氏族机关的权力，这种权力不再是成年的氏族成员的共同意志的表现，而只是私有财产的力量的集中化。这个应运而生的机关就是国家。

恩格斯认为，国家权力的最初产生，一方面是靠改造旧氏族制度的机关，另一方面是用设置新机关的办法来进行的。最初，氏族、胞族和部落中为保卫自己而组织起来的武装的人民，渐渐地变成了可以被用来反对人民自己的武装的“公共权力”。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人民已经不再按照氏族来划分，而是视其私有财产的多少按照阶级来划分。贵族被赋予了担任公职的独占权，农民和手工业者则被排除了担任任何公职的可能性。并且，既然财产关系已成为人们之间唯一地起支配作用的关系，因而按氏族聚居也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人民开始按地区组织起来。氏族制度已走到了自己的尽头，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部落虽然仍被视为一种社会单位，但它也早已失去其原有的内容和意义。议事会的成员不再是由氏族选出的酋长担任，而是由各阶级的代表充当，并且规定只有最高阶级的人才能担任最高官职，而贫民阶级只享有发言和投票的权利。既然有产者攫取了全部官职，他们也就使公共权力和人民相脱离并完全变成了自己的私有物。不仅如此，阶级的划分也成为新的军队组织的基础，最富有的阶级构成了在军队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这一切所导致

的最后的结果，便是国家的产生，它的最本质的特征，是和人民大众相脱离的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

恩格斯在谈到国家权力怎样由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军事民主制中发展出来时写道："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人们最初是容忍，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民、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但是，如果不是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成富人和穷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马克思语），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存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可耻的活动，那末这种情况是决不会发生的。"①

由于生产和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也愈来愈成为经常和普遍的现象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财富的新形式——金属货币。地产、牲畜和奴隶不再是表现财富的唯一形式和富人统治穷人的唯一手段，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很快就被排挤到后面去了。握有大量货币的高利贷者和商人迅速上升到社会权力的顶峰。这样，在旧的世袭的土地贵族之旁又形成了新的财富贵族，他们从一开始就同旧的部落贵族处于尖锐的对立中，并且把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161页。

部落贵族完全排挤到后面去。而随着部落贵族的衰落，原来早已徒具形式的氏族制度的最后痕迹也就被彻底扫除了。

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由于全部经济生活的发展而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社会本身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而且使这种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进行。”①这个第三种力量就是建立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的国家。

由此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②

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明显地不同的地方：第一，是按地区而不是按氏族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是脱离居民组织的特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起来的武装的人民直接相符合了，由于社会分裂为阶级，任何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都成为不可能的了。除了这种特殊的武装之外，还有物质的附

①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5、166页。

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以及掌握着全部公共权力的大批官吏，所有这些，都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随着国内阶级斗争和对外侵略扩张的不断加剧，国家权力到处都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社会的高度。

恩格斯说："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① 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国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而严格地加以限制的，这种限制直接地宣布了国家是有权势者和富人用来防范平民和穷人的工具。在整个中世纪，政治权力不过是地产的附属物。但是，对财产差别的这种政治上的确认，决不是国家的本质，它只是标志着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

在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中，公民权利的财产限制已经不再存在了。在这里，财富是间接地但却是更加可靠地运用着自己的权力。并且，正是在这样的国家中，阶级斗争才以最公开和最彻底的形式进行着。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的决定性斗争能够在其中进行到底的最好形式，这一斗争的最后结果便是国家权力的消灭。

恩格斯在总结国家从产生到消灭的整个历史过程时写道："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

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灭，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①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0页。

第十章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后四十年来斗争成果的科学总结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形成到1886年恩格斯撰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四十年来，在指导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战胜了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杜林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复活德国古典哲学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一批资产阶级哲学家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合理因素，把它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哲学。他们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诬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简单拼凑”，胡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从黑格尔那里“窃取”来的。当时，在德国、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流派，它们在新招牌、新术语的掩盖下贩卖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糟粕。恩格斯说：“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好象有点要复活的样子。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衷主义残羹剩汁，看来已惹得人人都讨厌起来了。”①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8页。

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就是其中的主要的唯心主义流派。新黑格尔主义者完全抛弃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片面强调和夸大黑格尔哲学中的保守方面，即其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如瑞典的新黑格尔主义者博斯特隆（1797—1866），把自己的体系叫做“理性唯心主义”，认为唯一实在的东西是精神实在。在伦理学上，博斯特隆深受康德的影响，把最高幸福的实现看成是彼岸世界的事。又如挪威的右派黑格尔主义者蒙拉德（1816—1897），公开把自己的哲学叫做“神秘主义泛神论”，认为真正的东西是表现为自然界和精神的观念。产生于十九世纪60—70年代的新康德主义者，抛弃了康德哲学中仅有的一点唯物主义因素，力图复活它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不可知论。“回到康德去！”的实质，就是要人们重新地对康德的“物自体”进行唯心主义的批判。新康德主义者还激烈攻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不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而应当是康德主义的伦理学。

十九世纪8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处于“和平”发展时期，并向帝国主义过渡。机会主义适应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的需要，把资产阶级的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出发点，妄图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引向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杜林主义、拉萨尔主义，就是如此。此外，德国工人政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等人的思想理论基础，原来也是杜林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杜林主义遭到批判后，他又妄图用新康德主义来冒充和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用康德的伦理学来解释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能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实现，而是要通过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和道德的自我完善来实现。

为了回击资产阶级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攻，批判机会

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教育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恩格斯适应这一思想斗争的迫切需要，“越来越觉得把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即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并且怎样同它脱离，做一个简要而有系统的说明是很必要的了。”①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有过愿望去阐明他们的哲学同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但是，四十多年来，他们一直没有机会能回到这个题目上来。恩格斯于1886年撰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乃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这一宿愿。当时，《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请恩格斯撰写一篇文章来评述卡·尼·施达克（1856—1926）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②一书，恩格斯就借此机会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光辉著作。

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教材。它以最简洁的形式，科学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四十年来斗争的成果，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同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联系和区别，并对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了颇为详尽的叙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系统化。这部著作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的历史发展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和概括，从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往全部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和合乎规

---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8页。

②1885年，丹麦资产阶级哲学家、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施达克，为了维护费尔巴哈，驳斥新康德主义者，他写了一本小册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由于施达克不懂得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正确标准，竟认为费尔巴哈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批评了施达克的这一错误观点。

律的结果，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它在哲学中所实现的革命变革。

第一节　全面系统地剖析了德国古典哲学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同时，也是全部旧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历来认为，他们自己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通过费尔巴哈的哲学，从而达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时，首先是从分析黑格尔哲学开始的。因为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只有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全面剖析，才能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同时，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黑格尔哲学又是费尔巴哈哲学赖以产生的重要条件。恩格斯本着逻辑的与历史的相一致的原则，认为只有分析黑格尔哲学，才能说明费尔巴哈哲学的出现。而费尔巴哈哲学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理论来源，只有在全面剖析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并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又是根本对立的。为此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详尽地、系统地而又全面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联系和区别。

恩格斯认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黑格尔哲学具有二重性，这就是它的革命性和保守性。一方面，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果。黑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进行了

系统的批判，提出了辩证法的思维方法。他把整个自然界、社会历史和人类思维描绘为一个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①

这是黑格尔哲学辩证法本身应当而且必然得出的革命结论。但是，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本人从来没有明确地作出上述革命的结论。这个革命的结论乃是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改造，剥去了它的神秘外壳之后得出的。黑格尔为什么不能作出上述革命结论呢？恩格斯说："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②因而黑格尔宣称他的哲学体系结束了人类认识的终极的绝对真理，而在实践上，则认为人类的历史发展在费里德里希一威廉三世许诺的君主立宪政体中达到了顶点。可见，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相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辩证法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哲学体系方面所闷死。

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和保守性，是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保守性的表现。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它对封建制度心怀不满，向往革命，在经济上、政治上有一定程度的进步要求；另一方面，它又害怕革命，不敢采取实

①②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3页。

际的革命行动，甚至出于对无产阶级的畏惧而逐步走向反动。它"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①黑格尔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他和歌德一样，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群神之王"，是有影响、有威望的人物。但是他们两人都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没有摆脱德国庸人气味。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以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命题，即"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②为例，剖析了黑格尔哲学的二重性，即既有保守的一面，他把现实神圣化，为现实辩护，但又有革命的因素，即包含对现实的否定。这个命题，从字面上看，显然是为当时的普鲁士现存制度作辩护，因为普鲁士王国的现存制度、法律等等都是现实存在的，因而也都是合理的，于是，反对现存制度的斗争也就成为不合理的，应予取缔的。这种字面的推论方法，曾使这个命题迷惑了从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乃至许多政治家、哲学家、以及一般的知识分子。因此，它受到政府方面的感激；同样，也引起自由派的愤慨。

黑格尔的这一命题为德国的现存制度作辩护，这是肯定无疑的。因为黑格尔历来推崇国家，把它看成是"地上神物"；并且特别美化普鲁士国家，认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顶峰。因此，这一命题是符合黑格尔的一贯思想的，是为普鲁士的现存制度祝福的。但是，这一哲学命题也不能象一般庸人理解的那样，认为它是粗鄙地用来辩护一切的工具。实际上，黑格尔本人也并不认为普

①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页。

②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页。

鲁士现存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合情合理的。例如，他对当时的税收制度就有意见，并曾暗示说："某种征税方法的观念本身虽然很好、也很适用，但这类东西在所谓现实里找不到，而且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也难以实现。"①黑格尔的这一段话，反映了他对当时德国的税制的不满。在他看来，现存的税制并不合理；真正合理的税制只存在于人的观念中，还没有在实际生活中兑现。这一点也说明了，不能把这个命题理解为现存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现存的。

黑格尔在《小逻辑》导言中指出，一些人之所以对他的这一命题表示诧异和反对，乃是在于他们将"现实"与"现存"（即"偶然的存在"）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在黑格尔看来，现存的并不等于现实的，二者还有区别。"就定在一般说来，一部分是现象，仅有一部分是现实。"②黑格尔认为，现存的东西包含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属于现象，一部分属于现实。现实虽然表现为现象，但现象并不全都是现实。现存的整体中包含有现实的部分，但决非都是现实。把现存与现实混同起来，那是庸人的看法。

黑格尔说："在日常生活中，任何幻想、错误、罪恶以及一切坏东西、一切腐败幻灭的存在，尽管人们都随便把它们叫做现实。但是，甚至在平常的感觉里，也会觉得一个偶然的存在不配享受现实的美名。因为所谓偶然的存在，只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可能的存在，亦即可有可无的东西。"③在黑格尔看来，"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现实性在其展开

①②③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5—296、44、44页。

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①因此，“现实的”应该同时是必然的，即合乎发展规律的东西。有些东西尽管存在着，但只是偶然的存在。此外，还有些东西，在一定时期具有必然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丧失必然性。黑格尔曾以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体或一个即将被推翻的坏的政府为例，说明尽管它们依然存在，但终归是要消亡的。象这样的存在，就不能认为是合理的、具有必然性的，因而也就不能认为它是现实的。黑格尔说："任何不合理的事物，即因其不合理，便不得认作现实。”②既然现存的东西并不全是现实的，黑格尔说现实的“表现或外在性即是它的内蕴力；在它的外在性里，它已返回到自己；它的定在只是它自己本身的表现，而非他物的表现。”③因此，现实是内在的，具有必然性的；它合乎规律，有自身存在的充分根据。一切非现实的东西之所以不能实现或者还没有实现，就是因为它或者缺乏内在的足够的根据，或者还有赖于外部的条件，因而不具备有现实的必然性。

这里，黑格尔的观点十分明白，在他看来，现存的东西并不都带有必然性、规律性。只有那些必然的、合乎规律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因而是合理的。至于那些不具有必然性、规律性的东西，当然也就不现实、不合理了。不现实、不合理的东西就不应当存在，而应被消灭。至此，黑格尔的命题显露出它的革命锋芒，具有革命的进步的含意。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这个命题的真实含义应是：凡是必然的合乎规律的东西都是合理的，而合理的东西既然是必然的、合乎规律的，那么在它的开始，无论

---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1页。

②③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6、295页。

怎样弱小，都必然会发展壮大，取得胜利，最后成为现实。反之亦然，即凡是失去必然性，不合规律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东西既然不具有必然性，不合乎规律，那么无论它当初表面上怎样强大，它都必定要逐渐衰亡，最后被彻底消灭。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继续发挥黑格尔关于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思想，从中推导出黑格尔本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即“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革命的结论。

上述思想不仅适应于概念的运动，而且也适应于社会历史。任何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总是作为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的否定物而合乎规律出现的。因此，新制度是现实的、合理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必须看到，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的社会制度，在它诞生的同时，其本身便包含了它的否定物，因而，它一开始就潜藏着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这正是它必定灭亡的根源。“被称为现实性、能力的东西，正是这种否定性、活动性、积极的作用；它自己击破了这种自为的存在，取消了统一性，而建立了分裂，——不再是自为的存在，而是变为‘为他的存在’，因此也就是对统一的否定。”①所以，现实性不是僵死的、永恒不变的东西。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从不现实到现实、从现实到不现实的矛盾运动，这就是事物的发生、发展以至最后灭亡的过程。

恩格斯剥掉了黑格尔哲学的神秘外壳，发现了它的合理内核。这是辩证法所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体现。

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恩格斯说：“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91页。

来的整个运动的顶峰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

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①这样就破除了形而上学的观点，确认了人认识和发现真理是一个过程，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无限发展的过程，这乃是辩证法的结论。恩格斯还说："这不仅在哲学认识的领域中是如此，就是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中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中也是如此。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②其中，每一个阶段对于它所由产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虽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对于从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了过时的和失去存在理由的了。这样，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阶段也是同样要过时的。恩格斯说："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

---

①②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2、212—213页。

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①

上述思想虽然包含在黑格尔哲学中，但不是黑格尔本人所曾明白地作出的结论，而是恩格斯从黑格尔的方法中必然地引导出来的。至于黑格尔本人所以未能明确地作出这个结论，原因就在于作为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任何哲学体系都产生于人类精神的下述这种需要：它不满足于一切有限的认识，而要以穷尽无限的东西为自己的目的。因此，按照这种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在他的著作如《逻辑学》中，虽然强调所谓“绝对观念”（永恒真理）不过是全部逻辑发展过程本身，但是由于体系的需要，他还不得不给这个过程确定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不过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变为起点，使“绝对观念”（《逻辑学》的终点）“外化”为自然界，从而成为《自然哲学》的起点。然后“绝对观念”通过自然界的发展又在精神中返回到自身，这就是《精神哲学》阶段。但是，要使整个哲学体系的终点能够重新变成起点，使体系的两端首尾连接起来，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把历史的终点设想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3页。

成这样：人类最终会达到对这个绝对观念的完全认识，同时宣布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全部黑格尔体系就是绝对观念的自我运动和自我认识过程的较完备的描述。

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全部内容就宣布为绝对真理，从而同他那只承认运动和发展为唯一绝对的东西的辩证方法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既然在黑格尔哲学中，逻辑的东西（哲学）和历史的东西（现实）是同一的，二者必然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所以，那被宣布为绝对真理的黑格尔哲学就不可能对他的同时代人提出太高的实践的政治要求。可见，单是体系本身的需要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出了极其保守的政治结论。

黑格尔哲学内部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这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正如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中所说的："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①况且，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他和同时代人歌德一样，都没有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尽管如此，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哲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以前的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巨大领域，而且没有妨碍它在这一领域中发展了现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②并且指出，在黑格尔那个庞大的体系的迷宫里，蕴藏着"无数的珍宝，

①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

②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5页。

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充分的价值。”①黑格尔“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②

恩格斯在剖析黑格尔哲学之后说：“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③即指出了旧哲学的终结和创造新哲学的道路。恩格斯认为，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概括的途径，就可以达到相对真理；相反，把自己的哲学奉为最终的“绝对真理”，就会陷于绝境。黑格尔哲学也是如此。

恩格斯指出，作为唯心主义哲学的顶峰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哲学，一方面，它否认以往的任何哲学体系具有绝对的、最终的性质，认为这些体系只是标志着真理发展过程中各个不同的、相对的阶段；但是，另一方面，黑格尔却陷入了以往一切哲学家所共同抱有的同样的幻想，即认为自己最终排除了认识过程中的一切矛盾，从而建立了绝对真理的体系。这样，他就把自己置于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他为了要证明自己的体系超出以往的一切时代，不得不把它描述为全部历史发展的结果，这就是说，他建立体系的方法必须是辩证的。然而，他囿于哲学家的幻想而赋予他的体系以最终的性质，并且作为体系来说也必须在某一个地方结束自己的发展，这样，为了适应体系的需要，他又必须回到形而上学。由于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导致了黑格尔学派的分裂。况且，哲学是上层建筑，作为认识工具，它要

①②③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5、215、216页。

为一定的政治斗争服务。黑格尔哲学虽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但由于其体系和方法的矛盾，“给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都留下了广阔的活动场所”。[①] 围绕当时德国有实践意义的政治和宗教问题，黑格尔学派于十九世纪30年代，分裂为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老年黑格尔派抓住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完全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们代表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利益，维护宗教。青年黑格尔派，在一定程度上利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批判宗教、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他们代表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

从黑格尔哲学解体中，我们看到了一切体系哲学的局限性，同时也找到了最终抛弃一切体系而达到真实地认识现实世界的道路。事实上，在一切哲学家那里，“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然而体系却产生于人的精神的永恒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从而历史就会终结。可是，设想历史会终止它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设想历史在继续发展，而认识已经终结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样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去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无穷无尽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认识到这一点，以往所理解的全部体系哲学也就终结了。哲学的真正任务，是把沿着上述途径而使任何一个人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抛在一旁，运用辩证思维对一切实证科学的成果进行概括，沿着这条道路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改造，宣告了一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6页。

切旧哲学的终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除了革命的辩证方法以外，不包含任何教条的内容，它不是黑格尔所宣称的“绝对知识”，而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恩格斯的分析，不仅表明了一切旨在复活旧的体系哲学的企图是反动的和倒退的，而且严肃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这是和它的本性相違背的。

使黑格尔哲学必然走向解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唯心主义的出发点。这一点特别不能适应当时已成为主要斗争任务的反宗教的要求。由于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际需要，许多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开始返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这个返回到英法唯物主义运动是从费尔巴哈开始的。

恩格斯说：“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的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最后，他不可遏止地意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超世界造物主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①

费尔巴哈的新观点，曾经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热烈欢迎，并且在一个时期内成了他们的哲学的出发点。虽然费尔巴哈的观点，“在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的长期统治以后，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②但是，它本身仍然没有摆脱旧的体系哲学的羁绊，仍然是“黑格尔哲学的支脉”，究其原因：其一，哲学对费

①②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3、218页。

尔巴哈来说照旧是被当做绝对真理的“科学的科学”，而且和黑格尔哲学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体系也是异常贫乏，除了关于对抽象人的崇拜和爱的宗教说教以外，几乎没有多少现实的内容。在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懂得辩证法，没有辩证法就不可能从体系哲学的迷宫中走出来。费尔巴哈推倒了一个绝对（“绝对观念”），又立起另外一个绝对（抽象的人的本质）。其二，在黑格尔那里，他的哲学体系包含着绝对观念所囊括一切的回旋和运动，他在唯心主义的形式上，把认识史、自然史和社会史的全部丰富内容都包括在自己的体系中。而在费尔巴哈那里，绝对的宇宙观念变成了绝对的人的本质，他的全部体系也因此变成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简单循环。这就不能不使他的哲学内容极端单调和贫乏。其三，由于黑格尔哲学在一个无比广阔的领域内运用了辩证方法，因而在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唯物主义内容。例如，黑格尔的伦理学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内容。在黑格尔体系中，伦理学又是法哲学，其中包括：（1）抽象的法，（2）道德，（3）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这就是说，他不是纯粹抽象地谈论道德，而是把道德问题连同经济、政治、法律一并加以阐述。所以，他的法哲学，其形式虽然是唯心的，但内容却是现实的。而费尔巴哈却相反，在他的著作中，虽然每一页都宣传感性，宣传专心研究具体的东西，研究现实，可是一碰到社会历史问题，他就变成纯粹抽象的了。同样，在道德问题上，费尔巴哈所谈到的人，既不生活在家庭中，也不生活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中，他根本没有谈到人所生活的那个世界。至于人们之间的各种现实关系，无论经济、政治和法律等等，对他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费尔巴哈所不断谈到的人们的关系只有一种，那就是被他极端抽象化和理想化了的性爱关

系。他不厌其烦地用美的文学词句和夸张的笔调反复赞美这同一内容。因此，费尔巴哈的哲学尽管形式是现实的，而内容却是唯心的。他的唯心主义就在于“他不是直截了当地按照本来的面貌看待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即性爱、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等。而是把这些关系和某种特殊的、在他看来也属于过去的宗教联系起来，断定这些关系只有在人们用宗教一词使之高度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① 由此可见，被费尔巴哈当做出发点的人不是生活在真正的尘世社会中的人，而是从宗教哲学中引伸出来的抽象的人。

费尔巴哈虽然首先离开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回到唯物主义，可是却依然没有找到正确的哲学出发点，原因就在于他推倒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时候，把他的辩证方法也一并抛弃了。唯物的但却是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使费尔巴哈既不能批判地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也不能有效地战胜当时流行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小贩们。他虽然看到了以往唯物主义的机械性，但无力把它提高到辩证法的水平。在社会历史观上他拒绝使用唯物主义这一名称。他说，向后退时，他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他陷入机械论，但又反对机械论，这就是他的哲学所特有的矛盾。为了保护它的唯物主义的正确的出发点，必须反对它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一点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能做到。这种方法已经由黑格尔在唯心主义的形式下提供出来了，问题在于要把它从极端神秘的形式下剥取出来，完全依靠实证科学所提供的材料，用现实的联系代替头脑的虚构，才能使它置于真正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这个任务费尔巴哈未能完成，只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0页。

有马克思、恩格斯才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从而使唯物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即辩证唯物主义阶段。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尤其显得陈旧了。"现在连他那赞美新的爱的宗教的'最美丽的篇章'，都不堪卒读了。"①在这种情况下，企图重新回到费尔巴哈，就也如同复活黑格尔哲学一样，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一种倒退。

1848年革命冲破了黑格尔关于普鲁士王国是社会发展的顶峰以及费尔巴哈关于爱的种种说教，把他们的哲学毫不客气地抛在一旁，至于费尔巴哈本人，由于他不问政治，轻视实践，在1848年革命中无所作为，也被时代抛到后面去了。

1848年革命是一个分界线。从此，德国古典哲学就全部终结了。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地吸取德国古典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正式问世了。1848年的革命无情地把资产阶级的任何形式的哲学都抛在一旁，无产阶级不需要它们，而资产阶级的发展也已经超过了革命前的思想孕育时期。

随着1848年革命的爆发，资产阶级的德国终于抛弃了理论而转入实践的领域，资产阶级的兴趣日益集中到正在迅速发展的工商业方面去了。"但是随着思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失去了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地热中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②从这以后，德国古典哲学所表现

①②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253—254页。

的理论兴趣，只有在无产阶级中还没有衰退，还继续存在。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因为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是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在这里党性和科学性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旗帜，是它的科学的世界观。它作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找寻不到也期望不到的。”①

所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定的信奉者，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继承者。

第二节 第一次科学地提出和阐明了哲学基本问题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对两千多年来的哲学发展的历史作了最高的概括和总结，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② 恩格斯认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③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思维和存在何者是本原，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

①②③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19、220页。

各种学派。”① 恩格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看做贯穿全部哲学史的两大阵营，划分这两个阵营的唯一标准是对思维同存在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

哲学基本问题是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问题，它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象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②

大家知道，从十四世纪末到十六世纪，欧洲进入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这时，基督教依然垄断文化和社会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成为科学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于是产生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资产阶级在反封建主义和经院哲学的斗争中，创立了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哲学。

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具有无神论的色彩，在它产生之后，就尖锐地向教会提出：世界是神创造的，还是从来就有的？什么是世界本原，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哲学认为自然界是唯一的实体，在它之外，没有上帝。例如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狄德罗公开宣称：“上帝是没有的；上帝创造世界是一种妄想”。③ 为了批判宗教神学，近代机械唯物主义还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关系，指出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人脑的机能。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里说：“有很多的实验曾经使我们认识到，心灵实际上是在脑子里感受到动物所特

①②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页。

③狄德罗：《哲学思想录》，《狄德罗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页。

有的感觉的：因为当脑部受重伤时，动物就没有知觉、没有分辨力、没有认识了。”①同样，狄德罗也指出，意识是人脑的特性。他认为，我们一切对外界的感觉都是通过感觉神经传到大脑，有如外界的震动通过蛛网传给蜘蛛一样。可见，感觉、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是依赖于人的大脑和神经的。可见，近代唯物主义者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唯物主义的回答，是以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亦即以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形式进行回答的。这时，哲学基本问题经过中世纪的长期冬眠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自十五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加速了自然科学同哲学的分化，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用自然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等代替具体科学研究的局面，已经不能维持下去，从而使哲学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乃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去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日益增多地获得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这使哲学更加注意研究主观如何反映客观的问题，亦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被提到哲学研究工作的显著地位。这一时期，一些著名的哲学家的代表作，如培根的《新工具论》（1602）、笛卡尔的《方法论》（1637）、洛克的《人类理解力论》（1690）、斯宾诺莎的《知性改进论》（1677）、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1710）、休谟的《人类理智研究》（1748）、爱尔维修的《精神论》（1758）和《论人的智力能力和教育》（1773）、狄德罗的《论解释自然》等等，都是以研究认识论问题为中心的著作。

①拉美特里：《心灵的自然史》，《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07页。

总之，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近代哲学对认识的主体，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研究了主体如何反映客体，也就是说，十分重视对认识论问题进行研究。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回答，被放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各种探讨人的认识发生和发展的观点和理论，应运而生，如雨后春笋。正是由于近代哲学直接研究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自觉地进行回答，哲学基本问题才获得完全的意义。

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在近代哲学中，已经成为各派哲学直接争端问题。它在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已经意识到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在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黑格尔曾说："现时哲学观点的主要兴趣，均在于说明思想与客观对立的性质和效用，而且关于真理的问题，以及关于认识真理是否可能的问题，也都围绕思想与客观的对立问题而旋转。"①他还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②也就是说，思维与存在的对立这个问题是所有哲学派别必须回答的问题，是研究其他哲学问题的出发点。哲学只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才能使自己成其为哲学。费尔巴哈在回顾哲学发展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关于精神对感性、一般或抽象对实在、类对个体的关系如何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属于人类认识和哲学上最重要又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整个哲学史其实只在这个问题周围绕圈子，古代哲学中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间、柏拉图派和亚里士多德派间、怀疑派和独断派间的争论，中古哲学中唯名论者和实在论者间的争论，以及近代哲学中唯心主义者和实在论者或经验主义者间的争论，归根结柢

①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3页。

②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92页。

都是关于这个问题。"①费尔巴哈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卓越见解，得到列宁的充分的肯定。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见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这一理论的思想来源。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第一次以理论的形态、明确的哲学概念，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概括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概括为哲学基本问题，也是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论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大意义。它第一次以极其鲜明的形式揭示了贯穿全部哲学史的两条基本哲学路线的斗争，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这两条基本路线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因而思维和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这个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也永远不会陈腐和过时。他告诫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任何时候都不要被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诡辩词句和骗人花招所迷惑，不可忘记哲学上两个基本派别的斗争，而要沿着十分明确的唯物主义道路前进。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即物质和精神何者为本原的问题，是任何哲学家都不能回避的首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回答其它一切哲学问题的出发点，决定着某一哲学的发展方向。所以，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反复强调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

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除了标明哲学上的两个基本派别之外，不包含任何别的意义，同时，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赋予它们以另外的意义就会造成极大的混

①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21—622页。

乱。费尔巴哈以及包括施达克在内的某些资产阶级哲学家，正由于不了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真实含义，不了解这两个哲学用语和哲学基本问题之间的联系，因而一方面在自然观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却又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费尔巴哈由于不理解哲学基本问题的全部深刻意义，因而始终是一个不清醒和不自觉的唯物主义者，他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始终没有超出反神学的范围而达到更广阔的视野。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哲学信条把哲学斗争的范围过分狭窄地局限在人神关系问题上，而不能把这种斗争扩展到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整个领域和广阔范围。特别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费尔巴哈公然拒绝唯物主义这个名称。他不仅不能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基本路线的斗争，自觉地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中来，而且公开声明反对这样做。他十分错误地认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贯彻唯物主义就是根本否认宗教、伦理等精神力量的作用。他认为，在各种精神因素中应被否定的只有旧的宗教神学，即对神圣事物的崇拜和信仰，因为这种信仰只是自身的本质力量的虚幻反映，这样一来，除了基督教的神学观念和与之有关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之外，对其他一切意识现象的起源与本质，费尔巴哈都置之不论。不仅如此，他还企图创造新的宗教，把被他极端夸大了的抽象道德信条当做人类唯一的救世主。他从没有想一想，如果被基督教国家所如此夸张的对神的崇拜是从现实存在的“人的本质”中异化出来的，那末他本人所竭力鼓吹的“爱的宗教”毕竟也是对现实生活的虚假反映，因而它所能产生的作用也是十分可疑的。由于他对哲学基本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不能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研究一切意识现象的基本指导线索，因此，这就注定了费尔巴哈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他除了声明不同

意现存唯物主义的机械论倾向之外，也就束手无策。他不能突破历史所造成的局限，把唯物主义坚定地推向前进。通过费尔巴哈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所做的概括和总结有着多么深刻的意义。

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学派，它主张："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① 所以，唯物主义只是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制定和包含了正确理解现实世界的基本出发点和方法论要求，至于它作为某种既定的哲学学说能否真正对外部世界的一般联系作出正确而完整的解释，则要有各种情况，特别是由历史所提供的条件而定。

因此，决不能把作为一般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譬如说，为了反对庸俗唯物主义，而把唯物主义的一般命题也一并否定了。费尔巴哈所表现的，就是这样。

恩格斯说："象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② 所以问题不是要恪守唯物主义的某种特定的历史形式，而是要坚持它所采取的基本的哲学立

①②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8、224页。

场，物质对精神来说是本原性的东西。进一步的更具体的说明，则有待于实证科学的进步，可以提出更为丰富的事实与材料。恩格斯指出，十八世纪唯物主义所特有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并非唯物主义所固有的缺陷，而是有着历史的理由的。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刚体力学，所以机械论的局限性对于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形而上学的局限性也是如此。那时，康德的太阳系发生说刚刚提出，地球发展史还完全没有人知道，生物进化的思想更不可能科学地提出，因此，对自然界的非历史的观点，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不仅十八世纪的哲学家抱有这样的观点，黑格尔也是如此，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没有时间上的发展，而只能在空间中展示自己的多样性。而且在黑格尔生活和写作时代，上述自然科学较之十八世纪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只有出于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偏见，才会把机械论和形而上学观点同哲学唯物主义混为一谈。事实上，要使哲学能够跟上自然科学的进步，不致歪曲地解释它的成果，就必须抛弃唯心主义的哲学路线，返回到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

在恩格斯看来，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无论是唯心主义体系或唯物主义体系，都是在自然科学和工业日益迅速进步的推动下实现的，而不是如唯心主义哲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由某种纯思想的力量所推动的。正因为这样，不仅唯物主义哲学本身，甚至唯心主义体系也愈来愈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因此，我们在评价某个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时候，就必须把它的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一般世界观同它所包含的唯物主义的合理内容区别开来，决不能根据后者而肯定前者，误认为唯心主义的哲学路线也能导致

客观而真实的认识成果，甚至得出两条基本哲学路线的斗争对哲学的进步与发展是无足轻重的结论。

恩格斯阐明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包含着两重意义：一方面它指明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意识何者是终极原因，因而归根到底起着决定的作用。在这个范围之外，物质和精神的地位和作用就完全是相对的了。这就是说，它们处在纯粹的相互作用中，彼此交互作用、互为因果。这样，唯物主义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并非从一般因果序列的意义上讲的，而是从特定的因果序列的意义上讲的，就是说，这里强调的是终极原因，即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所以，承认哲学唯物主义决不意味着否定或忽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只有把唯物主义庸俗化才会得出否认精神也能起重大作用的结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认为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神论者伏尔泰和卢梭一样，几乎狂热地抱有这种信念，并且往往为它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①

另一方面，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指明了物质对精神说来是本原、原型，精神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物质的反映、复写或模写，最多也只能是近似于正确的、确切的反映。从这两方面来说，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都是确定了的，不容许有任何颠倒和错乱。颠倒了这种关系就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基本路线，它所要求的就是如此。

既然唯物主义把精神、思维等等看做物质的反映，它就必须要回答另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即我们的思维能不能正确地认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8页。

识我们周围的现实世界？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经休谟和康德重新提出并详加论证之后，已成为近代哲学中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事实上，在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两条基本哲学路线的斗争中，所谓“不可知论”不过是哲学唯心主义被战败而不得不退却时，用来抵挡唯物主义的一种遁词罢了。

恩格斯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①

不可知论者认为，不知道是否有为我们的感觉所反映、所摹写的客观实在。正如列宁说，不可知论“不超出感觉，他停留在在现象的此岸，不承认在感觉的界限之外有任何‘确实可靠’东西。”②

休谟（1711—1776）认为客观世界以及反映客观世界的人类认识的主体都没有客观实在性，这一切不过只是一束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彼此相续并处于不断流逝和运动之中的不同的知觉，或这些不同知觉的集合。休谟认为，知识的对象只是我们自己的知觉。知觉又分为两种：印象与观念。印象包括色、声、味、苦、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1页。

②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97页。

乐等；观念则包括想象、记忆、思想。此二者虽有区别，但又是紧密联系的。休谟认为，那些最强烈出现的知觉，我们称之为印象。我们所谓观念，乃是指这些印象在思想过程和推理过程中的微弱的影像而已。休谟认为，观念乃是知识的唯一对象，知觉以外的客观实在，物质对象是不能设想的。

恩格斯认为，休谟和一般不可知论者一样，也认为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觉所给予我们的感知为基础的，休谟承认一切知识都由经验、知觉、印象所产生，在这一点上多少还有一点唯物主义色彩的残余。但当我们追问知觉、印象的来源时，休谟却止步不前，他认为，人们要想了解知觉的来源，就必须超出自己的知觉之外，但人们决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人心亦不过知觉而已。这样一来，知觉的来源就不可知了。

康德（1724—1804）和休谟一样非常尊重经验、知觉。他承认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客观世界，也就是他所说的“物自体”的世界。但他认为“物自体”是不可知的，是超乎经验之外的，是人的认识能力不可达到的“彼岸世界”。康德对人类认识能力的全部考察，从“感性”到“知性”，从“知性”到“理性”，处处都贯穿了一个思想，就是把“物自体”的“本质”和“现象”割裂开来，把思维与存在割裂开来，把认识和实践割裂开来，宣扬不可知论。

康德的不可知论和休谟的不可知论是近代哲学史上不可知论的两个典型。二者各有自己的特点。休谟认为人永远跳不出自己的感觉一步，根本不能过问在感觉之外有没有“物自体”的问题。列宁指出：“休谟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在之物’，他认为关于‘自在之物’的思想本身在哲学上就是不可容许的……。而康德则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不过宣称它是‘不可认识的’，……属

于知识不能达到而信仰却能发现的‘彼岸’（Jenseits）领域。”①

但是康德的不可知论和休谟的不可知论又有共同之点，这就是“他们都把‘现象’和显现者、感觉和被感觉者、为我之物和‘自在之物’根本分开。”②

列宁还认为，不可知论者的“所谓自在之物在现象的‘彼岸’（康德），或者说可以而且应该用一种哲学障壁把我们同关于某些部分尚未被认识的但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世界的问题隔离开来（休谟），——所有这些哲学的臆说都是废话、怪论（Schrulle）、狡辩、捏造。”③

对于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论，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和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都进行批评和反驳，不过在恩格斯看来，“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④恩格斯接着写道：“如果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复活康德的观点，而英国的不可知论者企图复活休谟的观点（在那里休谟的观点从来没有绝迹），那末，鉴于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推翻，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做法。”⑤

①②③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91—92、91、92页。

④⑤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1、222页。

虽然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都承认外部世界的可知性，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但这一点在唯心主义者那里不过是同语反复,不证自明的。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不言而喻的。既然现实世界不过是绝对观念的“外化”，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是“外化”了的绝对观念，因此，思维（即作为思维主体的绝对观念）自然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绝对观念的东西。在这里，需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然而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要证明现实世界的可认识性（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仅凭逻辑的论据是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实践的标准来解决。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实践作为真理的唯一的检验标准以前,这个问题,长期陷于无休止的争论中。甚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后，不可知论者由于不懂得辩证法，不懂得思维对存在的反映、概念对现实的符合是一个辩证的、无止境的发展的过程，仍然总是把“尚未认识之物”当做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新康德主义者所玩弄的也是这套把戏。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时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出来说道：我们可能正确地知觉到事物的特性，但是我们不能通过任何感觉的或思维的过程来掌握自在之物。这个‘自在之物’是在我们的认识范围之外的。”①这种说法无疑是一种可怜的诡辩与遁词。这等于是说，在科学认识所达到的范围内，新康德主义者承认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的正确性，而在未知世界中，他却要求作一点保留，即仍然承认有神秘的“自在之物”存在着。这正如恩格斯所嘲笑的那样，“就他是

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5页。

一个讲科学的人来说，就他知道一些事情来说，他是唯物主义者；可是在他的科学以外，在他一无所知的领域中，他就把自己的无知翻译成为希腊文，称之为不可知论。”①

不可知论者常常陷入抽象推论的折衷主义方法，“这种方法丢掉了事物的总的概貌，过于经常地陷入一种几乎是无休止、无结果的对枝节问题的玄想中。”②

事实上，思维对存在，概念、规律和理论等等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永远只能在“总的联系”、“总的概貌”上达到符合和一致，而不能要求在一切枝节问题上都能和现实相符合，否则就不成其为概念和规律了。不仅如此，由于世界的无限性和发展的永恒性，我们的思维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也不能不通过一个无限的过程来实现，因此，在恩格斯看来，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乃是一个无止境的认识过程。

1895年3月12日，恩格斯写给正在转向新康德主义的施米特的信中，详尽地阐明了这个观点。恩格斯说：“您对价值规律的责难涉及从现实观点来看的一切的概念。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我用黑格尔的方式来表达）完全符合于您举的圆和多边形的例子。换句话说，这两者，即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象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由于概念都有概念的基本特性，因而它并不是直接地、明显地符合于它

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6页。

②《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5年3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5页。

必须从中才能抽象出来的现实，因此，毕竟不能把它和虚构相提并论，除非您因为现实同一切思维成果的符合仅仅是非常间接的，而且也只是渐近线似地接近，就说这些思维成果都是虚构。”①

恩格斯认为：“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这种统一无论在这个场合下或是在其他一切场合下都是如此。”②

同时，恩格斯还说：“自然科学中通用的概念，因为它们绝不是永远和现实相符合，就都是虚构吗？自从我们接受了进化论的那个时刻起，我们关于有机体的生命的一切概念都只是近似地和现实相适应。否则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哪一天有机界的概念和现实绝对符合了，发展的终结也就到来了。鱼这个概念的内涵是在水中生活和用鳃呼吸；如果不突破这个概念，您想怎么能从鱼转到两栖动物呢？而这个概念已经被突破了，我们知道一系列的鱼，它们的鳔已经发展成肺并且可以呼吸空气。如果不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这两个概念中的一个或两个都和现实发生冲突，您想怎么能从卵生的爬行动物转到能生育活生生的幼儿的哺乳动物呢？”③

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所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有力地反对了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而且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观点划清了界限。唯心主义者主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由于他们把存在归结于思维，在他们那里，思维和存在的对立和差别不过

①②③《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5年3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5、517、517—518页。

是思维在自身中设置的对立和差别，思维能够克服这种差别就象它能够创造这种差别一样，不过是借助于它自身的纯粹想象的活动。因此，唯心主义者所主张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实质上乃是无差别的同一，是形而上学的等同。

由于他们把思维当做出发点，把存在置于从属的地位，因而他们总是借口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来论证他们的思维产物的现实性。例如，黑格尔就是这样，既然对他的思维来说，他的哲学是正确的，所以，他的哲学也就是唯一符合现实的；只要人类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按照他的原则来改造世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会得到证实。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则往往陷入片面的经验主义。他们只注意内容而忽视形式，强调只有在感觉中有的，在思维中才能有。这样一来，他们就否认了思维规律和逻辑法则的客观性，否认了它们在认识现实世界中的巨大作用，认为思维的作用仅仅是把感觉经验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排列。

事实上，人的思维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本质上不同于感觉的经验，它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抽象化过程，在无比丰富的感性材料中把握住现象和过程的最本质的方面，它们来自感觉，但又是感觉中所没有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由思维而获得的规律，例如经济规律，并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倾向，一种平均数。如果要求概念和规律在细节上都和现实相符，要求它们和感觉直接一致，那就是陷于片面的经验主义，取消了思维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在恩格斯看来，正确地运用思维规律不是主观自生的东西，而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漫长过程中从自然界和历史中学习和吸取而来的，所以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以及历史规律这三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它们的最一般

的表现就是辩证法。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且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的、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①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由于不了解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深刻含义，不了解它所包括的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内容，甚至把它当做唯心主义的命题加以否定，其结果就是大大贬低理论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并且通过经验主义而走向不可知论。

第三节 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概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

1890年9月21日，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曾经指出，除了马克思的一些论著外，他自己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两部著作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②

在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费尔巴哈虽然首先回到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但是他并没有把唯物主义路线贯彻到底。作为一位哲学家，他仍然停留在半路上，即在社会历史领域里，他仍然是唯心主义者。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和批判了费尔巴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页。

②《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9页。

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思想，揭露了费尔巴哈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核心的唯心史观的本质，指出了他停留于唯心史观的原因。

恩格斯首先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宗教观。因为费尔巴哈并不希望废除宗教，只是希望使宗教完善化，他认为哲学本身应当溶化在宗教中。

费尔巴哈说："人类的各个时期彼此不同，仅仅是由于宗教上的变迁。某一历史运动，仅在它深入人心的时候，才会达到自己的深处。心不是宗教的某种形式，因而说宗教也应当在心中；心乃是宗教的本质。"①

他的唯心主义宗教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费尔巴哈夸大宗教的作用，认为宗教的变迁决定历史的变迁，宗教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费尔巴哈看来，某一历史运动能否发生和发展，不是取决于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而是取决于宗教是否深入人心。如果某一时期人们的宗教观念很深，则这个时期便比较稳固；反之，人们的宗教观念淡漠或发生动摇，则这一时期就不稳定，必将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所代替。费尔巴哈说过，路德的宗教改革曾带来一个"新时代"，现在"对基督教的自觉否定"又"打开了一个新的时代"，"人们现在投入政治，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是使人失去政治毅力的宗教。"②这样，费尔巴哈便把人类的历史看成了宗教的变迁史，把宗教的变迁夸大为"人类的各个时期彼此借以区别的"标志。显然，费尔巴哈用精神信仰来解释历史，这是明显的唯心史观。

其二，费尔巴哈把宗教完全归结为人的心灵和感情，认为

---

①②费尔巴哈《改革哲学的必要性》，《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5、98页。

"心是宗教的本质"。把宗教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心灵的关系混为一谈，从而否定了宗教的社会阶级根源。

费尔巴哈还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应该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即不仅能够满足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而且也能使别人得到幸福，为此，就必须有爱。爱是人们避免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摆脱罪恶和灾难的唯一途径。费尔巴哈断言："性爱是爱的最玄妙、最完善的形式；但是在这里，不同时（即使不是自愿的）使另一个人幸福，就决不能使自己幸福。相反地，我们愈是使别人幸福，我们自己也就愈幸福。"① 在他看来，宗教本来应该是这种爱的关系，但是在过去的有神的宗教那里，却把爱从人间搬到了天国，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这种爱，而是借助神或上帝的虚幻形式来满足人们的爱。宗教总是告诫人们在尘世间要戒色禁欲，克制自己，以便在天国中"由童贞女玛利亚身上获得女性之影象，获得爱之影象。"②

费尔巴哈认为，这种扼杀感性、窒息性爱的有神宗教必须打倒，应该使爱直接了当地在现实生活中建立起来。为此，就必须使爱神化，把爱提高到宗教信仰的高度，建立一种新的崇拜爱的宗教，去代替旧的有神宗教；用人们彼此之间的爱，去代替过去对上帝的爱。因此，费尔巴哈虽然反对有神宗教，但它并不希望废除宗教，只是希望通过他所建立的爱的宗教来"使宗教完善化"而已。

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列举了大量的事例，对费尔巴哈的唯

---

①费尔巴哈：《论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特别是从意志自由方面着眼》，《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34页。

②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2—53页。

心主义宗教观进行了批判。恩格斯指出了不是宗教的变迁决定历史的发展，恰恰相反，是历史的发展决定宗教的变迁。不能用宗教的变迁来解释历史，相反，宗教的变迁只有在历史的变迁中才能得到说明。恩格斯还认为，即使某些历史运动带有宗教色彩，但并不意味着宗教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真正决定性的原因仍然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同时，费尔巴哈还把宗教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混为一谈，也是不符历史事实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特别是性爱关系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可是宗教在人类漫长的岁月中，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从宗教的完善意义上来说，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随着阶级的消灭，宗教也必然随之消灭。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两性关系却依然存在。

恩格斯指出，在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里，人的感情总是有阶级性的，根本就无所谓纯粹的人类感情，所以也就没有理由再把这种超阶级的感情说成是宗教。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加以神圣化，这样就抹煞了阶级对立的事实。

恩格斯在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之后，接着又批判了他的唯心主义伦理学。恩格斯首先揭露了费尔巴哈道德观的唯心主义本质，在于以抽象的人性论作为出发点。费尔巴哈在反对宗教神学时，处处"都宣传感性，宣传专心研究具体的东西，研究现实，可是这同一个费尔巴哈，一谈到某种比人们之间的纯粹性关系更进一步的关系，就变成完全抽象的了。"①

在较之人们的两性关系更为重要、更为复杂的经济、政治等各种关系中，费尔巴哈只看到一个方面，即道德。同黑格尔的伦理

①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页。

学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伦理学显得十分肤浅和贫乏。在黑格尔那里，伦理学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绝对概念”，就其形式看来，无疑是唯心的；但它的内容却是现实的，是研究人类社会中关于家庭、社会和国家等一类实际问题的。费尔巴哈正相反，他把人作为自己伦理学的出发点。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就形式而言，当然是现实的；但他的伦理学的内容却是抽象的。因为费尔巴哈所说的人，脱离了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①

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道德观的基本准则。费尔巴哈认为，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来就有的，因而应成为一切道德的基础。但追求幸福往往受到人们行为的自然后果和社会后果的双重限制，要得到幸福，就必须正确地估计这两种后果。因此，对己以合理的节制，对人以爱，就成了费尔巴哈道德观的基本准则。这不过是一些贫瘠而空泛的说教而已。

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的道德的准则，在实际生活中是根本不能实现的。任何一个人要使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得到满足，就需要和外部世界来往，需要种种物质条件。在各种剥削制度下，广大劳动人民从来没有这些物质条件，追求幸福的欲望就根本无法实现。所以，把追求幸福的欲望当作道德的基础，对于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来说是一文不值的。同时，在阶级社会里，根本不可能有人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人有平等权利虽然在法律上被承认了，但因社会的物质、精神生活条件，被资产阶级所把持，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连勉强维持生活都很困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页。

难，他们哪里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平等权利呢？

恩格斯还分析了费尔巴哈停留在历史唯心主义上的原因。费尔巴哈未能摆脱唯心史观的主要原因在于：（1）他立足于资产阶级人性论，不了解社会实践的意义。费尔巴哈把自然界和人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他把自己的哲学叫做“人本主义”。在他那里，人纯粹是自然的生物学上的人，是超阶级的、超时代的纯粹抽象的人。他不是把人“当做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①，不是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去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也就不能真正了解人的社会本质。（2）从费尔巴哈本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说，当时德国反动当局对他的迫害，使他长期处于孤寂的生活之中，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不了解欧洲1848年的革命，因而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未能得到改造，所以，他也就不可能揭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

“恩格斯说得好：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在革命实践中，发展了唯物主义并把它贯彻到历史领域中，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崭新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③。

大家知道，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它彻底地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中去，科学地分析和回答了社会历史问题。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自然发展一样，有其客观规律。他是从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客

①②③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7页。

观规律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大家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初，首先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个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谈概念的自我发展，他认为绝对观念是推动一切运动和变化的最后动力，在自然界和历史中所表现出来的辩证的发展，都不过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这种颠倒了的意识形态，首先必须倒转过来，使它立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即自然界和社会历史以及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一旦把辩证法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他的革命性和巨大的方法论意义就立刻显示出来了。辩证法基于这样“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① 一旦把这个思想具体地实际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一种全新的科学即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就被开创出来了。

然而，把唯心主义辩证法转变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需要条件的，这就是自然科学发展，因为它能够揭示出自然界各种自然现象和过程之间的联系，而社会历史本身的发展也能够使社会生活中过去显得混乱且又隐蔽的联系，简单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只有这样，才不需要象先前的哲学那样，“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240页。

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①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大可不必责难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他们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是和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状况相适应的，他们在哲学上所达到的成就无愧于他们的时代，况且，当费尔巴哈在世时，自然科学也还是处在酝酿过程中，更由于他长期过着乡村的孤寂生活，使他得益于自然科学的新材料的可能性就更少了。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前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是所谓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使人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大地前进了。自70年代以后，对各门自然科学在认识上所取得的新的成果，更以空前的规模被提供出来，这样就能依靠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同时，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自从产业革命以来，在欧洲历史舞台上非常触目地出现了三大阶级之间为争夺统治而进行斗争，这时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它表明各阶级间的利益冲突是近代历史的主要动力。一旦弄清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它们在历史上是怎样变化和发展的，人们就能科学地说明全部历史，而不需要象先前的历史哲学一样，用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现实的历史，把历史描述成某种观念或理想目的的逐渐实现。

很久以来，人们就深信人类历史，虽经迂回曲折，但它终究是朝着进步的方向运动的。同时，既然人们都具有理想的目的，那末推动历史前进的就必定是关于这个理想目的的观念，于是，历史就成为各个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的过程。这些观念可以是人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创造这种观念的杰出个人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2页。

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它也可能是某种非人的神秘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运动就是由神秘的天意来支配的。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终极目的是达到绝对精神，因此，整个历史都是不自觉地、但又是必然地为实现绝对精神而努力，而达到这个绝对精神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中的内在联系。

在唯心主义哲学家看来，只要相信历史是进步的，就得承认它是在向着某种理想的目的运动，而推动它前进的则是某种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为了清除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就必须象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发现历史本身中的现实联系，以便取代那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并且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

发现社会历史的规律，唯物主义地解释社会历史，较之自然规律的发现更为困难而复杂。因为在人类能够系统地说明自然界中的各种现象的过程的普遍的相互联系之前，近代自然科学已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并为此提供了日益增多的材料，单单是自然科学本身的进步，就愈来愈迫使人们对自然界的统一图景及其历史发展，必须进行综合的研究和说明，所以，当康德提出太阳系发生说时，尽管当时它被大多数自然科学家视为奇谈，但就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预示着旧形而上学的覆灭。

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唯心主义越来越失掉自己的阵地，并且在自然神论和泛神论的外衣下，羞羞答答地塞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甚至连黑格尔哲学这个初看起来最唯心主义的体系，就方法和内容来说也不过是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但是在历史科学中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照例是唯心主义，而且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外，还没有另外的认识领域踏上真正科学研究的道路。在这里，一切似乎都必须从头做起。

所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内，他们的精力和才智都贡献给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唯有在这个领域内，他们作出了天才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发现。由于这一发现，唯物主义才第一次得到彻底的贯彻，而唯心主义也就从它的最后的一个避难所中被清除出去了。

恩格斯认为，除去各种原因不说，在历史科学领域内，影响人们去发现客观规律的情况是，“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这里，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目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①因此，要证明历史过程同样地是受内在的客观规律支配则具有更大的困难。

为此，必须说明制约着人们的自觉动机和目的的物质动因究竟是什么？并且，如果把推动历史的动力归结于某种自发发生的物质的原因，那末又如何说明历史的运动一般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的。倘若没有自觉的理想目的的推动，难道历史的进步能够实现吗？过去，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唯物主义者，正是在这个问题前面停下了脚步，结果竟为了保卫住“理想的意图”、“理想的力量”而不得不背叛自己的唯物主义的出发点，重新把观念性的东西当作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可见，要跨出这一步，并非轻而易举的。难怪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一听到历史规律之类的说法，仍旧不免要轻蔑地耸耸肩膀，把它视为奇谈。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

然而，尽管自觉的动机和预期的目的对于历史研究、特别是对个别历史事实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但是，有两个问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第一，在历史上，虽然人们的行动都是为自觉的动机所驱使，为实现预期的目的而努力，因而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一切都决定于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偶然情况，可是从结果来看，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却很少如愿以偿，无数个人的不同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下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其中有些目的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另一些则缺乏实现的手段。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就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自然界占统治地位的状况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虽然是预期的，但是最后的结果却不是预期的。这样，从最后形成的历史来看，个人的自觉动机和预期目的变成了从属的东西，它们不是历史事变的真正原因，导致最终结果的必定是由表面的偶然性所隐蔽着的内在规律，而历史科学的真正任务就在于发现这种规律。

第二，人们的行动虽然直接地是由他们的思想动机决定的，但这些思想动机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在这些动机的背后隐藏着的最后的动力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提出乃是唯物主义的要求，而旧唯物主义却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样，它就在历史领域内背叛了自己，把精神的原因当做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力，而不去研究隐藏在精神背后的最终原因是什么。所以，旧唯物主义不彻底的地方不在于它不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它没有进一步从精神动力的背后去追究物质的动力。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较之深刻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满足于看到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认为这些动机尽管可以解释个别事件，但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在这些动机背后还有应当加以探索的别的动机。可是，作为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不可能从历史本身中去寻找这种动

力，而是从他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怪想中，从所谓先于世界而存在的“绝对观念”中寻找这种动力，因而历史就不是人们自己创造的，而是“绝对观念”自我发展的历史。

由此可见，在探索历史的规律上，旧唯物主义甚至未能正确地提出问题，黑格尔接近于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却远远没有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正是在旧唯物主义却步不前，而黑格尔哲学又把问题引入歧途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从这里开始了他们创建唯物主义的工作。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为了要去探索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构成历史的真正动力的动力，就不能只研究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因为决定个别人物动机的杠杆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原因，有的甚至纯粹是个人的癖好。

为了撇开一切可能存在的偶然情况，从中发现必然性的东西，恩格斯提出从下述几个方面去研究和发现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

首先，必须研究那些推动广大人民群众、整个民族和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恩格斯指出：“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民族、以及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①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必须着重探讨推动人民群众行动起来的思想动机，从人民群众、民族、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的背后寻找历史发展的物质原因。

---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5页。

其二，必须研究在历史发展中长期起作用的、引起历史伟大变迁的动机。恩格斯指出，在研究推动广大群众行动的思想动机时，应集中注意的，“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①持久的、引起伟大的历史变迁的行动的动机往往是符合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如果只注意那些个别的、一时的现象，就会被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偶然因素所困惑，找不到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其三，要研究人民群众及其领袖在社会实践中的各种动机。恩格斯指出，要“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头脑中的动因”②。在群众及其领袖的动机中有些是明显的，有些是不明显的；有些是以直接行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有些是以思想形式表现出来的。不论这些动机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都要加以全面的、深刻的研究。历史上革命的领袖人物，他们的动机往往和广大群众的行动一致，能够代表群众的利益，推动历史发展。恩格斯认为，对上述思想动机的探讨，“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③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自从采用大工业生产以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已越来越被人们看得清楚了，并把阶级斗争当做理解近代英、法两国历史的钥匙。恩格斯说：“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即指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封建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

①②③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5页。

——引者注）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指英法两国——引者注）的现代历史的动力。”①

既然阶级斗争已被认为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动力，那末进一步的问题就是研究和决定阶级斗争的最后动因是什么？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必须从阶级本身的产生和发展去寻找。因此，为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而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便是阶级（其中首先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如果说，从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起源，初看起来还可以归结为政治的原因，即暴力的掠夺，但是这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就不行了。这两个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的经济原因。虽然各个阶级都要利用政治权利作为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但归根到底，它们都是由于经济原因而产生的。

在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斗争的最初几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致力于研究并且发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由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确切些说，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两个阶级。”②

所以，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发现阶级的存在并不是他的功绩，他的贡献乃是揭示了阶级的产生和存在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之间的必然联系。这样，人们就能够在混乱而隐蔽的历史联系中看清了它的层次和线索，即“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③

---

①②③恩斯格：《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6、247页。

与此相联的国家和政治制度，从传统的观点看来，它们是决定的因素，即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这种看法就被彻底倒转过来了，它们变成了从属的东西，而真正决定性的因素，乃是市民社会，即经济关系的领域。这样，无论从整个民族来看，或是从个别人物来看，它们的动机和愿望仅仅是形式上的原因，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乃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对未来历史所寄托的一切期望，虽然表现为崇高的理想和目的，其实都是以生产的进步为基础的。由此可见，对历史起支配作用的规律深藏在经济运动之中，这个运动的最基本的规律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愿望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①

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把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归结于经济力量，因而第一次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全部社会生活，但是它丝毫也没有因此而忽视意识形态的作用。它同崇拜经济力量的自发作用的庸俗唯物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推动个别人行动的动力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转变为他的愿望和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推动一个民族或阶级起来行动的动力也是如此，它也一定要通过国家或政党，转变为法律条文或政治纲领，才能使它们行动起来。而自从"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它就取得了对于社会的独立性，并且它愈是成为某个阶级的统治机关，它就愈是凌驾于社会而独立，与此同时，它也就愈是强化对于社会的支配和统治。而且"国家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7页。

一旦成了对社会的独立力量，马上就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公法和私法也被看做是两个独立的领域，并且有了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这样，同国家政权一样，它们虽然都渊源于经济关系，但由于它们相对独立性的加强，它们对经济的反作用也愈来愈加强了。

恩格斯在谈到哲学和宗教时指出，由于它们是离经济基础更远的意识形态，它们的相对独立性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了。自从古代社会解体以来，宗教及其组织在历史上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在整个中世纪，甚至在近代历史开始的二百年间，宗教都曾经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意识形态外衣，只有法国革命才最后结束了它的这种作用。所以，承认经济关系对历史的最终决定作用，不仅丝毫没有贬低精神因素的积极作用，而且第一次对这种作用提供了科学的说明。恩格斯认为，要了解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就必须了解它的产生和发展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于分工而产生的相对独立性，它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就是由此而发生的。他说：“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的本质来处理了。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①从恩格斯在这里对意识形态一词所作的独特说明，可以看出所谓意识形态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精神现象，而是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和发展的特殊精神现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象，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们终于被对历史进程本身的科学认识所代替。到了那时，即使在历史领域内，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也就会一目了然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了。

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批判，对唯物史观的系统地阐发，不仅澄清了资产阶级哲学家在社会历史观上所造成的混乱，而且对马克思和他四十年来在唯物史观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作了最为详尽的、科学的阐述。

第十一章　十九世纪90年代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十九世纪90年代，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继续发展，主要见于他的书信中。写作这些书信的直接原因，是鉴于党内的“青年派”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批评家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粗暴歪曲。尽管其动机不尽相同，他们都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为机械决定论和社会宿命论，宣称历史唯物主义是所谓“经济唯物主义”，硬说它唯一地只承认经济的决定作用，而完全无视人的活动的积极意义。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理解，不仅在资产阶级中间，而且在新近加入党的青年们和同情马克思主义的“朋友们”中间，都获得了广泛的流传，造成了思想上的极度混乱。

恩格斯高度重视这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对党的事业的极端危险性，他正确地指出：“青年派”出现的危险性不仅在于党内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别，因为在德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国家，出现这种派别并不使人意外，也不那么危险，它可以在以后的选举中被当做破烂废物扔掉。事实上，更大的危险还在于，“傲慢的文学家们”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却不熟悉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实际条件，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简单化，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偷运唯心主义观点。“青年派”的领袖并不打算认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而是急急忙忙地用他们

从资产阶级大学里搬来的零碎知识拼凑自己的"科学"，并"想用这种科学去教育别人"和"通过党的刊物来指挥党"，"规定党的策略"。但是，如果真的把"青年派"狂妄想法"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①

有鉴于此，结合对资产阶级批评家和"青年派"修正主义的批判，重新阐述并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第一节 保·巴尔特和保·恩斯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及恩格斯对他们的批判

莱比锡大学的历史教授保尔·巴尔特（1858—1922年）是德国唯心主义的社会学家，1890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哲学社会学著作《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在这部著作中，他第一个宣称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派唯物主义"，并且加以系统的歪曲和攻击。根据巴尔特的曲解，历史唯物主义似乎是机械地理解历史过程，他把马克思主义所承认的历史必然性同机械决定论和社会宿命论混为一谈。作为一个唯心主义实证论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一窍不通。在他看来，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就必然要排除人的活动和一切主观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巴尔特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只有经济因素自动地起着作用，因此，他断言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及其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乃是纯粹抽象的、思辨的结构。

①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1页。

出于唯心主义的偏见和资产阶级的立场，巴尔特竭力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解释为狭隘片面的教条，似乎历史唯物主义只承认经济因素起作用，而社会生活的其他多种多样的内容都不过是单纯的结果，一概被归结于经济的原因。从这种歪曲的解释出发，巴尔特硬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说成是物质进化观，按照这个观点，经济关系的变化自动地为历史进程开辟道路，而人本身不过是受经济状况摆布的可怜的玩具。

巴尔特不仅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为“经济唯物主义”，而且把它歪曲为“技术决定论”。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可以直接被看做是经济派概念，而为了把他们的观点与同一派的其他分支加以区别，必须称这些观点为技术经济历史观。在巴尔特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使用经济结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些概念似乎在内容上全无区别，它们所表明的都不过是某种工艺过程、技术的发展。他硬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中，经济关系和生产、生产和工艺技术完全是一回事。在作了这种歪曲之后，他又一本正经地来加以“驳斥”，说单凭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改变并不足以解释一切历史事实。

他完全不了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经济或生产这一类术语具有极其广泛的含义，它们被理解为人与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的整个社会过程，而决不仅限于技术的进步和工艺水平。技术的发展和工具的进步总是会带来物质生产条件的改变，并且迟早要引起生产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而由于这一切，社会就同时相应地改变着自己的面貌。如果象巴尔特所曲解的那样，一切历史事实都径直地由生产工具的改变来解释，那就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而是最庸俗简单的机械决定论。

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者，巴尔特完全不了解社会科

学中科学抽象的意义，因而他否认诸如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范畴的科学性。在巴尔特看来，所谓“经济”一词的意义，除了包含着工艺和技术而外，不可能再有别的内容。作为本身就是抽象范畴的“经济关系”这一概念，他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因此，在他看来，“经济”一词是和人的有意识的活动互相排斥的，它不过是一堆死物。承认“经济”的决定作用就意味着完全否认人们的思想及其有意识的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基于这个观点，巴尔特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受经济制约的学说，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称之为“社会静力学”。他硬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中，“社会动力学”，即所谓观念、意识等等的能动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他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完全没有指出过意识形态对国民经济的反作用。他断言，马克思主义把思想等等仅仅看做某种消极的东西，“仅仅是形式和外衣”。而他认为，真正社会学的任务，是不抱任何成见地确定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因素（无论是经济的或政治的，物质的或思想的）在历史发展中的相对作用。

为了论证他自己的折衷主义的因素论，巴尔特力图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一种狭隘、片面的历史理论，它从未得到过证明。巴尔特说：经济先于政治，这无论在历史初期和以后都无法证明，不如说，在这两个生活领域之间存在最密切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决不能说明一个是基础、另一个是上层建筑的比拟说法是正确的。对于巴尔特来说，真正科学的任务不在于坚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基本哲学派别之间的对立，即不在于确定物质的东西和意识的东西之间的区别以及二者的从属关系，而在于承认并描述各种实在的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

用。他力图把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消融在所谓“相互作用”的灰暗背景之中。作为实证主义的拥护者，他竭力鼓吹唯心论和折衷主义。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划分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区别，而是论证自我和非我、主观和客观、意识和存在的不可分割性。

在历史观上，巴尔特从身心并行论出发，主张把物质和思想、经济和政治这两个领域的相互作用作为社会理论的决定性基础。这样，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时而把物质和经济的“因素”，时而又把思想和政治的“因素”，当做第一性和决定性的东西来加以解释。据此，他指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未能贯彻唯物主义，说它只承认“经济环境”的决定作用，而完全忽视了地理环境、人口密度、种族特点的作用。巴尔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忽视了“一开始就在人的周围的东西，即自然，以及后者在人的身上表现为思想的东西”。根据巴尔特的观点，人类社会设施的性质从属于满足人的生物需要的必然性。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复杂机体，不是在人与自然界的长期相互作用中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不是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直接地、唯一地服从于地理环境，服从于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即所谓“人的本质”。这样，他就不可自拔地陷进了公开的唯心主义观点。

如上所说，巴尔特的观点是唯心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的折衷主义的杂拌。在他看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截然不可调和的。他断言，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只是渊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至于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学说中同历史理论丝毫没有关系的偶然因素，它不过是从费尔巴哈那里生硬地搬来，以便于给黑格尔的逻辑形式添进一些经验主义的内容。

巴尔特竭力贬低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他“读黑格尔的著作，就是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寻找作为他建立体系的杠杆的那些谬

误的推论和牵强附会之处。”① 他的平庸的头脑无法从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的虚假形式下发现它的天才的内容，因此，他始终不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所包含的深刻的辩证思想的实质。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中，既包含了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又包含了揭示精神和物质之间全面的相互关系的彻底的辩证法。正因为这样，所以，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充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进程，它既深入地研究了历史发展的动力，又科学地阐明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全面的相互作用，发现这种相互作用所围绕的轴心。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对全部社会生活现象作统一的解释，反对用各种孤立的“因素”来对历史作折衷主义的、支离破碎的说明。

基于形而上学的立场，巴尔特特别激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象宗教、艺术、哲学这些高耸在社会生活顶端的意识形态现象受经济制约的学说。他断言，马克思主义用经济制约性来解释一切的“奢望”是没有根据的，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的著作，也没有能够提出足够的证据，来说明宗教和哲学作为“决定于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是从属于经济发展的。他认为，在宗教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中，宗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尤为明显的。他说：在各族人民的生活中，“宗教到处是占统治地位的，而不是第二等的因素”。“宗教就其起源来说是远离经济的，马克思只是硬说经济后来对宗教能够发生影响，但是没有在任何地方加以证明，这一点是不能排除的。实际上我们认为这种影响是不大的。”

作为一种恶意的挑衅，巴尔特还自鸣得意地写道，他为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哲学发展从属于经济变化的例子，不得不逐

①《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1年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3页。

字逐句地阅读马克思的全部著作，结果只能找到一个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他这样极尽歪曲的能事，是企图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和贫乏。被巴尔特歪曲并加以攻击的马克思的上述这段话，出自《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的（111）脚注。在这个脚注里，马克思写道："按照笛卡儿下的定义，动物是单纯的机器，他是用与中世纪不同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眼光来看问题的。在中世纪，动物被看作人的助手"。①

马克思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他把笛卡儿的哲学体系仅仅看做是工场手工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指出了在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先前的哲学思想一般地会朝着什么方向变化。

巴尔特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恩格斯最初是从一家维也纳杂志《德语》上知道的。１８９０年７月，恩格斯在这家杂志上读到了三流经济学家摩里茨·维尔特对巴尔特这本书的评论。接着，他在给施密特的信中写道："这个批评使我也对该书本身产生了不良的印象。我想看看这本书，但是我应当说，如果摩里茨这家伙正确地引用了巴尔特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那末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了。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末，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②

---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8页。

②《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页。

虽然，恩格斯没有写出专门的著作来回击巴尔特的歪曲和攻击，然而，在他此后所写的一系列书信中，他却以巴尔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为借鉴，正面地十分精辟地重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所有基本问题。在恩格斯仔细研究了巴尔特的著作之后，他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批评家的平庸拙劣和别有用心深为愤慨。他说："巴尔特对马克思的批评，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臆造一种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论，说什么这应当是马克思的理论，继而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他并未由此得出结论：他，巴尔特，把某些不正确的东西强加给了马克思，相反的，却得出结论说，马克思自相矛盾，不会运用自己的理论！"①

巴尔特所以这样做，不仅是由于无知，而且是由于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者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就拿论述马克思的那一部分来看，那里出现的极其严重的错误用什么理由可以解释呢？对于一个读过我的《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在这两本书中对这些错误都充分予以防止）的人来说，几乎所有这些错误都是不可理解的。"②

恩格斯认为，历史的现象并不象巴尔特所认为的那样是各种孤立因素的总和，各种现象都是统一的社会机体的一部分，它们相互作用，彼此发生影响，但归根到底又都无一例外地以物质生活关系的发展为最终的基础。为了理解整个社会生活，光找出经济的原因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归根到底把经济关系视

①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1年7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4页。

②恩格斯：《致斐·滕尼斯（1895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3页。

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而决不是把一切历史现象都径直地、简单地归结于经济关系，更不是否认政治等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因此，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而整个的历史发展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各种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力量。①

在恩格斯的影响下，1893年，梅林写出了第一部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历史的引线来应用的历史评论性著作《莱辛传奇》，该书的最后一篇是专论历史唯物主义的附录。在这篇文章中，梅林尖锐地抨击了保尔·巴尔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篡改和攻击。他根据大量的历史材料证明一切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依赖性，同时也正确地阐述了宗教、哲学等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篇附录受到恩格斯肯定和赞扬。恩格斯指出：象巴尔特一类的人都有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例如在您的书中第475页上巴尔特讲到教士等级和宗教的地方，就是如此。我很高兴您这样收拾了这个平庸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家伙。”②

对马克思主义的粗暴歪曲不仅来自资产阶级批评家，而且也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6—487页。

②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2页。

来自党内的"青年派"。所谓"青年派"，是90年代初在德国党内兴起的一股反对派运动。这个运动被恩格斯称做"文学家和大学生骚动"。在政治上，"青年派"反对以倍倍尔等人为领袖的德国议会党团所奉行的政治策略，攻击他们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社会民主派"。在思想上，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极端庸俗化和简单化为抽象的公式，企图按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面貌改造马克思主义，并妄想从理论上指挥党。在"青年派"的思想领袖中，最突出的是柏林组织的领导人保尔·恩斯特（1866—1933年），他是经常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上撰写文章的著名剧作家和文艺评论家。

1890年5月，在"青年派"的文学社会刊物——《现代生活自由论坛》上，围绕文学和妇女解放问题在保尔·恩斯特和海尔曼·巴尔之间展开了争论。《现代生活自由论坛》的编辑巴尔和文艺评论家勒·玛尔戈尔姆认为，"妇女问题"是一个不以社会条件为转移的"永恒"的生物学问题。对此，恩斯特提出了批评。恩斯特虽然正确地指出，妇女运动象许多其他社会现象一样首先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然而他却极其简单地认为，妇女问题的解决是生产关系发展的自然结果。他说："毫无疑问，妇女问题象所有'问题'一样，要靠生产关系的一般发展自行解决"。这样，他就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为机械决定论和社会宿命论。接着，巴尔在《妇女问题。马克思主义模仿者》一文中尖锐地嘲笑了恩斯特，说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把"批判方法"变成"教条主义定理"。

1890年5月31日，恩斯特就巴尔的文章写信给恩格斯。他在信中说："由于许多原因，我很想知道，巴尔的指责是否正确，马克思是否对妇女问题有另外的看法，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在这

种情况下会怎样想，……因为我也在其他刊物上（例如在《社会民主党人》上）维护自己的观点和类似的东西，如果它们不正确，会造成有害的影响”。恩斯特满心希望能在和巴尔的论战中获得恩格斯的支持，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6月5日，恩格斯在答复恩斯特的信中，虽然婉转却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恩斯特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和公式化的错误。恩格斯写道：“至于谈到您(指恩斯特—引者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那末，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如果巴尔先生认为他抓住了您的这种错误，我看他是有一点道理的”。①在这封复信里，恩格斯同时也嘲笑了巴尔的观点。他说，如果象巴尔先生那样，把妇女身上的一切历史地形成的东西统统去掉，那末，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所谓“原来的妇女”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干脆地说，这就是雌的类人猿。”②

恩格斯的批评显然未能使恩斯特改正自己的错误。1890年8月9日，恩斯特在《柏林人民论坛》报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危险》一文，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那里他直截了当地重复他从形而上学者杜林那里学来的荒谬论断，说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正是创造历史的)人的参与，并且说什么经济关系(但是它们本身就是人创造的！)就象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这些人。这个人竟能把杜林这样的敌人对马克思理论所作的歪曲同这个理论本身混为一谈”。③同资产阶级批评家

①②恩格斯：《致保·恩斯特（1890年6月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10、412页。

③恩格斯：《答保尔·恩斯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7—98页。

保尔·巴尔特一样，恩斯特也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庸俗化为“经济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只是经济力量的消极的结果。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处理问题的刻板公式，甚至非常机械地去理解象艺术作品这样的意识形态现象，认为它们直接来自时代的经济发展。他极其简单地把文学创作中的阶级问题公式化，按照德国小市民阶级的模式去理解挪威的小资产阶级，而对挪威社会发展的历史独特性则弃置不问。例如，他认为易卜生作为挪威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必定不可能跳出小市民思想的框子，所以，他竭力证明这位挪威的伟大文学家始终只能在自己的阶级观念中兜圈子。恩斯特否认具体研究历史事实的必要性，认为不这样做单靠历史唯物主义也能够解决一切历史问题。这就意味着，对于“青年派”来说，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词已完全变成一个套语，变成不研究历史的借口，他们认为只要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无需作进一步的研究，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对此，恩格斯指出：“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①然而，“青年派”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这样，就给资产阶级批评家如巴尔特之流以称心的理由，来恶意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

在给恩斯特的信中，恩格斯结合易卜生作品的评价问题，分

①《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5页。

析了恩斯特在方法论上的最大错误是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公式化的教条主义。针对恩斯特在研究易卜生的作品受什么阶级的世界观所制约的问题上采取了非历史的抽象的态度，恩格斯写道："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入小市民阶层的范畴。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在这一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①实际上，由于几个世纪以来挪威的独特的历史发展，使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和德国的小市民阶层有着天渊之别。由于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因而挪威的小资产阶级是自由农民之子，他们比起德国的小市民来可说是"真正的人"。虽然这个国家由于它的隔离状态和自然条件而落后，但在好几个世纪以来它的社会状态却处在正常的发展之中。随着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挪威的小资产阶级象十七、十八世纪的英法小资产阶级一样成为历史的主人，就毫不足怪了。只有懂得了这点，才能理解以下两个基本事实：第一是当拿破仑最后失败、欧洲反动派到处都卷土重来的时候，正是挪威的小资产阶级争得了一个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个宪法都要民主得多的宪法；第二是在最近二十年中挪威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同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他们所创作的东西给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文学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然而在德国，小市民阶层却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和延缓了的发展的产物，因此它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德国的小市民虽然也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然而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而是一幅夸张到了极点的漫画，是一种退化。

①《恩格斯致保·恩斯特（1890年6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2页。

可见，在对所有这一切历史事实作一番彻底的研究之前，要想对例如易卜生等人的戏剧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则是不可能的，单单把他们的创作纳入小市民阶层这个抽象范畴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如果事情竟是这样简单，那就不需要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只要对作家的身世作一点阶级的考证就可以了。

在恩斯特看来，一切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必然直接来自于经济，因此只需要根据作品的作者属于哪个阶级就可以判定它的思想内容的阶级性。而根据恩格斯的观点，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任何意识形态，它只是影响人们在对先前的思想资料进行加工时所遵循的方向，象艺术、宗教和哲学这些远离经济的意识形态，尤其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归结于经济的原因。

恩格斯强调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不是关于人类历史进程即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知识总和，不是一堆僵死的结论和现成的公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因此它在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具有最根本的方法论意义，是研究历史的指南和引线，而不能把它当做教条来使用。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包含人们借以作出一切具体结论的现成公式和历史知识，相反，为了成功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必须在各个具体研究领域拥有广博的知识。不深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一致性，就常常容易滑到庸俗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去。恩格斯以梅林和拉法格等人为例指出，甚至第二国际的最优秀的理论家，都不能完全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深刻性，以致也常常造成庸俗化和简单化的错误。

事实表明，在历史科学领域内庸俗唯物主义的立场必然导致历史唯心主义。在拒绝恩格斯的批评之后，保尔·恩斯特很快地

就从“经济唯物主义”的立场转到公开的唯心论方面去了。他和巴尔特一样，成了多因素论的拥护者。他说，在历史上除了经济力量以外，具有非特质基础的纯精神力量也同样起作用，对理解艺术和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来说，这一点应当成为一条指导的东西。他认为，在社会中有两种因素共同起作用，这就是“经济关系”和“人的本质”，由于它们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后来的所有的东西。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如果我们想要成为正确的，我们就不应当仅限于客观的生产过程，我们还应当研究人的‘本质’。”①沿着这条道路，他最终跌进了新康德主义的泥坑中去：人的历史行动不是决定于经济关系等等这些“实在的东西”，而是决定于为人的感觉器官的本质所制约的“似乎实在的东西”，或者说，人并不知道有什么，而只知道由于人的感觉器官的本质而使他感觉到的东西。

以保尔·恩斯特为代表的“青年派”的修正主义观点受到了党的“正式理论家”卡尔·考茨基和康拉德·施密特的袒护。恩斯特的文章大多发表在由考茨基主编的社会民主党中央理论刊物上，而施密特则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为恩斯特的所谓“片面性”进行开脱和辩解。这种情况当然会在一般党员、特别是非党人士中引起更多的思想混乱。于是，有许多人、其中多数是青年作家和大学生写信给恩格斯，要求他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质。

例如，《社会主义月刊》的编辑约瑟夫·布洛赫（1871—1936年）于1890年9月3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这个原理应当怎样理解呢？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只有经济关系是决定性因素，或者只有

① 见《新时代》1893—1894年第2卷，第27期，第7页。

经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一切其他的关系（这些关系本身在当时情况也能发生作用）的固定的基础？我以为，保·恩斯特较多支持前一种看法，而康·施密特较多支持后一种看法。难道政治的、王朝的和普通个人的利益在历史过程中不相当经常地起一定的作用。当然，它们没有物质基础，就不会发生这种作用，但毕竟不是一切都产生于经济必然性。不然，光有经济可能性就足够了。象拿破仑或俾斯麦那样的人物不顾经济条件似乎就不大可能取得什么成就。但同时这一点也不能说明，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经济必然性的结果，……为此，我想问一问您，根据唯物史观，是不是只有经济关系作为自然界的自然规律在所有的地方直接地和不以个性为转移地起着作用，或者，还有其他一些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条件同时本身又能加速或阻止历史发展进程的关系也起作用”。

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恩格斯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都一一作了回答。所有这些书信围绕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问题，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既简单扼要而又透彻鲜明的阐述，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库中的极为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精心地加以研究和领会。

第二节 经济基础及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为了正确理解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首先需要弄清“经济基础”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1894年1月，恩格斯在给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写道：“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

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①

恩格斯给“经济基础”所下的这个定义，显然是考虑到巴尔特之流对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曲解。巴尔特首先把“经济”一词的内容解释得非常片面和狭窄，然后就宣称历史唯物主义为一种狭隘和片面的理论。巴尔特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同哲学唯物主义没有丝毫关系，它不过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学理论，因为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似乎只承认“经济环境”，而完全忽视了地理环境、人口、种族之类的物质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事实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关系”的概念具有非常广泛的意义，它包括了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整个过程，既包括生产过程的工艺和技术方面，也包括这同一个过程的全部社会关系。和巴尔特所理解的所谓“社会静力学”完全不同，“经济基础”这一概念不仅是一个有着自己多方面内容的有机结构，而且完全是一个“动态”概念，它包含着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构成的整体和自然界之间的活生生的、不断变动着的关系。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在生产过程中既是人们改造的对象，又是人们的生产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随着生产的发

---

①《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页。

展而不断改变着的自然环境，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总是作为消极的因素而存在，它们愈到后来就愈是作为“经济”的因素而参加到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中来。至于族种，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它“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①

然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列举的上述诸方面，即地理环境、生产力、交换和分配方式等等，作为决定社会历史的基础，并不是互相并列的，而是彼此从属构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其最终的基础是生产力，而决定其性质并标志其社会发展阶段的则是与该生产力相联系的生产关系。所以，恩格斯说，生产和运输的技术装备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而后者则决定社会的阶级划分。在这些社会关系中，还包含先前发展阶段的旧经济关系的残余。

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认为在考察经济关系时必须考虑到一国的外部环境，例如，世界市场对一国经济的影响，等等。可见，马克思主义视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包括着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存在的一切现实关系的总和，或者说，是全部生产过程所赖以进行的各种前提和条件的总和。

因此，“经济基础”这一概念决不是指某种抽掉了现实的具体内容的单一的关系，而是与现实的生产力乃至特定的地理环境等等密切相连的统一的经济有机体。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变化，这种经济有机体也无时不处于运动之中。只有这样理解，人们才不致象巴尔特和恩斯特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简单化和庸俗化，变成一种片面和狭隘的理论，或者象另一些人那样，把经济关系简化为阶级关系，然后就一概用“阶级利益”和“阶级性”来说明人

①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页。

们的一切活动和动机，从而解释全部上层建筑，包括最复杂的意识形态现象。

到了后来，甚至还产生了下面这种本末倒置和削足适履的情况：不是正确地根据经济基础的概念来理解上层建筑，而是根据上层建筑的所谓阶级性来规定经济基础的概念，这就是说，凡不能在上层建筑中反映出鲜明的阶级性的那些关系和因素都不能列入经济基础的概念之中。这样，不仅地理环境、人口和种族因素不能包含在经济基础之中，甚至生产力和先前时代残存下来的经济关系也被摈斥于基础这个概念之外。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化和歪曲，竟然超过了巴尔特和恩斯特之流。

把生产力排除在经济基础的概念之外，从方法论的观点来看，是尤其荒谬的。若果真如此，则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就会象巴尔特所攻击的那样，变成“社会静力学”。关于这一点，我们特别需要研究一下恩格斯临终之年所写下的一段话。1895年3月，恩格斯在为再版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指出：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同时又很典型的多年历史发展时期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从而按照作者的观点，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接着，恩格斯写道：在判断当前发生的个别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时，总是不能探索出终极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有相当的专门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这样逐日地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发展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以致能够随时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作出一般的总结，况且，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因素，在还没有突然猛

烈暴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在长时期内处于潜在活动状态的。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后头的。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

恩格斯说："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源泉。但是，概括叙述当前事变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产生错误的源泉，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当前事变的历史。"①

不难看出，根据恩格斯的观点，把政治冲突归结为各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各种政治事件，这只是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当前的历史时所不得不采用的简化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是它不可避免地要忽略作为一切历史过程的真正基础的经济状况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虽然各阶级和阶级集团的利益无疑是推动各个政党进行政治活动的动因，但是各阶级的现实利益和它们相互间的实际力量对比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而改变的。因此，只有把握住经

①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2页。

济运动中的一切最重要的变化，如工业和世界市场、银行和金融贸易方面的每一个重大变化，乃至工艺技术和生产方法上的重要革新，才能探究到一切政治事件的最终原因。

因此，从理论上和原则上来说，决不能把作为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看成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并且，在不得不把当前的历史事件简单地归结为各阶级的利益斗争时，要清楚地看到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和相对的意义。可见，把经济基础简单化为生产关系（甚至所谓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简单化为阶级的对立，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简单化为阶级分析方法，这类的观点和理论，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和曲解，是企图把历史唯物主义变成片面的抽象公式，变成真正的“社会静力学”。

在阐明了“经济基础”的概念之后，恩格斯进而论述了经济关系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在这一方面，恩格斯首先针对巴尔特和恩斯特把“经济状况自动起作用”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理解，阐述了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和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

恩格斯说：“这并不象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历史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①

①《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页。

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是否承认人对历史本身的创造作用，而在于正确地理解人们是怎样创造自己的历史的。为此，就必须辩证地解决在人类历史上偶然性和必然性以及必然和自由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不同于机械唯物论，它不否认偶然性的客观存在，也不企图把偶然性强行抬高为必然性，它坚持在偶然性中贯穿着必然性，但认为必然性只有通过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把这个方法应用于历史，就不会导致那样一种机械决定论和社会宿命论的观点。

自从私有制发生以来，同一社会中的人就为不同的经济利益所分割，支配人们行动的每一个人的意志都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所制约的。这样，就有无数个彼此不同而又互相交错的力量同时发生作用，由此而产生的总的结果，表现为一种合力的作用，而不以任何单个的意志为转移。这些由单个意志所组成的力量的形成及其交互作用，并不是机械决定的单一的过程，而是表现为无数偶然性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中每一个人的行动虽然是充分自觉的，甚至是深思熟虑的，但是，事变的总的结果却通常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然而，这种结果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预先所期望的，但却是合乎规律的，一定要出现的。这就是说，在到处表现为偶然性起作用的历史运动中，又有必然性贯穿其中，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个必然性归根到底乃是经济的必然性。

由此看来，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但人们决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进行这种创造的，在这些条件中，经济条件起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它既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动机，也规定着这种动机得到实现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在私有者的社会里，人们并不能按照共同的意志，

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志和力量汇成了一个总的合力，并由此而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这个结果虽然每个人预先都期望的，但却是他们共同活动、共同创造的结果。在这种表现为合力的创造作用中，单个的意志决不等于零，相反地，他们都对合力所有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于是，事情就可以表述成这样，历史进程既是由人们的共同活动所创造的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①所以，当历史唯物主义把经济必然性看做历史运动中的自然规律的时候，它决不是忽视人们的自觉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意义，而不过是指出了贯穿在这种活动之中的历史的规律而已。因此，巴尔特和恩斯特之流把机械论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主义，适足以说明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缺乏起码的了解。

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引出社会宿命论的观点，也是荒唐可笑的。硬说历史唯物主义把经济关系的作用等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说它象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着人们，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所一再重复的无耻滥言。谁重复这种滥言，就证明他已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所以，恩格斯在引述恩斯特的这段话时气愤地说道：“这个人竟能把杜林这样的敌人对马克思理论所作的歪曲同这个理论混为一谈，让别人去帮助他吧，我可不干这种事。”②

①《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页。

②恩格斯：《答保尔·恩斯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8页。

在必然和自由、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坚持着最彻底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承认经济关系对历史进程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但是，它不认为经济必然性的作用是唯一的和无所不包的，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一切历史现象，不仅彼此相互作用，而且能够对经济基础发生强大的反作用。由于这种反作用的强弱、大小和方向的不同，经济关系的作用就会产生多种多样的结果。因此，人们在经济必然性面前决不是无所作为和无能为力的，他们可以通过多种多样方式和途径，以各种可能的手段来影响经济发展的进程。如果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把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看做是绝对的，设想政治、法律、宗教、道德以及哲学等等都不能反作用于经济并影响历史的进程，那就是根据“名称”来了解事物，是小学生的作业。

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

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①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规律归根到底制约着人们的活动和这种活动最终导出的结果，但这丝毫不排除人的自由意志的作用。只要我们不把自由了解为在想象中摆脱了一切限制的放纵和任性，那末，自由和必然就不单是彼此对立而且是互相统一的。自由王国并不存在于必然王国的彼岸，而是只有通过必然王国、并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的。必然诚然是自由的界限，但是，到达自由之路不是在想象中超出这个界限，而是在现实中认识并把握这种必然。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人们一旦认识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必然性，他们就会有足够的自由去运用正确的手段来影响历史的进程。硬说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人们必须奴隶般地服从经济规律的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和恶意歪曲。

在谈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的时候，恩格斯强调指出，不能把上层建筑中的各种现象简单地、直接地归结于经济。为了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表述得更准确，恩格斯着重指出这里所谓的决定作用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说的。一方面，就整个上层建筑而言，它是一个包含着多层次的有机结构，其中的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同经济基础有着远近不同的关系，如果说政治、法律等等是较为直接地反映经济关系的，那末宗教和哲学则是远离经济的上层建筑现象，它们对经济关系的反映是以政治和道德等等为中介的。另一方面，所有上层建筑现象都一无例外地相互影响，形成一个错综交

①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织的相互作用之网。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那些远离经济高耸在上层建筑顶端的意识形态不能直接归结于时代的经济，就是更接近于基础的上层建筑现象，如政治、法律等等，也不能简单地、径直地由经济来解释，因为它们不仅受经济的制约，而且也受到上层建筑中其他方面的影响，其中包括历史传统。

恩格斯以英法两国的继承法为例来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的继承权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尽管如此，也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① 恩格斯接着写道："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那末它们都有它们的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内容，即目前我们不免要称之为谬论的内容。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本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大都只有否定性的经济基础；……要给这一切原始谬论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的确太迂腐了。"②

在远离经济的意识形态领域内，例如在哲学中，经济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在这里被当做出发点的只是先驱者们所提供的现有的哲学资料，经济的作用仅限于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并且这种作用照例是间接发生的，最能对哲学产生直接影响的，常常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正因为如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处于领先的地位。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决不是只有经济规律起作用，政治、法

①②《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4、484—485页。

律、道德、哲学等等上层建筑的发展也有自己的规律，在各种规律彼此交错地发生作用的情况下，历史的进程就不能不充满各种偶然的事件，要把这些偶然事件一一都直接归结于经济的原因，那就是把复杂的事情十分简化了。事实上，越是远离经济的上层建筑领域，参与其相互作用的因素就越多，在他们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也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就决不能用单一的经济必然性来作出解释。

然而尽管如此，经济基础对整个上层建筑的最终决定作用还是毋庸置疑的，不然历史的发展就没有任何规律可言。虽然各个上层建筑领域都有自己发生和发展的特殊条件，并且彼此相互作用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经济运动的基础上，是处于对经济关系的总的隶属关系以内的。单个事件似乎和经济不相统属，而总的情况却无法摆脱经济运动的支配。

从霍布斯到法国唯物主义者以及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发展，都十分明显地首先从政治、然后又从经济上反映了历史本身的进程。霍布斯作为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是当时达到全盛的君主专制政治的产儿。在十七世纪，这种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是英、法资产阶级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第一个阶段。然后是洛克，他在哲学上对宗教所采取的妥协态度就象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对贵族所进行的妥协一样。只有到了十八世纪，当资产阶级在法国成为彻底革命阶级的时候，唯物主义才获得了更为彻底的形式，法国唯物主义者则成了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哲学家。至于德国，由于它从1648——1830年间的经济的可怜状况，使德国的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庸人的面貌。它向往着革命，但又显得疲惫和软弱，它的虔诚主义、多愁善感和对贵族的奴颜婢膝，使德国的经济长期处于慢性贫困之中。德国资产阶级(实际是小市民阶层)的这种

两面性和矛盾态度，异常明显地反映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德国庸人的面孔有时从肯定方面表现出来，有时又从否定方面表现出来。"①

经济关系对上层建筑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不应当在单个的事例中去寻找，只有对一连串的历史事件进行系统的研究并探索其发展的规律，才能加以理解。如巴尔特那样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哲学对经济的从属性的例子，正说明他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质的完全无知。归根到底，经济运动是构成全部历史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过程的红线。正如恩格斯说的："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间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②

第三节 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恩格斯第一次阐明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的原理，这个原理对辩证地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①《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

②《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7页。

恩格斯的阐述是从关于分工的问题开始的。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在致施密特的信中谈到了工业和世界市场同金融和证券市场的相互关系问题，指出金融和证券贸易最初乃是从工业和商品贸易中由分工而分离出来的新部门，虽然在金融市场上的人看来，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好是它的倒置的反映，因而颠倒了因果关系，但在实际上，后者却总是尾随着前者而运动的。这就是说，离开了工业和世界市场，金融贸易就没有自己的独立的运动。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危机，对于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危机来说，只是一种征候而已。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不依赖于商业危机的发生，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并且工业中所发生的紊乱情况对于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

金融市场对于工业生产和商品贸易的这种独立的运动是如何发生的呢？恩格斯通过阐述分工的理论来说明这一问题。恩格斯说："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就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生产本身而独立起来，它就会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起作用。"① "金融市场也是如此。金融贸易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和在这一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的规律和阶段。加之金融贸易在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到

①《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1页。

证券贸易，这些证券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金融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金融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①

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对于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了解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说："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金融贸易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整个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象在商品贸易中和后来在金融贸易中的那种情形：这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它由于它本来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影响。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②

恩格斯关于由分工而产生相对独立性的理论具有极其深刻和广泛的意义。社会内部的分工和自然界中由发展而引起的分化一样，是按照事物所固有的规律进行的。例如，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产生的每一种新的有机体，一经从原有的生物种类中分化和分离

---

①②《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1、482页。

出来，就获得了它自身的内部结构、它所特有本性和活动方式以及进一步发展的特殊规律性。这就是说，它获得了一种相对于自然界而独立的运动，并反作用于它所由产生的那个自然环境，虽然这种运动总的来说仍然必须服从它周围的自然条件。并且随着有机体本身不断向高级阶段发展，它所获得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自然基础的反作用也越来越大。人类本身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情形也是如此。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沿着分化（分工）的规律进行的，这种分化或分工同自然进化一样也是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发生的自然历史过程，由分工而产生的新的部门和领域不是人为的无机的产物，而是合乎规律地发展出来的有机整体。因此，它一经产生，便获得自己的独立存在，并且按照自身的规律、循着本身特有运动方向生长和发展，愈到后来它就获得愈大的能力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上层建筑最初作为从经济运动中派生的东西就反过来对经济基础起作用，从而使原因和结果各自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原因转化为结果，而结果转化为原因。然而这一点并没有推翻唯物论，那最初作为原因而起作用的经济关系归根到底仍然是基础性的东西，在总的从属关系上经济运动仍然是起支配作用的方面，就象人类社会归根到底不能脱离自然界的基础和摆脱自然规律的支配一样。

例如，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就不仅是单纯地反映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且遵循它本身的内在规律性。法律作为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它的最基本的特性是必须保持自己内部的和谐一致，法律关系的每一个变化不仅必须是首先变化了的经济关系的反映，而且必须表现为某种普遍法律原则的较为一贯的运用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产生了职业法律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

立刻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部门，这个部门虽然一般地是完全依赖于生产和贸易的，但是它仍然具有反过来影响这两个部门的特殊能力。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①

因此，虽然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但它却很少把某一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掩饰地表现出来，在这里作为普遍原则的“法观念”，仍然是法律制定者的形式上的出发点。例如，1792—1796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底的法观念虽然在拿破仑法典中已经受到若干歪曲，但是，它连同拿破仑法典一起，仍然是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所遵循的基础。“这样，‘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②

这个过程在法学家的头脑中表现为一个完全从思想出发的过程。在法的制定过程中，经济关系转变为法的原则，这个反映过程是法学家本人所意识不到的，他总以为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是以某种思想观点的东西为出发点的。这样，在职业法学家的活动中，在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独立部门的法律领域内，它和经济运动的关系就被倒置过来了。而这种颠倒必定要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

①②《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484页。

法律原则对经济关系的这种相对独立性，被以往的思想家们绝对化了，他们认为法权体系的发展，是一个完全不依赖于经济而独立的过程，而不懂得它所获得的这种独立性只是相对的，归根到底法的发展乃是经济运动的反映而已。

恩格斯继续写道："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那末它们都有它们的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内容，即目前我们不免要称之为谬论的内容。……史前时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自己的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谬论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的确太迂腐了。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消除或是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论的历史。从事于这件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而且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在处理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①

所以，每一时代的宗教和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只能发生在这些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譬如说，若没有从先前时代流传下来的一定的哲学资料，单有经济的高涨，是决不会造成哲学繁荣的。在这里，经济本身不能创造出任何东西，它

①《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4—485页。

只能规定和影响现有的思想资料进一步改造和发展的方向。

意识形态的发展不是经济运动的自发的消极的反映，而是由历史思想家有意识地、积极地完成的。思想家们在每一学科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基础，这些资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过去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历了独立的发展道路。在这整个发展过程中它无疑要受到每一时代发生的各种外部事实的影响，其中尤其是经济的事实。但是，在思想家们看来，这些事实又似乎都是思维进程所产生的结果。这样，意识形态的发展就具有了完全独立的历史，它仿佛能消化掉最顽强的事实，并且成为全部历史发展的原始的原因。

正是宪法、法权体系和任何领域的思想观念所具有的独立历史这种外表，蒙蔽了大多数人。如果说在历史上，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末，这一切似乎只是神学、哲学和政治内部的一个过程，它们表现为各该思想领域发展的一个阶段并且完全未曾超出思想本身的范围。甚至在经济学中，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之“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做纯思想的胜利，而不是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维领域中的反映。

恩格斯在概括意识形态发展中的这个重大特点时写道：“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他只和思维材料打交道，他直率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

的，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这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人的行动既然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最终似乎都是以思维为基础的了。”①

由恩格斯所阐明的以往意识形态发展的具体历史特点对于理解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之前，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不是归结法和还原法，即不是把复杂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现象简单地归结为产生它们的经济基础，而是要从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出发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探索出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来寻找经济生活的内容是较为容易的，而要从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具体的观念形态却要困难得多，但是，只有后面这条研究道路才是唯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尽管有这个明确的指示，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总是有时间和机会来具体地探讨意识形态的发展所遵循的方式和方法，这就使巴尔特等人有可能按照机械论的模式来歪曲马克思主义。

1893年7月，恩格斯在给梅林的信中，谈到梅林在《论历史唯物主义》这篇附录中所存在的缺点时写道：“此外，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为，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

①《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1页。

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① “对问题的这一方面（我在这里只能稍微谈谈），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不应有的疏忽。这种情况过去就有：起初总是因为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就这样做过，错误总是在事后才清楚地看到。”②

看来恩格斯感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他不只是一般地给梅林的文章指出这个缺点，而且回顾和总结了马克思和他四十年的理论活动，认为必须就这一方面作出重大的修正和补充，不然就不能有效地对抗资产阶级批评家对历史唯物主义所进行的歪曲和攻击，也不能防止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对它作出庸俗化的解释。

资产阶级思想家及其在党内的代表通常有一个荒谬的观念，这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否认各种思想领域有离开经济运动而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他们也否认思想领域对经济本身有任何影响。他们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所否认的是思想观念等等的绝对独立的历史发展，认为思想观念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依赖于经济的。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思想等等的东西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使社会的上层建筑并不总是尾随在基础之后成为它的单纯的消极的反映，它常常表现为是由思想家们根据纯思想的原则创造出来的。

这样，上层建筑虽然在总的隶属关系上是决定于经济基础的，但在具体表现上它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又可以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情形，由于被思想家们当做出发点的思想观点各不相同，由此而建立的上层建筑既可能和经济基础相一致，也可能和它相矛盾，或者部分地相一致又部分地相矛盾。这些不同的情形必定给予经济基础以不同的影响和反作用。因此，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

①②《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0、502页。

决不单单是什么经济关系的自动的作用，上层建筑和思想领域内的斗争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据此，恩格斯明确地指出，恩斯特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实际上意味着贬低思想斗争和群众政治积极性的作用，崇尚经济主义和自发性，把社会主义降低为自由主义。

恩格斯认为，虽然上层建筑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运动终于要冲破上层建筑的阻力而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上层建筑仍然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或长或短地决定经济发展的进程。所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显然存在着交互作用，尽管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

恩格斯在谈到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时说道："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①

1892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了英国资产阶级顽固的宗教偏见所由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原因。这种顽固的宗教偏见形成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特殊的民族性格：在思想上它恪守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在政治上则富于妥协精神。所有这一切都对英国

①《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页。

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尽管有这种传统的惰性和阻力，经济运动仍然在通过曲折的途径为自己开辟着道路，它终究不能阻止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潮流。

恩格斯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因此，宗教也不能长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保护物。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近或远的枝叶，那末，这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除非我们相信超自然的奇迹，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宗教教义都不足以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①

由上可见，十九世纪90年代，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批评家和"青年派"的修正主义思潮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了重要的阐述和发展，这是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的很好的总结。

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2页。

责任编辑　王素馨

封面设计　舒　茵

书号：　2088·118

定价：(精装)5.50元

B
S
8